



宋斐如文集



卷四

宋斐如先生（一九〇二—一九四七）是我國台灣省台南人。即今台北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畢業。他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激情，於一九二二年二月西渡大陸，入北京大學就讀，與負有民族使命的《台灣民報》，或自辦雜誌，投入文化啟蒙運動。早在一九二五年就以發表在東京的《台灣民報》的文章《王悅之氏之謬談與北大台灣同人》，開始了他短暫卻厚實的、以文筆啟蒙與鬥爭的生涯。一九三五年，他到日本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修習政治經濟學專業，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帝全面侵華之寸前，毅然回到祖國中國，以他深厚的日本語文能力，得以多讀戰中日文資料，並以其精到的社會科學訓練，展開深刻的抗戰研究、日本敵情研究和台灣研究，對於我國抗日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對於光復台灣，對於將台灣同胞從日帝殖民桎梏中解放出來，做出了很大貢獻。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帝戰敗投降，台灣復歸於祖國。一九四五年十月，宋斐如先生回台，很快投入光復後台灣政治、社會和思想、心理的去殖民化重建工作，呼喚省內外同胞的團結與「溶合」，不遺餘力。不幸，回台後堅決站到人民群眾一邊的宋斐如先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台灣民眾因國民黨接收集團的惡政而嘩變後的鎮壓行非法逮捕，很快就仆倒在國民黨法西斯刑場。英年而壯烈犧牲，得年僅四十五歲。嗚呼！

—— 陳映真



定價：250 元

宋斐如文集 卷四

第五輯 日本經濟

深圳台盟 主 編

楊 益 群 執行主編（特邀）

宋斐如文集 卷四／第五輯・日本經濟

著者 宋斐如

發行人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5963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review@s4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師大路一六五號

電話：(〇二) 二三六七七八七八 傳真：(〇二) 二三六七七四三二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二三五)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六六巷十號十樓

電話：(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八 傳真：(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三

香港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香港〕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三〇之三二號華耀工業中心十四樓十室

電話：(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八九八 傳真：(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〇〇五

澳門總經銷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三七一二九號地下

電話：(八五三) 五八一四一八 傳真：(八五三) 五八一四二五

排版所 偉旭資訊工作室 (〇二) 二五八五四四四四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七三三六四三

初版 二〇〇六年三月廿五日

定價 二五〇元(平裝)

劃撥帳號 一九三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 986-7359-39-9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宋斐如文集. 卷四 / 宋斐如著. -- 臺北市 :
海峽學術, 2006[民 95]

面 ; 公分

第 5 輯 : 日本經濟

ISBN 986-7359-39-9 (平裝)

1. 經濟 - 日本 - 昭和時代 (1926-)

552.31978

95003829

目錄

宋斐如文集 卷四

第五輯 日本經濟

日本帝國在遠東的情勢及其前途（一九三〇年七月）／ 3

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

——日本經濟的衰落與東北事件（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53

日本戰時經濟編制中的原料問題及其政策的動向（一九三七年一月）／ 79

日本侵略戰爭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危機（一九三七年九月）／ 97

日寇對我侵略戰爭中的勞動問題（一九三八年三月）／ 102

日本侵略戰爭中工業危機的發展（一九三八年六月）／ 111

美國新經濟恐慌對於日本的影響（一九三八年六月）／ 121

日本農業經濟的特質（一九三九年六月）／ 129

日本貨幣政策的新攻勢（一九三九年七月）／ 135

日本帝國本質論

——軍閥官僚統治的經濟基礎（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月）／ 137

日寇南進前的財政狀況（一九四一年三月）／ 173

日本半封建的農業經濟

——解開日本帝國特質之謎的一把鑰匙（一九四一年六月）／181

日寇通貨膨脹的新發展（一九四一年七月）／220

日寇的物產及動力總剖述（一九四一年七月）／226

日寇戰時的死亡問題（一九四一年九月）／239

日本人口問題與移民政策（一九四三年五月）／244

日本產業統制的三種制度（一九四三年九月）／249

日本糧食增產政策的批判（一九四三年九月）／253

日寇的「超重點」產業（一九四三年九月）／260

日本戰時中小工業的沒落（一九四三年九月）／265

美國雄厚生產威脅下日本船運的苦難（一九四四年一月）／269

第五輯 日本經濟

日本帝國在遠東的情勢及其前途

一、日本帝國的勃興

日本原是蕞爾小國：本土於一般所常提及的三島（本州、九州、四國）之外加以北海道（或稱蝦夷），總面積也不過二五，一五一日方里，約當我國滿蒙地方總面積三分之一；其本土的人口總計，即在開國維新後已將二十年的明治十九年度，也不過三八，八三三千人，其在明治維新前鎖國時代，總人口尚不及此數，據一般的估計，必在三千萬以下，不及我國總人口十三分之一。

然而，原是蕞爾小國的日本，自從開國維新後僅及六十餘年，拓地北及庫頁島，南及於南洋群島中之一部分，朝鮮、台灣成其良好的殖民地，關東州成其心目中的無期租借地，滿蒙地方也成其心目中的領地，他的勢力尚且西及於中國內地，尤以福建為甚，走南瀾漫於南洋群島間。現在他居然一躍而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寧可以說是先進帝國主義國家——的英、美、法、意並肩齊立，稱曰世界五大強國。不惟如此，他的勢力，若僅就東方而論，實足占據盟主的地位，自列強的眼光看來，也是推他為東方主人翁。不數十年間，竟能這樣的突進，這種變化和膨大，不算不急激強烈！我們既想在本論文中討論日本帝國在遠東的情勢——現在的情勢，那末，我們對於日本這種急激而且強烈的變化和膨大，換言之，即日本帝國的勃興，自然不能不加以詳密的認識，將其變化膨大的經過，概述一下。

自十五世紀以來，歐洲各國開始向海外的發展，其勢漸及於遠東。當時稱雄於西歐

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自十六世紀初葉，即已繼續要求中國開港通商。

入十七世紀以後，歐人之來往中國者日益繁雜，和中國發生國際上的關係的國家，也日益加多。即遠處北方的俄羅斯，也經由西比利亞南下而至於遠東。隨著歐人的東漸，而基督教也日益普遍傳播於東方。日本睹此西力東漸，基督教漸漸蠶食東方舊有的宗教——在日本尤其是佛教——等等情勢，恐其影響將及於政治上、國勢上。於是，當時執掌日本國政的德川三代將軍，家光，即於一六三九年，即明末崇禎十二年，頒布〈鎖國令〉，嚴禁人民和任何外國人的交往。這種政策，一般的稱「鎖國政策」，這個時代，一般的稱「鎖國時代」。這種鎖國狀態，竟達二二五年之久，一直繼續到日本永嘉六年，即一八五三年，日本史上之所謂「黑船」的襲來（一八五三年美國提督白里統率軍艦迫至日本浦賀，說服日政府開國，日本君民對此未曾見過的軍艦，就稱為黑船），始首先和美國締結日美條約為止。不久，英、法、俄各國，也都接續和日本締結了同樣條約。於是，自從一六三九年，繼續下來的日本鎖國狀態開始打破，而約略繼續了二一五年之久的日本鎖國時代終了。從此以後，日本就加入了國際上國家團體的隊裡，而日本勃興的頭緒，即在於此。

日本自從海禁開放以來，即受歐洲資本主義的熏染，第一在產業方面，先步歐洲諸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後塵，而普遍地起了產業革命。惟是日本產業革命的萌芽，雖始於德川幕府的末期，但其充分發達，卻是在於明治維新之後。這是因為明治維新以前，受到歐美資本主義的熏染孕育起來的經濟上的新的關係尚未成熟，而舊封建勢力尚為產業發展的桎梏，法制上，尚有許多束縛產業自由發展的條例。例如禁止土地的自由買賣，限制農作物的種類，社會階級關係的因襲固定……。自明治維新後，日本國權收歸天皇掌握，日本君臣銳意於解除束縛產業自由發展的各種因素，以順應世界資本主義發達的趨勢，於是日本的經濟勢力，就日漸發達，終於達到現代的產業階段。

日本產業革命，先自農業的發達始。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順應時代的要求，先將束縛農業自由發達的各種限制全部解除，例如承認農業的經營自由，完全承認土地的私有權，田賦的改革和稅金的減少……皆是。其結果，農業完成了長足的進步。茲就主要農產物的米蠶產額的發達數字，以為代表，列表於下：

米蠶產額發達表

年次	米產五年平均(千石)	蠶絲產額(千貫)
明治十三年	二九,八一	五三三
明治十五年	二九,九五八	六六一
明治二十年	三四,五七七	一,〇二三
明治二十五年	四〇,三五五	一,六一九
明治三十年	三九,二六五	二,一六七
明治三十五年	四四,六四三	二,五五八

(備考) 本表根據《明治大正農村經濟的變遷》編製成的。

明治十三年以前，雖無統計材料，可用以證明農業的發達，但是明治十三年以前，只可視作發展預備期，僅以明治十三年後的數字，也就足以充分證明產業革命後日本農業的發展。明治十三年後的米產額，只有二九，八一，八一千石，蠶絲產額也不過五三三千貫。其後則如表格所指示的，年有增加，至二十二年後的明治三十五年，米產額竟達四四，六四三千石，約增二分之一，蠶絲產額也達二，五五八千貫，約增五倍之多。

此外，農業基本要素的耕地面積，也有巨大的增大。明治十三年耕地總面積，只有

四，三一三千町步，至明治三十六年，就增至五，二六七千町步，約增五分之一有奇。

以上所述明治維新後農業經濟的發達，只是日本帝國勃興的產業基礎，還不是充分發達而足為日本帝國主義構成要素的產業的全部形態。我們要知道日本產業發展的全部形態，還須求之於近世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具條件的工業情狀，要應求之於資本主義成立要素之一的公司制度發展的情形。根據《明治大正產業發達史》所載日本農商務省每年底的調查，明治十七年各種企業公司的總數目，只有二，三九二所，資本金總額，也不過一〇〇，九五一千元；及至八年後的明治二十五年度，各種企業公司的總數目，則達五，六四四所之多，約增一倍半，其資本金總額，也增至二八九，三三四千元，約增兩倍之多。其中，代表資本主義發展的工業公司及水陸運輸公司的增加，尤其厲害。明治十七年，工業公司的資本總額，只有五，〇四八千元，至二十三年竟增至七七，五三〇千元，約增半數之多；在十七年，僅占各種企業公司資本金額四，九六%，至二十三年，竟升至占各種企業公司資本總額二四·六七%。水陸運輸公司資本金的增加：明治十七年，只有六，八九二千元，至二十三年則增至一〇三，六三一千元，其增加尤其厲害，在明治十七年，僅占各種企業公司資本總額六·八二%，至二十三年，竟占總額三二·九八%。

根據以上所列數字，即可知道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達的急激，而這種急激的經濟發達，才是構成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要素，有了這種經濟的基本要素，再加以內政的修明和外交上、戰略上的勝利，於是蕞爾的日本，就一躍而躋於世界五強之列。以下再談談日本帝國勃興的戰略上、外交上獲得勝利的經過。

促使日本帝國勃興的戰略上的勝利，最主要的就是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促使日本帝國勃興的外交上的勝利，最主要的就是取消不平等條約的恢復國權。且分述於下：

中日戰爭是在光緒二十七年七月開始的，其結果，即自我們推想當時雙方的情形，自然中國是要失敗的。中國戰敗後，兩國間成立了馬關條約。馬關條約的重要內容：

(一) 中國確認韓國為完全獨立自主國。

(二) 中國割讓左列地域及該地域內的城壘兵器工廠及一切官有物給日本。

1. 奉天省南部，即自鴨江、溯江至平安河口，從該河口劃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為止。所有折線以南地方及遼東灣東岸黃海北岸屬於奉天省諸島嶼，概為割讓地。

2. 台灣全島及其附庸島嶼。

3. 澎湖列島。

(三) 中國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二億兩。

(四) 中日舊約作廢，新約均以中國與歐洲各國現行約章為基據。

(五) 中國於現今已開通商口岸之外，又新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日本得置領事官，且享有中國已開市場之同一特典與便利。

(六) 自宜昌至重慶，自上海入吳淞江，入運河至蘇州間之航路，准日本汽船自由航行。

(七) 日本臣民得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自由從事於各種工業製造。

上項馬關條約締結後，日本所得利益與權利非常巨大。已認韓國為獨立，又割遼東以斷中韓的聯絡，而朝鮮則實已落其掌中。日本從此可以根據旅順、大連為海軍根據地，以制黃海、渤海的海權，因而扼中國北部數省的命運；又據澎湖群島為海軍根據地以制南海海權，因而扼中國南部數省的命運。這二處海軍根據地，且於未來太平洋戰爭，及其南侵向南洋群島發展上，大有幫助。此外，尚享片面的最惠國條款，得在中國各通商口

岸從事機器工業的製造，以從經濟上剝削中國財富，而中國工業則被制於死命了。

嗣後雖因俄、德、法三國的干涉，放棄遼東半島的永久占有權，即將馬關條約第二款所規定奉天省南部割讓地全部返還中國，而由中國償與庫平銀三千萬兩，以為代價。雖則如此，而日本由中日戰爭的勝利所獲得領土與利權，尚屬巨大。

如上所述，日本因中日戰爭的勝利而獲得的領土與利權雖屬巨大，但尚不克因此而躋於「一等國」的地位。再經日俄戰爭獲得勝利之後，始完成了世界強國之一的實質和資格。

日俄戰爭基本原因，不消說，一方面是因為遠處北寒帶的俄國急於向南發展以便打通出海的道路，而經由滿洲也是通海之一路，一方面是土地狹小的日本企圖向西向經濟大陸以為發展帝國的張本，於是兩個強國，就在中國的東北部碰個滿懷，利害處處相衝突。在這種情勢之下，再加以昏庸不識時務的中國政治家，運用什麼「以毒攻毒」的外交政策，而日俄兩國的戰機，就一觸即發了。

日俄開戰的結果，出人意料之外，長久期間稱霸於歐洲的大俄帝國，竟敗於新興蕞爾的日本。惟有一事，正如我們所推論得到的那樣，大約那時代的人們也豫想得到，日俄兩強作猛獸鬥的結果，戰敗者對於戰勝者應負的賠償義務，就完全完全轉嫁在我們這個善於運用「以毒攻毒」的外交政策的中國身上——實在只是中國民眾的身上。我們且檢點日俄的媾和條約看：

波子瑪斯媾和條約（也即我們所要檢點的日俄媾和條約）中所規定日本由俄所得種種的利權及土地，以為戰敗國的賠償條件的，實質上莫不是中國的所有物。且列舉有關的款項於下：

一、俄國承認日本對於韓國有政治上、軍事上，及經濟上的卓絕利益。日本對於韓

國，認有指導保護及監理之必要處置時，俄國不得加以阻礙，或干涉。

二、俄國經由中國政府之承認，而將旅順、大連及附近領地領水之租借權，及與租借權相關聯而組成的一部或全部權利，或特權，讓與日本。又租借權效力所及地域之一切公共房屋及財產，也全部讓與日本。

三、俄國經由中國政府的承認，將長春（寬城子）、旅順間的鐵路，及所有支線，以及附屬於該地方的一切權利、特權、財產，及其所經營的一切煤礦，無條件地讓與日本。

日本因日俄戰爭而由中國所獲得權利和土地，在上列各項之外，尚有協定滿洲鐵路守備兵附約中所規定：

「兩締約國為保護滿洲鐵路起見，允許日本得於每基羅米突，置守備兵二十五名」。此外尚有滿洲善後協約的締結，且舉其中有關於日本獲得利權的條項於下：

一、中國政府允將安東、奉天間的軍用鐵路，仍由日本政府繼續經營。……

二、中國政府允許南滿鐵路所需各項材料，豁免一切稅捐釐金。

三、營口、安東、奉天府各商埠，由中日兩國派員劃定日本租界。

四、中國政府允設一中日合同材木公司，以採伐鴨綠江右岸的森林。

五、滿韓交界陸路通商彼此以最惠國之條款待遇。

根據以上各項所規定，日本不但承繼了俄國原來在中國所有的一切利益和權利，並且迫開東三省千餘處的商埠，以便其向滿洲做大規模的移民，又取得陸路通商的最惠待遇，及安奉鐵路的經營權。

日本除由中國所獲得利權和土地之外，尚有俄國取得土地和權利。波子瑪斯條約，尚有下列二項規定：

一、俄國將樺太島（即庫頁島）北緯五十度以南的半部，及其附近的一切島嶼，以及該地方內的一切公共房屋財產的主權，完全讓與日本政府。

二、俄國允許日本臣民，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的俄領沿岸，有漁業權。

諸如以上所述，日本因為日俄戰爭的勝利，得到種種的利權和土地，由這時候起，世界各國始看上遠東的島國，而承認其列入於世界第一等國的班次，推其為亞洲盟主。並且，日本此次戰爭所得，尚不止上列利權和土地，其後合併韓國及經營滿洲，實皆發端於此。日本帝國的勃興之得力於日俄戰爭者，誠屬不小？

然而日本雖因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而由中國獲得的種種利權，和廣大的領土，但其與歐美列強在國際上的對待關係，仍然有很多不平等之處，如又是積極的進行取消先前和歐美各國所締約的不平等條約，恢復國權，這一層，對於日本帝國的勃興，也大有關係，且概述其經過於下。

一八五三年，美國提督，白里氏（Perry）率領美國艦隊航行至日本，對於當時掌握政權的德川幕府，解說世界大勢，力勸日本開國，翌年始締結日美條約。不久，俄、英、法等國，也都和日本締結略與日美條約相同的條約。這是日本和列強締結條約之始。

然而因為這些條約太過簡單，關於交通貿易上的規定，還是不充分，於是至安政五年，即一八五八年，重在江戶（其時的首都），與英、美、法、俄、荷五國改訂新約，稱之為安政五國條約，或稱舊約。這個安政五國條約的締結，因為當時日本的外交家，正如清季的昏庸外交家一樣，致使所訂者皆為束縛日本稅權和法權的條款，即置日本國民於不平等的國際地位的「不平等條約」。

在上述稱為安政五國條約的不平等條約中，規定最詳細的，就是日英條約。日英條約第三條，規定：日本開放神奈川、長崎、函館、新潟、兵庫、江戶、大阪等港口，並

且在這些港口，創設了「居留地」制度。同約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七條，承認英國享有領事裁判權。關於關稅，起初雖因美國公使的周旋，限定輸出稅為從價五釐，輸入稅最高為從價三分五釐，但後因日本拋延了條約上的開港義務的履行，於是被迫而以輸入稅的減低為其代價，重於慶應二年（即一八六六年），在英、美、法、荷等國的關稅修約上，規定輸出輸入概以從價五釐為基準的從量稅率。這是日本對於歐美各國的不平等條約內容的大概。

日本要強盛起來，在理論上非先撤廢這些不平等條約不可；即自實際上說，日本也因為這些條約的廢止，費了不少的努力和苦心。日本政府在上述條約的改訂期的明治四年（一八七一年），特派岩倉等人為特命全權大使，到歐美和列國接洽修改舊約。所提議的大意，是：三府五港允許外人雜居，撤廢居留地和治外法權，允許外人自由旅行內地，日本法庭採用外國法官，委托外人以編纂民法和刑法。但其結果，除美國略與同情外，再也沒有一個國家傾聽這種提議。

日本不但明治四年所企圖的全部改約，終歸失敗，即明治十年（一八七八年），外相寺島宗則的計謀，先單獨恢復稅權，廢止協定稅率，自主地提高稅率，也一樣總歸於失敗。

繼寺島之後，外相井上馨，也曾在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年），向各國提出法權與稅權的部分修改，但也未得各國的承認。井上氏又於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年），在東京和十二國代表會談，開了條約改正預備會，提議開放日本內地，而以恢復法權和稅權的一部分，為其交換條件。但所恢復的程度，極其輕微，反惹日本國內的反對，於是這個談判遂成無期延期。

其後，復經大隈重信、青木周藏、榎木武揚等外相，熱心活動於恢復國權，當中也

曾幾次微露過成功的希望，但也終於毫無效果。

至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年），日本的特出的外交家，陸奧宗光，始一掃過去的條約改正談判的懸案，樹立相互的、對等的改正案，以進行單獨交涉，先與英國談判成了功，其後，美、意、德、法等國。也都相繼而簽字於這個改正條約上。且舉這個改正條約之關於法權各項的要點於下：

一、日本允許開放全國；外國人要受日本司法權的支配。

二、在日本的外國租界，編入所在地的日本市區，為日本地方組織的一部分。其屬於租界的共有財產和資本，概交日本官吏。

三、自新約實施之日起，以前所訂修好通商條約，作為無效，領事裁判權完全撤廢。上列三項是關於日本所收回法權的部分。這次修正條約，是在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年）各國一同實施的。到此時日本關於法權方面的不平等條約，可以說完全撤廢。惟關於稅權，則尚殘留著部分的協定，至最近年始完全恢復；但也可說大部分稅權是自主的了。

日本的取消不平等條約運動，恢復國權，雖大費苦心，並且得助於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也屬不少，但是這個國權恢復的成功，大為資助了日本帝國的勃興，也是不容疑義的事實。

日本帝國勃興的條件，除去上述經濟的、戰爭的和外交的三條件而外。內政的改革和修明，也大有關係。日本至明治初年，始廢除封建的諸侯制度，而採取中央集權制，國家大權收歸天皇，創定憲法，採用責任內閣制，順應時勢的轉移，利用新興的民氣。而名聞東西的明治天皇及其一代的良臣，始得從立法、行政、司法各方面改革內政，完成了日本帝國的勃興。但是關於這點，想加說明未免太過於籠統，且是一般人所具有的

平凡的觀念，所以這裡為節省篇幅起見，只得從略。

二、日本帝國主義向外發展的經濟解釋

近代無論那一個帝國主義者的勃興，盡都採用富國強兵的政策；即在現在，還是在極力加濃軍國主義的色彩。日本在明治初年，即已極力獎勵人口的蕃殖和國富的增加。

日本政府極力獎勵人口蕃殖的結果，日本國的人口，居然以急速的增加率膨脹起來。自明治初年以迄大正末年，為時未及五十年，其膨脹的程度，幾乎增加一倍。且看次列表格：

日本人口增加實數表

年次	實數(千人)
明治十二年	三五，七六九
明治二十年	三九，五一〇
明治二十三年	四〇，九六九
明治二十六年	四二，〇六一
明治二十九年	四三，五〇〇
明治三十一年	四五，四〇三
明治三十六年	四八，五四三
明治四十一年	五一，七四一
大正二年	五五，一三一
大正七年	五八，〇八七
大正九年	五五，九六三
大正十四年	五九，七三七

根據上表，明治十二年的日本人口，只有三五，七六九千人，至日俄戰爭前的明治三十六年，則已增至四八，五四三千人，幾乎增加了半數。

國富方面，也年有急激的增加。只就耕地面積說，在明治十三年，只有四，三一二千町步，至明治三十六年，就增至五，二六七千町步。日本主要農產物的米和蠶絲，其產量也各有飛進的增加：米產量在明治十三年；只有二九，八一一千石，至明治三十六年，就增至四三，九八五千石；蠶絲的產額在明治十三年，只有五三三千貫，至明治三十六年，竟增至二，五九二千貫。（附注——此節數字，是根據《明治大正農村經濟的變遷》書中的附表的。）在近世國富增加的源泉之中，第一要推各種企業公司的經營為首位，所以各種企業公司經營的發展如何，也可以間接證明一國財富的增減，且將日本各種企業公司經營發達情形，列表於下：

年次	公司數(所)	資本金(千元)
明治十七年	二,三九二	一〇〇,九五—
明治二十五年	五,六四四	二八九,三三四
明治三十五年	八,六二二	八七八,七六三
明治四十一年	一〇,八五六	一,三三七,二八三
大正元年	一三,八八七	一,七五六,六一〇

備考：本表根據《明治大正產業發達史》編製而成的。

根據上面所述，再參照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日本的獲得勝利，可知日本富國強兵的成績的優良。但是我們再反轉過來想，「興國之力，即亡國之力」，至少，也可以從

某方面說是威脅國家存在的勢力。若從社會學上推論說，則無論那一個國家，都因為某種環境的壓迫而興盛起來，因為他的興盛而受到國家存立的威脅。促成日本帝國勃興強盛的急速的人口增加，和急激的產業發達，到後來，事實上已經成了威脅日本帝國的存在及其繼續發展的勢力。換一句話說，日本如不另謀「向外發展」的方策，則在其帝國的存在和發展上，是很危險的。所以，日本帝國自從明治中年以來，即已汲汲於向外的發展和殖民地經營。

日本帝國之所以急於向外發展的基本原因，我們可以在強盛日本帝國的最基本的動力，即經濟的動力求得之。這種日本帝國之急於向外發展的經濟上的原因，大約可以分為下列三種：

- 一、人口的極度膨脹；
- 二、本國資源的缺乏；
- 三、產業發展的停頓。

日本人口的膨脹程度，在世界各國中，占著相當高層的地位。且將世界各國的人口增加率，列表於下：（見下頁）

〔備考〕參照本刊第二期〈朝鮮問題的真髓〉

國別	人口增加率(%)
日本(本國)	一三·一
奧地利	二〇·一
加拿大	二〇·〇
丹麥	一七·一
荷蘭	一四·五
意大利	一〇·六
瑞典	六·七
英吉利	四·四
瑞士	三·五
德國	二·三
比利時	〇〇·三(?)
法國	五·五

根據上表，日本人口的增加率，在世界上算占第五位。

再根據朝日常識講座之〈人口問題講話〉的統計數字，編成下表，以示世界各國人口的密度：

國 別	面積 (千平方杼)	人口 (千人)	密度 (人/平方杼)
日本 (本國)	三七九·九	五九, 七三七	一五七·二
中國 (本國)	四, 一六八·八	四〇七, 二五三	九七·六
暹羅	五一八·四	九, 六一八	一八·五
阿富汗	六三五·〇	一〇, 〇〇〇	一五·七
波斯	一, 六四七·〇	九, 〇〇〇	五·四
土耳其	一, 二八〇·八	一〇, 〇〇〇	七·八
英國 (本國)	二四四·〇	四四, 三一四	一八一·六
印度	四, 七二二·二	三一九, 六九三	六七·六
法國 (本國)	五五一·〇	三九, 一九八	七一·八
意大利 (本國)	三〇九·七	三九, 六九三	一二八·二
比利時 (本國)	三〇·四	七, 七四四	二五二·六
荷蘭 (本國)	三四·二	七, 三一五	二一三·九
西班牙 (本國)	五〇五·二	二一, 七六三	四三·〇
葡萄牙 (本國)	九二·〇	八, 〇三三	六五·五
丹麥 (本國)	四三·〇	三, 二六八	七六·〇
瑞典	四四八·五	六, 〇三六	一五·〇
德國	四七二·〇	六三, 三〇九	一三四·一
蘇俄	二六, 八七六·七	一三九, 七六一	六·七
美國 (本國)	七, 八三九·一	一〇五, 七二一	一三·四

根據上表，可知日本人口的密度，在世界各國中，占第四位。於此，我們可以理解，日本人口問題已達相當緊張的程度，而成為日本帝國急於向外發展的一種原因。

無論那一個國家，想在世界經濟市場，占相當位置，第一必須「資源豐富」。蓋因想在世界市場爭勝，先要具備「貨美價廉」的條件；而要具備這些條件，非國內，或在勢力範圍內有豐富的資源不可。例如：英國、美國及大戰前的德國，因其國內及其殖民地，各具豐富的資源——尤其是煤、鐵、棉花、羊毛、食料等物——所以就能夠在世界經濟界占優勢。至若缺乏這些資源的大戰前的法國及意大利等國，就不能夠在經濟方面充分發展了。

現在回看日本的情狀，他近年來生產技術，雖然進步些，但其本國的資源卻極其缺乏。近年來日本鐵的生產，幾等於無；煤雖有多少出產，但也因其生產費的昂高而被局限著。這二種近代產業的基本資源的缺乏，實是日本帝國的經濟發展的致命傷。其他，如棉花和羊毛，要完全仰給於外國，化學工業的重要原料苛里，也絕對缺如，食料也感不足。即如從前資助日本工業發達起來的微乎其微的礦產，經不幾何時，也已幾乎採掘淨盡。

日本的資源，既如上述那樣缺乏，日本帝國不想企圖經濟上的發展，或維持其帝國的威勢便罷，否則，必須另找出路。日本帝國君臣所認為唯一的出路，就是擴充領土，經營殖民地。日本帝國的君臣，在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前，即已覺得本國領土狹小之岌岌可危，和國內資源缺乏，高級的經濟發展之無望，而急於擴充領土和經營殖民地的企圖。其結果，乃發生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而奪得台灣、朝鮮、關東州、庫頁島等地，獲得滿蒙地方的經營權。

然而日本第一期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為什麼這麼短命？

日本的產業革命的完成，是被動的，而其於短期內完成了第一期資本主義的發達，是基於下列三種原因：

一、歐美在數百年間費多大心血而始完成的科學和技術，日本則於數十年間，照樣模仿過來；

二、假借關稅的壁壘及保護政策，以限制外國產業的競爭力，所以容易在本國內，完成本國市場的產業發達；

三、利用工資低廉的勞力，容易戰勝外國產業的競爭力。

然而日本帝國的第一期資本主義所賴以發達的上述三種條件，是極靠不住的。例如第一項的模仿，不久就會達到飽和點。後進的產業國家——尤其是中國——容易起而以膏血工業（Weaving industry）與之競爭；第二項的保護政策，只限於專以國內市場為銷售地，始能有效，但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用多少時候，就會進至以世界市場為銷售地的地步，尤其是地狹人少如日本者，其達到這個地步的距離，更加短促。日本產業，在日俄戰爭前後即已停頓，非轉換第一期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進而採取第二期的精工業化的方針，轉以世界市場為銷售的對方，則無向前發展的希望。日本農業的發展，也自那時候起。發展率日漸低落，到近年，其耕地面積和產量，甚至竟絕對地減少了。第三項的低廉工資，也是靠不住的，社會環境一進步，工人的生活程度，也就要提高，他們的生活費也自然增多，而維持他們的生活的工資，也自非增加不可。並且，工人們的生活費的增多，大部分是由於地主、資本家、貸金家來的，這層容後再談。

我們雖如上述，把日本帝國的企圖向外發展，侵略外國領土，經營殖民地的原因，歸結於（一）日本人口的極度膨脹，（二）日本國內資源的缺乏，（三）產業發展的停頓；但是這三種原因，只是表面上的吧了，至若潛在的基本原因，則另有所在。我們敢

斷言：日本帝國之所以這樣急於向外經營，是因為充當日本支配階級的資本家（包括地主、貸金家、企業資本家）的「營業利潤減少」的緣故。這層的詳細理由，使到《日本帝國僵局的正當解決策》的章裡，再來討論，這裡不過先略為一提就是了。

三、日本帝國與朝鮮

日本之吞併朝鮮的經過，不是作者所想像敘述的範圍，並且在《日本帝國的勃興》章裡，讀者已可得到一個概念，所以在本章裡，只就日本吞並朝鮮的原因，及日本經營朝鮮殖民地所得報酬，敘述一下。

日本吞併朝鮮的原因，約可分為：

（一）戰略上的原因

日本地狹人稠，產物缺乏，其向外發展，經營殖民地，既是決定之數，且因地理上、人種上、文化上的種種關係，自以經營亞洲大陸為第一策。日本第一就注意到朝鮮，想占朝鮮以為蠶食亞洲大陸的軍事上的根據地。

（二）經濟上的原因

日本自經產業革命後，完成第一期資本主義經濟的發達以來，各種產業即陷於停頓。因此，日本就急於擴大領土的企圖，第一步先征服了琉球，第二步就輪到朝鮮的運命上。

但將上列二種原因歸結起來就只有一種，即經濟上的原因。至若戰略上的原因，歸根起來，也無非是經濟上的原因；這是自明的道理，無庸多加說明。以下且將日本經營朝鮮所得的成果，分別敘述一下。

朝鮮全境的面積，約有一四，三十二日方里，較比中國之遼寧省大些，約略等於日本的九州（日本九州的面積一四，五七一日方里）。各種物產均極豐富，農產物，於五穀外，尚有麻、苧、烟草、番椒、棉、蔬菜等物。此外，白芋、馬鈴薯遍產於全韓，栽培容易，桐產也遍於全韓，品質優於日本國產。礦物、金產量最為豐富，石灰、鐵、銅的產量次之，他如重石、水鉛、石棉、雲母、銀、鉛、花崗石、石灰石、石版石、臘石等物，也出產不少。朝鮮正當寒暖二流的交界，所以水產種類，特別多，產量也極豐富。鴨綠江，圖們江上流的森林，遙延數十里，面積共有一五，八八三千町步，林木計有十數種，也是朝鮮豐富物產之一種。此外，尚有一種朝鮮的特產，即一般人所稱為高麗人參者，價昂量多，每年的收入也屬不少。

我們再來檢點朝鮮在日本帝國所占的重要性和日人在朝鮮所經營各種產業狀況看。朝鮮因為是處在殖民地的地位，所以其本土的各種產業愈益發達，而朝鮮人民則日益貧窮化。但其反面，卻替日本帝國解決了許多種的困難問題。

朝鮮替日本帝國所解決的難題，第一就是「人口問題」，和「糧食問題」。朝鮮因為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所以處在日本自由移民目的地的運命之下。且將明治四十三年以降，日本人移住朝鮮的數目，列表如下：（見下頁）

年次	實數(人)
明治四十三年	一七一,五四三
大正元年	二四三,七二九
大正五年	三二〇,九三八
大正十年	三六七,六一八
大正十四年	四二四,七四〇
昭和元年	四四二,三二六

備考：本表根據本刊第三期。

於此，朝鮮替日本帝國解決了不少成分的人口問題，可想而知。但是朝鮮，一方面由日本及其他外國移入人口，他方面本土人民卻被擠向外移出，例如移向滿洲、日本內地，而成了失掉家鄉的漂泊者。這是處在殖民地運命下的人們所最痛心的一件事。

朝鮮的農業，自經日本經營以來，的確有了充分的進步，但是這種充分進步的成果，大部分是為日本帝國的人民所享受，換句話說，替日本帝國解決了不少成分的糧食問題。且將近年，占朝鮮農產物最重要地位且為日本國民所最需要的米的出口量列示於下：

年次	總出口量(石)	指數	移出量(石)	指數
明治四十四年	五四四,〇六三	一〇〇	三〇八,九八二	一〇〇
大正七年	二,一二〇,一五二	三九〇	二,一一九,八〇三	六八六
大正十四年	四,七五八,〇六八	八五七	二,七四五,〇二六	一,五三七

上表「移出量」是指移向日本內地而言的。朝鮮每年的移出量，占總輸出量半數以上；且其移出量的指數，呈顯著愈益增高的趨勢。

朝鮮全土適宜於農耕，南部的氣候溫暖，更適於農作物的發育。冬季宜於種麥，夏季宜於水稻，發育均極順適，產量也極豐富。自經日本極力經營以來，其進步頓加猛進。且將表示農業經濟發達最顯明的耕地面積，列表於下：

年次	耕地面積(町步)
明治四十三年	二,四六四,九〇四
大正九年	四,四五〇,〇九九
大正十年	四,四六六,七六六
大正十一年	四,四五二,二一七
大正十二年	四,四六九,〇七九
大正十三年	四,四八二,七二九
大正十四年	四,五〇一,六四六

此外，未開墾地面積，大約尚有：河邊荒地七四千町步；海灘地二〇七千町步；山麓傾斜地八〇〇千町步。

根據上述，可知朝鮮是多麼重要的農業地帶。但在這個重要的農業地帶，其耕種形態怎樣？朝鮮的耕地面積，過半數是為大地主所有；並且愈益表示著土地兼併的趨勢。在大正八年，大地主的數目，只占農家總戶數〇·六%，至昭和元年就增至〇·七%。地主也由大正八年的二·八%，增至昭和元年的三·一%。只這個數字尚不足以充分指

示土地兼併的全貌。因為這個數字，只是地主數目的增加，而事實上，每個地主所有土地面積的增加，恐更甚於此，是極明的道理。

並且，上述土地的兼並及耕地經營的形態，於階級的集中之外，還帶著民族的色彩。這種民族的色彩，才是日本帝國經營殖民地的代價。且依照日韓種別，把各種農戶在農家總戶數中所占百分比，列表於下：

	自耕農(%)	自耕兼佃耕農(%)	佃農(%)
日本人	三一·一	四一·四	二七·五
朝鮮人	二〇·六	三四·五	四四·九

根據上表，可知自耕農和自耕兼佃耕農，是日本人占多數，而佃農則歸朝鮮人占多數。朝鮮礦產也極豐富，茲將日韓合併以來的礦產全部產量所值金額，列表於下：

年次	金額(日金元)
明治四十三年	六,〇六七,九五二
大正九年	一四,二〇四,六八八
大正十年	一五,五三七,二二五
大正十一年	一四,五〇三,七八一
大正十二年	一七,三二六,八九四
大正十三年	一九,一七六,四六二
大正十四年	二〇,八七六,九六四

他如日本本國所缺欠而又是近代工業上最需要銑鐵、石炭、鐵礦的豐富產量，尤於日本帝國的經濟發展上，有更大的益處。此三種礦產，大正十四年度產量及其價格金額：

	數量	金額(日元)
銑鐵	一〇一，九三二噸	五，三八六，四八九
石炭	六二二，三〇四貫	四，五四八，五三五
鐵礦	三五一，四四四噸	五，一七九，七七八

日人在朝鮮所經營產業之中，漁業與水產製造業，也占重要地位。且參照下表：
日本人在韓漁業與水產製造業的狀況

年次	漁業產量(日元)	水產製造額(日元)
大正十二年	二六，六〇六，二九〇	一一，二八四，八五三
大正十三年	二七，一六九，八八三	一一，七二四，八八八
大正十四年	二六，七〇七，六〇七	一一，七五三，一五二

而且這些數目，均占朝鮮全部水產量的過半。
自一般說，日人在韓所經營各種產業之中，規模最大而利益又最豐富的，要算是工業。且將幾種主要的工業，列表於下：

日人在韓所經營主要工業概況表（大正十四年）

種別	工場數	資本金（日元）	生產額（日元）
製棉業	三四	五，二四六，四〇〇	六，九二八，一〇七
棉紗業	三	五，〇五〇，五〇〇	一，二八五，九四一
生絲業	二六	三，七〇六，六〇〇	七，一三五，七二六
製材業	五一	二，九五七，三〇〇	四，三八七，八三二
製鐵業	一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四〇五，〇九一
碾米業	四八四	一七，四四二，三〇〇	一二六，二七三，三四二
製糖業	一	二七，二五〇，〇〇〇	八，六九四，八四三
瓦斯及電氣業	四二	二三，〇五七，三五七	五，二七七，五二四

在上列工業之上，再加上其他所有工業，則其合計總數：工場數二，〇八五所，資本金二二二，八六八，五九九元。若將次數目，拿來和朝鮮全部工業的數目比較看，則日人在朝鮮工業界所占勢力，實出我們意料之外：

朝鮮工業的狀況（大正十四年）

	工場數（所）	資本金（日元）
全體	四，二三八	二六五，八五三，三六九
日人所經營者	二，〇八五	二三二，八六八，五九九

根據以上所述，日本不惜開啟中日戰端、日俄戰端，犧牲不少生命和財產，所得來的價價，可想而知了。

四、日本帝國與台灣

台灣面積，本極有限。與其十四個屬島合計，面積只有二，三三四，一二八日方里；澎湖群島的面積更小，只八，二三〇日方里，二者合計也不過二，三三一，三九〇日方里。

然而台灣在日本帝國所占的重要性，並不在乎它的面積的大小。台灣在日本帝國所占的重要性，約可分為：

- 一、充當日本帝國的海軍根據地；
- 二、充當日本帝國經濟發展上的續命湯。

澎湖群島的形勢，最適宜於駐紮大批戰艦。日本帝國藉此，北轉可以扼制中國的東南部，南進可以侵占南洋群島及澳洲等地。即中東（近東，遠東的對稱）全部，也莫不在其虎觀之下。在這世界的政治中心，既由大西洋移至太平洋來的時代，太平洋一旦有事，日本帝國很可憑藉台灣而得伸張戰略上的勢力。

台灣在日本帝國所占重要性，最基本的，而又是最現實的，還是第二條的經濟條件。台灣地處熱帶地帶，物產極其豐富，而大部分物產的種類，屬於工業的原料。現代無論那一個帝國主義者，都是假藉工業為榨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工具。尤其是地狹如日本者，更不能不以工業立國，以在經濟上企圖向外的發展。而台灣正是他發展工業的適宜的地帶。本章預定先就台灣的主要物產概述之後，再就日本帝國經營台灣殖民地所得的酬報，分析說明一下。

台灣雖是個形如白芋的小島，但是農產、礦產、水產、林產等，均極豐富，而農產尤為各種物產之冠。

農產中，砂糖、米、茶、樟腦，是最主要的。砂糖一九一八年的產量，是五七，三〇〇餘萬斤；米近年來每年的產量，約有五五〇餘萬石，值金九千萬元左右；茶每年的產額，也有二千三百餘萬斤，值金一千四百餘萬元；至若產量占全世界產量約當五分之一的樟腦，一九二六年的產量，就已達五百三十餘萬斤，值價二千三百餘萬元。此外，如白芋每年產量，也在一六五，〇〇〇萬斤以上，落花生的產量，約有三五六千餘石，豆類的產量也有一〇七千餘石，素以台灣名產聞於世界的香蕉，每年產額也在二五，〇〇〇餘萬斤以上。此外，尚有麥類、黃麻、胡麻、苧麻、烟草、柑、桔、龍眼等農產，真不勝枚舉。

台灣全島的礦區，大小計有一千餘所，面積共有二〇〇，〇〇八，五〇〇餘坪（每坪六尺四方），每年產量值價，達一，五五〇餘萬元。其中，以金產為第一，煤產次之，銀、銅、煤油等，也極豐富。

水產的每年產量，值價約在二千萬元之譜。此數，僅就捕魚與水產製造而言，主要鹽產尚不在此數之內。

台灣因有上述豐富的物產，莫怪一九二五年《台灣年鑑》的緒言裡說：「山有喬木，海有魚鱉；穰穰五穀稔於野，而百木離離。富源無盡藏，寶庫任人開發。進可以伸張經略南方之大志，退亦足為子孫謀定百年之計……」

更莫怪自明治三十年至大正十年僅二十四年間，日台間的貿易純益，約有三〇〇，四八一，八四八元，約略十倍於日本領台以來所投資金（詳見本刊第三期一三五頁）！以上述過台灣物產的豐富，以下再就日本帝國由台灣獲得了什麼東西，換句話說，日本帝國經營台灣的意義，也即台灣對於日本帝國的價值，詳加分析一下。

殖民地對於本國的經濟價值，在於消納本國的資本及製品，供給原料和糧食，充當本國的移民地。在消納本國的資本的反面，也供給本國以資本；與供作本國投資經營地，同時，也供給企業者以廉賤的勞力。

台灣因為具備下列各種條件，所以最適於日本國民的投資：

- (1) 氣候是屬於熱帶和亞熱帶，地質又極肥沃，換言之，即土地生產力大；
- (2) 本地居民勤勉而生活程度又低，工資比日本內地低廉；
- (3) 農工兩階級的團結力量薄弱，資本家容易利用其資本的獨占力，而肆其榨取的能事；
- (4) 日本政府對於日人企業，特別加以保護。例如對於製糖公司的獎勵金，對於台灣銀行及電力公司的創設加以保護，對其分紅也加以保障。更如昭和二年，由日本國庫撥出二億萬元，以救濟台灣銀行的恐慌。

因有上列四種原因，所以日本人自然極力投資於台灣各種企業上。據一般的估量，昭和二年底，日人在台的投資總額，約達十三億元。台灣較比朝鮮，面積僅占一五%，人口僅占三一%，而公司資本的總額，就絕對地大於朝鮮，工礦業尤其如此。換句話說，

台灣的資本家型的企業化的程度，比朝鮮高得多。看下表：

	公司數	資本金(千元)	既繳資金(千元)
朝鮮	一, 二七六	四四七, 二八二	二二六, 三六一
台灣	六四七	五三七, 二三〇	三三六, 六〇七

即與日本內地相較看，台灣投資的速度，也高於日本內地：大正十四年底日本全國的投資額，八倍於明治四十二年底的投資額；而在同期內台灣的投資額，就有十一倍之多。

既繳資本或投資額

	明治四十二年底	大正十四年底
全國	一, 三六七, 一六四千元	一〇, 八九〇, 〇〇〇千元
台灣	三一, 〇九三千元	三五〇, 五三一千元

台灣不但供作日本內地的投資地，並且在他方面供給資本金，以便日本帝國轉投於外國或日本內地，日本吸收台灣資金的方法，約有三種：募集國債、郵便儲金及銀行儲金。大正七年底截止的國債募集金總額，就有一〇，一七六千元。郵便儲金，即就昭和元年底的統計，台灣的儲金額，就有二，七一二千元之多。經由銀行的吸收量，即就下表參照看，也可知其昭然顯著的形迹。

昭和元年底	總計	台灣	日本	在外國
銀行放款額(千元)	七三七,六八一	二四九,一九四	四一九,三六四	六九,一二三
同百分比	一〇〇・〇	三三・八	五六・八	九・四
銀行存款(千元)	一五五,九六五	九六,二〇五	二九,四一一	三〇,三四八
同百分比	一〇〇・〇	六一・七	一八・九	一九・四

在日本內地銀行放款指數，占總數五六・八%，銀行存款卻僅占總數一八・九%；在台灣，銀行放款僅占總數三三・八%，至其銀行存款，就占總數六一・七%。這就是說：日本內地的放款數目大於存款，反之，台灣的存款卻大於放款。

台灣在日本帝國所占重要性，第二點就是貿易上的價值。從前台灣的主要貿易對方，是中國。但自明治四十三年廢止輸出稅及出港稅，實行日台間的關稅同化，四十四年日本稅權的自主運動成功，協定稅率完全撤廢，而提高輸入稅率以來，於是日台間的貿易，遂因更高的關稅障壁而得到市場的保護。且看下表：

年次	明治三十年	昭和元年
輸出(千元)	四一二,七五二	四九,三一五
移出(千元)	二,一〇五	一〇二,一一〇
輸入(千元)	一二,六五九	六二,〇〇八
移入(千元)	三,七二四	一一一,四〇五

明治三十年，日本與台灣間的貿易額，若和其與外國的貿易額比較看，僅占四分之一；但至日本領台三十年的昭和元年，前者反三倍於後者。並且這種急激增加起來的日台間貿易額的內容，大約如下：

(1) 供給食料品及原料品於日本，而銷納日本的工業品（織物、肥料、重工業製品及其他雜貨）。

(2) 即在同種商品，也以上等商品進日本而下等商品轉回台灣的步驟進行著。例如蓬萊米出口而外國米入口，檜木出口而松杉入口。

詳言之，台灣對於日本，充當工業生產物與農業產物的交換市場，這就是殖民地與本國間貿易關係的特質。近年來，台灣本島內的工業，雖然也因資本主義的刺激而漸有進步，不但如前充當一部分工業品的經紀地，並且積極向外輸出本島的製品。但是這些處於工業生產者地位的，幾乎可說全是日本人，這也是殖民地工業的特質。

台灣在日本帝國的第三種重要性，就是人口的移植，正如隨著國家及資本的活動而商品的移出入貿易進行，人口的移植，也隨國家及資本而進行著。日本向台灣的移入速度，近年雖不很高，大正二年底是一三三二，九三七人，昭和元年底是一九五，七六九人，在此十三年中僅增六一，八三二人。但其移民之繁在於明治末年，並且現在也已在台灣各種住民的比例中占第二位了。

台灣住民的比較表

台灣人(即華人)	三,七〇二,八一三人
日本人	二二五,七六一
生番	一七二,六五四人
外國人	六,八九六人
合計	四,〇九八,一二四人

在台的日本住民，如上表所示，實屬少數，但是這些少數人對於多數的台民，卻握有絕對的支配權，在政治上施行壓迫，在經濟上肆行榨取。由少數人支配多數人，強行壓迫榨取，這是多麼不合理的事情！然而自古的人類社會，就是如此演進下來，現在不分東西中外，這種情狀還在繼續著，這是多麼不理想的、罪惡的社會呵！

五、日本帝國在中國的經濟勢力

在未寫本章之先，應先對讀者聲明：本章因為下列二種原因，只從大體上概述大意，詳細的討論和統計材料的證明，要俟諸後日：

- (1) 因為本論文所限定的篇幅，所剩無幾，若將本章細述，勢必超過限度數千字以上；
- (2) 因為本章可以另立一題，且問題甚關重要，所以擬留於專論詳加討究，此處只得暫從概述。

言歸正文，我們要概述日本帝國在中國的經濟勢力，應先理解：中國是實質上的殖民地，國際的殖民地，至少也可以說是「半殖民地」。中國處在諸帝國主義者的半殖民地的地位，性質上，和名實相符的殖民地，例如朝鮮、台灣等，所不同的地方，在於後

者可以專用政治勢力來培植其經濟勢力，而前者則不可。固然，前者也可利用半殖民地的不肖的官吏和軍人，以收對於真正殖民地所得的效果，但這也無非是暗中的勾結，和明目張膽的方法，自然不同。換句話說，帝國主義者之對於半殖民地的侵略和剝削，大多是依賴經濟勢力的。日本帝國之於中國，也是如此。

帝國主義者之侵略，或剝削半殖民地的形態，大約有下列幾種：

- (1) 利用既得各種特殊權利，以投放巨額資金於各種企業上；
- (2) 利用關稅協定的單方義務的條約，以推銷帝國主義者的工業製品，同時吸收其所需要的原料及食料。

上列二種形態，且由法權上的不平等條約，得到保障；甚至由這種保障，而大肆其移民的能事。以下且就依照上列二種形態的日本帝國在中國的經濟勢力，略加敘述一下。先就投資額檢點看。鐵路投資只就南滿鐵路公司所投資金，就達四四，〇〇〇萬日金元。工業方面的投資，雖無具體數字，但只就最發達的紡織工業，日本在各國中，無論工場數，或錘數都占第一位想看，也可知道其所占勢力之大。礦業投資、航業投資、電政投資以及私人企業的投資等等，實占巨大數目，茲不詳述。

至若銀行投資數目，更是巨大了，只就所創設銀行說，就有正金、台灣、朝鮮、住友、三井、三菱這些家。

上述概屬於直接投資，此外尚有依據借款辦法的間接投資。共分政治的借款和經濟的借款二種。日本借與中國的政治外債，達六〇，六二〇萬元，占全部外債三四％。若經濟的外債，如鐵路借款、電政借款、地方團體借款以及向私人及私團體的投資等等，因為數目浩大，種類繁多，本文中只得從略。

各國與中國貿易最盛的，當推英日美三國。且就下列一九二六年主要國對華貿易，

及其對華貿易船舶噸數的比例表檢點看：

國別	船舶	貿易
英國	三五%三八	二九%二八
日本	二八%九二	三一%五五
美國	四%八五	四%六四
德國	一%二三	一%九二
法國	一%七二	三%〇七

於此可見日本對華貿易額之大，昭和二年日本對華貿易的實數總額，約達四十二億日金元。其內容如下：

輸出（由日本輸出中國）

第一位	生絲	七四〇百萬日金元 三七%
第二位	棉織物	三八四百萬日金元
第三位	絹織物	一四〇百萬日金元

輸入（由中國輸入日本）

第一位	棉花	六二五百萬日金元
第二位	鐵及鋼	二二八百萬日金元
第三位	羊毛等	一二〇百萬日金元
第四位	木材	一〇四百萬日金元

就上列中日貿易的內容考察看，即可知道中國為日本充當工業製品的銷納場，日本則仰賴於中國的工業原料品。此外，尚有糧食的供給問題和人口移殖問題，未及談到，但也不過是具備殖民地性質的東西，惟後者有直接移殖（如日本之移住各地），和間接移殖（如日人之移入朝鮮，迫朝鮮人移住於滿蒙地方）的區別，我們要特加留意。

六、日本帝國在南洋群島的形勢

歐洲大戰的結果，日本由德國承過德屬南洋群島的一部分。這部分由馬利安那、加羅林、馬紹爾三群島組成，大小島嶼共有六二三個，總面積約有一四〇方里。東加羅林群島之普那拍島，面積稍大，適宜於農業移民。西加羅林各島，魚介及其他的物產豐富，宜於漁業經營。馬利安那各島，人口稀薄，富於海產及椰子樹，適於農漁兩種經營。

年來貿易雖漸發達，但數目也極有限：

	出口(千元)	進口(千元)
一九三三年	二,三四四	二,四五四
一九二四年	三,五三五	二,五二三
一九二五年	五,八六四	三,六四七

此外如商業、工業、林業、牧畜業等，都同樣沒有什麼可取的地方。所以，這一部分群島對於日本帝國的現實價值，並不很大。而所謂日本帝國在南洋群島的形勢，實另有所在，也即非殖民地的經濟勢力。

日本帝國在南洋群島的經濟勢力，可分兩種來談。其一，日人在南洋群島的栽種事業，其中以橡樹、可可及砂糖為大宗。其二，為南洋群島與日本間的國際貿易，範圍普

及於荷領東印度，英屬海峽殖民地，菲律賓，甚至及於暹羅，法領印度支那等地。
據大正十五年的調查，日人在南洋群島間所栽種主要植物的統計：

種別	栽種面積（英畝）	生產量	投資額（元）
橡皮樹	一一一，三五九	二〇，八六一，〇一五磅	七六，六三七，八七四
可可		五，四〇八擔	八，八七二，五四〇
麻			八，八七七，五七〇
砂糖		二五七，八九七擔	四，三三八，九三七
茶及其他			一〇，七七五，八七一
合計			一〇九，五〇二，七九二

再與其他的椰子、甘蘭、金雞納霜、馬鈴薯、香料等物合計，其投資總額，已近二億元之多。

其栽種地帶，普遍於英領馬來、英領北婆羅洲、沙撈越王國、緬甸、爪哇、蘇門答臘、荷領婆羅洲等地。其中以英領馬來的栽種面積為最廣，有七〇，三三九英畝，而蘇門答臘次之栽種面積為一五，二三七英畝，英領北婆羅洲又次之，其栽種面積為一三，一二四英畝。

我們再就日本在南洋群島栽種事業，在列國同種投資之中，占什麼地位查看。根據一九二三年的調查，南洋橡樹栽種事業各國投資額的比較如下：

英國	九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荷蘭	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日本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	六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法國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比國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其他歐人	九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其他亞洲人	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計	二,一〇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只就南洋最大宗栽種事業的橡皮樹栽種檢點看，日本的投資額即已占各國投資額的第三位，其他栽種事業，日本勢力之大可以想見了。

其次，日本帝國在南洋的貿易，也占重要的地位。日人在南洋的貿易，在大正初年以前，為數無幾。至大正三年，南洋開過大規模的博覽會時，因為歐洲大戰爆發，歐美各國忙於戰務，無暇兼顧南洋商品市場的廣告，所以在這個大規模的博覽會中，日本商人就大為發揮其廣告技術。日本對南洋的貿易額，也以此為劃分期，而急速地增加起來。這固然得力於歐戰中歐美各國無暇顧及商務的經營之處很多，但其廣告技術的效力，也實不小。大正二年（即一九一三年），南洋由日本輸入各貨，約值荷幣六，七六九千盾，向日輸出米，糖及原料，約值荷幣三五，八一二千盾。

但至大正九年（即一九一八年），由日本輸入貨物金額，就激增至一三四，一三七千盾；向日本輸出貨物金額，也增至一，一四〇,〇一四千盾之巨額。這種貿易狀況，

後者約略七倍於前者。

再將近年日本對南洋貿易發達的情狀，列成簡表，以示其趨勢。

日本對南洋貿易發達表

年度	出口(日金元)	進口(日金元)	合計(日金元)
一九一四	二二,七四五,〇〇〇	五二,七三一,〇〇〇	七五,四七六,〇〇〇
一九一七	八七,一一一,〇〇〇	五九,三六七,〇〇〇	一七六,四七八,〇〇〇
一九二〇	一八四,九九七,〇〇〇	一二六,〇三五,〇〇〇	三一,〇三二,〇〇〇
一九二三	八四,四四一,〇〇〇	一三五,三二五,〇〇〇	二一九,七五六,〇〇〇
一九二六	四八,六九六,〇〇〇	八二,八一八,〇〇〇	一三一,五一四,〇〇〇

根據上表，在歐洲大戰中急激發達起來的南洋貿易，雖然大戰終息後，因為歐美各國的競爭，而呈跌落的情勢，但是現在所占勢力也尚不小。即就在貿易品中占第一位的砂糖貿易額檢點看，日本還是占住優勢，實駕從來在南洋砂糖貿易界占優勢的英荷商人而上之了。且參照下表：（見下頁）

南洋砂糖貿易額

年度	歐商貿易額(千擔)	日商貿易額(千擔)	華商貿易額(千擔)
一九二八	六,八〇〇	四,二〇〇	三,七〇〇
一九二九	九,一〇〇	四,四〇〇	四,六〇〇
一九三〇	一〇,八〇〇	六,五〇〇	三,九〇〇
一九三一	八,六〇〇	七,一〇〇	七,二〇〇
一九三二	七,五〇〇	九,九〇〇	六,六〇〇
一九三三	七,九〇〇	九,九〇〇	五,五〇〇
一九三四	八,六〇〇	一〇,四〇〇	七,五〇〇
一九三五	一一,五一九	一一,五二〇	一〇,一五〇

日本帝國對南洋的貿易內容，也照例帶著帝國主義的色彩，換言之，即工業製品輸出，而原料品及食料品輸入。日本向南洋輸出的大宗貨物，有棉布、汗衫、陶瓷器、綢緞等種。一九二四年這些種輸出品金額，約計一一,二二〇萬日金元。

日本由南洋輸入的重要貨物，是：砂糖、米、橡皮、苧麻等物。根據一九二四年的統計，這些種輸入品的金額，計約一七八,〇五四千日金元。

我們從前在本刊第二期所載《英美帝國主義者與遠東關係的考察》文中，曾經說過：現代帝國主義的特色，在其為「工業國」；而工業國所賴以存立的前提有二端：一是工業原料出產地的確定，二是工業製品銷場的獨占。根據以上所述，南洋群島兼具上列二

種條件，尤其熱帶及亞熱帶地方（不消說，南洋群島是處在熱帶地方的，關於南洋群島地理方面的詳情，且參照本刊本專號，〈南洋殖民地的研究〉一文！）的產物大多是工業的原料，所以日本帝國如想向外發展，以打開近年來本國經濟上的僵局，他自然要於中國大陸的經營之外，第二注意到南洋群島來。

七、日本帝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停頓

日本自日俄戰爭前後，第一期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就已達到頂點，而必須進入第二期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要討論日本帝國第二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困難，應先理解日本帝國經濟發展停頓的情狀。這種情狀可以由下列二種表現觀察出來：

（一）粗工業及礦業發展的停頓；

（二）農村經濟的疲敝。

本文第二章裡已經說過，日本近世產業的發展，專靠下列三種原因：

(1) 模仿歐美的科學和技術；(2) 利用低廉的工資，以開發從未開發過的資源；(3) 依賴保護政策，以培植幼稚的各種產業。因此，其時所發達起來的，只限於「粗工業」及「粗礦業」，例如紡織業的粗紗、洋火、胰子、玩具、刷子、扇子等粗工業，及輸出生銅、鐵塊、石炭、硫黃等粗礦業。

然而促進日本資本主義第一期發達的上述三種原因，自明治末年即漸失其效用，反而成了第二期資本主義發展的桎梏。這種情勢，經歐洲大戰後，尤其擴大，尖銳化。歐洲科學和技術的模仿，達到了飽和點，低廉的工資也因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例如勞工階級生活的改進，資本案階級奢侈生活費對勞工階級的轉嫁，勞工階級對於游食階級繼

大的負擔增大，因財政的膨脹——發展帝國主義的軍費，保護資本家的政費——而對於勞工稅租的增大，以及由於保護資本家而提高關稅的轉嫁），而日漸升高了。保護關稅也已失了效用，因為現在的日本工業已經經過不以本國市場為工業製品的銷納場的階段，而已達到必須向外尋覓市場的階段了。

因為上述三種效用的消滅，所以資本家和地主的各種經營，已不如從前那樣合算，換句話說，各種利潤率沒有從前的大了。在滿足資本家和地主的求利欲的情勢之下，日本的各種產業，都已發達到飽和點，再也沒有發展的餘地了。工業如此，礦業也如此，生產組織和生產技術，如無相當的改革，其向前發達是無望的。即如金融機關的銀行業，也莫不日就停頓，銀行組織，如無相當的改革，資金的利用效率，也是日就低落的。我們且就幾種主要工業的生產量檢點看：

幾種主要工業生產價值表（單位：千元）

種別	年次				
	明治四十二年	大正三年	大正八年	大正十一年	大正十五年
紡織工業	三八八，〇〇九	六二〇，二六一	三，二九五，九〇〇	二，四八一，三二七	二，八七二，一一七
金屬工業	一七，〇七〇	四七，九六五	三三八，二四八	二五三，二五八	四四七，〇五八
機器工業	四〇，九七四	一一〇，九〇六	七二六，二四一	五四五，四四七	五三八，九一七
化學工業	八六，四一四	一七五，八四九	七七六，九四三	五七二，一三六	八一三，四〇四
瓦斯電氣業	—	二五，二五二	六六，六四九	四三，九九五	一五〇，〇一六

上列紡織工業，金屬工業，自大正三年以後，不但其生產量不增加，並且絕對的減少了，大正八年的產量價額不如大正三年，大正十一年還在繼續減少，雖至大正十五年

產量價額又略有增加，但也都不及大正二年的數目。機器工業和化學工業的生產量價額，也自大正八年以後減少，大正十一年的生產價額都不如大正八年的生產價額，至少如機器工業，即至大正十五年，還是在減少的道程上。即如正在蓬蓬勃勃地發達的瓦斯電氣工業，大正十一年度的生產價額，也是少於大正八年的生產價額。

我們再就礦產的產量的增減情狀檢點看：

重要礦產數量增減表

種別	年次	石炭(千噸)	石油(千石)	銅(千斤)	鐵(千貫)	鉛(千斤)	硫黃(千貫)
明治二十		一,七四六	三五三	一八,四四〇	四,〇七二	六四三	二,八七五
明治二五		三,一七七	一三	三四,六六〇	五,〇三一	一,四八〇	三四,一四三
明治三十		五,一八八	二三一	三三,九八二	七,四六四	一,二八五	二二,六三七
明治三十五		九,五四九	八七八	四八,三九一	八,五六八	二,七四二	三〇,四七九
明治四十		一三,八〇四	一,五一四	六四,五三三	一三,八五一	五,一三二	五五,五四九
大正一		一九,六四〇	一,四五八	一〇四,〇三七	一八,四九七	六,二二二	九〇,九二八
大正六		二六,三六一	二,五〇九	一八〇,〇六四	三七,〇七三	二六,三四一	三一,四九四
大正十一		二七,七〇二	一,七九九	九〇,二一〇	二〇,九二四	五,三九九	九,二二九
大正十四		三一,四五九	一,六三七	一一〇,八二二	二三,六四九	五,五六一	一二,七二六

根據上表，可知除了石炭而外，各種重要礦物的產量，都自大正六年以後絕對地減少，大正十一年比大正六年都有急激的減少，雖即大正十四年的產量，較比十一年度略有增加，但尚不及六年度的數目。其中，尤其如石油的產量，自大正初年即已減少，大

正六年度雖曾再一度增高，十一年復又減少，一直減至十四年，還在同樣過程中。石炭的產量，雖然沒有減少，但自大正六年以後，其增產比率，就大為降低，這是因為生產費增高而資本家的營業不合算的原故。茲引入由採煤股份公司的生產費為例子，大正三年上半年每頓煤採掘費只二元九十八錢，至大正八年即高至十二元十二錢，其後雖略有增減，也只在十二元左右。

根據以上所述，日本工礦業實已陷於停頓的命運，而這種命運正在指示第二期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苦悶。而且，這種命運，也同樣可以應用到農業經濟上來說明。不，日本農業經濟的衰落，因為資本主義末期的影響，其衰落的程度，恐怕比較工礦業，尤要利害得多。

日本農業經濟的衰落，表現在耕地面積的縮小及單位生產量的減少。關於這兩層，我們還是拿統計材料來證明。且依照猪侯津南雄先生所製統計表，以大正十年為基點，來比較比較日本耕地面積絕對減少的情狀。

日本耕地面積的增減表

年次	實數(單位町步)	指數
大正十年	六,一六二,二三二·七	一〇〇·〇
大正十一年	六,一五四,〇八七·一	九九·八
大正十二年	六,一〇二,九七三·一	九九·〇
大正十三年	六,〇六五,一六四·九	九八·四
大正十四年	六,〇六七,〇一五·〇	九八·四
昭和元年	六,〇七三,七九七·〇	九八·五

根據上表，日本耕地面積的指數，自大正十三年即已減少，十四年依然如故。至昭和元年，雖比大正十四年增加些，但猶不如大正十二年之廣呢，以與引為基點的大正十年較比看，還減少八萬八千餘町步。

日本農業經濟的衰落，不但表現於耕地面積上，並且表現於單位產量上。且舉日本最主要農產物的米，充當代表，以考察其發展情勢的停頓。

米每一反步的收穫額（五年平均）

	實數(石)	與前五年平均比較的增減
自明治三十四年至明治三十八年	一·五三六	——(增)
自明治三十九年至明治四十三年	一·六八六	○·一五〇(增)
自明治四十四年至大正四年	一·七五六	○·七〇(增)
自大正五年至大正九年	一·八八四	○·一二八(增)
自大正十年至大正十四年	一·八四二	○·四二(減)
昭和元年	一·八〇八	○·三四(減)

根據上表，米每反步的收穫量，在明治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的五年平均，是一石五斗三升六合；而日俄戰後次期的平均，是一石六斗八升六合。此二期間約有一斗五升的增加。但其次之世界大戰之前五年的平均，就只增加七升。即在歐戰中五年間，雖然刺激其增加的力量非常強烈，但其實際上的增加率，終不能不低於日俄戰後的五年平均期。這是在證明：日本農業經濟的發展多麼無力，而此後的絕對減少，就斷定於此時了。歐戰後五年平均的單位收穫量，果然絕對地減少了四升二合；昭和元年期，又再減少三升二合。

根據以上所述，可知日本帝國在經濟上的發展，確已陷入停頓的命運，日本資本主義的生長年齡，雖尚年輕，但實已到早衰夭折的徵象了，換句話說，日本帝國的經濟，實已成了「僵局」了！

八、日本帝國僵局的正當解決策

我們想在本章，關於日本帝國僵局的解決策，略加討論，以充本論文的結論。要解決日本這種經濟的僵局，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下，原有下列兩種辦法：

(一) 帝國主義型的向外發展；

(二) 由粗工業向精工業前進。

帝國主義型的向外發展的意思，就是侵略外國的領土，經營殖民地，以充當原料的供給地和成品的銷售場。但是，現在世界各地盡都有其主，絕不容第三者伸手，就是原來處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眾，也都逐漸覺悟起來，極力掙扎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日本帝國想再擴大領土，恐怕比什麼都要難些。要打破現有的國界，除非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幸而重再發生，但是日本有這種覺悟和力量嗎？固然，一般人也都推測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太平洋戰爭——即將爆發，但是大戰的結果，國界的變動能否有利於日本帝國，還是個疑號。或許因為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眾的覺悟，遂促日本帝國的滅亡，也未可知。即不至滅亡，或許因為日本帝國本國內覺悟集團的積極行動，終使日本帝國的國體以及統治關係，完全發生變化，也未可知。這是日本帝國的經濟發展，要依賴帝國主義型的向外發展，絕對走不通的證明。

其次，依照精工業的辦法，來解決日本帝國的經濟僵局，有無可能？

日本的粗工業，固然因為國內經濟環境的變化，及後進國——尤其是中國——粗工業發達的競爭，已經達到必須依賴藉精工業化，以繼續其帝國的經濟壽命。

但要依靠精工業，以競存於世界的商品市場，有二次事實，是我們應該考慮到的；

第一、精工業化，要有充分的資源和精熟的技術；

第二、精工業化，要有自由銷售製品的獨占市場，至少世界市場上，也要以「自由競爭」為原則。

關於第一項，日本國內資源的缺乏，上頭已經詳述過，是無庸引證贅述的。本國資源缺乏的日本，想在國際市場上，和資源豐富的其他各國，作商業戰，這豈不是困難的事嗎？要在自由競爭場占得勝利，必須具備「貨美價廉」的條件。但是日本的技術決不能優於歐美各國，實在是劣些，從那裡造出「美貨」來呢？日本國內的資源，比其他各國都缺乏得多，資源缺乏的國民，怎樣能夠造出可以在世界市場占得勝利的條件的「廉價」來呢？

我們即使讓一百步，假定日本可以專靠其大國民的自負心，極力從事於製造技術的造就，和極端過其刻苦的生活，務使「貨美價廉」的條件，都完全具備了；但這還是不足以與其他各國在世界市場爭勝。唯一的原因，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已經達到末期，一切的經濟活動，已經不象資本主義初期那樣，盡以「自由競爭」的法則為依據了。現在世界各地，那一個地方不高築了保護關稅的堅壘？那一個國家不像日本帝國採用保護政策以壓迫外國產業競爭力而培植本國的產業那樣，也以保護政策敬酬日本帝國？因為印度提高綢緞的輸入稅，取消土布的消費稅，而日本的各種織物，豈非受到極大的打擊嗎？最近，澳洲的關稅壁壘，又高築起來了，日本貨物之銷售於澳洲者，此後豈不又要碰個大釘子？雖然，此外實有一個老在病中不死不活的我們貴國，暫可充其製品的銷售

場，但是第一，日本犯了上列第一項資源的缺乏和技術的幼稚的毛病，不足以與歐美各國競爭；第二，中國民眾也漸覺悟過來，本國工業也漸發達，尤其因為歷來日本對於中國的積極政策太過露骨，大惹中國民眾排日的情感和運動，中國大陸的市場，也是不大可靠。

然則日本帝國經濟上的僵局，再也沒有辦法了嗎？那也不然！辦法是有的。不過，全以資本家為本位的策略。例如，提高保護政策的效用，降低農工的工資等等辦法，是不會走得通的。這些辦法，無非是把真正生產者的農工二階級，供作螞蟻般的犧牲，以達一時肥大閑游階級的目的吧了。然若犧牲了真正生產階級的「奴隸」，而其經濟日就衰落。這點，古代的希臘、羅馬等國，因為犧牲了生產階級的「奴隸」，而其經濟日就衰落，終至亡國滅族的事實（詳情，請參照《三民半月刊》近期所載《古代社會的經濟史論概要》！），足以證明。這種辦法，一定碰到「此路不通」的命運。

我們應從別方面，追求日本帝國僵局的正當解決辦法。在未談正常解決法之先，應先理解日本帝國的經濟發展停頓的真正意義。

日本帝國果真如他們帝國主義者所用以為侵略領土的口實那樣，地狹人稠，資源缺乏，耕地已經開墾到不能再開墾的程度，各種資源也已經開發到再不能開發的地步了嗎？我們不願意憑著主觀的揣測，以冒故意捏造煽動的罪名。我們還是引用數字，尤其是最得信任的政府當局的調查數字，來證明。

即舉農業耕地擴大（是農業經濟發展最基本而且顯明的指標）的停頓，充當代表事實來說明吧！據大正七年日本政府所設臨時產業調查局的調查，「目下還可以擴充的耕地面積」，還有一，六五〇千町步。明治三十六年日本耕地的總面積，是五，二六七千町步，大正十四年的耕地總面積，是六，〇六七千町步。在此二十二年期中所開墾的耕

地面積，也不過五三一千町步。那末，上述「還可以擴充的耕地面積」的一六五〇千町步，豈不是還可以充當四、五十年長期的開墾嗎？況且，還可以利用農業技術的進步，以增加單位生產量呢！誰敢說日本農業經濟，已到了絕對停頓的階段？其所以停頓，所以寧把一六五〇千町步的未開墾地擱置，豈不是完全在於農業資本家的營業利潤不高的原故嗎？換言之，豈不是由於「生產制度」的原因嗎？

上述日本農業經濟發展停頓的真正意義的解說法，同時也可以應用到工礦業的發展停頓上來。換一句話說，工礦業發展停頓的真正原因，在於工礦業資本家的營業利潤不如從前的豐富。例如上面所提及煤產量的比例減少，在於採掘費用的升高而煤礦業資本家的算盤不能打得合算，就是一個證例。日本的經濟社會，若能節省資本階級無用的浪費，以從事於科學的研究，技術的鍛煉，現用的資源即使缺乏，但也未始不可以另外發見代替物，例如以電力代替煤燃料。

其實，在這個蒸汽將要沒落而電氣取而代之的時代，電力富足的日本，實由自然蒙受特別優厚的恩惠！蒸汽的時代，農村完全為著都市的隆興而做了犧牲品。到近年來，一般經學者，也都覺有復興農村的必要。即把工業收回農村，使農工業成了農村產業的兩翼，用以救濟都市的失業人口，農村的失業問題，也可以同時解決。然要辦到這層，第一必要的條件，是電力的豐富。蓋因蒸汽工業只能集中於一處結成都市，要把工業收回農村，工場散處各地，蒸汽力是不適用的，非應用電力不可。日本既富於電力，自宜於把農村電氣化。不但工業上應用電力，即農耕上也可應用電力。我這樣說，免不了有人要質問：農村電氣化後，節省了許多人工，豈不是更要擴大失業問題？說到這一點，就完全歸結於「分配問題」了。如果經濟關係經過正當的改革，分配公平，再能因為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的進步而多數人反受到災禍，這於我是不敢相信的。

我們再把日本經濟發展停頓的原因，更具體地列舉於下：

(一) 日本資本階級腐敗，而喪失了充當一國經濟支配者的能力；

(二) 充當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的「營利主義」的經濟制度，達到頂點，反而大為阻礙生產的發達；

(三) 充當支配階級的資本家階級的生活，日益奢侈，為要保障他們的奢侈生活起見，自要利用種種政策，對於生產階級的農工，極度加以苛斂誅求，其結果愈使本國的生產力的泉源涸竭。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知；日本經濟的停頓，不是絕對停頓的問題，而是經濟制度的問題。如能規定出一種革命的，合乎時代的經濟制度，以代替頹廢的舊經濟制度，日本經濟的發展前途，尚不可限量。

我們所謂革命的經濟制度，就是和資本主義制度相對稱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其根本原則，如下：

(一) 撤廢以喪失了機能的資本家為本位的制度，而以生產階級本位的制度代替之。

(二) 撤廢現已阻礙生產的營利本位的自由交易制度，而以全體國民福祉本位的有計劃的經濟制度代替之。

社會主義制度的具備辦法：

第一、要先確定有能力的產業經營者和更完滿的產業經營方法，以代替資本家和營利制度。不消說，產業經營者就是社會，把產業社會化，全由社會共同經營；所謂更完滿的產業經營方法，就是在生產及消費皆於一定的預算之下，有計劃地進行的辦法。

第二、極力應用已發明的科學於有益民生的方面，使一般民眾皆得沾潤科學的恩惠。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就是有益於全體民眾的科學，也都因為資本家的營利關係而被埋

沒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必須把這些有用的科學極力發揮，使其克盡實用化的任務。此後，再加以繼續研究，科學的用途真是不可限量的。

第三、資本主義制度下，專為游食的資本家而課諸大多數國民的犧牲，把它運用於有益社會的方面。這一條是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辦法，例如：

利用租稅政策沒收不勞所得，重課財產進款，絕對沒收遺產，減輕對於勤勞所得的各種課稅。又如改革金融制度，降低利息，改革土地制度，以降低地租，把各種基本產業社會化，以縮小資本家游食奢侈的來源。

我們站在解決東方全體問題的立場上，站在世界連帶關係的立場上，替日本帝國經濟發展的停頓，想出了社會主義的出路。這種意思，即在日人中，也有一部分人提倡過的確，除此社會主義的出路外，恐怕是沒有辦法的。什麼依靠社會立法的勞工保障啦，什麼產業合理化啦，什麼資本家型的產業保護政策……，自論理上、事實上，結果是不会有有效力的。

然而日本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固須倚靠日本有志者的努力，但一方面，還要看中國革命成功的程度如何。假使中國革命不能在正當的方面，完成相當的成功，則日本帝國主義者所醉心的中國大陸的經營，尤其是滿蒙地方的經營，還可以充當日本帝國存在的支柱，充當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續命湯，這樣一來，本已迫切的日本社會主義革命，也能因有中國的躲避場的原故，而喪失其客觀的革命條件，而其現狀再往下延長。中國革命的成敗，對於日本革命的成敗，實有密切的關係。中國的民眾，為著東方全體被壓迫民眾的解放計，努力幹下去吧！

然而日本的民眾，也不要忘記：中國革命的成敗，也與你們的努力和幫助，有極大的關係。蓋因中國革命所以不能早日成功，大半也是因為被壓迫在帝國主義者之下，不

能盡量如意活動。日本民眾如能在其國內，牽制日本帝國主義者（自然是軍閥、官僚及其爪牙），使其不壓迫中國的施設，摧殘中國民眾的活動，則中國革命也可以早些成功；因而日本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可以早日成功。日本的民眾，請加倍努力吧！東方革命的同志，請加倍努力吧！

原載一九三〇年七月《新東方》第一卷第五、六、七期合刊殖民問題專號

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

——日本經濟的衰落與東北事件

一、引言

自從九·一八連三接四的「東北事件」發生以來，我國同胞莫不憤激填胸，積極籌劃對付的方法。但凡欲籌劃對付某種事件的方法，第一步須先認清該事件的發生原因。這正和治病之先診病而後開方，是同一道理。東北事件的發生原因固有種種，而經濟的原因確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原由，故自經濟上來解釋東北事件的發生。

東北事件發生的經濟原因，本可以由兩方面來解釋。一方面，是日本帝國經濟的衰落；另一方面，是東三省豐富資源的引誘。闡明這兩面的曲折，即可明白東三省所以被蹂躪於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原由。

自經濟上來解釋東北事件的論文或不少，但皆零碎不全，或言之不詳。為貢獻此方面材料於研究該問題者，故不顧淺陋試為剖述之，不逮之處仍願讀者指正！惟是，本文只從經濟上解釋東北事件，至若日本是否必須侵略東三省，及應該如何對付的問題，則專於「日本果非侵外則不能存立嗎？」及「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根本方法」二文中分述之。本文並希望與本專號所載拙作「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參照讀之。

二、日本經濟的衰落

日本現在是世界三大強國之一，在現代的世界政治舞台上與英、美鼎足稱雄。

此三雄近年來角逐於太平洋上，英且有後退而由日美直接對峙之勢。於此可知日本在現代國際上確是一個不得了的「大巨物」。

日本不但是個大巨物，並且是個「大怪物」。它雖然在國際政局上好似占很大的優勢，頭上戴着霸者的頭盔，但其內容卻非常空虛，基礎並不穩固，頭上的霸者盔，只是紙質的罷了。日本帝國主義不但年齡幼小，並且「外強而中乾」。它在五六十年中，居然完成了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經數百年而始完成的一大變革——社會經濟組織的變革。它被迫而促急產業革命，被迫而加入國際隊中，被迫而當早熟的帝國主義者，被迫而……發育未完的小孩，竟當了百歲的老人，難怪其將「早衰」、「夭折」也。

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始於明治初年（約當一八七〇年），盛於中日戰後（約當一八九五年後），而漸衰於日俄戰後（約當一九〇五年後）。其後，歐戰期雖曾以一度自然的發展而達至「最高點」，然而惟其是「最高點」，所以更高的發展似已不可能，從今而後也就只有一落千丈了。這種情勢本可以由各種方面來證明，但為節約篇幅起見，只拿日本輸出工業製品為證。

日本輸出貿易內容百分數

年 代	品 類			
	食料(%)	原料(%)	其他(%)	合計(%)
明治一～六平均	三三·九	五九·三	七·八	一〇〇·〇
明治二十二～二十六	二二·二	五二·四	二五·四	一〇〇·〇
明治三十二～三十六	一一·一	五四·九	三三·〇	一〇〇·〇

明治四十二~大正二	一〇・七	五一・五	三七・八	一〇〇・〇
明治四十二年	一一・八	五七・五	三〇・七	一〇〇・〇
大正二年	九・八	六〇・〇	三〇・二	一〇〇・〇
大正六年	一〇・七	五〇・四	三八・九	一〇〇・〇
大正七年	一〇・七	四三・八	四五・五	一〇〇・〇
大正十年	六・三	五〇・四	四三・三	一〇〇・〇
大正十三年	六・〇	五一・四	四二・六	一〇〇・〇

(注一) 本表根據高橋龜吉《資本主義末期的研究》三三〇頁第四表數字。

(注二) 本表所列「其他」項目，即代表「工業製品」者。此項數字之增減，可以充當日本發達及衰落的指標。

(注三) 明治二年即一八六九年；大正元年為一九一二年；其他類推。

根據上表，明治初年日本每年平均輸出工業製品，僅占全部輸出品七・八%。但至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代，就激增至二五・四%。相隔二十年增加一七・六%。再至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代，又增至三三・〇%。相隔十年間，增加七・六%，其增加率約與上期相等。但是此種急激增加之勢，至明治四十二年至大正二年代，即已呈現停頓的徵象。明治四十二年至大正二年代工業製品之輸出總額所占比率，只增至三七・八%，較諸前

期只增加三·二%。即自其每年平均增加數看，也不及上期，更不及上上期。尤其是明治四十二年與大正二年相比，不但沒有增加，倒反減少了〇·五%。大正六年以後，雖因歐戰而又急激呈現增加之勢，但自歐戰終熄之大正十年後，即已急激的速度逐漸減少。其低落之勢一直繼續至現在，尤其是一九三〇年恐慌的現在。此項且參閱本文第四節。

日本經濟的衰落不但表現於工業上，並且表現於農業上，農業上的衰落較比工業上的衰落，還表現得早，大約在工商業逐漸發達以後，即以下墜的現狀表現出來。此項，可參看《日本近世農業的發達》（載《三民半月刊》「農村社會問題專號」）及譯文《日本現代土地問題》（載《三民半月刊》第四卷第二十三期），剖述之甚詳，故從略。

要而言之，日本經濟早已步著向下的現狀。雖然僥倖遇著世界大戰，而其瀕危的經濟沒落，得了苟延殘喘，但也不過是「苟延」罷了。這種刺激不過是興奮藥針之於病危者的效用而已。日本政府且為維持，加強這種興奮藥力而於戰後，不顧一切居然採用「膨脹政策」，但仍無補於事。最近民政黨政府採用「緊縮政策」後，日本經濟界所表現急轉直下的潛勢力，就是興奮劑無力的表現。此項，參閱拙作《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及拙作時事述評《日本新內閣前途的黯淡》（皆載《新東方》《周年紀念特刊》）。歐戰後的日本經濟如何急轉直下，一九三〇年恐慌後日本經濟如何加緊直下的情勢，且以下各節的敘述。

二、最近一般的經濟恐慌

日本經濟本自日俄戰後，即步衰落的途程，這並不是蔑視「日本帝國」的話，且看日本經濟學者自家的說話：「然而如上所述，我資本主義的第一期的繁榮，大體上自日俄戰後即漸呈頹勢，歐洲戰後乃直面於其窮途……」（上引高橋龜吉同書第四編《資本

主義末期與日本經濟的研究》三三六—三三七頁）。幸而，得歐洲大戰的絕好機會，日本乃得在遠東及世界其他部分「趁火打劫」。其結果，許多日本企業家發了橫財，而其臨危的經濟界乃得一番的苟延。

但是，歐戰終熄後，日本經濟之一落千丈，又是事勢所趨，難以倖免的。我們且用數字來證明這種事實。證明經濟界興衰的事實，未有如「價格運動」之真確者。

且看下表所列戰後日本的物價指數：

物價指數表（以大正八年為基準——歐戰中）

年次	物價指數(%)
大正三年七月	四〇・七
大正八年	一〇〇・〇
大正九年	一一〇・〇
大正十年	八五・〇
大正十一年	八三・一
大正十二年	八四・五
大正十三年	八七・六
大正十四年	八五・六
大正十五年	七五・九
昭和二年	七二・〇
昭和三年	七二・五
昭和四年	七〇・五

（注）本表據猪俣津南雄《立於沒落轉向期的日本資本主義》第十表。

據上表，大正九年即一九二〇年，日本的物價指數為一一〇・〇％，至翌年即降至八五・〇％，以後繼續低降，至昭和四年降至七〇・五％，前後相差約四〇・〇％。再據本年《中央公論》四月號所載《恐慌一年ノ展望》，本年（昭和六年）又較去年低落如下：昭和四年十月的日本銀行指數（以大正三年七月為基準）為一七一・九％，昭和六年一月為一二六・〇％，降低四五・九％。若以大正三年七月為基準計算之，則大正九年與昭和六年一月物價指數，前後相差為一四六・八％。這是多麼巨大的變動，而日本經濟的恐慌深度可以想見。

證明經濟興衰的第二事實，就是公司銀行利息率的增減。日本全國工業公司的利率，大正九年為二〇・九％，大正十年即減至一五・七％，至大正十五年竟減至一二・一％。銀行利息率也然，大正八年為二五・〇％，大正十年低至二一・八％。昭和二年竟低至一一・八％。昭和二年後，公司銀行的利息率雖皆略有增加，但是昭和五年經濟恐慌後又大減低。此項，手內雖無統計可憑，但檢點上列物價之運動也可知之。

再就歐戰後日本的生產指數加以考察。「若以一九一九年的生產實數為基準，則一九一九年的消費生產指數為一〇〇，至次年之一九二〇年減至九三，其後雖有多少增減，但皆未超過基準以上，至一九二七年竟激減為八九」（拙作《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載《新東方》雜誌《周年紀念特刊》二九二—二九三頁）。即其主要食糧的米和麥，也有同樣減少的趨勢。據上引同文，「……同樣，以一九一九年為基準，則同年米麥的生產指數為一〇〇，至次年一九二〇年的指數，就減至八六……」

歐戰後日本經濟恐慌的發作，一時雖因政友會內閣的「膨脹政策」略為潛伏著，致使不至大為發現出來，而其程度略低。但自民政黨內閣斷然採用「緊縮政策」——金解禁政策以後，其情勢就難免一落千丈。此項上面已略言之了。這裡，再引一九三〇年恐

慌後日本工商業衰落的情勢為證。這種情勢徵引生產資料消費量之減少來證明，最為可靠。據上引拙作所列表格，一九三〇年一月至三月極短期間，各種主要生產資料的消費量，或輸入額的減少率如下：

品名	減少比率(%)
石炭(消費額)	一九
鋼鐵(供給額)	一二
銑鐵(輸入額)	三七
銅(消費額)	三二
洋灰(消費額)	二二
美材木(橫濱入口額)	八二

以上所剖述各種事實，既足以證明日本帝國主義一般經濟恐慌的深度了。但為更透切明瞭起見，再在以下二節解剖農村恐慌及殖民地的窮盡。

三、農村的恐慌

明治年間日本農業經濟由於工商業畸形發達而生的衰落，與最近日本一般經濟的沒落無多大關係，且其情形已於拙作《日本近世農業的發達》詳為剖述過，所以這裡只就歐戰後，尤其是一九三〇年恐慌後，日本農業經濟的情狀加以檢討。

農業經濟衰落的速度，及其恐慌前進的步驟，普通較比工業來得紆緩。但即如此，近年來日本農業經濟的衰落情狀也已很可觀了。歐戰後，日本的農耕地面積及單位產量皆有急激的減少——不但沒有增加，反而絕對減少。

日本耕地面積絕對減少的趨勢

年次(年)	面積指數(%)
一九二一	一〇〇
一九二二	九九·八
一九二三	九九·〇
一九二四	九八·四
一九二五	九八·四
一九二六	九八·五

歐戰後日本米麥單位產量趨勢表

期 間	每反步實數	與前五年平均數的比較
一九一六年—一九二〇年	一,八八四日石	〇·一二〇日石(增加)
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五年	一,八四二日石	〇·〇四二日石(減少)
一九二六年	一,八〇九日石	〇·〇三三日石(減少)

(注) 以上二表皆據上引拙作《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根據上列二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五六年中，日本農耕地指數減少一·五%，一九一六年—一九二〇年期米麥的平均單位產量，與一九二六年的單位產量較，前後減少七升五合（按每反步 \parallel 一·七六四中畝計算）耕地面積的絕對減少，是農業經濟之量的退步；單位生產量的絕對減少，是農業經濟之質的退化。生產上量的退步和質的退化！這豈不是農業經濟破產前夜的事相嗎？！

日本農業經濟的衰落，再經一九三〇年的恐慌而愈益尖銳化。此種事相具體表現於農產物價的暴落上。據本年七月二十一日日本農林省所發表調查，日本三種主要農產米麥蘭；昭和五年度的總生產價格，共為一，六二五，三五一，〇八九元（米一，一一七，九一六，一八〇元；麥二三〇，二二三，一三五元；蘭三〇四，二一一，七七四元）。若與前年較，則各種價額減低數如下：米為四六六，八一一，六六八元（二九·五%）；麥為六七，八七五，三八三元（二五%）；蘭為三五〇，七八七，四一九元（五二·六%），合計八八五，四七六，四七〇元（三五·三%）。況且，生產數量上只麥略有減少，一，八〇〇千餘石（五·二%）；米和蘭反有增加，米增收七，三一〇千石（一二·三%）；蘭增收四，三七〇千餘貫（四·三%）（以上數字皆據最近〈改造〉十月號，河西太一郎所作〈恐慌農村的動向〉）。這是何等激烈的暴落！又據猪侯津南雄的估計，他種非主要穀物一九三〇年底價格的低落比率如下（據本年一月號〈改造〉所載〈農業恐慌與日本資本主義〉）：

六種穀物（米除外）	跌落二四%	與六月比較
菜蔬七種	跌落五一%	同上
果物三種	跌落五二%	同上

此外，農業副產如茶、日本蓆、養鯉、雞蛋、苗木、木炭及林產物等等，也約跌落三〇%。

日本的農業恐慌已經經過一年多的歲月，到現在有無轉好的曙光——這是一般關心世界經濟及日本經濟者所切望明瞭的。在此恐慌的過程中，日本為政者及所謂農業大家，固然也會改換種種農耕的新方針，例如農業經營的多角化、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的自給主義化等等，極力改桑園為水田、增加豚雞等家畜的飼養頭數等等，但這也不過是一種

退化的表現罷了。本年農業經濟的情狀也不過如下：

「……上半期主要農產物的繭，數量雖僅比去年，預想為一〇%多些的減少，而其價格（諒為額之誤——焦農按）則約為五〇%的低下。……其價額為一三，九七〇萬元，與去年的春繭實收價額較，相當於七，〇六六萬元（三三·五%）的減少。」

「……即就蔬菜類看，截至現在，其運轉略與去年同，而市價則比去年略示低落。茶也然，由去年五六月的市價（中味、新、一貫目，皆係茶之品名——宋按）三元六十錢，低至今年的三元，約有二元的低落，數量也約減二〇%，故其總價額與去年之二，四一九萬元較，可得四九〇萬元減少的預見。」

（節譯本年《改造》十月號八十五頁所錄載《日本經濟年報》第五輯——昭和六年第二季）

四、日本殖民地膏血的涸渴

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危機的急迫，還可以從日本殖民地——台灣及朝鮮——民眾膏血之涸渴來證明。

大凡帝國主義者皆恃殖民地民眾的榨取，以維持或加強其自身的存立。日本帝國主義也然。上面述過，日本的經濟早在明治中年即已步入衰落的途程。這種情勢迫使日本帝國主義急於「向外發展」。甲午戰後日本居然割據了台灣；日俄戰後又吞併朝鮮及租借旅順、大連。果然因此而日本帝國主義多少延長了本身的壽命。

關於日本由朝鮮及台灣等殖民地所獲得的利益，換言之，朝鮮及台灣等日本殖民地「在日本帝國存立上的價值，請參看《日本支配下滿二十年的朝鮮》、《朝鮮問題的真髓》、《日本資本在台灣的發展》、《日本的台灣土地政策》等論文（載於《新東方》

及《國聞周刊》等雜誌）裡，剖述之頗詳，茲為節省篇幅起見不再贅述。但簡約言之，正可以應用孫中山先生的名言，「假使英國喪失印度，大英帝國立即降為世界三等國」說：「若日本喪失了朝鮮和台灣等殖民地，日本帝國立即降為世界末等國。」具體說來，朝鮮及台灣等殖民地在日本帝國存立上的重要性，約有下列各端：第一，消納日本國民的資本；第二，供給日本工業的原料；第三，消納日本的工業製品；第四，解決日本內地的糧食問題；第五，解決日本內地一部分的人口問題（此項不但要注意移住殖民地的人口數目，並須注意由殖民地輸送於日本內地的財富）；第六，提供日本國民以財富秘密積蓄及公然榨取的源泉；第七，充當日本帝國海陸軍的根據地……前六項為經濟上的價值，幫助日本經濟上的維持甚大。日本經濟之所以能繼續繁榮到如今，說是大半依存於殖民地的壓榨，諒非過言。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朝鮮及台灣的壓榨，已經達到飽和點；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續命湯的朝鮮及台灣兩地群眾的膏血，已至涸竭的程度了。據《朝鮮問題的真髓》，昭和元年（一九二六年度），百元以上日人納稅者數目竟較本地韓人同種納稅者數目，多出一四〇人。又據朝鮮京城帝國大學所編《朝鮮經濟的研究》，昭和元年度百町步（一町步＝一七·六四中畝）以上的地稅及市街地稅納稅人數目，日人為五四三名，韓人為三九一名，日人約當韓人一倍半。這種事實是在證明韓人資產家的沒落，而一般群眾的膏血也將涸竭了。此項比較尚須注意當地日韓人口的比率，據昭和五年《朝鮮要覽》，在韓日人僅占總人口二%強。他方面，韓人的食米量一年減少一年，質也有激變，以小米代精米。這是韓人的沒落，其結果乃不得不攜老招幼向我國東省及西比利亞前進，以過饑凍的生活，或連袂而至日本內地，威脅日本的勞動市場，過流浪無依的生活。

朝鮮的情狀如上所述，而台灣的悲慘也不在其下。日本經營台灣已逾三十年，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結果，一切的企業經營殆為日人所獨占。政府專賣的酒、鹽、烟草、樟

腦、阿片、半專賣的糖及專營的鐵路業，林業不用說，即普通事業的經營，也莫不皆然。據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一八至一一九頁，銀行業資本日人為四四，八〇四千元，台人僅為六，五七二千元；小鐵路業日人資本為一，三六二千元，台人僅為八七五千元；製糖業日人為一五，〇六七千元，而台人則僅為一，九五〇千元（實則現在台人資本唯二經營的林本源製糖及新興製糖已盡為日本的製糖公司所合並）；石炭業日人為一四，五三三千元，台人僅為七八〇千元；他如造船鐵工業、電力電燈業、新聞印刷業等皆為日人資本獨占。即如殘存為台人謀生的企業如米貿易及茶貿易，近年來也已漸歸日商所獨占，最大米商的瑞泰（台人）已達破產境地，茶商也已無可言者存在。大多數台人所倚以為生的土地的兼併也頗厲害，不久也將盡歸製糖公司的絕對支配。他方面，台灣人大部分被迫而由平地冒險向番地的山裡移動，不能同化生番則為生番所同化而還原於半原始生活，其小部分逃至中國南部及日本內地。

朝鮮和台灣群眾膏血的涸渴，再經此次一九三〇年的恐慌，更臻於極點。據價格的運動以檢點恐慌的深度最為可靠。一九三〇年九月，朝鮮米價每石尚為二十元，至十二月即跌至十二元，約跌一半（據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號《朝鮮》雜誌所載《關於米價調節日本政府的應急施設》）。不但主要農產的米價如此，其他的農產物價也然。台灣農產物價的暴跌也不在朝鮮之下。據台灣友人的私人調查，一九三〇年日本米（日本種的稻米）每石由十六元跌至九元，蜜柑一斤由一毛四分跌至六分錢，芭蕉每斤由一毛左右跌至二分，跌勢自百分之四五十至八〇%。現在印度豆每斤只值二分錢，洋白菜每斤只值七分錢，蒜每斤值一分錢。農產物價雖然暴跌而各種公租公課的負擔卻毫不稍減。該二地方占本地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農民，其生活之苦真非殖民者的日本人所得體驗出來的。台灣台南州下的農民（台南州因失收而益窮）因為收穫額不足以納稅，致使所收成的稻全部為政府徵去充當稅金。朝鮮也因年益貧窮化的結果，而韓人犯罪的件數激增。據一

九三一年三月號《朝鮮》雜誌所載《朝鮮生活與犯罪》一文，朝鮮犯罪件數，一九二一年只為八二，九〇一件，至一九二九年就增至一六八，八〇六件，增加一倍以上。而其犯罪的內容，猥褻、奸淫、重婚這些所謂「文明罪」減少，而因「生活問題」激發的犯罪卻反增加，犯罪最多者為盜竊犯，而詐財及橫領罪次之。

朝鮮及台灣本地群眾的經濟已至山窮水盡的關頭，一般群眾的壓榨已達飽和點。但是日本猶在加緊壓榨膏油，於是兩地民眾為謀生存而自然起來反抗。去年朝鮮的「光州事件」，就是一例。即如處在高壓之下的台灣社會運動，表面上雖減退，但卻是一種潛勢力的滋延。縱使他們不積極反抗，一任日本加緊壓榨，他們也不過是一堆「枯骨」，大量脂油的獲得當然無望。這又是日本帝國危機急迫的另一關頭。

五、日本向外侵略的必然性

日本帝國的經濟因其本身資源的缺乏，不足以應付資本主義型的繼續發展，所以到中途即呈停頓。雖然後來幸得朝鮮和台灣兩殖民地的壓榨，使它得以發展到帝國主義的現階段，但是近年來朝鮮及台灣兩殖民地壓榨之達飽和點，似已不足以供其苛求的情勢，已經重使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陷入苦悶的境地。日本要維持其經濟上的存立，似非先打開這種苦悶的難關不可。

日本要打開當前的經濟難關，本有下列二種方法：第一，社會主義的方法；第二，資本主義的方法。社會主義的改造方案，日本和平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者高橋龜吉，曾有詳盡的提議，若節述援引於下，既可避免煩雜，且可避去代庖僭越之嫌。

「……今日新經濟政策的根本：就是（一）撤廢充當支配者而已無能力者化的資本家本位的制度，改為生產階級、新興階級的無產階級本位的制度；

(二) 建設厚生本位，國民福祉本位之有計劃的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以代替現在阻礙生產的營利本位的自由交易經濟制度。……」

高橋氏把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停頓的原因，歸罪於經濟制度的束縛，故謂：「……同樣，在今日資本主義經濟之下，為須直接間接保護資本家階級的既得權利及既得利益，而可以充分利用的科學的進步，遇到不少的阻礙。現在若將此等科學移用於以國民的厚生為直接目的的有計劃的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之下，且能利用得法，則可由從來阻止發展的資本家型的束縛解放出來，於是得如我們在明治維新後所經驗的，助成生產力的一大發展。……」

高橋氏的具體方法如下（節錄並申述其意）：

第一，要先確定有能力的產業經營者及更完滿的產業經營方法，以代替資本家及營利制度。而產業經營者就是社會，把產業社會化，全由社會共同經營；所謂更完滿的產業經營方法，就是在生產及消費皆於一定的預算之下，有計劃地進行的辦法。

第二，極力應用已發明的科學於有益厚生的方面，使一般民眾皆得沾潤科學的恩澤。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就是有益於全體民眾的科學，也因資本家的營利關係而被埋沒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須將這些有用的科學極力發揮，使盡其實用化的任務。

第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專為游食的資本家而課諸大多數國民的犧牲，把它運用於有益社會的方面。……例如利用租稅政策沒收不勞所得，重課財產進款，絕對沒收遺產，減輕對於勤勞所得的各種課稅。又如改革金融制度，降低利率，改革土地制度以降低地租。並將各種基本產業社會化，以縮小資本家游

食奢侈的來源。

以上，據《資本主義末期的研究》三六八至三七二頁。

然在資本主義經濟發達至獨占階段，政府大權操於財閥手中的日本，高橋氏所擬不利於資本家的打開政策，必不能為所採用。而現在日本布爾喬亞政府的難關打開策，必定採用資本主義的方法無疑。此種方法本可分為由粗工業向精工業前進；帝國主義型的向外發展。而前者須依後者始有可能，其具體表現就是擴大殖民地。且申論之。

日本的粗工業因為後進國，尤其是中國粗工業的發達與競爭，而必須進展至精工業的階級，日本工業經濟始有維持的可能。但欲以精工業競存於世界的工業界，須有下列二種條件：

第一，須有充分的資源和熟練的技術；

第二，須有自由銷售製品的獨占市場，最低限度也須世界市場以自由競爭為原則。

關於第一項日本資源的缺乏，我們已當作文述過，一般人的腦中印象也頗深刻，故無須詳細引證。要而言之，日本沒有羊毛和棉花，沒有鐵產，煤產的艱難也已達極點。即如農業尚占重要位置的農產，尚須仰給於其殖民地和其他外國。至若技術上的能力更不能與歐美各國對立。日本貨物之得在世界市場上占一點地位，全由於「價賤」，非由於「物美」。

第二項自由銷售製品的獨占市場，除完全歸其統治的朝鮮及台灣兩處殖民地而外，似無絕對可靠的。東省市場近因英美德俄之進出，日本貿易已漸陷於悲境。即如朝鮮及台灣，也因其壓榨程度達飽和點的原故，購買力已有激減之勢。且舉朝鮮為例，朝鮮由日本的入口量，一九二九年尚為三一五，三二五千日元，一九三〇年減至二七八，一九

四千日元，本年度截至五月為八六，八九一千日元，有更減的傾向（據〈中央公論〉九月號〈日本資本主義與殖民地〉）。況且，朝鮮和台灣也已相當資本主義化，需要外來製品的程度必愈減低。不但日本沒有獨占市場，他方面，各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殖民地且皆築有堅固的「關稅壘壁」。

日本的資源既不豐富，勞工的生活程度又越增高，技術且不能與歐美各國爭競，欲以「物美價賤」的二優點爭逐於世界市場上，是絕對不可能的。再加以現有的獨立市場已漸不可靠，日本現在的統治階級自必採用「帝國主義型的向外發展」的策略。且須此策略完成，而向精工業的前進始有可能。因此，日本之向外侵略，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現階段的必然性。

六、東省適當日本侵略的第一線

日本三島位於北太平洋中，北連俄國，南跨海可至南洋群島，西接中國大陸，東隔太平洋而與美國遙遙相對。在此環境之下，日本帝國主義之向外發展，除向西線前進以外已無他路，蓋因此而不但格於強俄而且經濟的價值也小；東邊的美國不但領土的取得絕無希望，即連移民也已因美國〈移民律〉的禁止而不可能；南方因為領土皆被英美荷等國分割淨盡，除非重再分割，已無覓得片土的可能。所剩的只有西進的一路。因此，西進的所謂的「大陸經營」，就成了日本帝國統治階級向外發展的傳統政策。

自地理上說，陸地最與日本接近的就是我國東三省。日本與我國東三省隔日本海，一衣帶水，數十小時即可抵達。由朝鮮過鴨綠江更近，只需數小時。就現狀看，日本由大阪經由安奉路及南滿路進至長春腹地，只費九十二小時。若萬一日本久年所企望的吉會鐵路完成，即由大阪經由該路只需五十一小時即可直達，這是地理上的密切關係。若

再自東省的經濟價值加以考察，則日本帝國數十年來之急於開展所謂「滿蒙積極政策」，也是意料中事。

概括言之，東三省的面積的廣大達六四，二五三千方里，而人口只有二三，四五九千人。面積約三倍於日本內地，而人口反不足日本內地二分之一（據大正十四年十月一日日本的國勢調查，日本內地面積為二五，一五一千方里，人口為五九，七三六，八二人——皆據大西齋著《支那的現狀》二七一頁）。若自人口密度比較看，則日本內地每一日方里有二，四一七人，而東省約為三七四人，約當日本七分之一的密度。據說東三省的人口包容量尚有三四千萬人的可能。土地且多肥沃可耕，氣候也相宜，即現在的農產量每年就有一八，三七六，三四〇噸，除去一二，四七五，七四〇噸自用量外，尚有五九〇餘萬噸的剩餘（據《中東經濟月刊》第六卷第十期《民國十九年東三省農產收穫與輸出之估計》）。此外，尚有鐵的埋藏量七億噸①，煤的埋藏量二十餘億噸②，全礦區數百處③，天然森林面積一二，四二〇，〇六〇餘町步，材積量達四四五，〇〇〇萬餘石④；……且每年有六四七，五八三，〇一七海關兩的貿易能力（約占中國全國貿易額三分之一）。具有這些種種良好經濟條件的東三省，自然構成日本帝國向外侵略對象的第一線。

上述只是概括的解釋而已，至若東三省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發展上的各別價值，則另設專節詳細解剖於下。

七、東三省與日本糧食問題

日本帝國存立上第一個險象，就是原以農業立國而本國的糧食問題卻日益險惡。日本國民的主要糧食的米麥，年來因為農業經濟的衰落（正如本論文第一節及第三節所述）而其產量漸有減少的傾向。米麥的生產指數一九一九年度一〇〇，次年的一九二〇年即減至八六。其後雖有多少增減，但仍未突破基數，即至一九二九年的指數，也只與歐戰前一九一四年的九一相等。主要糧食的生產量雖然日益低減——至少也在停頓中——而人口的繁殖卻日益增大，日本人口的增加指數一九一九年為一〇〇，一九二九年為一一一。即就現狀而言，日本內地人口約有六千萬，其增加率每年自七十五萬至百萬。所以一九二六年的米進口量超越九，五三〇千日石（據上引藤岡啟同書七十一頁）。這在日本帝國的存立上，是多麼嚴重的問題。這種缺陷雖然可以由殖民地的米產來彌補，但是殖民地的民眾也須自己消費，即使台灣人可以鐵釘樣的「白芋乾」充饑，朝鮮人可以小米代替精米，但其提供力究竟有限。這個問題的解決必須仰賴於東三省的農產。且分水稻、小米，兩項分述之。

水稻 據日人的調查，東三省大體上甚宜於水稻的栽培。只一九二六年的水稻的栽種面積已有一一，七三〇町步（約當二百萬中畝），其產米量為一，八七七，八〇〇日石（約當三二七萬餘中石）。又可開為水田之地尚有百萬町步。即據日本農商務省技師的調查概算（士林及間島除外），可開水田之地即有五十八萬町步，其中三十三萬町步比較容易開墾。據日人的預計，若獎勵得法，每年可開墾八千町步至一萬町步，不數年而增加十五萬町步，決非難事。而每反步平均收穫額若假定為稻子三石六斗，可得五〇四，〇〇〇萬日石，以平均五〇％計算，可得二七〇萬糙米。再加算現在七十五萬日石的剩餘，合計可得三五〇多萬日石（約當六〇九萬中石）。日本國民正渴望著此項米產

的救濟呢！（本段數字皆據上引藤岡啟同書六十六頁、六十八頁、七十二頁）

小米 日本每年由朝鮮移入鮮米在二，七四五千日石以上。而這些米量並不是朝鮮人民消費的剩餘；鮮米出口的反面，就是低級食糧的小米的進口。昭和元年，朝鮮的小米進口量達五，二四三千多日石（此二項數字據《朝鮮問題的真髓》），此項小米進口量的大部分皆來自東三省。昭和元年，東三省小米向朝鮮輸出量約為四，四四三千擔，價值二一，一八九千多海關兩。於此可知東三省小米間接解決日本食糧問題有多大作用，而小米在東三省農產上又占很高的位置。即就失收的昭和元年度的耕種面積及收穫量言，已有一，九二六萬多反步，二，四八九萬日石（約當四，三三六萬中石）。自產量言，小米為東三省的第三重要農產，東省小米對於日本糧食問題的救濟力何等巨大！（以上數字據藤岡啟同書五十八頁、五十九頁及六十頁）

八、東省與日本生產原料

日本之立國於世界上，以資源之缺乏著名。日本工業之所以早衰，主要原因也即在於資源之缺乏。前節述過，工業上最重要的生產原料，如鐵、煤、棉花、羊毛，日本皆無之，或產量很少。即農業生產上必要的肥料大豆，日本也多仰給於外國。而這些日本切要的生產原料，東三省皆甚豐富。且分述於下：

大豆 大豆在東省農產上首屈一指；其國際上的商品地位也頗負盛名。大豆的栽種面積為二，六〇三，七〇〇町步（昭和元年度——據藤岡同書四十五頁）；其產量為五，二六八千多噸（一九三〇年，據《大公報》本年四月十九日《哈爾濱通訊》）。東省的大豆產量除本地自用外，尚有很多剩餘。據《大公報》上引哈埠通訊，一九三〇年東省大豆輸出量四，三二七千噸，占同年產量五分之四以上。又據藤岡氏書，昭和元年東省

大豆輸出量約為二二，四二六千擔，價值約七，六六〇萬海關兩。其中輸向日本者僅南滿三港即已達三，九四九千多擔，價值一四，三二八千餘海關兩，莫怪藤岡氏說：「……輸送大豆不獨為增加運費收入，實為繁昌本國系（日本系）油坊，提供廉賤豆油及豆餅於母國（日本）工業及農業，以獲某種利益。以豆餅為肥料的我國（日本）農民（昭和元年輸向日本及朝鮮者達一九，一五九千擔Ⅱ五四，六三五千海關兩），滿洲大豆的高低，直接影響自身的計算」（同書四十四頁）

棉花 目下東省的棉產量雖然不大，年產額棉實僅為一，五〇〇萬斤，似乎不關重要。但是可以種棉土地，約在一二〇萬町步（約當二，三〇〇萬畝）以上。且日本在關東州栽種棉花已有相當成績，關東廳特為樹立《棉花獎勵九年計劃》，預定九年後於關東州旱田面積二二萬町步之中，將八萬町步用於棉的栽種。如此前途有望的產棉地，自然難逃缺欠棉產的日本的注目了。

鐵產 煤和鐵是近代文明的資源，此二者在近代國家的存立上頗占重要，但以強國自豪的日本卻很缺欠此二種資源。日本目下鐵的需要年額，鋼材在二〇〇萬噸以上，換算銑鐵當在三一〇萬噸以上。而日本內地的供給量，無論如何努力也不能超過一五〇萬噸，約缺二〇〇萬噸非求之於殖民地及外國不可。為滿足這種需求，東三省也逃不了日本的視線。蓋因東三省的鐵埋藏量在七億噸以上。與日本全土（包括朝鮮）之一二，二〇〇萬噸比較，正五倍於日本全土（本段數字據藤岡氏同書一〇八頁、二二四頁及二二五頁）。

煤產 日本煤的埋藏量也有九十餘億噸，埋藏量不算不大。但是近年來的採掘費非常增高，已在證明日本煤產的困難。反之，東省煤埋藏量雖然不大，而為日本獨占的撫順煤產，正足以救濟日本的這種困難。撫順煤礦的埋藏量約為十億噸，占東省全部埋藏量之半，而該煤坑尤以坑層之深厚及其「露天掘」著名，採掘容易，生產費低微，實日本產煤界的一大救星。昭和元年度の產額即約達六一四萬噸，且有昭和十四年度出產一，

一〇〇萬噸的預定（以上數字據藤岡啟同書一二六頁、一二八頁）。

羊毛 日本每年的毛織物產額雖然約為二〇，二三九萬日元，但其所用原料的大部分，皆仰給於外國，每年輸入額達一二，一〇七萬日元。需要大量羊毛原料的日本，其飼羊業卻微微不振，僅北海道一隅。反之，東三省的牧畜業頗盛，羊毛的產量也多，除本地消費外，每年尚有二萬擔，價值三十七萬多海關兩的輸出。況且，此數僅就南滿三港計算而已。對俄輸出尚不在此內。而此三港的輸出量幾可以說全部輸向日本，日本並且直接投資於此項企業。約自一九一四年，滿鐵即設置公主嶺試驗場，從事此業的經營，希望二十年後產毛一，五〇〇萬磅，價值一，五〇〇萬日元（以上數字據藤岡同書一六五頁、一六七頁）。

九、東省與日本投資及商品市場

與東省之幫同日本解決糧食問題及供給生產原料有密切關係的事情，就是東省之銷納日本投資。大凡企業實權之歸宿皆視資本之來源為轉移，日本已投資於東省各種企業上，則直接間接可以操縱各種產業的經營實權，使有利於其母國無疑。據「滿鐵」的調查，日本之國外投資（殖民地不計）二十二億日元中，對中國的投資為十八億日元，占八一%強；而對東省投資又占對華投資七二%強，約為十三億日元。日本之東省投資額即自對外投資全數計算，也約占六〇%。日本支配東省經濟的實力如何雄厚！同時，東省為日本投資市場的意義，又如何深濃！（本段數字據《中央公論》本年九月號《日本資本主義與殖民地問題》）

東省不但是日本的巨大投資市場，並且是巨大的商品市場。據上引同文一九三〇年日本向中國的輸出總量為三九，九〇〇萬日元，其中向東省輸出者為一二，二〇〇萬日

元，占三一%。又據藤岡氏同書二五〇頁，歐戰中，日本向東省的輸出貿易額，占全部輸出額五二%。即自東省方面說，在日本商品略受列強商品壓迫的一九二六年，在東省輸入總額之中，日本商品尚占四三·四%。同種比率，英為五·七%，美為六·七%，僅及日本比率約八分之一，或約七分之一。即我國所占比率也只三一·一%，猶不及日本比率多多。

自經濟的立場上看來，東省輸入商品的內容，也有加以考察的必要。在輸入品中最占重要的，就是棉織物。一九二六年該項商品輸入額達五，八〇〇萬兩，約當總輸入額二四%。其次為麥粉，一，九〇〇萬兩。再其次為棉紗一，六〇〇萬兩，麻袋一，一〇〇萬兩，……此中之綿織物，綿紗，及麻袋，幾乎全部為日本輸出品。同時，又皆為工業製成品。其在日本經濟上的意義，不獨限於商品銷納的意義，並且具有很大的工業發展的意義。

輸出貿易的反面就是輸入貿易。此項固不應在本節題目之下討論，但因其有密切關係，且有特別的意義，故姑述之。日本由東省輸入的數目額也頗巨大，據上引同文，在一九三〇年中國輸向日本的金額一七，八〇〇萬日元當中，東省的輸出額占一六，三〇〇萬日元，約占八五%。此項巨大數目另於生產原料的供給上具有特別意義。換言之，日本由東省輸入的物品概為生產原料，如鐵、煤、肥料（豆餅）及大豆之類。故在日本工業上，與上述製成品之銷納正相映照，而有特別的意義。

十、「東北事件」的發生

總括以上各節所述，一方面日本的經濟危機日益急迫，現已由工商業蔓延於農業經濟，他方面東省具有充分的經濟價值，可以充當食料及原料的供給泉源，可以充當資本

及商品的銷納場所，並且可以充當所謂「大陸經營」的媒介物。於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手伸向肥嫩而柔軟的東三省，乃有十二萬分的必然性。因此，保護所謂「滿蒙的特殊權利」，擴大滿蒙的利益和權限，甚至主張「滿蒙積極政策」，等等，乃成了數十年來日本任何內閣的主要政綱之一。雖其方法有急進與緩進之差，但其為侵略東三省的根本計劃，則無二致。果然，九月十八夜終於發生了近代史上異例的「東北事件」。

然而「東北事件」何以偏偏發生在這時候？日本經濟豈不是早就衰落了？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東三省，豈不是早就垂涎萬丈了？東北事件之所以不發生於過去任何時候，而偏偏發生在此時，非有何種特別的原故不可！我們且就東北事件的近因檢討看，以作本文的結束。

東北事件發生的近因，大體上可以分作下列四項：

第一、日本殖民地問題的急迫；

第二、列強向東省的積極進出；

第三、中國經營鐵路的壓迫；

第四、中國內部統一的威脅。

且逐項分別剖述之。

日本自經明治維新以來，每代政府皆極力施行「富國強兵」的政策。強兵的要件之一，就是獎勵人口的繁殖。日政府不但不肯節制生產，反而禁止生產的節制，獎勵人口的複生產。長久的過去姑置不論，即最近十年間的人口繁殖，已有驚人的成績。一九一九年的人口指數若假定為一〇〇，則一九二九年為一一一，增加十分之一以上。現在人口總數約為六千萬，而每年的增加自七十五萬至百萬。這個比率比較一九一九—一九二九年期，反為增大。這樣大比率的人口增加，本即地狹人稠的三島將如何容納？移向朝鮮

和台灣嗎？以二五%（朝鮮）及一八%（台灣）的年增率增加下來的這兩個地方，似乎已無收容能力，除非將上二處的本地人擠出境外。此外，唯一的方法就是移向東三省。但是東三省究竟不是日本獨占的殖民地，日人之移住東省多少總須受制於「適者留」的競爭原則。日本人生活程度高而不耐勞苦的工作，故不容易在東省生存競爭場裡占得勝利。過去二十餘年努力的結果，也只不過二十萬的成績，其中之十五萬且係住於日本租借地之關東州及南滿鐵路附屬地者。日本果欲施行殖民政策於東三省而獲良好的成績，自非完全獨占東省為殖民地不可。這是日本近年來急於進出東省的第一原因，也就是東北事件發生的近因之一。

東三省惟其不是日本獨占的殖民地，所以美國乃有主張「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權限。過去只是口頭的主張而已，近年來則進入實行的時期。美國是以大量生產著名的國家，它的商品銷售於世界各地，且以歐洲為主要市場。但是歐戰後歐洲各國的經濟皆極度疲敝，一般人民的購買力大減，而美國商品乃不得不另覓銷場。中國固為適當的地方，而東三省尤為其理想地。美國近年向東三省進出的猛勢，竟駕日本而上焉。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六年期，列國對東三省輸出貿易增加率，日本只為三·三七%，美國則為六·六%。不但美國的此項增加率可驚，即東方貿易漸呈頹勢的英國，其同項增加率也頗可觀，同期增加率約為三·〇%。最近年英美等國的增加率，恐尚不止此。各國不但積極輸送商品，並且投資。這種急轉的情勢自使日本不寒而慄，終出以先發制人的手段。這是東北事件發生的第二近因。

日本之經營東三省，不但受到本身問題及其他列強的威脅，即以病夫國著稱的中國的國內統一與夫所謂經濟建設等等，也增高了日本驚慌的程度。

鐵路為經濟的大動脈，且為政治侵略及軍事侵略的急先鋒。故欲侵入國者第一步必先攫取鐵路權；而欲恢復國權者第一步也必先收回鐵路權，或進行同樣性質的運動。俄

國早年之侵略東三省，先鋪設中東路，繼而延長南滿線。日俄戰後，南滿線雖由俄國移歸日本，而東省鐵路二大幹線及其支線的路權，仍握於外人手裡。覺醒路權之重要的東北當局，雖有恢復路權之意，礙因格於條約與強權而未得實現。其結果，乃採行第二辦法，自己敷設平行線。東北自敷鐵路工程始於一九二五年的開豐（開原至西豐）輕便鐵路；次之者為瀋海鐵路，再次之者為呼海鐵路及打通支線，鶴立鐵路、吉海鐵路、齊昂鐵路，及齊克鐵路等也皆先後敷設。現在新舊各線之聯絡，儼然形成東西二大幹線：西有洮昂、四洮、打通、鄭日等線，洮南至通遼一段若完成則成一完全的幹線；東有吉海及瀋海三路，向北可以延長至伊蘭，而成一完全的幹線。此二幹線皆可直接與北寧路聯絡而與日本經營的南滿鐵路平行，且可通至建築中的葫蘆島新港口以出海。中國有此二線一港，即不收還南滿鐵路，南滿路將必成為廢物。於是，日本大起恐慌了。反對平行線之敷設已無效力，自然出以武斷的，暴力的方法。這是東北事件發生的第三近因。

中國方面不但要恢復路權，並且要恢復一切旁落的國權，排脫外國的羈絆。日本素來對於東北所擬定的帝國主義型的侵略步驟，第一先使東北獨立，第二由獨立而收攬為保護國，第三由保護國而合併，終使成為朝鮮第二。這是顯而易見的陰謀。在此陰謀醞釀未成熟以前，東省當局即斷然歸順中央，促成中國統一的局面，而由中央負責處理對日的一切交涉。於是，從來萬事皆由地方政府專權交涉的東北問題，一變而為中央直轄的交涉問題，二國中樞的直接交涉問題。中央政府為全國的中央，為全國力量的所在，軍力姑置不論，即國際上的地位也與地方政府的勢力有霄壤之差。日本的交涉自然格外感覺棘手，包藏禍心的陰謀乃不得逞。但卻因此而日本惡恨東北當局至於極點，必欲改換「俯首聽命」的地方當局，以便實行其傳統的「滿蒙吞併政策」，而償其帝國主義型的發展。這是東北事件發生的第四近因。

因有以上所述正面的原因和背面的原因，遠因和近因，而轟動世界的東北事件乃發

生於本年九月十八夜。於此我們獲得東北事件發生的必然性。不過，此種「必然性」是在某種前提條件之下成立的，其理由剖述於《日本果非侵外則不能存立嗎？》及《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二篇論文中。

注釋：

- ① 據藤岡啟《滿蒙的新估計》一〇八頁。
- ② 據同上二二六頁。
- ③ 據同上二四五頁。
- ④ 據同上二五四頁。

原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新東方》第二卷最近遠東問題專號

日本戰時經濟編制中的 原料問題及其政策的動向

日本帝國正和其他的帝國一樣積極在準備戰爭；在首都戒嚴中成立的準戰時政府的寺內——廣田內閣，在其樹立「國策」時，特別周密討論到的就是原料資源的問題。原料資源的問題現在已經不但是平時工業生產的問題，並且同樣是戰時軍需原料的問題了，即戰略資源的問題了。日本自其開始資本主義的第一步即為原料問題所困惱，所以每一發展階段上皆用戰爭手段來解決，但是戰爭又增進原料的需要。處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日本帝國正在焦慮於這個日益逼切的原料資源的問題，且看它的內容如何？企圖解決的方策又是如何？

一、一般原料資源的重要性

現代工業的興衰及消長，主要的決定於三種條件，販賣市場的廣狹、資本的多寡及原料資源的豐富。特別是後者關係尤其重大。原料資源豐富則可以減低工業的生產原費，增加工業製品的國際競爭力，保持一國工業之繼續發展。原料資源缺乏則工業生產須依賴外國供給原料始能進行。這不但增加生產原費，提高製品的價格，削弱國際競爭力，有時甚至因為外國供給的斷絕而生產陷於不可能。例如不能生產羊毛及棉花的國家，他的紡織工業無論怎樣發達，其前途仍是岌岌可危的，即連目前的現狀，都要千辛萬苦專賴剝削極廉賤工人的所謂「血汗制度」(Sweating System)姑以維持。日本是個典型的事例。又如缺乏現代資源的石炭和鐵礦的國家，他的重工業的發展也要劃下極嚴格的界限，

萬一因為戰爭及其他的原故，資源的供給完全被切斷時，就不但重工業生產要停頓，即連仰賴重工業供給生產手段的輕工業，也須關門大吉。在這點，日本又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上面只是從平時的工業生產說明而已，若更深入從戰時的場合著想，則原料資源的重要性更為顯著而增大。今日之世界，因為經濟的聯繫與政治的決裂無法調和，遂陷各國野心家於戰爭的夢境，現實上整個世界已經逼至戰爭的前夕，各國皆在瘋狂似的備戰了。在這瘋狂備戰的前夕，一切平時的生產全部戰時的生產化，一切的生產都為戰時的需要而進行了。然而戰時工業生產最大的威脅就是原料資源的斷絕。而戰時各國又皆以封鎖敵國斷絕一切經濟來源為取勝的重要手段，例如歐洲大戰中協約國之於德國。因此，瘋狂備戰的各國目前的經濟鬥爭，就很自然地集中到原料供給地之獲得及占有上。這時候平時的原料資源，也變成了戰略資源了。這種鬥爭最近很顯明地表現為兩面的事實，資源豐富的強國努力堅固他的資源地的獨占，如英、美、法及蘇聯；資源缺乏的強國則相反的，主張實行世界的再分割，以便自己占領新的原料材源地，如意、德及日本。在這種情勢之下，半殖民地特別成了缺乏資源的強國爭奪的對象了。

原來，殖民地的作用有三：其一、充當宗主國過剩人口的尾閘；其二、提供工業製品的販賣市場；其三、充當原料資源的供給地。各國侵略他國的領土者也皆列舉本國這三種條件缺欠為理由。但是宗主國移植殖民地的人口，事實上皆非常低率，這因為生活程度及生活方式不同的原故。侵略者並不能由事實來證明第一種理由為正當。第二種製品販賣市場的理由雖較重要而合乎實際，但是任何國家若能提高工業構成則國內市場也可以增大。例如生產手段部門的發展速度高過消費資料部門，則國內市場自然擴大，並且原料國以至其他的工業國亦都很自然地與之相交易，製品市場自然擴大，無須乎殖民地的侵佔。歸結起來，侵佔殖民地最大的最根本的作用，在於原料資源的獲得。在自由經濟時代，因為各國彼此之間皆遵循著世界經濟關聯的自然法則，所以這種占領原料資

源地的必要並不很大，但自近年來特別是一九三一年世界經濟會議決裂以來，經濟的國際主義益向國家主義轉變，各強國皆努力於造成經濟集團，原料資源地的占領欲就尖刺著野心家的心胸。特別是在逼至戰爭前夕的今日，每個野心家都時時刻刻在吟味德國在歐戰中受到經濟封鎖而致失敗的經驗和教訓。於是占領殖民地的根據全部集中到原料資源的獨占上，而原料資源的重要性更加漲大了。

日本是三個缺乏原料資源的國家之一，原料資源的問題在目前的日本就很自然地成了他最關心而又最重大的問題了。準戰時的寺內，廣田內閣苦思焦慮的結果，也終於榨出了關於確立原料資源的許多政策，並且引起國內外的注意。原料資源的重要性在目前

二、原料資源的世界分布

討論各國野心家爭奪原料資源的問題，第一點應當首先分析的，就是造物者究竟對於這些野心家怎樣與原料資源的現狀。但是更應首先決定的問題，還是什麼是原料，特別是戰略原料。這裡當然只能舉出最重要的來討論，有人說現代工業的基礎原料是石炭、鐵、石油、棉花、橡皮及銅。這幾種原料之為最主要的現代原料，大約任何人都不會有異議，但是在工業充分發達，並且戰時經濟包羅著整個經濟範圍的今日，戰略原料也不能單限於這幾種。所以更加擴大而得下列幾種主要原料。茲據〈皇家學會國防事情〉(Royal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調查，主要原料的世界分布，約如下表。這裡又有一個應加說明之點，就是所謂原料資源分布的問題，應當是數量多少的問題，而不能是有無的問題，大凡普通的國家對於普通的原料資源都擁有多少。所以這裡只就占世界供給量一〇%以上的生產國，按其順序列舉如下：

原料資源的世界分布表

原料種類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石炭	美國	34	英國	20	德國	12	----
鐵礦	法國	27	美國	21	蘇聯	13	----	
石油	美國	59	蘇聯	12	委內瑞拉	10	----	
銅	秘魯	20	美國	16	加拿大	13	北洛勒西亞	12
鉛	美國	19	澳洲	17	墨西哥	12	加拿大	12
硫黃	美國	72	意國	20	----		----	
棉花	美國	49	印度	16	中國	10	----	
鋁	法國	42	美國	13	意國	10	----	
亞鉛	美國	28	加拿大	10	澳洲	10	----	
橡皮	馬來聯邦	46	荷印	37	----		----	
錳	蘇聯	61	印度	14	黃金海岸	12	----	
鎳	加拿大	84	----		----		----	
鉻	蘇聯	28	土耳其	18	新加勒洛尼亞	12	----	
鎘	中國	33	印度	23	美國	13	----	
羊毛	澳洲	27	美國	12	阿根廷	10	----	
加里	德國	59	法國	19			----	
磷	美國	29	突尼斯	22	蘇聯	12	法領摩洛哥	12
銻	中國	65	墨西哥	10	布里維亞	10	----	
錫	馬來	31	布里維亞	19	荷印	17	----	
水銀	西班牙	35	意國	32	美國	17	----	

(注) 本表錄自《中央公論》九月號五十三頁。

從上表看出世界主要原料生產上占最優越地位的是美國。他在幾種最重要的原料，石炭、石油、棉花、鉛、亞鉛、磷的生產上占第一位，在鐵、銅、鋁及羊毛的生產上占第二位，在鎢及水銀的生產上占第三位。美國所缺乏的原料只有橡皮及二十三種非鐵金屬的原料。美國可謂得天獨厚。但可以與美國對抗的，尚有大英帝國。從上表看來英本國的原料資源並不豐富，但若合自治領、殖民地及委任統治地以觀，則其地位並不在美國之下，其各種原料的生產額占世界總額的百分比如下：橡皮五八%，錫四二%，鎳八六%，鉛四三%，亞鉛三二%，鉻三四%，錳三〇%，銅三〇%，石炭二五%，羊毛五一%，棉花二四%等等。大英帝國的原料資源的特色還有多樣性的一點，從這量和質看來，或許勝過美國。在英國領土內只缺欠一種重要的資源，石油，難免美中不足之感，但是這個缺點卻又由資本的支配補償過來。英國資本支配下的石油生產主體，有世界數一數二的英波石油公司、土耳其石油公司，及英荷殼牌集團。若加資本支配的成分，則世界原料生產的情形略與上表所指示的多少不同，但是其結果，英美的地位只有越發增高而不降低。次於英美的國家就是蘇聯。他是鉻及錳的第一位生產者，同時又領有鐵礦、石油及磷礦的豐富資源。再次就是法國和荷蘭。

三、日本欠缺的原料資源

在上面所分析的原料資源分布上，最引我們關心的，就是稱霸於東亞躍進於世界的日本帝國，竟然落在孫山之外。這一點就是現今的準戰時內閣所以急於確立原料國策的基本原因吧！但是我們尚須更深入的分析各國原料的需要量，始得明白問題的實際。所以，再就世界七大強國主要原料生產的自給程度加以比較：

七大強國主要原料資源自給程度表

	美國(%)	英國(%)	蘇聯(%)	法國(%)	德國(%)	意國(%)	日本(%)
石炭	104	136	103	71	122	3	108
鐵礦石	98	70	107	140	30	76	65
石油	106	2	134	3	5	1	17
銅	118	0	62	0	11	2	92
鉛	96	6	28	7	29	70	6
窒素	67	250	37	61	130	83	68
硫黃	132	25	89	14	19	150	102
棉花	215	0	86	0	0	0	4
鋁	54	3	28	211	2	88	0
亞鉛	111	0	54	50	60	265	25
橡皮	0	0	0	0	0	0	0
錳	8	0	270	0	0	15	43
鎳	2	0	270	0	0	15	43
鉻	0	1	132	0	0	0	100
鎢	24	3	0	1	1	0	110
羊毛	55	22	82	7	10	26	0
加里	29	0	99	253	148	26	5
磷	137	44	87	51	50	0	14
銻	0	0	0	53	0	51	1
錫	0	8	0	0	0	0	13
水銀	40	0	86	0	0	506	0
雲母	91	0	102	0	0	0	100

(注) 本表根據上引《中央公論》五十四—五十五頁。一〇〇%以上的生產額始得為自給自足。這個比率單就各國本國的生產計算的，殖民地皆未包括在內，所以嚴格地說來尚不足以指示自給程度的正確性。例如英本國沒有橡皮和鎳，但若從大英帝國全體看，則橡皮又產於馬來聯邦，鎳產於加拿大，並且是世界頂大的資源。

根據上表，現代七大強國之中得天獨厚的是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國家的原料資源的生產，大體上都能夠自給自足，特別是石炭、鐵礦、石油、銅、硫磺、棉花等重要原料的生產皆能自給而有餘。其次，英國若合其殖民地及自治領以觀，則其原料資源之豐富當不至如本表所指示的缺乏，其得天獨厚仍不在美俄之下，檢閱前列原料資源的世界分布表即可明瞭。再次，法國尚能於現代最主要原料的煤鐵保持自足的情狀。德、意、日之大國的原料生產就未免相差太遠了。特別是日本帝國，除了石炭、銅、硫磺、雲母及稀有金屬的鉻鎢尚能自給自足以外，皆極缺乏。即連石炭的生產，也因為採掘費的高漲而漸覺困難。今後石炭液化政策一旦實施，其需要量當更增加。特別有趣的是日本帝國支柱工業的纖維工業原料的棉花和羊毛，本國完全不產；目下成了最重要戰略資源之一的石油的產量遠不及其需要。日本帝國原料資源對外的依存性，是特別濃厚的。

四、日本原料缺欠的數量

日本國內生產不足以自給而須仰給於外國的原料資源，還可以從輸入品的內容，檢出更具體的情形。據日本輸入品的內容，日本每年由外國輸入的原料及其半製品，約有下列幾種：

(一) 纖維工業的棉花及羊毛。

(二) 金屬礦油的採油原料，原油重油、石炭、銹鐵、礦鐵、鋁、鉛、銅、錫及亞鉛。

(三) 肥料化學原料的粗製硫曹、粗製硫安、磷礦石、油糟、曹達類及合成染料。
 (四) 雜種原料的生橡皮、皮革、牛脂、木材及木漿。

上列各種原料及半製品之中，固然也有一面輸入一面輸出的，例如石炭及銅，但是大體上可以視為日本所缺欠的原料資源。這些原料及半製品每年的輸入量是非常巨大的，此點，分析日本原料資源者更應加以注意。一九三五年度日本全部輸入額二四七，二〇〇萬元之中，原料及原料用的半製品竟達二一五，〇〇〇萬元，占八六%以上。日本原料及原料用半製品的輸入額，並且是與年而俱增的。昭和四年以來日本工業構成的增高，特別是昭和九年所謂經濟「大膨脹」以後，日本原料的輸入更是步著激增的路程。今年比去年又增加了不少。

日本原料缺欠的數量

	十一年上半期(千元)	十年度全年分(千元)
纖維工業	六五七，〇七六	九六九，六七八
金屬礦物	二六二，三八八	五四九，七七七
肥料化工品	八〇，一五三	一〇〇，〇六一
粗生食品	一〇一，九一八	一四七，四九六
雜類	一〇五，四八二	一九二，六四〇
其他	一〇四，五八五	一九八，〇一九
合計	一，三二一，六〇三	二，一五七，六六一

(注) 根據日本《Economist》本年八月十一日期。

日本帝國以纖維工業而發展，也因纖維原料之缺乏而脆弱。在輸入原料之中，以纖維工業原料占最大宗。在一九三五年全年分原料輸入總額之中占四五%，本年上半年更增至五〇%。其中，棉花及羊毛又占纖維原料全部的九〇%以上。棉花的輸入額一九三五年全年七一，四二六萬元（數量一二，二八四千擔），本年上半年四五，二四九萬元（八，四二一千擔）。羊毛的輸入額一九三五年全年一九，一七六萬元（一四八萬擔），本年上半年一六，七四七萬元（一五三萬擔）。其餘的製絹木漿及其他纖維則占極小部分（數目據日本《Economist》本年八月十一日期，千以下四捨五加）。

其次，日本金屬及礦油等資源對外的依存性，也不下於纖維原料。從金屬礦油等資源的軍事性看來，積極備戰中的日本政府，尤其重視這些資源。政府當局的原料政策第一步先著手於這些資源的獲得，是其事實的佐證。日本石油、鐵礦、石炭、輕金屬以及其他的重要軍需資源，目下每年的輸入額已達五／六億元以上，這種輸入並且隨著日本戰時經濟體制的推進而愈益增加。茲將本年上半年及上年全年分金屬及礦油的輸入數量及金額列表於下：（見下頁）

金屬油類及半製品輸入表

	價 額		數 量	
	十一年上半期 (千元)	十年度全年 (千元)	十一年上半期	十年度全年
採油原料	26,248	43,088	105,954 (千斤)	572,496 (千斤)
原油重油	66,229	106,826	207,622 (千加侖)	918,738 (千加侖)
石炭	24,813	48,970	2,025,515 (英噸)	3,984,824 (英噸)
礦	20,294	44,542	2,553,506 (千斤)	6,104,835 (千斤)
銑鐵	21,511	41,180	838,850 (千斤)	1,603,190 (千斤)
他種鐵	36,621	165,979	1,181,119 (千斤)	3,724,763 (千斤)
鋁	9,463	18,362	12,771 (千斤)	22,336 (千斤)
鉛	12,466	20,292	75,279 (千斤)	150,344 (千斤)
銅	14,717	36,444	36,752 (千斤)	108,768 (千斤)
錫	5,460	15,581	2,701 (千斤)	7,087 (千斤)
亞鉛	4,566	8,503	27,523 (千斤)	54,606 (千斤)
合計	262,388	549,767	---	---

(注) 本表之編製，根據上引《Economist》同期。

再次，肥料、化學原料及其半製品也隨日本近來新興化學工業的發展而漸增加其輸入日本的金額和數量。日本近來化學工業的發達及其本國原料生產化的厲行，雖然漸有促成化學工業原料自給的狀態，例如硫酸、硫曹、苛性曹達及曹達灰等生產日益增加，企圖能夠自給自足。但是每年的輸入額還非常之大，並且輸入額的增加速度甚至高過金屬及礦油等原料。日本肥料、化學工業原料及其半製品的輸入情形如下表：

	價 額		數 量	
	十一年上半年 (千元)	十年度全年 (千元)	十一年上半年 (千元)	十年度全年 (千元)
粗製硫曹	六,五八三	五,四三三	一三三,六七九	一〇四,二〇九
粗製硫酸	二九,七六一	二二,〇六九	四四〇,五一五	三九七,六六三
磷礦石	一一,〇四四	二〇,〇六〇	六八八,七六二	二六二,八〇〇
油槽	二五,七一九	三八,六七八	六四一,九九九	六六〇,二二八
遭達類	二,二四五	五,四九二	四五,九一四	九七,〇七五
合成染料	四,八〇〇	九,三三九	一,〇七四	二,〇九五
合計	八〇,一五三	一〇〇,〇六一	—	—

(注) 本表之編製根據上引同志同期。曹達類包括苛性曹達、曹達灰及天然曹達。

除了上述原料之外尚有幾種雜類原料，也為日本所不產，或不足自給的，如橡皮、皮革、牛脂及製紙用的木漿等。日本完全不產橡皮，國內工業上所使用的全部仰給於輸入。日本每年生橡皮的輸入額達五一，六三六千元（一九三五年度），本年上半年期的輸

入更為增加了，以達三〇，六五四千元。戰時經濟體制中的汽車工業的勃興，更要增加日本此後對於橡皮的需要量。皮革牛脂的輸入額也屬不少，一九三五年全年達二，八六四萬元，本年上半年期又增加了，已達一五，五八三千元。畜牧業不發達的日本，此類原料之仰給於外國是無可如何的。特別有趣的，富於森林的日本，尚且仰賴外國每年供給五，五一〇萬元以上（一九三五年度）的製紙用木漿；木材的仰給額每年也在四九，七七五千元。

五、日本輸入原料的來源

日本大多數工業原料皆仰賴外國的供給，並且這些種工業原料的大部分皆被輸入的比率占了去，本國生產數量卻占小部分，甚至有完全不產的。這個原料資源對外依存性之質量及數量的問題，威脅正在積極確立戰時經濟體制的現政府當局憂慮、焦躁。他們正在企圖確立所謂「原料國策」，特別是「燃料國策」。這些國策的詳情雖未公布也未至完全具體化的程度，但其大概的動向則可以推想而知了。上述缺乏原料從那裡來，這些國策就要向那裡去，或改變可以去的方向。因此，現在先來剖述缺乏原料的來源。

日本纖維工業上缺乏的原料，是以棉花、羊毛及人絹木漿為最主要的。棉花在日本完全不產，據農業者說是：因為日本的自然環境不適於棉作。但社會的原因也不能沒有，這裡不講。棉花的來源是美國、印度、埃及及中國。最近（昭和十年度）這些國家輸入日本的棉花，美國是三七，二〇〇萬元，印度二五，九〇〇萬元，埃及四千三百萬元，中國二千一百萬元。羊毛在日本也是完全不產，現在雖已努力於綿羊的飼養事業，但目前尚無成績可言。羊毛的大部分仰給於澳洲，其次就是紐西蘭、南非及南美。去年輸入日本的羊毛，總額一九，一七六萬之中，澳洲占一八，二〇〇餘萬元，紐西蘭占四百萬

元，南非占二百萬元，南美占二百萬。又，人絹木漿的輸入，美國占一千五百萬元，挪威占一千三百萬元，芬蘭占三百萬元，加拿大占二〇〇萬元。纖維原料的大部分來自亞洲以外的地方，只有中國供給不多的棉花，滿洲也可以供給木漿。

其次，重要軍需工業原料的金屬及油類的來源，更加複雜。在這一點，亞洲占著重要的地位，中國本部、滿洲、婆羅洲、印度及海峽殖民地等處皆為主要的供給地。特別是鐵礦、銑鐵及石炭，幾乎全部仰給於中國。石油則依賴美國和荷蘭。茲為節省敘述而將去年金屬及礦油的供給國及供給量列表於下：

一九三五年金屬礦油供給國一覽表

一、原油及重油：美國（八千一百萬元）荷印（一千二百萬元）婆羅洲（五百萬元多）滿洲（一百萬元多）。
二、銑鐵及鐵礦：中國本部（二千二百萬元）滿洲（一千九百萬元）印度（一千六百萬元）澳洲（五百萬元）。
三、石炭：滿洲（三千一百萬元）法領印度（一千萬元）中國本部（八百萬元弱）。
四、鋁：加拿大（六百萬元）挪威（三百萬元）瑞典（二百萬元）。
五、鉛：加拿大（七百萬元）美國（五百萬元）印度（四百萬元）。
六、銅：美國（三千六百萬元）。
七、錫：海峽殖民地（一千萬元）中國本部（三百萬元）。
八、亞銳：加拿大（三百萬元）澳洲（三百萬元）美國（二百萬元）。

再次，肥料及化學工業原料的供給地，除了滿洲而外，就是美洲、德國、英國及其殖民地。茲就最近的輸入國及其數額列表於下：

一九三五年化學原料供給地一覽表

一、硫酸：德國：（一千三百萬元）滿洲（六百萬元）。
二、硫酸：美國（五百萬元）智利（也五百萬元）。
三、鹽類：英國（三百萬元）東非（一百萬元）。
四、磷礦石：埃及（六百萬元）美國（五百萬元）海峽殖民地（一百五十萬元）。
五、合成染料：德國（六百萬元）瑞士（二百萬元）美國（一百萬元）。

最後，幾種雜類原料資源的供給地，大部分集中於南洋及美洲，也列其一覽表如下：

一、生橡皮：海峽殖民地（二千四百萬元）荷領印度（一千二百萬元）法領印度（二百萬元）。
二、皮革牛脂：中國本部（九百萬元）美國（七百萬元）印度（三百萬元）澳洲（三百萬元）。
三、木材：美國（二千八百萬元）加拿大（八百萬元）菲律賓（五百萬元）英領婆羅洲及荷領印度（各二百萬元）。
四、製紙木漿：美國（二千三百萬元）斯干抵那維亞（二千一百萬元）加拿大（六百萬元）。

（注）本節所錄用數目皆據上引《Economist》同期。

六、日本原料政策的動向

日本原料的外國供給地自大體上說，可得三大集團；其一是美國及其勢力圈；其二是英國及其殖民地；其三是中國本部及滿洲。日本大部分原料皆仰賴這三個集團供給的，本國的生產只限於少數的種類和不夠自給自足的數量。這種情形無論自平時的工業生產說，抑自戰時的軍需生產說，都是一種極大的威脅。奔忙於戰時經濟體制的建設的現政府，集中精力於所謂「原料國策」的樹立，也是當然的。原料國策的樹立固然不是自今日始的，但是現政府逼於內外的情勢正在企圖樹立一個周密的原料國策。這種國策現在已可大略窺其動向了。

日本的原料國策可以從兩方面來檢討，一方面是國內原料的增產，另一方面是國外資源的開拓。從來表現在產業政策上的大多偏於國內原料的增產，但是事實上開拓國外資源的努力並不下於國內原料的增產。現在先就國內的原料的增產方面加以剖述。

最近日本政府樹立的所謂「原料國策」約有四大綱目：（一）燃料國策；（二）鐵礦國策；（三）纖維國策及（四）雜類原料國策。日本商工省為著實現這些原料國策，特於昭和十二年度的預算上增加二千七百萬元的新規要求，約占該省全部預算四千萬元之四分之三，而這新規要求的金額由原料國策費占去大部分。在上列四大類原料國策之中，日本政府最感逼切而提案較為具體的要算燃料國策。燃料國策的經費預算六，一八三千元，占原料國策的總經費八，四六六千元的大部分。決定設立大燃料局以充當關係燃料問題的最高諮詢機關，大燃料局是橫斷有關係各省的統一組織，由內閣調查局、資源局各長官、各省次官局長及富有學識經驗者充構成分子。但是大燃料局還是一個研究機關而已，行政政策的權限不消說依然握於商工省。商工省最近決定的具體案是（一）創設代用燃料事業及（二）強制混用酒精。關於（一）項聞將制定代用燃料事業獎勵法，

統一燃料研究機關。統一燃料研究機關表現於上述燃料局的設立上。至於代用燃料事業獎勵法的內容，主要的是對於石炭液化事業、低溫幹溜事業及汽油合成事業，生產量達一定量時免除或減少所得稅、營業稅及營業收益稅，同時又給與補助金。關於強制混用酒精之項，聞將制定強制混用法，以混用二〇%的無水酒精為內容。同時施行酒精專賣制度。日本政府並且計劃創辦官營石炭液事業，以收代用燃料政策的急速效率。

日本鐵產政策尚未成立具體案，屬於商工省的經費預算也不過一八二，〇〇〇元。目的只在促成青森及岩手兩縣砂鐵礦的開發罷了。因為日本國內鐵礦資源的缺乏，日本國內增產政策恐怕也只能如此，主要政策是集中於開拓國外資源上的。

纖維政策的國內增產辦法，在商工省方面專以化學纖維的技術研究為要目，將以九三四，〇〇〇元的預算擴充橫濱絹業試驗所，設立綜合的纖維工業試驗所，並積極獎勵化學纖維的使用。除了商工省的政策以外，尚有農林省的綿羊增殖計劃，其羊毛自給施設費預定為二，六〇一，〇〇〇元。這個計劃是預定於十年間用二千一百萬元增殖綿羊一二〇萬頭。這是為滿足平時軍部的需要的，完全是軍需的目的。此外還獎勵民間的綿羊輸入，對於每一頭輸入給與五十元助成金，預計一年增殖二萬頭。

雜類原料國策，目下只有人造橡皮的製造試驗，及大豆的利用兩種項目。其預算經費也有一，一六七，〇〇〇元。

日本國內的原料資源原是十分缺乏，所以它的原料國策的國內增產部分，遠不如國外開拓的重要。特別是軍需資源幾乎完全依賴外國，準戰時的日本政府自然要重視這一點。他們絕對不會滿足於以上所述的原料國策的。九·一八事變以來常在「非常時」的名義下進行的許多政策皆含有這種意義。此後的方向也很顯明。從前面所分析日本外來原料的供給地，就可以推定日本此後開拓國外原料資源的政策方針。

日本此後對外的原料國策，將不外乎兩大原則：（一）獨占及開發半殖民地的資源；（二）保持並新拓友邦的資源。上面說過，日本外國原料的三大來源是英國及其殖民地、美國及其勢力圈、中國本部及滿洲。次要的是德國和荷蘭。日本在這情勢下為防備戰時的封鎖，第一步必先以政治的軍事的手段企圖獨占中國及南美的半殖民地的原料資源，第二步以外交的協調的方法企圖保持英國殖民地及德國的供給來源。重工業的鐵煤及輕工業的棉花將由中國本部及滿洲供給。日本最大製鐵公司的「日本製鐵」的增產五年計劃（預定至昭和十六年頃生產日本全國需要的鑄物銑鐵百萬公噸）中的銑鐵生產已由滿洲供給，決定了所謂「日滿製鐵業提攜案」，確立「日本銑鋼一貫作業及滿洲銑鐵中心主義」的兩大原則（東京朝日八月十八日）。不獨是滿洲，即如揚子江流域特別是湖北的鐵礦，也已成了日本鐵礦國策的對象了。日本國內煤產固然不少，但是由滿洲輸入的數量還是巨大。除了東三省以外，煤埋藏量豐富的熱河也在日本的囊中了。山西的煤產及山東的「焦炭」也已擺脫不了日本帝國的魔手了。棉花的第一位供給國雖是美國，但這個來源在戰爭爆發後是靠不住的。除了用外交的協調的方法保持占第二位的印度棉花的來源以外，就是開拓滿洲及華北的棉作事業。據日人的調查，奉天以南的滿洲及華北五省皆適於種棉，特別是華北居然是優越的產棉地，將來可保日本棉花來源安全無慮。

日本還可以用移民拓殖的方法，謀獲南美及南洋的資源。最近日本拓務省的預算中有南美移民及拓殖事業指導獎勵費三二一萬元及南洋經濟提攜方策費三六六萬元，也可以說是一半為著這個目的。南洋及南美的石油資源的引誘力也頗不小。

其次，日本將以協調的外交方法取得英國的歡心及德國的合作，保持各種原料的來源。德國化學原料來源的問題，雖較容易對付，但是澳洲的羊毛，英屬婆羅洲的石油資源，英國資本主義支配下的石油，印度的棉花，加拿大的鋁、鉛、亞鉛，乃至海峽殖民地錫等等，就不是本國國內所可以設想的了。日本最近樹立的燃料國策固然理想，粗

自生產原料著想則又不能立刻發展，戰時的生產必更不足以供給需要。綿羊增殖計劃固然有望，並且可以擴充至滿洲和蒙古，但是目前仍須仰賴於澳洲，是不能否認的。滿洲及華北的棉作還是未來的希望，目前除了美國之外還須仰給於第二位的印度及第三位的埃及。鋁、鉛、亞鉛及錫等輕金屬，也隨日本帝國裝甲坦克車、汽車及飛機等軍事工業的發展而增大其重要性。自工業原料及戰略資源之點說，日本帝國幾乎可說是依存於大英帝國集團的。英日同盟的復活，近來已不僅是李滋羅斯的單調，日本方面最近的鼓吹不是沒有原因的。

此外，北庫頁的石油資源，馬來半島及荷屬印度的錫礦，以及法領新加勒洛尼亞的稀有金屬，早為日本帝國垂涎焦慮的對象。「無論怎樣退讓，日本也不能放棄北庫頁礦物開採權」，是最近日本政府對付蘇聯最感棘手的嘆聲，其他的地方就較易運用它的手腕了。但是最使日本帝國焦思苦慮而難於「打開」的，還是美國。美日的積怨再加以目前日益擴大的在華糾紛，增大了圖謀免去國際孤立的日本外交家的苦惱。這個問題就須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方式來解決了。不過，將在美國方面失去的原料資源，日本必先由中國及南洋等地求得補償。日本西進政策及南進政策，即自確立原料國策之點說，也有並駕齊驅的必然的趨向。

原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春季號

日本侵略戰爭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危機

富於軍事性的日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又發動了一個更大規模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了。這次的戰爭隨其規模的擴大而增大了它的危險性，好戰的日本軍閥卻不知道這種危險性的深大，一步步地在促進這種危險性的實現。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固然侵占了我們廣大的領土，奴役了我們不少的同胞，但其結果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危機的克服絲毫無補，只有加深了各種內在的矛盾罷了。六年來日本財政困難的增大，產業畸形發展的加速，社會生活的極度動搖，固不消說，即如專恃工農的血肉姑以維持的國際收入也會因戰爭之爆發而破壞無餘，侵略戰爭正在為侵略者挖掘墳墓。

日本的侵略戰爭必然地會為它帶來許多不能克服的危機，其中一般大眾社會生活的動搖就是最根本、最危險的危機。現代的戰爭已經帶上了大眾的性質，必須動員一切的人力和物力以作持久戰，最後的勝利是要歸到動員人力及物力最大的國家。所以一般大眾社會生活的安定，幾乎成了戰爭決勝的根本因素。即如漠視一切客觀情勢的日本軍部也都看重這一因素（詳見日本陸軍部頒發的小冊子〈國防本義及其強化的提倡〉），然而日本一般大眾生活的動搖卻與日本侵略戰爭的發展適成正比例。

一九三一年以來，六年間日本全體國民的生活費負擔總平均約略增加二〇%；而下層大眾的負擔尚不只此數，月收四十元，未滿日收一元五角以下的人，負擔增加三三%；月收五十元，未滿日收二元以下的人，負擔增加二六%——二九%；即月收一百元；未滿日收三元五角的人，負擔也增加了二四%。這只是準戰爭時期的增加率，現在日本軍閥已在製造中國全面的抗戰，將來日本民眾生活負擔之增大將不能知其限界。日本大眾生

活負擔之增加表現於物價之暴漲，而物價暴漲的主要原因約有兩種，一為國際一般物價高漲的影響，二為國防費的急增，都不是日本目前所能克服的。日本不能提高匯兌，就不能阻止國際物價高漲之影響，此後的國防費只有日益增加，絕無減少的道理。富力薄弱的日本民眾在這種重壓之下絕對不能夠維持一個長期的戰爭是不消說的，日本社會經濟也會因此而根本動搖。

根據上述的事實，可知直接影響日本社會經濟動搖的根本原因是，財政的膨脹是所謂國防費的增大。日本的陸海軍費總額自一九三一年至本年約略增加了三倍。一九三一年的陸海軍費總額只有四七，〇〇〇餘萬元，本年度則激增至一四一，〇〇〇多萬元。因而日本國家歲出的總額也由一四九，七〇〇萬元激增至二八七，二〇〇餘萬元。這個國家支出的膨脹在國家收入薄弱的日本，每年表現為入不敷出的結果，而專靠「赤字公債」的發行姑以彌縫過來。一九三七年度一般會計負擔的公債（特別會計的部分除外）即已達八二，二〇〇萬元，預想明年度公債的發行額將必增加三億元，只就一般會計而言，最低限度也必突破十一億元。日本赤字公債這樣急速的膨脹，已使日本一般社會無法銷納，自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以來，日本公債銷納力量已告不足，昭和十年度不足之額竟達四六，七〇〇萬元，十一年度更增至七二，〇〇〇萬元之巨（據エケノヨケト）。

此後日本財政必隨戰爭之開展而愈發膨脹。預想明年度的歲出總額將達三十四億元，其中所謂國防費占十七億元，約占一半。但是華北事變發生以來，所謂華北事件費已由二億元增至四億元，增至五億元，據昨日的消息或將增至二十億元，則明年度的歲出總額達到五十億元是很可能的。至少也將如八月十四日東京朝日新聞的記載「戰時姿勢的明年預算總額將突破四十億元。」這已突破了所謂惡性通貨膨脹的防線（即馬場財政的所謂「火災保險費的界限」）四十億元了。日本籌劃財政的辦法仍有兩途：其一增加租稅，其二繼續增發公債。其結果皆能愈使一般國民的生活動搖以至瀕於危境。日本近年

來的國民所得已遠不及財政的負擔，特別是軍事費的負擔。若以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為基數一〇〇，則歲出總額指數昭和十二年增至一九五，預想明年年度將增至二三〇，軍事費昭和十二年度增至三一〇，預想明年年度更將增至三七五，而生產總指數昭和十二年度不過增至一七六，消費財生產指數更低，只有一六二（據〈改造〉八月號）。若以消費財生產指數與軍事費負擔指數相比，昭和十二年度即已相差幾及一與二之比。日本一般國民這樣纖弱的富力如何負擔得起急增不知底止的軍費重擔呢？籌款的辦法依舊須求之於赤字公債的增發，一般社會銷納不了時集中到日本銀行手裡，充當通幣的發行準備量。但增發通幣的結果，流通過程上的通幣數量大增而增大通貨膨脹的危險性，物價之高漲更要突飛猛進，一般社會生活的動搖將不知發展至如何程度，日本要支持一個長久的戰爭，簡直是夢想。

或許日本政府將以調整國際收支及發展產業的政策來克服財政的困難及社會生活的動搖，也未可知。但是到了戰爭大規模爆發的時候，國際的收支只有愈於日本不利的前途，產業的發展愈趨於畸形化，其結果將愈使財政陷於破產而人民生活更加動搖。日本平時固然專恃「社會傾銷」以調劑國際收入，但到日本對外作戰時，一方面因為中國廣大市場之喪失，他方面又因為軍需品生產及輸入的必要，不但平時的輸出額減少，且須由外國作巨量的輸入，國際收入將必一落千丈的不利。日本勢須輸送大批現金以清還貨款，否則將變成外債的奴隸。再如擴大生產增加產量以降低物價，在理論上固然不失為救濟社會生活動搖的一策，但是實際上到了戰爭時期一切生產自然偏向於軍火等破壞的生產，而與一般社會生活毫不相干。只看準戰時的產業政策已可知其動向，例如興業銀行之優越放款只限於礦業、金屬工業、機械工業、化學工業、電業、窯業（特別是洋灰）及交通運輸幾種軍需工業，即其證據。日本政府發展產業獎勵生產的結果，將愈犧牲一般大眾以增大軍需工業資本家的利潤罷了。各種軍需工業的股份資本雖有急速的增加，

但是固定資產則未擴大。這在說明生產的增大及利益的增大，並不是生產規模的擴大，只是資本回轉率增加的結果。這不是生產性的增大，而只是勞動強度的增大，榨取率的高度化而已。一九三一年以來各種軍需工業的生產總額增加了數倍，勞工每日生產量的增加率雖達四〇%—九六%，但是工資卻無多大的變動，製鐵工業每小時工資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只由二角七分增至二角九分。有些工業部門倒反跌落，如電氣工業、機器製造業自二角七分落至一角七分是個極端的例子（詳見《改造》八月號）。專以勞工大眾的血肉充滿軍需工業資本家的腰包，這種生產的擴充絕對不能救濟瀕危的社會生活，只有增大其危險的程度罷了。

日本財政的困難與社會生活的動搖是步入準戰時體制以來日本政治經濟社會及軍事各方面矛盾的集中表現。最近歷任的日本內閣都在努力克服這個基本的矛盾，現在的近衛內閣尤其是著重於這一點。所以標榜出財政經濟政策的二大目的及三大原則，所謂二大目的就是（一）國防力的擴張及充實，（二）國民生活的安定。為達這二大目的而樹立財政經濟政策的三大原：（一）國際收支的適合方策，（二）生產力擴充的具體方策，（三）物資需供的適合方策。然而二大目的根本上就是衝突的對立的，三大原則的實施在準戰時期即已不易收效，到戰爭時期當然更是此路不通了。自日本國際貿易的內容及戰時的需要看來，戰時日本的國際貿易只有入超增加的一途，國際收支自然不能適合。生產力擴充之不能救濟社會生活，上面已經詳細分析過。即連物資需供的適合方策在戰爭時期也不能安定社會生活，因為戰時所加緊的是軍需生產而一般大眾所需要的是日常的消費財。二者不但風馬牛不相關，並且會因戰爭的特別需要減少普通消費財的生產，增高物價，倒反會陷社會生活於危境。

近衛內閣的準戰時財政經濟政策，已到根本改換的時期了。據最近日文報所載消息，已決定隨對外戰爭之發展改換財政預算的編制方針，各種經濟政策自然也隨之更動，以

改成純戰時經濟體制。其將影響日本社會經濟更陷於危境以至不可收拾，是可拭目而待的。

日本軍費與國民生活的矛盾，日本侵略戰爭與社會經濟的對立，不但不能支持長久的戰爭，簡直會導日本帝國主義入於滅亡。日本的侵略戰爭或許可以多造幾個戰時暴發戶，膨脹軍需財閥的財產，但是一般民眾只有益發陷於水深火熱的悲境，終必覺醒過來，認清他們的真正敵人。現在在日本帝國主義刺刀監視之下不得不繼續極高強度的勞動的日本勞工，到戰爭擴大的時候，特別是在日本稍受挫折的時候，自然會醒悟過來，爭取他們的自由和利益的。平時蒙受日本政府欺騙愚弄的農民，早即因農村恐慌而瀕於破產的農民，也會同樣起來爭取他們的自由和利益的。日本農民覺醒之日，就是大多由農民構成的日本軍隊叛變之日。日本戰時社會經濟的動搖將必決定日本工農的正確意識，日本工農的正確意識造成日本前線的潰亂與後方的騷擾，日本帝國主義於是壽終正寢。日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其向上期是以侵略戰爭而起家的，在其向下期也很自然地會以侵略戰爭而滅亡。「善戰者服上刑」實在是古今中外不泯的定理，日本民眾總有審判並處刑他們的禍首的一天，頭腦清楚的日本民眾不難覺醒過來，只不知好戰殘暴的日本軍閥作何感想呢！

原載一九三七年九月《時事類編》特刊第一期

日寇對我侵略戰爭中的勞動問題

我常說過，日本一般大眾和代表日本帝國主義的官僚軍閥及資本家，是對立的，兩者的利益是無法調和的；反之，日本一般大眾的利害，倒和被侵略者的我們是一致的，侵略我們的戰爭愈是進展，日本一般大眾的損害也愈增大。日本帝國主義雖然常用改善日本國民生活的假招牌欺騙日本大眾，但是事實卻比任何無耻的欺騙政策更雄辯。且看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全面侵略戰爭發動以來，日本大眾究竟得到了些什麼？依照事實的表像看來，在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戰爭上得到最優越條件的，應該是一般產業工人，特別是軍需工業及幾種鍵鑰工業的工人，但是他們所得到的收穫，卻只是實質工資的降低、勞動時間的延長、勞動強度的增高，因而健康也日益衰退。

一、產業工人的爭奪

自從日本帝國主義對我發動全面的侵略戰爭以來，就很自然地增高各種基礎工業（如煤炭業、鐵礦業，乃至煉鋼製鐵業等等）及軍需工業的需要程度，各重工業工場的生產力竟不能夠適應外界的訂買，外界的訂買額超過了生產量數倍以上。現在就日本幾個巨大重工業公司一九三七年六月底結算的情形列表指示如下：

	上半年訂貨額 (A)(百萬元)	半年生產額 (B)(百萬元)	(A)對(B) 的倍數(%)
三菱重工業公司	一七八	三三三	三二〇
日立製作所	三三三	三三三	九八
芝浦製作所	三二二	一八	一四五
池貝鐵工所	一〇	五	二〇〇
新潟鐵工所	一〇	七	一四五
東京瓦斯電氣公司	二二	六	二〇〇
浦賀船渠所	三〇	一〇	三〇〇
石川島造船所	二五	九	二七〇

(注) 據東京《朝日新聞》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所載。

單就上半期訂貨未付額，即已超過半年可能生產額二、三倍以上，下半年的訂貨額若再增加，其需要倍數當更可觀。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已自七月八日發動了戰端，八月十三日更將侵略戰爭擴大到淞滬，華北及華中也全部牽入戰爭的範圍。日本對我戰爭範圍之擴大，也就在同樣程度增加日本基礎工業及軍需工業的需要，而各種工業生產的增加，也就同時提高了產業工人的需要。於是各種產業的工廠主遂曲盡各種方法搜羅工人，甚至於互相爭奪工人。他們搜羅並爭奪工人的方法，約有三種：其一，就是各公司在各報登載廣告徵求工人。近數月來各大報的所謂「求人廣告」欄中，除以前常見的保險外交員、小店員及女招待的廣告外，還添上許多種新鮮的「求人」廣告，例如日本光學會社、自動車工業會社、東京自動車會社、東京電氣會社、東京瓦斯電氣會社等等。

登報徵求的人數在二三千人以上，除了熟練工人而外，即連童工及見習工也都在內。其二，是利用工廠門口、電桿、牆壁、電車等地方招貼募工廣告，滿街滿巷，五花八門，無不光怪陸離。其需要工人的人數，較之報上廣告有加無減，種類更為複雜。其三，是由本廠工人以鄉親及朋友等關係，拉攏別個工廠的工人，特別是工頭，企圖以一人關係拉來一幫工人，這種陰謀橫奪的結果，暴露出許多技師或組長帶走部下全部工人的收買事情，卑鄙的醜態，實不堪以形容，工廠彼此間也受極大的擾亂。於是，有些大工廠遂不得不彼此協定，禁止此種陰謀的手段。例如川崎、三菱、藤永、幡磨、三井物產、玉造造船、神戶製鋼及大阪鐵工所等大阪、神戶間的關西七大造船所，共同組織所謂「二日會」，彼此締結「紳士協定」，約定：「退出加盟公司三個月乃至六個月以內的工人，以不雇用為原則，在職中之工人更不消說了。萬一必須雇傭時，也必須先通告對方公司而得其承諾。」又大阪市的住友伸銅、住友製鋼、汽車製造、大阪製鎖、日本染料，及大阪鐵工所等大公司，也組織「二水會」，締結同樣紳士協定。東京方面也有東京鐵工機器同業組合在去年九月二十五日的評議員會上，決定了〈關於雇傭工人的協定〉，發表聲明書，阻止工人的爭奪戰。但這更如何反證著工廠方面彼此爭奪工人的醜劇，是無可諱言的。事實上，各大工廠明爭暗鬥的工人爭奪戰，並沒有因為這種紳士協定而停止，工人需要的急增和逼切，更可想見了。

二、準戰期勞動條件的惡化

照上述的情形看來，日本產業工人在需要的劇增和逼切的情勢之下，勞動條件是應當日益改善，工資是要日益增加的，但是事實卻不盡然，甚至得到完全相反的結果。日本工業生產的增進，開始於準戰時經濟體制實施之初，這種工業生產又都集中於軍火工

業及與有密切關係的重工業部門。茲分準戰時期的勞動情形，及戰爭時期的勞動情形，來加以分析：前者自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期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期，後者由對我發動侵略戰爭以至現在，現在先來檢討準戰時期的勞動情形。

日本帝國主義自從一九三一年開始占我東四省以來，即更加積極擴充軍備，準備應付一個大規模的戰爭。他們積極參加備戰的結果，擴大了軍火工業及重工業的生產至數倍以上。現在拿一九三一年作為基準年度，一九三五年重工業的生產指數，增至三六四，超過三倍半；兵器工業的生產指數更加增至四五〇，超過四倍又半。但是普通輕工業生產，即在所謂「躍進的」生產過程中，也不過增至二二七，還不到二倍半。詳情且閱下表：

兵器工業及重工業的發展

	兵器	重工業	輕工業	化學工業
一九三五年	四五〇	三六四	二二七	一六三
一九三四年	二七九	二八九	一八三	一五一
一九三三年	二五四	一九二	一五七	一三九
一九三二年	一六七	一二九	一一五	一一〇
一九三一年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注) 根據去年七月一日號日本 Economist。

兵器工業乃至重工業的生產雖然日益發展，但是產業工人的勞動條件，卻日益惡劣化。第一，勞動時間隨著需要的增加而日益延長；第二，工資總額也隨著勞動時間的延

長而有多少的增加；第三，工資增加的比率，並不及勞動時間增加的比率。這些事實，若稍加考慮，則可以得到一個結論：表面工資雖是增加了，但是實質工資卻大減少。這種勞動情形的惡劣化，在兵器工業方面尤其是顯著。

日本全國兵器工業勞動情形的發展

	勞動時間指數	工資指數	每一小時的工資
一九三五年	四三七	三五三	二十四錢
一九三四年	二六五	三三三	二十四錢
一九三三年	二六二	二二二	二十一錢
一九三二年	一九〇	一六一	二十三錢
一九三一年	一〇〇	一〇〇	二十七錢

日本全國最近的勞動情形就是：勞動時間雖是增加了，但是實質工資卻由每小時二角七分錢降到二角四分錢。這是全國平均的情形，主要地方，更要惡劣。愛知縣兵器工業工人每小時的工資由三角一分錢減至二角二分錢，而兵器生產甲於日本全國的東京，更為利害，由每一小時二角七分錢減至一角九分。但另一方面，一般日本民眾的生活負擔，卻隨軍事景氣的發展而日益增高。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六年間日本人民生活費，平均增加二六%，而下層民眾的負擔更增加至四二%（參閱《時事類編》特刊創刊號拙作）。

三、戰爭爆發以來勞動情形的惡化

日本對我全面侵略戰爭發動以來，軍需工業和重工業的生產，更加總動員起來，對於工人需要的急增及迫切已如上述，而各工廠所採用的方法，第一就是延長勞動時間，第二就是募集臨時工人，第三就是促成承攬工場。結果造成不熟練工人的雇用，現有工人勞動時間的延長，在工人外拉工人，在勞動時間上加時間。這於工人是多麼優越的條件，論理工人是要多賺錢的。表面上工人也是賺錢的，因為工資外加工資，至少在表面上是的確的事實。但是事實卻又未必盡然。這裡有資本主義勞動制度的魔術在作用。普通重工業的工資制度，約有二大種類：其一為定額工資制，其二為論件工資制。定額工資普通是依時間計算的，也就是論件工資制的基準，但其絕對額非常之低。在論件工資制中，有個人承攬辦法和團體承攬辦法，還有單價承攬和全額承攬等等，真是千差萬別，極其複雜。此外，又加上按時加錢辦法，獎勵加錢辦法，及罰金辦法等等參雜在一起。這些工資計算法，在工廠方面稱為科學的工資計算制度，是所謂合理主義的魔法之一，但在工人是絕對不能理解的，結果只有全憑工廠的會計課去決定。定額工資原來是有一定標準的，勞動時間無論怎樣延長，總是不能超過這個標準，到某限度以上時，論時工資額就須減低。論時工資的減低，也就很自然地影響論件工資額。對於承攬工場的付價自然也就低落，於是工資是全面減少的，不管名目的工資有多少的增加，而實質工資則反大減，是不成問題的。

其次，日本工人的勞動狀態隨著戰爭的發展而愈益惡劣化，即連平時法律所保障的條件，也完全喪失了效力。煤礦資本家曾向礦山監督局陳請緩和深夜工作的禁令，撤廢礦內勞動十小時的限制，緩和礦夫的保護條件，允許未滿十六歲的童工入礦工作，允許婦人入礦工作。這種陳請雖然沒有得到批准，但是政府在他方面卻於盧溝橋事變過後頒

發命令，緩和軍需工場的工人保護條件，例如廢除星期休息日。根據這個命令實施的，自七月十五日以後一個月間即已有五十三件以上，其中，機器工業四十件，化學工業六件，其他七件。截至最近，件數當在一百件以上。此外乘著政府的緩和意志而違反《工場法》的件數，也大大增加。軍火資本家常利用軍需品的緊急必要而發揮利己主義，資本家所知道的只是高率的利潤。於是日本工人在延長勞動時間，加強勞動強度乃至工人保護條件緩和的情形下，最大的收穫就是健康日益損壞。於是日本內務省社會局遂於十一月間頒布政府保護勞動方針於全國府縣，其旨趣是：「際茲事變，對於軍需品工場，為著維持勞動力，增進生產率，增加生產力並圖其持久，須努力於抑制過長的勞動時間，防止產業災害保持勞動者的健康。」這正反證日本各工廠如何壓榨工業工人的實情。

四、慘苦的臨時工制度

近年來日本勞工在積極備戰的情形下最感受慘苦的，就是臨時工制度；而這種慘苦自入戰時階段以來，更為加劇。

臨時工制度是日本工廠主逃避損失，轉嫁虧損最好不過的雇傭制度，同時也就是降低全體勞動條件，使其迫近奴隸生活線的好方法。第一，臨時工制度可以因為臨時的自由勞動工人尋求工作的競爭，而極度降低工資；第二，工廠主可以隨時解雇舊工人，雇用新工人，以避免工資遞增的負擔；第三，工廠主可以在解雇時省卻解雇津貼的負擔；第四，工廠主還可以利用工資計算法，早上工、遲退場的勞動辦法，加重榨取勞工；第五，工廠主可以避免工人有組織的進攻和交涉；第六，同時避免國家保護勞工法律的監督，例如工場法、健康保險法，及災害補償法等法律的適用。而在工人方面，除卻工廠主直接的壓迫和榨取以外，還要加上包工工頭的中間剝削（普通臨時工都是經由工頭

包攬的)，所得的工資少而付出的勞力大，即連恒常工作也都沒有保障，所忍受的勞動條件，可以說極盡現代勞動制度的慘苦。

日本工業界一方面因為經濟恐慌的不斷的襲擊，他方面又因為軍需景氣的需要，所以廣大地採用臨時工制度，以避免虧損而保障高率利潤，自從一九三二年頃以降，臨時工制度或所謂「人夫雇用制度」即已普遍通行於各工廠。這並且不獨限於民營工廠，即在官營工廠也是通行的。據加藤勘十的估計，採用「人夫制度」的民營工廠，當在八百多處，臨時工人數達九萬多人；若加算官營工廠的臨時工人數，總數當在三十多萬人（據「統一戰線的展望」）。臨時工人大多集中到軍需工業及重工業方面，特別是臨時工人在固定工人的比重，更為驚人。茲舉幾家民營重工業公司為例：

	固定工人數(人)	臨時工人數(人)
住友伸銅鋼管公司	八八〇	七七八
東京瓦斯電氣公司	一,五四七	一,三〇五
日本車輛製造公司	一,三六九	一,四二〇
火車製造公司	八四三	一,三八二
廣島日本鋼管公司	六五三	一,六四〇
大阪機器工作所	四二七	一,一三〇

(注) 據加藤勘十上引同書十三—十四頁。

臨時工人數竟與固定工人數並駕齊驅，有時甚至超過固定工人數數倍以上。日本臨時工制度正和陸軍當局逼令兵工廠工人宣誓退出工會，脫離無產者統一陣線的辦法，是

夾劈一般工人的兩把大斧頭。日本官僚托拉斯資本的手段的慘酷，並不在個人獨占資本之下。

原載一九三八年三月《世界知識》第七卷第七期

日本侵略戰爭中工業危機的發展

作者小引拙著《日本工業的危機》（文教館去年九月版）承國際宣傳委員會譯成英文擬案國外擴大宣傳，因而要求我補述中日大戰爆發後日本工業危機的發展。本文即為應國際宣傳委員會的要求而作，讀本文，更可知日本工業的脆弱性和各國對日經濟制裁的效果，增強我們國際宣傳的努力。

日本工業經濟的三種特殊危機，（詳見拙著《日本工業危機》），到了對外侵略戰爭爆發的時候更將加深。關於原料資源之項，不但敵國及敵國的友邦封鎖來源，即中立國也因擁護正義、和平，及不信用日本商人而停止供給。關於市場三項，也必因為日本國內外的原因而銷路大減特減，甚至有些國外市場完全崩潰。到了戰爭時期，勞動者生活狀態之更加惡化，也是無庸諱言的。日本工業的這些危機在中日大戰中已經完全暴露無餘了。實際上暴露出來的危機比平時所規定的，更加複雜，更加深刻。如果分成項目來講，至少有以下幾點：

一、輸出激減引起的危機

戰爭對於日本工業的第一種影響，首推外國市場的全部喪失或大部分喪失。據蘇聯《新聞報》十月十日所引用《中外貿易新聞報》的消息，「在華北事變的影響之下，七月份日本對華的輸出比六月份減少了二〇%，而八月份則完全停頓了。日本在上海的紡織工業因為契約的取消及貿易的停止，只八月份一個月損失即達五千萬日金，因為軍事行動而預定輸到中國去的價值三千六百萬日金的日本商品，重行運回日本。」

戰爭對於日本輸出的影響還不僅以中國一國市場為限。在中國行商所採用的抵制及海運困難的影響之下，日本輸到太平洋南部諸國的商品也減少了。例如日本輸到暹羅的商品在這個時期也減少了六〇%，菲律賓減少了一〇%，荷領印度也減少了一〇%（據《中外貿易新聞報》九月二日）。又據《中央日報》九月二十四日所載，開戰後不久，日本對荷印、暹羅、菲律賓、安南及馬義半島的貨運減少了六二·二%。在戰爭爆發後的兩個月內，日本和太平洋南部諸國所簽訂的商約被取消的達五二%。日本對英領印度的輸出也是大減的（據上引《蘇聯新聞報》）。

這個輸出激減和輸入相對增加的兩重原因，在日本國民經濟上造成一種嚴重的事實，就是異常的入超。依據日本政府公開發表的統計，一九三三年輸出入的差額，是入超八，五四〇萬餘日元，一九三四、三五及三六年的入超每年平均也不過一億餘日元。而一九三七年的入超額竟達六四，八〇一萬日元之巨。日本因為戰爭的影響而致去年一年的入超竟超過了過去四年間的入超總額一倍以上，而為戰爭前一年入超額的五倍（據中宣部所刊行《敵情研究資料》第一輯）。日本這種因為輸出激減而引起的入超之增長，即至今年春季還在繼續。據路透社東京電，本年一月份日本的輸入總額為二〇，八九五萬日元，輸出總額為一七，二二七萬日元。去年同期間的輸入總額則為三二，九九三萬日元，輸出總額為二〇，八四九萬日元。又據最近的消息，本年為首三個月間，日本對外貿易仍有六千餘萬日元的入超，輸入固然減少，輸出更加銳減，去年的輸出入總額當為五十餘億日元，每月平均在四億日元左右，而今年三個月輸出入則不過六億日元（據《時事月報》一八卷八期一二九頁）。這不但是日本輸出入貿易全部呈現衰落狀態，輸出額數之激減尤為日本工業界的大病，按這情形看來，日本本年輸出額的減少將較去年為鉅。我們要注意每年下半年期才是日本的輸出時期，所以本年輸出的減少當在上述一月份的標準以上，是可斷言的。

我們分析日本輸出額減少的事實，必須注意到四種的原因：第一，各國人士因為同情中國而排斥日貨；第二，各國商人因為不信任日本商人而停止訂貨；第三，各國工人因反對日本侵略戰爭而拒運日貨；第四，因為日貨價格絕對地，或相對地漲價，而轉用別國商品。這四種原因又隨著我們全面抗戰的進展而愈加發揮它們的作用。例如世界援華反日的情勢是在日益開展著，自從「國際反侵略和平大會」廣大地發動援華反日運動以來，排斥日貨的風聲已經成了一種世界普遍潮流。此後日貨在世界市場上更要碰壁，是不消說的。

因為日本工業原料依存於外國市場的原故，而輸出的激減，自然直接影響到日本的工業生產。據《社會運動促進報》九月十七日的記載，日本許多縣份已經完全停止或極度減縮為著輸出的企業生產。例如新潟（Niigata）縣因為對華輸出的減少而有二百個以上的人造絲工廠完全停止了生產。又據《讀賣新聞》（Yomiurishinbun）的消息，塩鑿（Liogama）地方的許多紡織公司宣布破產。日本紡織業聯合會在九月八日宣布本年冬季紡織工廠中沒有動用的機器達二七·五%。日本工業生產的減縮，不獨限於為外國市場而生產的企業，即日本本國消費品的製造工業也受其波及。例如京都（Kioto）絲的棉製造廠，從八月份起生產減少了二〇%。同時，日本國內市場的商品流轉率也降落了。如八月十七日《中外貿易新聞》所傳，在戰事開始的為首半個月內，大百貨公司的流轉率減少了八%。此外，日本在華的企業受到打擊尤為嚴重。只上海一地直接的損失估計即在一億日元以上，青島的直損失更在五億日元以上，日本對外的資本市場幾乎喪失殆盡。

帶著世界經濟新恐慌之序幕性質的美國經濟恐慌，又已於去年秋冬之交開始了。此後日本許多種一向大量輸往美國的特殊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罐頭、玩具、帽子，將更失去絕大部分的銷場。這不但影響日本這幾種特殊商品的工業生產，日本許多專靠這些種生產來維持其經濟的存在的農村，及所謂「澳村」、「山村」，也要掀起絕大的社會

經濟問題。

二、原料問題引起的危機

戰時工業原料的來源問題，是日本工業界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日本和平的及軍需的原料，都是依賴外國供給的。棉花來自美國、印度、埃及及我國。羊毛的絕大部分仰給於澳洲，其次為紐西蘭、南非及南美。重要軍需工業原料的金屬及油類的來源，亞洲占著最重要的地位，中國本部、東三省、婆羅洲、印度、海峽殖民地及蘇聯的北庫頁，都是主要的供給地。特別是鐵和煤幾乎全部仰給於中國，煤油則依賴美國、蘇聯及荷蘭的屬地。此外如鋁、鉛、銅、錫、亞鉛及化學原料的硫安、硫曹、曹達類、磷礦石、合成染料，乃至雜類原料的生橡皮、皮革牛脂，甚至製用的木漿等等的供給地，不是中國就是英美荷等及其殖民地。其中，加拿大尤為日本軍需原料的倉庫，一九三六年產鋁供給日本七一%，產銅七九%，去年一月至九月間銅供給量比前年同期增加七倍，鐵增加四倍，線增加兩倍（據國際和平運動大會加拿大代表在二月十二日援華反日大會上的報告）。平時供給原料給日本的國家，不是它的敵人就是反對侵略戰爭的國家。所以自從日本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以來，這些國家幾乎皆在有計劃地推行封鎖資源的供給，不但各國主持正義的人士極力主張封鎖資源，各國工人更是出於實際的行動，嚴拒搬運原料供給日本。莫斯科的〈消息報〉論及目前日本國民經濟的時候，特別強調「日本帝國主義所有資源趨於枯竭」之點（據塔斯社莫斯科二月十一日電），實在不是沒有原因的。

日本軍需工業原料隨著戰爭的擴大而對外的依賴性大增，其危機也更加深。日本帝國主義雖說在戰前即有相當數量的儲藏，戰爭爆發後不久又即施行貿易統制及外匯分配制度，來保證軍需工業原料的供給。但因戰爭已經延長了九個月，何時戰爭始能結束，

即令侵略者也都沒有把握，所以原料完全用盡是很有可能的。其中最感為難的就是煤油，日本煤油消費量在平時是每年三五〇萬噸，對華戰爭已使煤油的需要額增加到四五百萬噸以上。其本國的生產至多不過三十三萬噸，葉岩提煉及煤炭液體化等人造方法也只能增產十多萬噸，所以每年日本本國的產油量只夠供戰時消費量百分之五至十。日本陸海軍方面雖有巨量的囤儲，民間煤油商也以前年以來的嚴令而有相當的儲存，但充其量也只夠六個月至八個月之用。日本現在已經大感煤油缺乏的威脅；對於汽油的使用已嚴加統制了。汽油之出售須經特別許可，私人汽車每日用油至多不能超過兩加侖，煤油由一城運到一城，須有特別許可證。據東京五月二日路透社電，五月一日起，更將實行汽油購票制。其次，銅鐵也同樣感到缺乏。最近日本圖謀開採菲律賓鐵礦為奎松總統拒絕後，又在「儘量收買私人所有非島各礦所產的生鐵，是見日本需要生鐵之急逼」（據一月廿二日馬尼刺合眾社電）。據中央社澳洲柏斯五月三日合眾社電，「日本因為生鐵不足，一切工業計劃均無法實施，現已與澳洲礦商商妥，在澳洲採取生鐵一百萬噸，其辦法是由日本出資開採古蘭島鐵礦」，但是開採問題還多，尚不許樂觀。又日本最近購買銅貨已達三萬噸，使世界上跌落銅價突然上漲（據一月廿四日倫敦塔斯社電）。這種情勢終於逼使近衛內閣急忙起草充實全國資源的四年計劃；首相強調極力節省軍需原料的主張（在七十三屆日本議會演說），並勸人民節省消費（近衛對人民宣言）。最近，日蘇衝突的尖銳化將更使日本在庫頁島北部各礦的開採更加困難。

其次，日本和平製品原料也感缺乏，這更是由於日本政府為保障軍火及軍火原料採用輸入統制政策所致。去年十月間禁止入口的原料及產品即有二六〇多種，棉花、羊毛及木料等原料也在被限制之列。上述新潟等縣許多紡織工廠之倒閉，就是受到原料來源的限制。據統計，商業方面有二千萬元的工程全因鋼鐵的缺乏而陷於停頓，酒廠、磚窯、大百貨公司、酒店及旅館的改建及擴張也受了限制。現在，日本各大百貨公司的華麗包

裝紙也因木漿原料之來源困難而停止使用了（據日本反戰作家鹿地巨先生的報告）。如果各國停止供給原料與日本，則不但日本工業危機完全暴露，即破壞世界和平的對華侵略戰爭也必立刻停止。特別是加拿大一國關係最大，據國際和平運動大會援華反日會加拿大代表麥克雷沃德的報告，「加拿大所產的軍需原料，幾乎全部供給日本使用，加拿大實乃日本的兵工廠」（二月十三日各報所載）。

三、勞動力問題引起的危機

日本勞動力問題到了戰時更加複雜化。第一，許多工場的勞工被調入伍輸往中國作戰，有些工場難免發生勞力新分配的問題。第二，勞工全體分配的紛亂。戰爭爆發以來，日本工業有些部分如紡織工業是停頓或減縮的，而有些部門如金屬工業、機器工業、化學工業，特別是軍需工業，卻是擴充的。結果，一方面產生許多的失業工人，另一方面又在需要大批的新勞工。但這兩方面的需供，又因為技術與熟練的關係不能夠調和。第三，因為日本進步勞工的反對侵略戰爭，而許多工廠也大起恐慌。中日戰爭爆發不久，大阪各大工場即已發現過反戰的傳單、標語。神戶海員工會十月間即已醞釀罷工表示反戰（據中央日報）。據東京朝日新聞所載，新潟近郊的丸新製油所突被工人縱火焚毀，損失達一百多萬元。最近日本勞工的騷動更加擴大。據大阪一月九日電，大阪海軍船塢工人三百人在進塢後，即集會停止工作。當管工的趨前詰問時，各工人即以反戰的傳單向他擲去。其中還有一部分工人毀壞鍋爐，高呼罷工，與到場彈壓的警察發生衝突。又據上引鹿地先生在武漢十一團體歡迎大會上的報告，二月間他得其本國朋友的消息，川崎和千住的士兵叛亂了。川崎一帶是日本最大的重工業心臟部，是日本革命勞動運動的搖籃地。「他們出征兵士才是手握日本軍事法西斯主義者的心臟的勞動大眾」（鹿地之

言)。第四，戰爭爆發後，日本軍事的及經濟的原因加深日本一般勞工的生活狀況的惡劣，直接間接影響於工業生產，日本勞工生活在作戰時期即受到物價高漲的影響。日本自一九三一年侵華戰爭發動後，至一九三五年止，即已增加一般工人生活費負擔三四%（據拙作《日本侵略戰爭造成的社會經濟危機》所引用日本Economist所載指數——《時事類編》特刊創刊號）。中日大戰爆發以來，日本物價更加高漲。據「日本銀行」調查，日本最近的物價指數如下逐月高漲：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七二·四；八月一七三·九；九月一七七·六；十月一七九·二；十一月一七九·九；十二月一八二·四；今年一月又漲至一八四·六。若和一九三七年一月的一六九·八及一九三六年一月的一五六·八比較，其高漲更為顯著。日本物價的高漲不但更使日本工人的生活惡化，且足以增長勞工的反戰運動。相反的，日本工資卻日益低減，不但實質上減低，即定額工資也減少。一九三四年為八二·九，一九三七年一月即降為八一·五（據日本Economist去年六月一日期二十七頁）。最近在日本政府總動員令之下，在「節省消費，……期望一般國民經濟生活與戰時財政協力」（中日大戰後不久日本政府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口號）的要求之下，日本勞工生活自然只有日益低下的前途。第五，中日大戰爆發後，日本勞工的勞動條件也自然要日益低下。日本侵略主義者對華作戰九個月，愈發陷入泥濘，隨中日大戰的擴大，日本在中國戰場上需要的軍隊也日益增加。現在日本徵調到中國來的軍隊已達五六十萬人，此後是更要增加的。這樣一來，一方面影響日本工場缺欠工人（自然是偏於與軍需工業有關的方面），而使廠主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另一方面廠主更可以藉口於所謂「非常時候」而加緊工人的壓榨。這不但影響工人工作的質量，並且增長工人反戰搗毀工廠及怠工罷工。近來日本反對侵略運動已由前進的智識分子的領導深入工人群，去年十二月中旬，日本政府大逮捕四百人當中，工人領袖占大多數。即自中日大戰爆發後勞資糾紛的案件說，即已發生了一，四五五起，參加工人的數目達十八萬以上，

造成日本工人運動史上的新紀錄，這對於日本工業生產是多大的影響，自不消說。

四、其他的原因引起的危機

除了上述三大原因之外，還有幾種原因也足以危害日本的工業生產，例如物價高漲直接影響的問題，資本缺乏的問題，關稅加重的問題，畸形發展壓迫中小工業的問題，都是戰時日本工業的嚴重問題。

「物價的高漲」不但如上所述影響工人生活，因又間接影響工業生產，並且直接影響商品的國內外的銷路。物價儘管高漲，而一般人民的收入不增加時，一般人民的購買力大減，因而工業產品的國內銷路縮小，工業生產自然大受影響。另一方面，日本物價儘管自己高漲，而世界物價沒有價漲甚至跌價時，日本商品的輸出即無各國為正義排斥，日貨也要減少。以一九一三年一月為準，則日本物價自去年七月的一二八·九漲至今年一月的一三八·七（據日本《東洋經濟新報》），而英國在同期則由一二七·〇跌至一一七·三（據 *The Economist*），美國更由一一八·三跌至九六·六（*Brad street*）。在這種情勢下，日本商品是不能和國際商品競爭的，其輸出之激減更是當然的歸宿。因為物價高漲有減低國內外銷路的作用，所以無論是供給本國消費的工業生產，抑或專為輸出的工業生產，都如上述縮小的縮小，停頓的停頓了。而日本物價因為「赤字公債」的濫發，惡性通貨膨脹的增長，是更要高漲的。

其次，日本資金自中日大戰爆發以來即大困惑，上述赤字公債的濫發，不但提高物價，並且吸收游資而使工業生產感到資本的周轉困難。據日本大藏省的發表，截至一九三七年年底止，日本公債總額共達一，一八九，三〇〇萬日元。日本第七十三屆議會又已通過了包括二八七，〇〇〇萬日元的普通政費及四八五，〇〇〇萬日元的對華特別軍

費的空前的巨額預算，則此後公債的增發是必然的。公債的增發和私人資本的國家統制已使日本資本感到極度的缺乏。據捷克《布拉格報》的東京通訊，只在開戰後一個月內，日本銀行的存款即便猛減八千萬日元。此後，在總動員之下，日本增發的公債必將向各銀行、各保險公司及各生產公司攤派更將影響工業生產萎縮。本屆議會又通過華北開發會社的法定資本三五，〇〇〇萬元及華中「振興會社」的資本一五，〇〇〇萬元，此後日本資金之外流，也是必然的。日本實業家曾向美國交涉信用借款美金五千元及九千萬日元棉花借款，「滿鐵會社」急激向瑞士接洽借款，這些都是日本資金缺欠暴露。

再次日本增稅的種類隨戰爭的進展而增加。最近第七十三屆議會又通過了多種增稅案。就專門委員會初次審查財政法案的規定如下：「所得稅及其他汽油、糖、茶、咖啡、酒各種稅率俱較前增高，至於珠寶及專賣奢侈品之商人，則必須繳納特別稅。日本國內每一納稅人，建造新屋時，其建築費若超過一萬日元，也須繳納特別稅，即如看戲娛樂，亦須納娛樂捐，同時個人收入、營業收入銀行存款、股票贏利及企業資本，也將於明年度起加稅」（據二月二十七日東京路透電）。這樣繁雜的增稅，直接間接皆影響日本的工業生產很大。

再次，日本工業的畸形發展，素來即為日本工業界極大的危機。其詳細的情形已於上引拙作第二章述過。而這種危機性在戰時更加增大。日本政府戰時一切的設施，都在有意中或無意中，直接或間接以中小工業為犧牲而保全大工業的生產以和平工業為犧牲而增高軍需工業的利益。例如製絲工業之崩潰因是由於美國市場之喪失，而紡紗工業及毛織工業的萎縮，特別又受政府限制原料之賜。和平工業的原料輸入，不是被限制著，就被課高率關稅。政友會議員，小笠原攻擊日本政府的財政經濟法案說：「……官僚派的國家統制主義者，專以保護大資本家的利益為任務，致使中小商家及中小工業家目前均被逼陷於困難中」，他並主張：「政府不得借取縮消費而以壓力施於中小工業」（據

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社香港電）。

日本政府又於第七十三屆議會通過了全國總動員法案、電器事業國管法案及許多種的增稅案，日本工業生產要更加受到全面的打擊，是可以預料得到的。固然，日本軍閥政府也曾想盡所有的花樣，掠奪天津及秦皇島的海關，並擅改稅率，以開拓日貨增加輸出的前途，但在中國社會因為全面抗戰而未得寧靜以前，日貨在華的商場是無法恢復的。日本強盜又在加劇它的走私行為，在上海海關方面也在強攫奪支配權，但是無論如何是不會有有效的。日本強盜又在企圖開發華北及華中以補救資源缺乏及被封鎖的危險。但在我們全國一致繼續抗戰以及在華北及華中各地的游擊隊及別動隊機巧擾亂破壞的情形下，日本的一切辦法都不會發生效果，日本工業生產的危機只有一天天地加深罷了。我們還相信：各國政府及人民為正義公理而加日本以經濟的制裁，必能發生效力，美國議員畢德門說得好：「世界各國停止與日本商務關係，不需一兵一卒即可使日本就範，」實在不是過大的誇張。又如國際和平運動大會加拿大代表麥克雷沃德在援華反日大會上所言，「日本若無加拿大接濟它以軍用原料。則無法開始侵略，且亦無法繼續侵略。」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至理明言。

原載一九三八年六月《中蘇文化》抗戰特刊第二卷第二期

美國新經濟恐慌對於日本的影響

終必到來的事象，總是要到來的。在危機性的恐慌後安定幾年的世界經濟，並不能夠永久安定，更不能夠繼續向上好轉。在全面的世界經濟恐慌還沒有全部恢復常態的時候，次期的全面世界大恐慌，又在世界黃金國的美國展開它的序幕了。我們不能忽視美國這次經濟恐慌的世界的意義；我們更不能夠忽視美國經濟恐慌對於資本主義各國特別是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影響。

現在先就美國這次經濟恐慌的概況來解剖一下。

美國這次的經濟恐慌，在去年三月底，即已一度有過警報，到了九月以後才算進到了正當的恐慌的階段。去年三月底美國的股票和商品的價格，即已發生過一次相當強烈的跌落。不過，當時一般人皆看做以前半年以上的暴漲的反映，是一種必然的反動，毫不介意。所以生產活動依然是活潑的，股票也於夏間反漲起來。但是到了秋冬之交，經濟恐慌的襲擊突然隨著緊急警報而來了。這次美國的經濟恐慌，確有幾種值得注意的徵象，其轉變的角度，甚至超過上次的恐慌。

第一種徵象是生產活動的急速萎縮，其速度比較一九二九年還來得快些。據《分析》雜誌的調查，去年九月至十二月之間，美國的事業活動減少了二七%；據聯邦準備局的調查，工業生產的指數減少三四%。美國主要工業的鋼鐵生產額，八月間是四八八萬噸，十二月間已減到一四二萬噸；作業率更由八三·八%減到二五·四%，十二月最激烈的時候是一九%。汽車的批發減四六%，零售更激減了一半。大眾消費品的生產的萎縮，也相當厲害。只就十二月說，即比上年同期有如下的減少：棉花的工場消費量減三八%，羊毛消費量減六四%，生絲消費量減四九%，人造絲減七四%，皮鞋生產額減四六%（均

據日本〈中央公論〉四月號所列數字）。

第二種徵象是破產與失業的激增。工業生產及事業活動的萎縮，必然地產生大批的破產者及多數失業工人。今年一月份的破產件數，達一，三二〇件之多，比去年同期增加五一〇件；其債務額達一千五百萬元美金，比去年同期增加七百萬元美金，約增一倍以上。失業工人在去年九月至十二月之間已增加了二九三萬人，到今年一月間總數增加到一千四百多萬人（據四月三十日〈新華日報〉所引〈紐約工人日報〉）。現在每周三日工作的辦法普遍於全國，大多數未失業的工人也已是半失業者了，即未失業的工人的收入，也減少了二〇%以上。

第三種徵象是股票和物價的跌落。素來股票行市的感受性最銳敏，所以跌落也相當厲害。去年三月間美國股票指數是一九四，到十一月上旬竟跌到一二五。按去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價格計算，股票所有者因為行市暴跌所招致的財產損失，在二五〇萬元，約等於美國全國收入的三分之一。批發物價去年自春間到年底跌二四%。又，其十五種主要商品的價格跌落了三〇%。

第四種徵象是貿易的衰退和存貨的過剩，對外貿易的衰退是經濟恐慌爆發的一因，同時也影響倉庫的存貨增加。據〈國聯統計月報〉的數字，今年一月份國際貿易總額，比去年十二月份減少了一一·三%。去年五月至八月之間，美國的存貨指數由九九增至一一四（以一九二三—一九二五年平均為基數）。恐慌爆發後，各業的定貨額更加減少；特別是原料的存量隨生產之萎縮而增加百分之十至十五。

日本經濟素來和美國經濟有著密切的關係，美國經濟的興衰，直接影響日本經濟，自必非常深刻而廣泛。現在試就可能發生的影響，剖述於下：

一、日本對美貿易更加惡化

日本經濟界近年來受到對美貿易惡化的影響很大，特別自我們全面抗戰爆發以來，其惡劣的影響更加增大。其主要的癥結，即在於輸出減少而輸入比例的增加。若按之過去的情形來推測將來，則日本對美貿易，此後的打擊必有非常的增加。日本輸出美國的主要商品是生絲、絲織品、罐頭、帽子和玩具，都是消費品，當然第一步要受美國一般購買力減低的影響，特別是奢侈品的生絲及絲織物等商品。生絲是日本最主要輸出品之一。曾經占過日本輸出品的主座，輸出額最多的年度達八七，七〇〇萬元。其輸出的絕大部分，則又是在美國。就最近幾年的情形看來，輸出美國的成分，自八三·七%至九六·六%，其重要性可知。但是此後美國一般大眾購買力的減低，首先就要奪去日本生絲的銷路。最近每年輸向美國的三三，〇〇〇多萬元（據日本大藏省發表昭和十年度）的日本生絲，當必減去大部分。此外如日本特殊輸出品的罐頭（每年輸出美國約五、六千萬元），玩具（約一千多萬元），及帽子（約三五〇多萬元）的輸出額，也必大減。反之，日本由美國輸入的商品，則為必需品，特別是軍需品，主要的有鐵、鋼、機器、汽車、鉛、銅、皮革及棉花等類。日本每年由美國輸入總額在八億元以上，而輸出則只有五億多元，常年即已有三億多元的入超（據大藏省統計）。此後，這些入超額必將激增而使日本淪於國際的債奴地位。

二、日本對外的匯價將更跌落

日本近年來對外匯率是在一直跌落下來。對英鎊的匯率由一九二一年的二·〇五先令跌至一九三六年的一·〇二先令。即就對美金的匯率言，也由一九二一年的四八·〇二二美元（一百元日金為單位）跌至一九三四年的二九·七一四美元，再跌至一九三六年

的二八·八九六美元。在平時日金對外匯率的降低，被日本對外貿易業者利用做增高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輸出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在戰時這種手段不但因為作戰國消費品生產的停頓而失去作用，並且徒然減低了貨幣對外的信用，這就是中日戰爭爆發以來日本政府拚命維持對外匯率（欲使匯率固定於一先令二便士）的主要原因。但是匯率的維持是有條件的，除了輸送現金之外，就必須增加輸出，或借外債，輸送現金在日本現勢之下是不能辦到的。告借外債也非常困難，有力量借款給日本的，只有英、美、法等國家，而其法西弟兄的德意則自顧不暇。英法因為利害關係，不會借款給日本，前者不願意日本獨吞中國，後者反對日本的侵略。在美國本年一月間曾有過傳說，說摩根將借款五千萬美金給日本，但美國人民反對的聲浪很高。據說，最近日本又向美國政府交涉九千萬美金的棉花借款，但也將因為日本本國棉業的停頓和轉賣的不可能而不能實現。最後一法的增加輸出，則將因美國經濟恐慌的發展而絕望。此後日本對美貿易只有入超日益增加，而日本對外匯率也將隨之降落。因為對美輸出額減少，世界金融市場上對日匯票的需要更加減少，日本在外抵賬的資金也更加減少，日本外匯不能維持現狀，當必繼續跌落。

三、日本國內物價之繼續高漲

日本既不能增加輸出或借外款以抵償入超，在外所設的外匯準備金又在前年初即已用完，則自必輸送現金以維持其國際的信用。最近日本輸送國外的現金，據各方估計，當在六億元以上。日本銀行的金準備原有五二，〇〇〇萬元，後為增加其效用而提高估價，現在變成十五億多元，其中一半用作外匯平衡基金。此外又限制金用途，獎勵產金，搜刮國內及東四省的現金，每年可得二億元。但若此後輸出美國的五億多元的總額，或

至少三三，〇〇〇多萬元的生絲輸出額，因為美國經濟恐慌而減去大半，則將更需要外匯平衡基金，需要輸送更多的現金到外國去。其結果，日本銀行的金準備額必大減少，而其發行的紙幣的準備率也將大減，直接影響到貨幣價格的跌落，間接為提高物價。日本物價自去年七月的一二八·九（大正二年一月為基數）漲至本年一月的一三八·七。此後日本物價將因幣值的無限跌落而繼續增高。相反的，英美的物價卻在跌落，英國物價自去年七月的一二七·七跌至本年一月的一一七·三（據《The Economist》），美國物價在同期間也由一一八·三跌至九六·六。所以日本物價的高漲，適足以減低日本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減少輸出，因而反過來影響外匯低落。日本對外的信用將隨這樣交互的影響而步入崩潰的途程。

四、對於日本國民經濟的影響

日本資本主義雖然有了高度的發展，但其工業生產的中心，依然在於輕工業。例如紡織工業，在美國工業構成上只占一四·一%。而在日本則占至三七·二%。其中特別是製絲工業，在占全體工業將近一半的比重的纖維工業中，占很大的比重，工場數在纖維工業總數二二，一九四家中占三，三六五家，工人數在總數九三八·六千人之中占三一·二千人，生產額在總額三，〇一七百萬中占五一〇百萬元。而這些製絲工業，幾乎可以說是完全為美國人而活動的（日本每年生絲產量，只有二〇%左右，歸自己消費，所餘部分皆輸出外國，絕大部分輸出美國）；如果因為美國經濟恐慌而減去大部分的銷路，則日本帝國主義支柱工業的纖維工業，將必崩潰主要的一角。此外如大量輸出美國的絲織品工業、罐頭工業、製帽工業及玩具工業，也都是日本的主要工業；單就包括罐頭工業的食品工業看，即占總工業構成一六·二%，這些工業將因美國的經濟恐慌

而受打擊，也是當然的。（以上據有澤廣己的《世界經濟統計圖表》及日本商工省的《工場統計表》）大部分製品銷售於美國的這些工業，還有一種特質，就是所用原料都是日本自供，其影響的嚴重，在原料來自外國的工業以上。再自工業利潤上看，製絲工業的重要性更大，其所雇用的工人，絕大部分是女工，在總數三一，二〇〇人之中，占二八八，二〇〇人（據三菱經濟研究所編《日本產業與貿易的發展》二三九頁）。日本資本主義原則對於一般的工人施行半奴隸的榨取，而對於女工的壓榨，又加倍於男工，其利潤率之高，正如薩法洛夫所引用歐脫萊女士的話：「投於妓院的資本和投於紡織工業的資本，從那一方面的統計看來，在日本諸條件之下，都是得著最高的利潤（Lancashire and Far East）。」這句話特別可以應用在製絲工業及養蠶業上。如果美國因為經濟恐慌而停止大部生絲及絲織品的購買，則對於日本經濟的影響，實不獨限於對外貿易，而專在女工身上找利潤的日本資本家，更將陷入泥濘之中。

五、影響日本農村經濟的崩潰

日本生絲工業的停頓，不但是工業經濟的問題，同時也是農村經濟的問題。這可以從三方面來分析。第一，日本農家專靠養蠶為主要副業，以補貼農業經營費的，為數約有二百多萬戶（約占農家總戶數五五〇多萬戶的半數——據《日本農業年鑑》），桑園面積六二三千町步，產蠶額在二〇三八〇多萬元。在日本，農家養蠶是僅次於米作的主要產業。在米作費用增高的近年，日本農家專靠養蠶的收入來補償。第二，日本農家素來即依靠女兒們入工場做半典賣的勞動，姑以維持重重壓榨的農業經營。有人把這種事實美化，說：日本女工的勞動，是為著自己的嫁妝。但是他們忘卻了：日本女工之取工錢，不是在初入工場的時候預支，就是在其父兄支付肥料錢及其他農業經營費的時候。

將近三〇萬的製絲工場的女工，在日本農家經濟的地位，是不能忽略的。第三，養蠶和產絲是日本主要的家內工業，這不但是農民副業的問題，同時也是地主得以繼續高率地租的剝削的問題。農民為地主養蠶，而地主則由販賣金扣去大部分的地租。這種半農奴的零細農與半奴隸的工資勞動者互相規定的體制，如果因為美國經濟恐慌而崩潰最主要的一角（養蠶和產絲）。則不但日本支柱工業的絲業有崩潰的可能，即「其社會的金字塔也必從其根底顛覆過來」（薩法洛夫語）。而兼做玩具副業的所謂「內職農家」，及兼營漁業的所謂「漁村農家」，因美國經濟恐慌可能發生的破產，更可以證明薩法洛夫的這句話的確實性。

六、激發農民的革命性

日本農民的文化水準是比較落後的。在日本軍部政府一貫麻醉政策之下，日本農民在革命上也是最落後的。但其在革命上的重要性，則不在工人之下。這不但是因為日本農業人口在職業人口中占四八·四％的壓倒的多數，（據《經濟統計年鑑》），並且因為日本資本主義建設在半封建的農村地基上。日本法西斯的爪牙的軍部，把他們的嚙口囉散布在鄉村，農村遂成了在鄉軍人活動的根據地。運用暴力維持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生力軍——包括軍隊和警察——大部分是由農村供給的；來自田間的軍人約占總數百分之八九十。但是日本農民久處於世界特例的高度壓榨之下，經濟恐慌更足以激發他們的覺醒和擁護本身利益的鬥爭。在過去所有農業恐慌中，日本農民皆已發生過暴動。我們全面抗戰發動以來，農民負擔的加重，也已激發了秋田縣農民和礦工聯合的大騷動。因為美國經濟恐慌所影響日本農村經濟的破產，更將促進日本農民的自覺。

從美國經濟恐慌的本質考察，很有當作世界大恐慌的推進曲而發展的可能，那末，

因為高度壓榨的「社會傾銷政策」強制維持下來的日本經濟，將在美國經濟恐慌的吹號之下加速爆發，是非常可能的。伐爾加說過：次期的世界經濟恐慌原該由英日兩國爆發。日本雖因加強壓榨的「社會傾銷政策」，一時彌縫過來，但是這種彌縫只是更加加深恐慌的深度罷了。

原載一九三八年六月《世界知識》第七卷第十一期

日本農業經濟的特質

在資本主義發展至最高階段的日本整個國民經濟當中，農業經濟究竟帶著那一種階段的性質，依然是封建性呢？或者已經是資本主義性呢？抑或是所謂前資本主義的性質呢？決定這個問題不但是研究日本農業經濟最重要之點，同時也是研究日本整個資本主義最重要之點。這個問題是研究日本農業經濟應先把握的問題，同時也就是研究同種的歸宿之點。日本學術界討論這個問題，早即各派的意見分歧不一，迨至最近的論戰更加尖銳化。各派不但努力於新資料的發見，並且特別注意到方法論的問題。其所以不容易解決的主因，據我看來，在於一般人眩迷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度之點。日本及其他各國——中國在內，還有許多有權威的學者堅持下列幾種理由主張日本農業經濟的性質為「近代的」，即「資本主義的」：（一）明治六年「地租改正」後，土地所有關係已由封建諸侯的大土地領有變成私人的所有。（二）同時封建時代的貢租亦已變成賦稅，且由物貢形態變成貨幣形態。（三）封建諸侯及領主全部撤廢，封建的身分制度已不復存在，不自由的農奴也皆得到解放。（四）土地的貸借關係可以專依「自由契約」締結，封建時代的「經濟外的強制」已經消滅。（五）農民可以依照職業自由的原則選擇職業，不必被束縛於土地，（六）農村的生產業已相當受到市場需要供給關係的支配，等等。

但是這些都是表面的皮毛的看法。實質上欲決定日本農業經濟的性質，正和決定其他一切的問題一樣，須從本質方面下手。決定農業經濟之為「封建制」，抑為「資本制」的本質，有一個根本原則，就是土地所有者與直接生產者的關係，即直接的剝削樣式。從這根本原則，我可以根據《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的著者列寧的意思列舉四點標準：

（一）自然經濟或貨幣經濟，（二）直接生產者事實上被束縛於土地或已得到解放，

(三) 受到不自由的經濟外的強制，或締結契約的完全自由，(四) 技術的應用程度高級或低級，即應用新技術的大規模經營或舊式的小規模經營。

現在且依上列四點檢討日本農業經濟的本質，究為封建，抑為資本主義的？

第一，「地租改正」後繳納政府的賦稅完全改用貨幣單位，一部分地主亦由佃農徵收貨幣地租。又近年來日本的農業生產，有為供給市場的需要，有為供給外國的消費的。這些現象很接近於貨幣經濟，但是事實並不盡然。貨幣地租只是地租形態的轉變而已，並不足以證明生產關係的轉變。《資本論》著者說得好：「現金地租是指那由現物地租的單純形態轉化而成的地租而言。在這地租形態上，直接的生產者，必須支付生產物的價格而不是生產物於土地所有者（不問其為國家或私人）。」「這種地租的基礎，與其起點的現物地租的基礎是同一的。換言之，生產者由於繼承或其他的傳統，依然是土地的占有者（不是所有者，作者按），必須依轉化為貨幣的剩餘生產物的形態，支付強制的超過勞動，即不受等價而支出的無償勞動，於這個最重要生產條件所有者的地主（《資本論》第三卷第六篇第四十七章《資本制地租的發生》），況且貨幣形態的地稅，亦不過只通行於地主與政府之間，若直接生產者的農民與土地所有者的地主之間，卻尚通行著現物地租，甚至至勞動地租的慣例——即令亦有一部分收著貨幣地租。維新政府之改用貨幣單位的地稅，實際上只是減少地主的負擔，在日本資本主義向上期農產物價高漲的時候，地主由佃農徵收現物地租而繳納政府以現金地稅，是處於有利地位的。

又如除去自己消費而尚有剩餘以供應市場的需求的，大多限於地主及富農。若占日本農民大多數的佃農及小自耕農，除去繳納地主及自家消費，乃至還本納息外，已無多少剩餘可以送出市場去了。即令近年來亦有多少專為供給市場需要而經營專門化的農業生產，例如養蠶栽種水果等等，但其比重畢竟很小，不足以代表全部。更嚴格地說來，僅僅農產品的變換尚不以說明農業的資本主義化。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必須具備工資

勞動者雇傭關係的本質，必須直接生產者使用農業經營者的勞動工具及勞動對象以耕作土地。若就直接生產者而言，日本農業生產還是停留於半封建的階段上，農民大部處於隸農的地位。此點與次述三種特質聯結，阻止日本農業經營之資本主義化。

第二，明治維新後法律雖已規定人民有選擇職業的自由。人民可以自由選擇其他的職業，不必被束縛於土地上，這似乎封建的農奴已經得到了解放。但是事實上日本的細小農並無行使這種自由權的能力及環境。一般的小農受到兩重地租（直接繳納地主的佃租及間接繳納政府的地稅）的異例壓迫，加上高利貸的高度剝削，他們實在沒有法子擺脫隸農的地位。再加以一般恐慌開始以來，資本主義向下期都市工業的蕭條，小農更難斷然離開農村而走入較富裕的生活之路。只有法律上的自由而沒有經濟上的自由，結果是一種駕空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罷了。

第三，明治維新後法律雖已允許直接生產者的農民可以與土地所有者的地主，依契約原則自由決定土地的貸借關係。表面上，「經濟外的強制」，似已不復存在。但是佃農因為經濟能力的薄弱，復又處在占總收穫額六八%以上的雙重地租及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重重剝削及壓迫之下，絕對沒有能力可以行使其契約的自由權。反之，他們只好處於人格的隸屬關係之下，忍受著種種「經濟外的強制」。例如佃租滯繳時所受的種種封建制裁，地主所加種種的臨時義務，佃種爭議發生時政府的武力鎮壓，政府幫助地主徵收佃租，乃至佃農人格地位之隸屬關係等等，不遑枚舉。

第四，在關係農業經營技術之點，我們更容易證明日本農業經濟的封建性。日本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除去新開墾地的北海道情形略有不同者外，從一般說來是不足一提的。大多數（在八〇%以上）的日本農民的耕作面積，皆在半町步至二町步之間（一町步約當我國十六畝），是一種典型的小農經營。加以一般工資的廉賤使機器生產費高於人力生產費多多，所以新技術的應用幾乎完全不可能。日本細小農經營又是一直發展著

來的傾向，所以土地所有權雖有集中的情勢而農業經營則愈益分化。封建的隸農制阻礙著農業經營的近代化，資本主義化。《資本論》的著者說過：「過小農的土地所有（乃至農業經營——作者按），其性質上排除勞動的社會生產性之發展，勞動之社會的諸形態，資本之社會的集積，大規模的牧畜，科學之累進的應用，等等」（《資本論》第三卷第四十七章資本制地租發展）。

上面四種標準的分析已經決定了明治維新後乃至現在的日本農業經濟之為封建性質，同時並且反駁了，各國（中國在內）許多有權威的學者，所主張日本農業經濟的近代性。更確切地說來，「地租改正」雖然改換了土地所有的主體，但是土地所有者之為國家，或封建諸侯，抑為私人，並不改變土地所有者對於直接生產者的剝削樣式，無寧更加強化了同種的剝削。所以與其說是近代化了，資本主義化了，倒不如說是後退了，半農奴的制度重現了。貢租之由現物形態變成貨幣形態，不但沒有貫徹於地主與佃農之間，即以貨幣形態之轉變言，尚不足以說明土地經濟的現代性。因為貨幣單位的地租形態仍未脫離封建地租的範疇，再如封建諸侯及身分制度之撤廢，事實上不過以秩祿公債和現金補償他們，使他們得以變成寄生的地主，而法律更加明顯保障他們的權利罷了。日本的土地革命並未完成，農民並未得到徹底的解放，依然處於隸農的地位。

還有一部分人持中間主張的。他們一方面看見日本農林的許多資本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又不能忽略日本小農的慘苦地位，因而主張日本農業地租為前資本主義的性質。但是事實上，構成農業經濟性質決定點的地租形態，只能有封建的或資本主義的性質，而不能有所謂前資本主義的性質。所謂「前資本主義」的概念，實在包括著封建的、奴隸的，及原始共產的範圍，而在地租之點並無這種範疇。又有人主張日本地租兼有封建的及資本主義的兩重性質。但若主張兩重性質的話，就只能從其地租剝削強化之點來說明，即從徵收佃租的地主及徵收地租的政府之點來說明。即在此點也不能說是封建的及

資本主義的兩重性，而只是封建剝削的兩重性。

要而言之，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土地所有關係，鞏固了地主的寄生地位，世界無比例的高率佃租，阻止農業經營利潤之產生，阻止農業經營資本主義化，促進過小農經營之發展。日本一般的過小農只有累積負債而等待著破產的一途。這才是日本農業經濟的基本特質——封建的特質。

不過日本資本主義早已胚胎於德川幕府末年，明治維新後只有劃階段的變革，廢除封建的身分制度，解除了土地自由買賣的禁令，因而社會構成的農奴制度解消，割據的分權的領主制度變成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制度，工業在中央集權的官僚制掩護之下急速發展，終於達到資本制生產樣式成為全社會的支配定則，貨幣經濟及商品的流通浸透於農村，把農村經濟包羅於其經濟網內。因此，這時候的日本地租與封建構成下的封建地已多少有不同之點，可以說是「半封建的地租」。規定日本半封建地租的特質，約有兩種條件：

(一) 這種地租充當資本原始積蓄的源泉，在資本主義全部生產關係之下不是一個不可分的構成因素。樹立於商業及高利貸資本及獨占資本的基礎上的日本主義，特別顯明指示這種條件。唯其有此條件所以日本資本主義如日早熟為獨占資本主義。同時，亦因為這種原因而獨占資本主義，倒反妨礙農業上的半封建的生產樣式轉變為資本制的生產樣式。因此，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桎梏，不能夠隨布爾喬亞革命之完成而解消。

(二) 在由封建制生產樣式轉化為資本制生產樣式的過程中，封建制只是妥協的融化的解消。在這兩種生產樣式的轉化過程中，日本的土地革命並未徹底完成，土地所有關係殘留於封建的狀態下，而只妥協地順應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已。農業上的資本主義經營，受到半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的妨礙，即有極緩慢的部分的工資雇傭關係產生，但仍

帶著半農奴的特徵。

最後尚須聲明一點，日本近代的農村經濟無論怎樣被包羅於貨幣經濟，浸透於商品流通，但是直接生產者與土地所有者的關係，依然是決定原本性質的根本原因。因此，「半封建的」地租，究結到底還是屬於封建地租的範疇。它既不是資本主義的地租範疇，更不是第三範疇的前資本主義的範疇。

原載一九三九年六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三期

日本貨幣政策的新攻勢

在對日全面抗戰的陣營，法幣的強韌性，即令敵人都驚駭，日本侵略者強調中國的抗戰力量是在英國金融的支持之下，自然不是偶然的。日本政界及輿論界數月來即熱鬧討論如何抵制、破壞，乃至利用法幣的問題，最近遂有急劇進攻的新趨勢。

日本最近進攻法幣的新方略，約有三種的形態；其一，搜集華北及華中的法幣，到國際金融市場上套換外匯，使外匯市場上法幣供過於求，用人工外科手術的方法降低法幣的匯價。其二，大量發行華興銀行的偽幣及軍用票，並以軍權強制使用，藉以擾亂法幣的流通，限制法幣的交換價值。其三，在特殊的地域內，特別是上海這樣容易受經濟封鎖的國際金融市場，更加運用「經濟外強制」的政治權力，利用物質來源的封鎖性，強制偽幣的使用，以期達到降低法幣的交換價值的目的。

在上列三種的形態中，第二種形態在華北及華中過去施行的結果，並無多大的效力，一般人民皆願意保藏使用法幣，法幣的價值依然高過偽幣，乃至日幣一、二成以上，所以日本侵略者發揮它偽幣政策的效力，就不得不再乞靈於政治權力和軍力，並用起第三種的方法來。但是這種「經濟外強制」的方法，截止今日尚未發生大的效力，它必須和「租界的問題」糾纏在一起，日本軍閥對於租界問題的蠻幹，不能達到所期目的以前，相信這種偽幣經濟外強制的力量，也不會發生很大的力量。所以在日前偽幣的前途還是暗淡的，雖說所採用偽幣的敵人陰謀，相當的毒辣。

現在已經發生多少擾亂作用的日本貨幣進攻政策，只有搜集法幣套換外匯一法。法幣黑市的跌落，開始於二、三月前，至最近更大轉劇：由四月的「五五·七八」（以每百元值港幣計算）跌至五月的「五四·六〇」，再跌至六月初旬的「五四·五二」，甚

至於十四日的「四二·九〇」。這種跌風確實相當劇烈，其主要的原由，在於日本傾出大量的法幣於上海及香港的國際金融市場上購買外匯。據說，日方在江浙強制搜集了不少法幣，這次先傾出九千萬。我們遂不得不採緊急對付策，由香港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命令上海匯豐銀行及渣打銀行等暫停出售往日價格的外匯。在這裡可以看出在法幣的跌落下，我們還是占著主動的地位。相信一陣暴風過後，法幣仍可安定於某一階段上。

這一問題不只是中國一國的問題，英美法的經濟利益都有密切的關係，英國與法幣的關係更密切。他們不維護在華利益便罷，否則他們會和中國設法共同維持法幣的經常價值。我們還可以從保護、獎勵本國的生產及貿易上，增進國際收支的好轉，而從根本上提高法幣的外匯價值。

原載一九三九年七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四期

日本帝國本質論

——軍閥官僚統治的經濟基礎

一、緒論

歐洲大戰後日本一躍而登世界三強之列，近年來經濟界也有更急速的畸形發展，幾個大都市如東京、大阪、京都、橫濱、神戶及福岡等也皆塗上不少現代的新色彩，東京丸之內一帶的大樓雖其高度並未插入雲霄，但也還可以供東京游客觀瞻一陣。日本帝國表面上居然可以稱雄於世界了，儼然是一個「現代國家」——「現代國家」——「現代國家」——「現代國家」——「現代國家」——「現代國家」——「現代國家」——「現代國家」——「現代國家」——「現代國家」。但是事實上日本帝國只是一個「紙老虎」，揭破了外皮，內部就是不調和的醜態。嚴格地說起來，日本帝國還不能算是一個「現代國家」，尤其不是一個「民治政治的國家」。我們打一個譬喻，日本就如同穿上歐式大禮服的鄉下紳士，不但形式上有許多不調和的地方，即其行動作為也都充滿著「土氣」，再加上橫衝直撞起來，更活像一個劫掠都市的鬍匪，封建的氣氛十足，凶殘的蠻性更十足。遠東的鬍匪現在已經侵入我們的堂室，大肆其中世紀的殘暴和劫掠了。我們要抵抗這種鬍匪，就不能不認清它的真面目，剝去用以嚇人的假面具和用以欺騙世界的紳士大禮服，細加分析，以便決定我們對抗的方策。

我們要瞭解遠東鬍匪的本性，須從它的本質探討起。究竟「日本是什麼東西」（某文化機關出版物的標題），的確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卻不是日本人短小難看的問題，更不是他們的人種惡劣的問題（上引著作及有些作者專重這些方面攻擊日本）。我們要決定日本的本質，須就它所賴以生成發展及存在的基本條件的經濟基礎及

經濟基礎上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及社會結構的醜惡加以分析。

關於日本資本主義乃至帝國主義的本質，日本及外國的學者各持不同的見解，彼此對立，莫衷一是，但據作者年來研究的結果，山田盛太郎下列的幾句話，已經揭破遠東鬻匪的外衣了。

「英國資本主義表現為自由競爭的祖國，德美資本主義表現為集中獨占的本家，俄日資本主義表現為軍事的半農奴制的典型國，那一種表現都帶著世界史的意義」（山田盛太郎著《日本資本主義的分析》第三頁）。

日本軍事機構的設備，在半封建的半農奴制的地基上促成日本資本主義乃至帝國主義的發展。帶有劃時期意義同時又是從上而下的日本明治維新革命，是一種不徹底的布爾喬亞革命，這次的革命只是一方面創造了半農奴的細小農民及半奴隸的工資勞動者，以充當資本原始積蓄的泉源；他方面整備軍事機構，發動重工業，以促進工業資本及金融資本的發展。於是日本資本主義帶上了軍事性及半農奴性，日本資本主義的軍事性及半農奴性，並且是自其出發點即已規定好的。

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並沒有改變了德川封建制度的隸役機構，束縛於德川封建制度下的零細耕作的農奴的隸役關係。是雙重的剝削關係，一為封建的大土地領有者（當時的諸侯及領主）的苛斂，一為高利貸資本式的寄生地主的誅求。這種雙重的隸役關係的內容，就是貢租三七%，地主租米二四%，農奴應得比率三九%的總收穫米的分配（山田盛太郎《日本資本主義的分析》第四頁）。明治維新並沒有改變這種苛刻的隸役關係，以前的零細耕作的農奴沒有得到解放。明治維新變革的結果，不過把從來的零細耕作的農奴轉化為兩種本質上沒有變化的東西。第一就是半農奴的零細耕作農，他們對於繼承半封建的隸役條件（封建的大土地領有權的妥協解消形態）的高利貸資本的寄生地主，

繳納五〇%乃至六八%的高率佃租。第二就是半奴隸的工資勞動者，他們在強力的原始積蓄過程上，正與那由社會生活資料及生產手段轉化的資本同樣重要。由封建制度下的農奴轉變的半農奴的零細耕作農及半奴隸的工資勞動者之間，並且依然保存著互相規定互相依存的關係。這種關係培養半農奴制的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尤其是最近幾年來世界市場上活動的可能性，這是我們要特加注意的要點。

日本資本主義在上述半農奴的零細耕作農及半奴隸的工資勞動者互相依存的土壤上，又受到軍事機構整備的推動及促進。明治維新的事業首先注重軍事機構的整備，是當時的國際情勢，國內經濟的特殊性，及農奴解放的不徹底等原因所急切要求的。換言之，軍事機構的整備及強化，適應當時日本的特殊情形，在其資本主義的誕生及發展上，具有對內及對外的兩重作用。對內的作用就是鎮壓由德川封建制度下的農奴轉化過來的半農奴的零細耕作農及半奴隸的工資勞動者的反抗或騷動，乃至由這反抗及騷動，集成的地方各藩的叛變。對外的作用就是一方面抵禦先進資本主義各國的侵略，保全自己的安全及發展；他方面侵占中國及其屬國的商品市場，攫得近代工業生產的主要原料的煤鐵，以補強纖弱的日本資本主義的貧血症。在這種兩重作用及逼切要求之下，軍事機構的整備及強化，成了日本資本主義誕生及發展過程上的無上的命令。這個無上的命令促成日本資本主義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顛倒發展，先由重工業尤其是軍事性質的重工業發展起來；軍事性工業生產，處於一般工業生產的指導地位。軍事性的重工業首先是以製造兵器的軍器工廠、海軍工廠、製造兵器材料的製鐵所，及軍事輸送機關的鐵路種種形態發動的。其次，又促動鍵鑰產業（key industries）如礦山、造船、機械工業的發生及發展。於是，不但提供了產業資本健全發展的條件，並且創造了巨大的金融資本。日本資本主義在極短促的期間由纖弱的產業資本急速轉變到金融資本，而且大闊步地登上世界的舞台，根本動力即在於這個軍事機構的整備及強化。

二、半封建的土地經濟與日本資本主義

半封建的土地經濟

日本土地經濟在其資本主義的構成上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此點自其農民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後猶占總人口六〇—七〇%的量的方面，及其資本主義依存於半農奴地基地上的質的方面即可以證明。日本農民在總人口所占比率之高，是各方面的統計材料所指示的既定事實，用不著詳細的剖述，問題只在於明治維新變革後的土地所有關係及耕作關係的性質及形態上。

日本德川幕府封建制度下的土地經濟，有兩種特徵：純粹封建的土地所有組織及零細耕作的農奴經濟。這種土地關係經過明治維新完成了的妥協的解消和轉變。但是這次的解消和轉變卻未根本脫卻從來的封建本質，而只全憑經濟外的強力，在軍事機構及鑰鑰產業體制下樹立了半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及半農奴制的零細耕作。此點是軍事性的半農奴制的日本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定，我們擬以本問題的性質及形態兩方面來檢討。

1. 明治維新後的土地所有關係

日本近世的土地關係的變革是以明治六年的「地租改正」(地租改正就是地稅或田賦的改正，因明治六年日本的地租改正幾乎是一個普遍使用的名詞，故仍舊名，而附注於這裡)為轉軸的，這是軍事性的半農奴制的日本資本主義產生的一個基本過程。在這過程上，日本的土地關係發生一度的再編制。此次編制的特徵，簡要言之，就是由舊幕藩的純粹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及零細耕作的農奴經濟轉到半封建土地所有關係及半農奴制的零細耕作。

現在先從「地租改正」所產生的土地所有關係的變革加以檢討。德川幕府後期日本

土地的分配是「御料地」（皇室用地）〇・五%，幕府領有地二五・八%，藩侯領有地七二・五%，廟寺領有地一・二%（據山田氏上引同書一八四頁）。明治政府的第一步政治改革是「奉還版籍，廢藩置縣」，這是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的一大變革。明治政府如何處分這占日本土地總面積九八%以上的幕藩領有地及其後的動向如何，構成我們檢討的對象。關係此點值得我們注意的，至少有三種事實：第一是幕藩領有地的有價的處分，第二是官有地面積比重之增大，第三是民有地的分配關係。明治政府之處分幕藩領有地，不是無價的，是有價的（承受巨額的藩票及補償，發行巨額的秩祿公債），所以明治維新的農民解放不是法國大革命後獨立自由的農民解放，而只是由農奴到半農奴的轉移而已。在廢藩置縣後的日本土地所有關係上，官有地仍占著絕大的比重，並且年益增大。明治十四年官有地總面積為五，二八九，八五〇町步。（每町步約當中國十六畝），民有地總面積為一，七五二，〇九五町步；到明治二十三年官有地激增至二一，四〇一，二四一町步，而民有地則只增至一二，五〇九，九八六町步，無大變化（據上引同書一八五頁），這是官僚軍閥的封建勢力殘存的基礎之一。民有地的絕大部分的利用者，不是沒有寸土的佃農，就是所有地過小的半自耕農。早在一八七五年，日本全部耕地面積的三六%就由佃農所耕作，其後這種過程益發加大，至一九三一年佃作面積竟達全部面積的四七%（據幾曼著《日本經濟》日譯本三十一頁）。

在上述情勢之下，日本農民對於土地愈覺饑荒，結果只有歸宿到半農奴的一個途徑。「地租改正」後，日本農民的實質地位並未優於德川時代，甚至於比鎌倉時代還壞。「地租改變」前後，耕作者所得收穫米的比率變化如下：

中田每一反步耕作者所得米的部分及其在總收穫額的比率

鎌倉府法（一二八六年以後）	○・五六一擔	五六%
文祿田法（一五九四年）	○・三八六擔	三三%
貞享田法（一六八六年）	○・六四五擔	五〇%
明治六年租地改正（一八七三年）	○・五一二擔	三二%
自明治四十一年至大正元年平均	○・七八二擔	四七%
自大正五年至九年平均	○・九二八擔	四九%

（注）據上引山田氏同書一八六頁第一表，日本一反步約當一畝半中畝。

「地租改正」之後的日本農民地位不但沒有改善，並且是七百多年來最惡劣的情形。日本資本主義的佃租，高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數倍甚至十數倍。日本每反步佃租（大正十年）一季作田三一・七四六元，二季作田三九・五九七元，旱田九・七一〇—一九・九四一元，桑園二三・二七五元以上。其他各國的耕地佃租（有的包括草地佃租）的平均，每反步，英國在戰前為二・〇〇元，蘇格蘭二・〇〇元（一九二—一九二〇年平均），愛爾蘭一・八〇元（一八八一—一九二〇年平均），德國一・九二元（一九一三年），奧地利二・四六元（戰前），法國一・二〇—一・六〇元（戰前），美國一・〇〇—一五・〇〇元（戰前）（據澤村康著《日本農業及農業問題》，及山田著《日本資本主義的分析》一八八—一八九頁的換算）。

這不但是量的問題，實在也是質的問題。「地租改正」後的日本農民，一方面負擔

著占收穫米三四％的公租，他方面又須繳納三四％的佃租，自己只得到三二％（尚且包括著種米及肥料等費用）。日本農民處在這兩層的隸屬關係及高度剝削之下。

日本大多數的農民（據蘇聯幾曼的估計當在六百多萬）所處上述的兩層隸屬關係及高度剝削，不但證明日本大多數農民的半農奴性，並且阻礙日本農業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耕作中田一反步的佃農須納公租一・六三二元（經由地主之手）及地主佃租一・六三二元，再除去種米肥料約〇・七二〇元，自己只能得到〇・八一六元，但若自耕農則可以得二・四四八元。換言之，佃農得一，地主得二，自耕農得三，這是在證明土地所有權的壓倒的優越。一町步佃農十人份的所得正與寄食於五町步中地的地主一人的所得相等。所以與其耕作十町步的土地不如租出五町步的土地。於此，自耕的阻礙，土地所有者的寄食化，由自耕至寄食化的傾向，是當然的歸宿（以上數字皆據山田氏同書一八九頁的列表）。在這種兩層隸屬關係上，幾乎收奪了日本佃農的全部剩餘勞動，沒有利潤成立的餘地。因此，貨幣的所有者自然不願當收穫利潤的租地農業經營者，而願當寄食於佃租的地主。日本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已被局限在這程度上。這裡，同時還可以握住下述日本半農奴制的零細耕作的根源。

但是上述佃農所繳總收穫額三四％的公租及三四％的佃租的兩重隸屬關係的規定，卻是「經濟外的強力」的強制所促成並為其所維持。明治維新以來繼續不斷的農民騷動及其鎮壓，都是證例。於此，又可以看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及半農奴制度的耕作，和巨大的軍事機構及鍵鑰產業體制的關係。此二者事實上是互相規定的。要之，日本資本主義的土地關係的特性不是布爾喬亞的，而是帶著寄生地主性的半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它又是為軍事機構所保障的土地所有關係。

2. 明治維新後的耕作形態

明治維新後日本土地經濟的半封建性，更具體表現於①劣於德川封建制度下的農耕規模的零細耕作的形態，及②以現物地租及徭役地租表現的剩餘勞動的徵收形態。

上述三四％公租及三四％佃租的兩層隸屬關係，必然產生半農奴的零細耕作，而明治維新後的農業經營規模的零細，較之德川封建時代，有過無不及，德川時代農耕的規模，約略如下：寶曆三年（一七五三年）仙台藩內的中等以下農民的耕作面積，是田六反步，早田四反步，共計一町步；寬政三至四年（一七九一—一七九二年），每個農民的耕作面積約自五六反步至七八反步；安政二年（一八五五年）「夫一，妻一，農繁時雇用短工一人計共三人」的耕作面積，是田一町，早田五反合計一町五反步。而「地租改正」（明治六年西曆一八七三年）後三府三十六縣的情形如下：農家每戶平均的耕作面積是○·八八町步，不足一町步，其後也無大變化。明治三十七年北海道及沖繩縣兩處極端地區除外的內地農家每戶平均耕作面積是○·九三町步，大正八年是○·九九町步，昭和四年是○·九四町步，皆未超過一町步，其零細程度之高於封建的德川時代。可知。這不能證明明治維新後日本農業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只指示零細耕作和別種條件結合，停滯於半封建的土地經濟上的事實。

關於日本農業耕作零細問題尚有三點有趣的事項，值得吟味：(1)資本主義發展較前進的地方的農耕零細程度甚於資本主義發展較落後的地方，(2)在農耕零細化的速度之點，前者亦速於後者，(3)前者只有土地所有零細化的單一傾向，而後者則有巨大所有增加及零細所有增加的雙重傾向。資本主義發展最前進的地域，若以近畿區為代表；則資本主義落後的地域，可以東北區為代表。這兩個區域的比較，可以列出下列兩表的對照：

(注) 兩表均據山田氏上引同書一九七頁及一九八頁。

	東北型			近畿型		
	明治四十一年(戶)	昭和六年(戶)	增減率	明治四十一年(戶)	昭和六年(戶)	增減率
總數(戶)	540, 109	624, 823		610, 898	583, 029	
半町未滿	165, 393	169, 188	(+)2%	271, 950	244, 198	(-)10%
半~一町	134, 487	169, 608	(+)27%	234, 321	257, 760	(+)1%
一~二町	126, 903	172, 617	(+)36%	89, 845	94, 883	(+)4%
二~三町	68, 256	79, 246	(+)15%	10, 815	5, 785	(-)46%
三~五町	38, 108	29, 618	(-)22%	2, 968	782	(-)39%
五町以上	12, 692	4, 786	(-)62%	1, 000	121	(-)87%

(A) 耕作規模及其傾向的對照表

	東北型			近畿型		
	明治四十一年(戶)	昭和六年(戶)	增減率	明治四十一年(戶)	昭和六年(戶)	增減率
總數(戶)	500, 548	534, 236		525, 599	537, 867	
半町未滿	192, 386	215, 754	(+)17%	288, 665	309, 492	(+)10%
半~一町	110, 271	107, 305	(+)16%	135, 372	134, 275	(-)1%
一~三町	127, 661	125, 374	(-)8%	79, 482	76, 761	(-)1%
三~五町	38, 316	34, 973	(-)8%	14, 128	11, 294	(-)20%
五~十町	15, 771	14, 827	(-)6%	5, 843	4, 639	(-)20%
十~五十町	5, 627	5, 430	(-)3%	2, 011	1, 389	(-)31%
五十町以上	516	633	(+)22%	97	57	(-)41%

(B) 所有面積及傾向的對照表

(A) 表指示資本主義發展較高地方的農耕零細程度及其零細化的速度高於資本主義發展較遲後地方的事實。(B) 表指示資本主義發展較高地方的土地所有零細化的單一傾向及資本主義發展較遲地方土地所有零細化及巨大化的雙層傾向。從此申論，又可得到兩種典型地域土地關係上兩種不同的性質，東北型的農業經營是雇用半農奴的半隸農主的經營，而近畿型的農業經營；是寄食於半隸農佃租的高利貸的寄生地主的經營。此點又在證明資本主義發展促成(1)地主之都市生活者化，(2)都市資產者之寄生的地主化，及(3)此二者的融化及結托的事實。三町步以上耕作者戶數在三町步以上所有者戶數所占比率，東北區為六〇%，近畿區則只有一〇%；寄食於佃租的生活者數在三町步以上所有者戶數中所占比率，東北區只有八%，而近畿區則為五六%（據山田同書一九六頁列表）。然而二者的剝削形式雖然不同，而其為半農奴的半隸農的半封建的土地的經濟則一。

日本資本主義的土地經濟的半封建性，除表現於上述零細的耕作以外，還很確切地表現於現物年貢（生產物佃租）的繳納上，現物年貢表現為日本佃農（占大多數農民的比率）的剩餘勞動的徵收形態。日本農業經營是以「米作」為主，米作是以決定的地位通行於全國並且已經固定化。此點阻礙日本農業生產的分化及發達，排除土地之自然產物的多樣性，使封鎖的孤立的零細耕作農奴之間只有利害的「同一性」而沒有「共同性」，奠下封建專制的鞏固基礎。這是後篇要剖述的問題，現在且先就普遍於全國的佃租關係略加檢討，根據大日本農會編《本邦小作慣行》（大正十五年刊行）日本水田的佃租慣例如下：(1)明治十八年水田的佃租關係，幾乎全國是米租，(2)大正元年的水田佃租關係也是同樣，「水田的佃租普及全國，幾乎全是米租」，(3)大正十年的水田佃租關係依然無變，最近並且普及於朝鮮。

日本的現物佃租，除了主要的普遍的米租之外，還有穀租、小米租、麥租，及豆租等等，若錢租及價錢租則為特例，是少數地方所通行的。其中的價錢租，本質上依然是

現物地租。所謂價錢租也者，即日文之所謂「代金小作料」，是預先以一定額的現物決定佃租的數量，在其繳納時則按照時價換算金錢而以貨幣支付的一種變相的假裝物租。貨幣地租之不通行，更可以想見。

在日本這樣半封建的土地關係及資本主義的農業設備不完全的情勢之下，由物租向錢租轉變，自然是極其困難。關於佃租之以錢租、物租或價錢租的何者為適宜的問題，兵庫縣產業部曾經徵得各方的意見如下：

贊成錢租者	一一	八	一〇	二九	地主	自耕農	佃農	共計
贊成價錢租者	七六	八四	一二二	二八一	四三二	四三二	三九六	一二四〇
贊成物租者	四三二	四三二	三九六	一二四〇				

一般所以贊成物租的理由是：「定為錢租時須先賣卻米穀及其他收穫物始能籌得，所以能擾亂繳納期，增加滯繳，又因米價的變動過甚，不但標準價格的決定及損益的預想困難，並且米價的騰落對於雙方經營上的影響甚大，特別能發生佃農在同一期間投資的結果米價跌落招來農家的非常不利，因此，在農業倉庫的設備未普及，米穀販賣未改善以前，仍以物租為適宜」（兵庫縣產業部〈關於農村問題的一般意見〉大正十二年刊十八—十九頁）。可知日本現物地租之通行，貨幣地租之不發達，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經濟階段性限制著。

較比現物地租還原始的地租形態的徭役地租（或稱勞動地租），在日本現在也還存在，並且通行於全國各地。這裡典型的農奴制的剩餘勞動徵收形態，迨至最近還發現於岩手縣九戶郡大野村，表現為所謂「名子制度」。例如「現在在晴山家有名子（按名子，

即在名子制度下耕作徭役地的佃農）三十五、六戶，地主分出宅地，一町內外的旱田及山林若干面積給名子使用，而課以每年三十日乃至四十日的賦役。賦役也者是在地主的田地或山林上勞動之謂。此種賦役若換算成金額，則每反步旱田為四角，又宅地一坪約當二釐五毫。又名子除此種賦役之外尚須以報恩之意在舊曆十二月貢送薪柴二擔給地主。此外，在喪喜事及大清掃時還須幫忙地主……」（據同書所錄東京《朝日新聞》昭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消息）。

日本徭役地租的名目非常繁多，不下幾十種，其通行範圍也不限於局部而實普遍於全國各縣。

然而日本目下通行現物地租的另一方面，公租的徵收則完全一律採用貨幣單位。這裡蘊蓄著一個相剋的矛盾，是由上述雙重隸屬關係產生的矛盾。農產收穫額三四％的公租和三四％的佃租二者之間並不是調和的平行線，而是充滿著矛盾的相剋線，現在由公租的貨幣形態及佃租的現物形態，更確切地表現出來。公租的貨幣形態是一定額的貨幣，佃租的現物形態是一定量的現物。一方是貨幣，他方是現物；一方是價值，他方是使用價值，二者的範疇完全不同，因而二者各受不同的條件所限制，其運動法則亦各不相同。此點在社會經濟上指示著一點很重的意義。地租不能脫離現物形態向更高位的形態轉化，是指示一般社會生產的低下及隸農制的半農奴制的關係之存在。反之，公租則以公力和強力擺脫了現物形態而向貨幣形態轉化。前者是半農奴制的規定，後者是「軍事性質」的規定，於此可以明瞭日本軍事機構及鍵鑰產業的體制與半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及半隸農制的零細耕作，是相成而又相剋，更可以把握住日本資本主義之軍事性及半農奴制的特質。

關於日本明治維新的土地經濟的封建性，蘇聯的日本問題專家薩法洛夫的論斷，尤其是痛快明瞭：「日本農民改革的布爾喬亞的內容，即比之一八六一年（俄國）帝制地

主的改革還要貧弱得多。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的日本改革，第一就是更生地主階級事實形成上的土地所有的公式化。那是農民附屬於土地的新束縛容易實施，並且維持最高度的舊封建要素的極端的農民土地喪失的是認。繳納給農奴主的貢物額數達到莫大的程度」（《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第一章）。事實上，這次的大改革只是換湯不換藥的變更而已。「諸侯及武士的建封特權，以國民大眾（寧可說是農民大眾——宋按）的犧牲而得收回。樹建基礎於軍事的封建的隸農制上的舊關係，再現於適應布爾喬亞汜發達的各種要求的新基礎上。身分的封建的隸農制，為將軍的廢止，地主買收土地封建權利的形式手續，職業自由，遷移自由，商業自由，文化吸收自由等等所隱蔽的農奴制高利貸的隸農制所代替。面目一新的君主政制，統治著從屬於改組後的地主階級而無尺寸土地之農民。其後的發達雖為少數農民開闢了二三獲得土地所有權的途徑。但是大體上農民大眾只殘存於貧弱的分割地，這種分割地又束縛農民於地主的土地上」（據同書四十五頁）。

三、半農奴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

經過明治維新改革的日本土地制度依然保持著半封建性的土地所有關係及半隸農性的零細耕作規模。日本資本主義就是在這半封建的土壤上建立起來的。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是為世界史最近階段的時代性所規定的，明治維新的變革遂以「由上而下」的形態開其端，以妥協融化的終局殿其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生及發展為這種歷史的條件所規定，所以從其誕生以至生長過程，完全依存在半封建性的半隸農性的土壤上。半封建性的土地所有關係及半隸農性的零細耕作規模，雖然限制了日本農業生產性的發展，阻止了日本農業的資本主義化，但卻提供了後進的纖弱的產業日本資本主義的確立條件。薩法洛夫說得好：「如果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改革）後，日本農業資本主義奠定了堅

固的基礎，如果因此產生了幾千有力的資本主義的經營，就不但由日本工業收回大半不付代價的勞動力，並且將由根底推翻了社會的金字塔……」（上引薩氏同書七十頁）。

日本半封建的土地關係與產業資本主義的交錯，表現在下列三種事實上：（一）日產業資本主義的半奴隸的工資勞動者的來源本在於近世農民尤其是隸農的轉化，（二）半奴隸性的產業資本主義的工資勞動者與半封建的半隸農的細小農民的聯結性，或相互規定的關係，及（三）日本農村充當日本資本主義原始積蓄的地基。茲分（A）半農奴制與資本主義的互相規定，及（B）農村地基上的資本原始積蓄兩項來剖述。

1. 半農奴制與日本資本主義。

日本資本主義特別依存於農村的根據，第一應先舉日本各種企業尤其是纖維工業的大多數勞動者是農民轉變的事實。大阪市社會局曾於一九二三年就纖維工業、化學工業、食料及酒釀造業、機器及器具工業、特殊工業（瓦斯及電氣）乃至其他雜類，工業的六個工業部門，九〇，一八九人的勞動者的先前職業，作過調查，其受過教育與未受教育的比率如下：

工業部門	受過職業教育者	完全未受教育者
纖維工業	二十二	七十八
機器及器具工業	七十	三十
化學工業	二十二	七十八
食品及酒釀造業	三十六	六十四
電氣及瓦斯等	五十四	四十六
其他部門	三十	七十

（注）根據上行薩法洛夫氏前書七九—八十頁。

完全未受教育的勞動者的前身，絕大多數是農民，在受過教育的勞動者之中，農民亦占一部分。農民在各種企業的勞動者中所占比率，除機器器具工業，及電氣瓦斯工業兩部門以外，皆占絕對多數。又據另一同樣調查，在所調查四一，四九〇人的勞動者之中，一八，〇九〇人是農民，占四四%，這個估量恐怕過小，但也已可觀的了。

其次，日本資本主義產業尤其是纖維工業的職工絕大數是農家的婦女充當的，這也是日本資本主義依存於農村的最大根據。一九二五年日本各部門工業中女工所占平均比率是五二·九%，在一八，七八一家工場當中，有九，八三〇家，擁有女工寄宿舍的設備，而在這寄宿舍住著五二九，五八八人的女工。其中五二四，二〇二人是從事於日本帝國主義支柱工業的纖維工業的勞動的。從事於纖維工業的勞動的女工總數，達七九一，五九九人，約占八一·三%。在這女工總數之中，五九一，八一五人是十六歲以下的幼工（據上引薩法洛夫氏同書七十六—七十七頁）。

這兩種事實不外乎證明：日本資本主義分解了舊時零細耕作農民的農業與農家日用手工業的結合，由農家奪去了自家消費用的手工業而代以養蠶業、質機紡紗工業、製絲業，及紡織工業。這四種新興工業的從業者，皆出自農民而與農民有互相規定的經濟關係。養蠶業的從業者是由中農重編的，目的在於農家生計的補充，明治三十二年約有二十二萬戶。質機紡紗工業的從業者是由貧農重編的，目的在於半隸農的生計補充。織物職工數在明治三十二年達八十一萬人。製絲業工業及紡織工業的從業者，都是由貧農的家族重編的半奴隸工資勞動者，目的大部限於半隸農的生計補充，前者服從於純粹日本型的特殊勞役制度，後者服從於工資低於印度殖民地工場手工業制度。這些資本主義工業的從業者，因其本身或其本家受高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十數倍乃至數十倍的高率佃租的剝削（參閱本文第一節中各國佃租的比較），自不得不在別一方面尋找補充生計的來源。找到上述幾種工作的農民的目的，因為是在於補充生計，所以能甘於極低賤的代

價。過高的佃租逼迫半隸農性的日本農民兼當沒有他例的極低工資的勞動者，又因為日本農民兼當工資勞動者所以佃租才可以格外高昂，高率佃租與低賤工資，因而半農奴性的農民與半奴隸性的勞動者，二者遂形成互相規定的關係。

日本資本主義支柱工業的纖維工業的發展，尤其是依存於農村的剝削。明治維新變革後，纖維工業的發展是最顯著最急速的，在日本各部門工業中占最要的地位。日本總輸出額四分之一是纖維製品，紡織工業（包括棉紗及布匹的生產）的地位，在生產價額之點占第一位。日本紡織工業在世界市場上正步著活躍優勝的前程。日本帝國主義的存立，依賴於這世界競爭力最雄厚的日本資本主義支柱的纖維工業，而纖維工業的則又依賴於半農性的農民家族，尤其是全靠農家的女兒們的剝削。

日本零細農因逼於過高佃租的支付，自己不兼作工業體系的勞動，就必遣送女兒到資本主義的工場去。第一，養蠶是農家生計補充最重要的來源，普通是由細農的婦女或幼童服務的。其次，質機紡織工業，同樣是由細農的婦女在自家操作的工作。再次，製絲工業及紡織工業的絕大多數從業者也都是農民的婦女。日本纖維工業是專靠農家婦女而發展起來的，纖維工業資本的利潤和妓業資本的收入有同樣高度，也有同樣的性質。其具體的條件就是工資的低賤及監獄式的寄宿制度。日本女工的工資不但極低，並且不及男工三分之二，甚至一半，「雇農每日三角二分，女雇農二角，養蠶女工每日得二角三分。其時（指一九一五年）到都市作工的人每日可得四角二分，製絲男工三角四分，女工一角八分。」（據 Joseph D. Auterler, *The Japanese Empire and Its Economic Condition*）。細農為著支付肥料或不得已而把女兒的勞動力賤賣。普通是由資本家工廠主借到百元、五十元、三十元、十元不等，而以女兒每月的極微工資攤還，也有每月分撥一部分工資給其父親的。女工工資的支付期普通在肥料或支付期，不是偶然的。為父親還債而以身體作抵押的細農的女兒，以借貸及勞動契約成立的時候開始，就步入一

種特殊的生活過程。每日勞動時間達十一時以上，沒有外出的權利，擁擠在小寢室的宿舍內。束縛在極不衛生的工場設備及強烈的勞動強度下的日本女工，普通經過一年半，至長二年即失去勞作能力而被解雇。即不死亦多墮落。日本死亡率之高在主要資本主義各國中占第一位；東京郊外暗娼的七〇%是以前的女工。（每千人的平均死亡率日本二一·四人，意大利一六·八，美國一二·〇，德國一二·九，英國一二·四，法國一七·四。以上引薩法洛夫氏同書一〇〇頁，「暗娼的情形，為東京警察的調查」。）

日本女工的這種勞疫制度，或許有人以所謂家族主義，日本資本主義的民族特點誇耀世界。甚至有人主張日本農家婦女之傭工不是為幫助家計而是為著她自己的嫁妝。這當然是掩飾和錯覺，是無根據的欺騙。實則日本女工在一工場連續勞動期間平均為一年半，在其開始工作以前，廠主借與其父親的金額平均三十元以上，女工每月攤還二元多，至期滿時除去回家的車錢，所剩實在太有限。

2. 農村地墓上的資本原始積蓄

日本半封建性的土地所有關係及半隸農性的零細耕作，是日本資本主義原始積蓄的源泉，日本產業資本主義乃至金融資本主義就是從這種源泉吸收養分發育起來的。

經過明治維新的日本布爾喬亞革命，雖然開闢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途徑，但其主要的因素卻是商業的高利貸資本。那時候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完成了劃時代的質的變化，因此，日本欲確立產業資本以與先進資本主義對抗，勢須特別需要強力的原始積蓄的準備。明治維新的封建土地所有關係的廢除，封建身分的解放，封建家臣團的解散，法律承認的農民自由，及農民土地共有耕地共有林野之官有及民有的分割，就是資本的原始積蓄的前提條件。其後，又因為保持國內市情及開拓國外市場的必要而與先進帝國主義對立，因而日本資本主義，更加壓抑國內勞動者及農民加強其封建的剝削，在日本資本主義初

期，農村的剝削尤其是重要，大體上可以分成四種形態

(一) 土地資本剝削下的原始積蓄

前節所剖述的日本土地所有關係，一方面被利用作日本資本主義原始積蓄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因為封建的高率佃租而再生產了封建的剝削關係。占絕大多數的日本佃農，支付著占總收成六八%的佃租，佃租的高率為世界資本主義的各國的特例。這不外乎是封建的剝削形態的殘留。日本佃租的基本形態，又如前面提過的，是「現物地租」，甚至於是「徭役地租」。這種地租形態，不但是封建的剝削關係的表現，並且隨農業生產性的發展而增高其封建剝削的程度。因為地租的現物數量即令沒有變動，亦可因為市場價格的增漲而實質上增大地主所得的貨幣價值（但在農業恐慌期及農業生產向下期，則又當別論）。

日本的高率地租不但表現封建的剝削形態，並且保持或加深封建的剝削程度。過高的佃租造成日本農業的零細耕作的基礎，形成過小農制。過小農制不足以容納都市工業資本不能全部吸收的農村過剩勞動力，愈發促進農民的土地饑饉。地主獨占土地，佃農爭奪土地。結果高率的佃租愈發增高，地主徵收了佃農的全部剩餘勞動，有時甚至收奪工資的一部分。於是過小經營的佃農愈發貧窮化，愈發爭奪耕地，其半農奴的地位也因而益發鞏固。

另一方面，高率地租又有促進地主「寄生化」的傾向，高率地租的存在，阻礙土地所有者或土地購買者的自己耕作，而只寄生食於地租。因為寄生食地主的利益比自耕農的利益大（參閱前面的分析）。地主的寄生形態還表現在工商業方面。地主由高率地租榨取所得的金錢，不利用於改良耕地改善經營上，而投資於都市的工商企業上，因而地租變形為銀行存款、債券及股票。即有投入農業的資本，也不是農業資本，而只是「土地資

本」。這種情勢阻礙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及農業勞動者的增大。農業布爾喬亞不出現為農業資本家而出現為地主，過小農民不轉變為農業勞動者而停留於佃農的地位。過高地租不但維持著零細耕種並且加以擴大再生產。日本半封建的農業生產關係依然以支配的力量而存在，地主在資本的支配權力下繼續封建的剝削，堆積資本的原始積蓄，造就產業資本的基礎。

(二) 商業資本剝削下的原始積蓄

農業部門的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與工業部門的高度資本主義的發展的矛盾，分解了農村的家內工業，而促農業經營變成商品生產。利用機械及動力的工業生產及殖民地的資本制大規模經營的壓迫，由農民奪去了酒、烟草、醬油、紡紗、製絲、菜子油等生產。貿易的發展也分解了從來的複合農業機構，使之單純化。國外資本主義的重壓，驅逐了原始產業的日本農業生產品，尤其是明治二十年（一八八七年）以後輸入品的壓迫，越過政府的農業保護壁壘而更使日本內地的農業機構單純化。例如棉花、藍靛等工藝皆直接間接為國外的輸入所壓倒，而米及生絲的生產因為是大宗輸出品，所以為日本農業所集中。一般過小農經營的最適應市場條件的農業，遂至最發達，轉化為兼營養蠶的「主谷農業」。

這種農業機構單純化的過程，就是農村生產狹隘化及購買消費相對地擴大化的意義，也就是自足自給經濟崩壞而變成交換經濟的意義。固然商品生產的發展是資本主義進步的過程，但是土地面積的嚴格限制與農村過剩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卻使商品生產最高形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採用不可能。農民雖被捲入商品經濟的漩渦中，而農業卻依然停滯於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下。其結果，農民一方面充當別種商品的購買者，他方面充當剩餘生產物的販賣者而參加於價格的競爭，陷於市場經濟的剝削之下。尤其是

在過小農制下，農業生產物不但不能保持平均利潤，其收入除扣各種費用之後尚不足以支付自己的工資。土地的耕作者，只由生產物價格中得相當於工資的部分。過小農經營的生產物價格，把工資部分評得極低。換言之，在過小農制占支配地位的地方，農業生產物的價格必然低下。

經由市場經濟的日本農民剝削，到金融資本階段上，更加強化。這在國內是由於卡特兒及托拉斯，所造成生產協定、價格協定乃至生產統制所產生的獨占價格，在國際上是由於抵禦國外資本主義的高率稅壁壘。卡特兒及托拉斯的市場支配，保持工業生產物的價格於農業生產物的價格以上，益加擴大二者的差額，置過小農民於高率的獨占價格的剝奪之下。肥料的卡特兒組織就是獨占資本剝削農民的顯例。

(三) 高利貸資本剝削下的原始積蓄

日本農業上信用一般皆集中於「土地信用」，換言之，只有高率地租的剝削者，才有告貸的信用，日本不通行農業信用。因此，擁有土地及家屋抵押力的中農以上的富農階級可以利用資本主義的信用制度，但在過小農經營者則必然地不得不依存於前資本主義的高利貸資本，其結果，農村的信用幾乎完全投於不生產的非農業方面。因為土地的投资只是地租剝削權的移動，而不是農業的投资。根據明治四十五年日本大藏省（財政部）理財局的調查，在負債總額七四六，〇三三，三一一元之中，銀行及保險公司的放款占二七·九八%，產業組合（即我國的合作社）的放款占二·九二%，其餘的部分占六·九一%，都是前資本主義金融業者的放款。其中，貸金公司及個人貸金業者占一六·六九%，私人放款又占三七·五四%。前資本主義的放款，尤其是私人的放款占絕大的比率。農村的利率自然難免過高：

利率	在總金額所占比率	在總債務者所占比率
一分未滿	二五·二%	二一·二%
分半未滿	四四·九%	四二·一%
二分未滿	一五·六%	二二·%
二分以上	四·三%	一五·七%

當時一般銀行的放款利率是九釐，而農村則大部分在一分乃至二分以上，雖說近年來農村的負債內容，有漸由前資本主義的放款改變為近代放款的傾向，但這並不是資本主義的資本克服了前資本主義的資本，事實上，一般過小農依然束縛於高利貸資本的剝削下，屈服於半封建的隸屬關係之下。

日本金融資本經過歐戰期中的積蓄，登上了日本主義的支配地位，同時，也急向農村猛進。根據昭和九年（一九三一年）七月關於全國負債實例的調查，各種放款機關的比重如下表：

信用組合	對負債總額的比率	對負債總戶數的比率
特殊銀行	三四%	八五%
賴母子講	二〇%	二三%
個人貸借	一八%	七三%
普通銀行	一四%	五四%
商店貸金業	六%	六%
道府縣鎮村	二%	三六%
		一〇%

（注）「賴母子講」就是我國的搖會、月會、銀會等金融通融的組織。

這在指示日本農村金融業的近代化，金融資本的進出。金融資本漸漸經由地方銀行及大地主以確立一般農民的政治支配。但是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必然強化資本的集中，資本的獨占過程就是在各種產業及企業的不均衡發展上以落後的產業及企業為犧牲的。於此，金融資本遂得以土地的抵押壓迫整個的農村。這裡含有都市剝削農村的最高階段的意義。農村終以「延付實施運動」及其他農村救濟請願運動，向金融資本反抗。在前資本主義的高利貸剝削之外，再加上金融資本的壓迫，日本農村充當原始積蓄對象的作用，有加無已。

(四) 明治初期的租稅與農村的剝削

近世一般資本主義的發展，尤其是工業資本的急速發展，是以農業為犧牲，以農村為最大的剝削泉源的。而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上的這種事實特別顯明，日本資本主義對於農村的原始積蓄，不但發動於私人，並且發動於擁有絕大強權的國家。日本資本主義政府運用租稅徵收方法以遂行其原始的積蓄，明治政府的「地租改正」就是原始積蓄的強力手段。明治六年地租改正後，日本各稅比率如下：

中央租稅大類別五年平均百分比比較表

(年)	實數 (千元)	地稅 (%)	商工稅 (%)	所得及相續稅 (%)	關稅及贖稅 (%)	其他 (%)
明治八、十二	五一、九〇四	八〇・五	三・一	—	四・三	四・三
同十三、十七	六〇、三三二	六五・六	四・四	—	四・四	三・八
同十八、二十二	七一、七五三	六九・四	三・八	〇・七	五・二	一・四

(續上表)

同二十三~二十七	一一三・三三三	七四・三	二・七	一・一	四・四	〇・三
同二十八~三十二	一二九・二五七	五八・一	五・五	一九	七・二	〇・一
同三十三~三十七	一五一・八七五	三三・五	六・八	五・七	一一・七	—
同三~四十二	三〇〇・二〇四	二八・八	九・八	一〇・〇	一三・九	—
同四十三~大正三	三四四・〇六一	二一・八	一〇・一	一一・四	一六・二	—
大正四~八	四五六・七〇八	一六・一	一〇・九	二二・八	一一・七	—
同九~十三	一・八一七・四七一	九・〇	一〇・六	二六・七	一二・一	—
同十四~昭和四	八九八・五三三	七・六	一〇・二	二六・二	一五・八	—

(注) 根據《日本經濟年報》第二輯八十二頁以後。

「地租改正」後的地稅(日本稱地租)占日本國稅八〇・五二%，一直到明治三十二年尚占五八・一%，農民負擔的多大，可以想見。市町村稅的地方稅亦有同樣情形，地稅後來雖漸減輕，但所得稅、酒稅、關稅、糖消費稅、營業稅、布匹消費稅，則反激增。這指示都市商工業的發展及財富所得額之集中於都市，所得額雖然集中於都市，但其租稅負擔率實質上卻還是低下。農村並且負擔上列漸增的間接稅，地稅的輕減即令於地主有利，而一般農民的負擔則相對地增大，隨帝國主義階段而來的財政膨脹，更加以種種形式轉嫁負擔於農民，都市商工業者與農民的負擔率的差額益加增大，農民每人租稅負擔比率由明治三三年至三七年平均的一〇〇%逐漸激增，明治四三年至大正三年平

均為一八〇・二，大正九年至十二年，平均更增至四五六・八。同時期的米價則只由一〇〇％漲至一四二・八，漲至二八六・八。收入漸減而支出漸增，相差幾達一與二之比。（據《日本農業恐慌》一一三頁）。日本農民及商工業者的租稅負擔懸隔之大，更可證明經由法律的農村剝削。

福島縣農工商負擔調查（大正十一年）

	農業者	商業者	工業者
租稅負擔總額	一・九八〇（元）	八三五（元）	五七一（元）
對收益的負擔	〇・三三六五	〇・一四八九	〇・一〇二六
負擔率的比較	一〇〇	四五	一三

（注）木村靖二《農業恐慌論》一四〇頁。

在奇重的農民負擔的租稅當中，特別加重貧農的負擔。地方稅（包括道府縣稅及市町農稅）不但在總稅額占很大比率（自耕農八一・二％，自耕佃農八五・一％，佃農九七・三％），佃農的負擔又大於半自耕農，更大於自耕農。因為地方稅包括著貧農所負擔的家屋稅、家屋附加稅、雜種稅，及「戶數割」的項目在內。地主及富農負擔的地稅雖然實質上輕減，而下層貧農負擔的「戶數割」（注一）倒反增加（對於全道府縣稅的比率，自耕農二・三七％，自耕佃農二四・八％，佃農三五・二％，對於市町村稅的比率，自耕農五・九六％，半自耕農六一・二％，佃農六九・七％）（以上兩項數目皆據小池基之著《日本農業問題，生絲問題》二十八頁計算的）。日本資本主義之依存半隸農的細小農，經由政府的剝削更有力量。

四、軍事機構促現的日本資本主義

歐美先進資本主義打開了鎖國三百多年的日本關門時，日本各種的資本主義關係，尚未充分成熟，尚不足以自己破開封建的外殼。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雖然已有高度的發展，但其自身卻缺欠轉變為產業資本的各種條件。因此，封建的日本要在倉惶間轉變為資本主義，自然需要人工的催生及補強。所以軍事機構所完「催生婆」的作用特別顯著。日本在明治維新的當時，內困於布爾喬亞力量的纖弱，不足以自身生長為健全的資本主義，外逼於世界資本主義的變質所伴來的先進資本主義的侵犯，時時刻刻阻礙著後進資本主義日本的發育，並加以淪陷為殖民地的威脅。在這種情勢之下，明治政府終不得不自己負起遂行資本的原始積蓄的任務，創出以軍需工業為中心的日本資本主義工業。換言之，從其胎身即已發育不完全的日本資本主義，企圖一躍而與先進資本主義分庭抗禮，並駕齊驅，就不但需要人工的催生，並且需要人工的培養。明治政府就是專靠軍事機構的強力完成了這種任務。這點就是日本資本主義之所以帶上軍事特質的原因。

日本資本主義是在半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及半農奴的零細耕作的土壤上，完全依靠這種強力的軍事機構的催生而誕生並發展起來的。日本資本主義從其母胎即已帶來許多弱點及矛盾，為補強這些弱點及克服這些矛盾，無論對內或對外，皆需要強力的常備軍、嚴密的警察網，乃至軍備警察機構上所附帶的各種現代設備。由這種動機自然首先發動軍事工業。由軍事工業的發生促進了基本動力基本原料，及其他現代工業的發展。即如包括衣料工業及食料工業的輕工業，也在同樣激發之下發展的，並且是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的。日本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史，不外乎是軍事工業的發展史。

關於日本資本主義的軍事性，還可以舉日本幾次對外的戰爭及國家權力與財閥的結

托來說明。日本每經一次對外的戰爭，例如中日戰爭、日俄戰爭及供給日本乘火打劫的機會的歐洲大戰，則不但獲得了巨大的賠款，用以補強帝國主義財政的缺陷，增進軍事工業的發展，並且促成神速的資本集積和集中，堆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基礎。他方面，最初由政府官營而現在仍以官營占巨大比重的日本軍事工業，經由官創民承，及政府保育的關節，又創設了民間獨占資本乃至巨大財閥。軍事工業即在創設了獨占資本及財閥之後，相互間依然以工業的軍事統制與獨占資本互相依存的形態結著不解之緣，日本政府永久加以培植及扶持。

(一) 軍事機構的必要及其創設

1. 軍事機構的必要性

世界各國為著維持資本主義的秩序皆常備著龐大的軍隊及嚴密的警察網，而在日本資本主義，這種需要更加逼切，這種設備也更加顯著。這是因為日本資本主義自其誕生即已充滿著複雜的深度的弱點，需要外力的補強。在日本資本主義的弱點當中，至少可以舉出下列最主要的幾點，而軍事機構的必要性也即由此產生：

(1) 布爾喬亞的纖弱上面說過，日本的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雖然在德川幕府末年即已有高度的發展，但其本身力量則尚不足以自己轉變為產業資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一前提條件是巨大的資本積蓄，而明治維新前後的日本布爾喬亞並未充分具備這種力量，所以日本要由封建的生產關係轉變為近代資本主義，勢須經過一度強烈的人工的資本原始積蓄，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一條件。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明治維新時「由上而下」的革命方式，封建勢力的殘存，及布爾喬亞和地主的妥協。

(2) 半封建制的地基因為日本布爾喬亞的纖弱，所以日本資本主義不能根本擺脫封建的本質而反再生產並且擴大了半封建的剝削關係。半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及零細的過

小農經營，造就了半農奴大眾；由農村流出的農奴在未得到解放以前即又被編為半奴隸的工資勞動者。日本在這種半農奴的半奴隸的剝削關係下樹立了，並且維持著資本主義。他方面，由明治政府領得補償金的封建領主及富裕的商人變成兩層寄生蟲——寄生於地租及債票。

(3) 國內市場的狹小日本國內市場之狹小，與其說是限於面積及人口，不如說是限於半農奴的過小農及半奴隸的工資勞動者的購買力過小。一國商品的最大消費者是工農大眾。而日本工農則過著動物程度的生活，日本著名的消化器病，即胃腸病，據說是由於粗惡的食料；以食糖國民著名的日人砂糖消費量尚不及美國每人消費量八分之一。日本國民消費力因其購買力之如此微小，日本商品安得不過剩，日本市場安得不狹小？

(4) 國內資源的貧乏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還依存於豐富的資源，鐵煤之有無幾乎成了近代重工業興衰的標準，羊毛棉花之豐歉也為紡織工業的決定因素。日本的煤藏量極少，鐵藏量幾乎沒有，羊毛完全仰給澳洲，棉花則仰給於中國及印度。在日本現代資源之中只水電力比較豐富，但是動力生產量，無論自總量說抑自比率說，仍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占最低的地位。每人一日的動力生產量指數，美國一三·一八，英國六·六五，德國六·〇四，法國四·三五，日本則只有一·七五（據博博夫著《日本之技術的經濟的基礎》三十八—三十九頁）。

(5) 工農不斷的騷動、資本的原始積蓄不夠、國內市場狹小、天然資源貧乏的日本資本主義，只好同人力方面來求補償。德國人力的每日生產量在總動力生產量中只占五·六%，而日本則占至一九%之巨；反之，日本工資之低微則為世界的異例。在資本的原始積蓄的苛刻剝削下的日本工農，自然要不斷地發生騷擾，尤其是明治改革的初年。

(6) 資本主義發展的遲後日本資本主義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是最遲後的，至少要遲

後一百多年。在日本資本主義誕生的時候，歐美資本主義已漸由量的發展到質的變化，帶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後進資本主義日本終於受了四十多年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關稅自主權的旁落，從一八五八年繼續到一八九九年。歐美帝國主義的束縛和壓迫，更加增大日本資本主義的弱點，逼著日本不得不急圖反抗。

2. 軍事機構的創設過程

從上述幾種弱點產生(1)鎮壓國內農群眾以維持並增強半封建的剝削關係，(2)反抗先進強國的侵略，擺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3)侵略落後的民族，鎮壓殖民地民族運動，以擴充市場保持資源的三種必要。日本資本主義逼於這三種必要而欲達其健全的發展，最先要求龐大的嚴密的軍事警察機構的整備。軍事警察機構的整備表現於資本主義產業發展上的就是軍事性工業的創出過程，細分之可得軍事工廠的開設、輸送運輸機關及重工業的發展。現在分述於下：

日本明治維新政府首先收用幕府及各藩的造兵制艦的設備而加以統一，再在近代的裝備之下加以編制，建築了軍事工廠的基礎。幕府末期的造兵設備，是以幕府直轄的兵工廠為最宏大而且完備，各藩之中以反抗幕府的雄藩，薩、長、土、肥四藩的兵工廠為比較發達。製艦設備有幕府直轄的工場及薩藩的工廠。明治政府則以幕府直轄的工場為中心集中各藩的設備，以創設軍事工廠，形成日本軍事工業的樞軸。陸軍工廠之中，最先著手創設的是東京炮兵工廠，其前身是幕府直轄的小石川關口製造所，明治元年並合各藩各所的造兵設備而成今日的炮兵工廠。這個兵工廠完成於西南戰爭（討伐西鄉隆盛之役）之後。日本政府又於明治三年，選擇幕府長崎製鐵所的若干機器為基礎，創設了大阪炮兵工廠。東京炮兵工廠生產小槍及其他輕兵器；大阪炮兵工廠則生產大炮等重兵器。其次，就海軍工廠加以考察，明治政府對於造艦方面的經營較遲於選兵，即在西南戰爭之後，造艦計劃實質上仍未就緒。當時，只有鹿兒島的大炮製造所（明治四年收用，

後來改建海軍造船所）、橫須賀造船所（明治元年收用，後來的海軍工廠）、長崎製造所（明治元年收用，後來轉賣人民民營）、兵庫造船局（明治四年收用，後來賣給私人）、石川島造船所（後也轉賣私人）等。至若吳兵工廠及佐世保兵工廠竣工，而造艦設備實質上略為整齊，無疑是中日戰爭以後。

輸送傳達機關以鐵路、電報及電話為最重要，都是軍事警察的國家強力發動的中樞機構。明治政府自軍事及治安的觀點，自與創設軍事工廠同時，在官營形式之下創辦了輸送通信工業。鐵路雖說在明治初年即在官營與民營計行的形式下發展過來，但是整個鐵路計劃皆在軍事的考慮之下作成的。這自東海道線鐵路計劃之採用軍部的建議之點即可了然。電報及電話事業，更不消說，自始即自軍事警察的觀點由政府經營，並處於軍事統制之下。

日本政府即創辦了常備軍及警察網等國家強力的物質基礎的軍事工廠及輸送通信工業，自然更需要充當基本工業的重工業。明治政府首先集中幕府及各藩經營的重工業，加以改築而創設了龐大的官營重工業的系統，完成了重工業的資本主義的改編。礦山雖在明治二年曾經一度解放給民營，但到明治五年又以《礦山心得書》集中採礦權於政府手中，其次再斷行重要礦山之原始的收用及官辦。他方面，在工業工場的一般部門，運用由農民收奪的巨額地稅收入，在廣泛的範圍輸入最新的設備而由政府官辦。製鐵工業附辦於軍事工廠內，機器工業也附設於軍事工廠及官營模範工場。

（二）軍事性工業的比重及其統制

1. 軍事性工業的絕大比重

日本軍事性工業適應半封建性日本資本主義的需要而產生，其後又在半封建的剝削土壤上急速發展起來，終於構成日本資本主義產業的骨骼。日本資本主義首先引人注意

的特殊性，就是主要的產業資本直接間接為軍事性工業所培育所促進，即如現在處於日本經濟支配地位獨占資本乃至金融資本，也未始非在軍事性工業的搖籃中生長的。因此，日本軍事性工業的神速發展，其在日本工業構成上所占過的大的比重，及其與獨占資本乃至金融資本的結托，又形成了日本資本主義最大特殊性之一。

占工業生產的絕大比重的日本軍事性工業，固然有官營工業與民營工業的兩大種類，但是首先發展起來的，是官營軍事性工業。日本官營的軍事性工業，首先引人注意的，就是官營軍事工廠的擴充及其發展的神速。明治政府在維新變革後，運用由農民剝削得來的巨額地稅，銳意擴充軍備，創辦軍事工廠。明治十年受到日本西南戰爭的刺激之後，日本軍備更加急進。明治十五年遂樹立了《軍備大擴充計劃》奠定了神速發展的基礎。中日及日俄兩次戰役獲得巨額賠款及主要資源，其發展遂趕上世界的水準。日本官營軍事性工業發展之神速，單就軍事工廠的發展即可窺知大概。中日戰爭前（明治二十六年，一八三九年），與日俄戰爭後（明治三十九年，西曆一九〇六年），日本軍事工廠的發展狀況如下：

	中日戰前	日俄戰後	增加率(%)
軍器工廠職工數(人)	九,五八四	八九,二八六	八三一
陸軍工廠職工數(人)	三,八三二	三八,六二九	九〇八
海軍工廠職工數(人)	五,七五二	五〇,六五七	七八〇
軍艦工廠原動力(馬力)	二,〇八四	八〇,七二八	三七七三
陸軍工廠原動力(馬力)	九五四	四八,〇七二	四九三八

(注) 根據《帝國年鑑》第十三回及第二十六回本。

軍器工廠（包括海軍工廠及陸軍工廠）的職工數增加了八倍多，原動力的增加，尤其是神速，約達三十八倍。其中，陸軍工廠的發展速度高於海軍工廠。這種神速發展，後來因為民營軍事工業之部分的民營化，及海軍工事之歸民營工業承辦，而於發展比率上略呈緩和狀態。但是歐戰前後猶有相當的發展，即在歐戰停後至最近期間，官營軍事工業的發展仍未停止。歐戰前至戰後期間，陸軍工廠職工數的增加率是三四%，海軍工廠增加率是四〇%（據《帝國年鑑》第三十三回及第三十八回）。又歐戰停戰後直至昭和六年，軍事工廠（包括海陸軍）的職工數，又增加五一·五%（據圖乾治《日本軍需工業論》四十五頁）。

其次，帶有軍事性的運輸通信工業的最重要之點，是國有鐵路的發展及電報電話事業的官營，日本鐵路在明治初年非常幼稚，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年）鋪設的東京、橫濱間的鐵路，除貨車及客車車皮外，一切技術、軌條，及車頭皆仰給於英國，至明治十二年始漸能自己建築路線、軌條及車頭的生產，至明治四十年始能自給自足。這完全由於明治三十九年頒布的《鐵路國有法》，把一切的鐵路經營收歸國營。日本鐵路的發展狀況如下（單位：基羅米達）：

(年)	國有鐵路	私設鐵路	合計	每年增加數
一八八四—一八八五	二九二	一三〇	四二二	—
一八九四—一八九五	九三四	二,四七四	三,四〇八	二,九八六
一九〇四—一九〇五	二,三五五	五,二〇一	七,五五二	四,一四四
一九一四—一九一五	九,一九四	二,三三四	一一,五二八	三,九九六
一九二四—一九二五	一二,一六一	四,五九五	一六,七五七	五,二三九
一九三二—一九三三	一五,三七一	七,一四三	二二,五一五	五,七五八

（注）根據蘇聯幾曼《日本經濟》九十五頁列表。

日本鐵路運輸從一九〇六年（鐵路國有法）頒布始完全而且徹底地軍事警察機構化，其後的發展亦始急速。除上列路線的延長外，蒸汽車頭的數目更由一九〇五年的一，六四四輛增至一九三一年的五，一七四輛，約增五倍；旅客運輸數由一九〇五年的十，四〇〇萬人增至一九三一年的一二五，三〇〇萬人，約增十二倍（據同書九六頁列表）。

至若日本的通信事業（電話、電報），因其自始即歸國家經營，所以獨占性及軍事性特別強烈，其整個發達即為整個軍事性的比重。

充當上述日本軍事工業及運輸通信工業發展基礎的煤鐵工業，也是在國家經營下發展起來的，占軍事統制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節目。製鐵工業的生產，從八幡製鐵所的創設始有顯著的發展。明治二十六至二十八年日本從外國輸入的銑鐵約占國內生產的一·七倍，鋼鐵輸入額更達七十五倍，明治二十九年八月始得官辦的形式創設八幡製鐵所。其後更利用中日戰後獲得的大冶鐵產及日俄戰後獲得的滿鮮鐵產，而官營的八幡製鐵所不但不占日本鐵產的壓倒地位，其生產額占日本內地總生產額八〇%，且能供給日本需要的大部分。八幡製鐵所的出產三〇%為陸海軍所採用，並且製造兵器及爆炸物原料，宛然是一個準軍事工廠。八幡製鐵所的軍事意義及日本製鐵工業之軍事統制，於此可知。

日本煤業的資本主義的經營，最初由政府以官營形態開始，也是鍵鑰產業帶著軍事性的更明顯的證例。明治六年日本政府如官營三地及高島兩處煤礦，前者在明治二十二年賣給三井，後者在明治十四年賣給三菱，都是幾乎無價的官賣。明治二十一年以後，筑豐煤礦創設後，日本煤產始有飛躍的發展，再經過中日及日俄兩戰役殖民地煤礦的占得，日本國內煤產更激增了將近四倍。日本煤產的特色是軍事統制與財閥的獨占。

日本軍事性工業的重要性的另一面，就是在日本一般工業生產乃至全部產業機構上占壓倒的勢力和指導的地位。從縱的量方面來檢討日本軍事工業與民營工業（其時大都

限於纖維工業的)發展情勢的比較，則中日戰爭直前(明治二十六年)到日俄戰爭直後(明治三十九年)的期間，民營工廠的職工總數，只增加一一四%，而同期軍器工廠的職工總數則增加了八三一%，陸軍工廠的增加率尤其大，約為九〇八%。再從質的方面看，日本軍事工業又在產業資本確立期占一般日本產業生產的指導地位，一般生產的技術皆依存於軍事工業，形成顛倒的關係。這不但是陸海軍工廠的製鐵業尤其是機器工業的優越，並且是一般民營工業的生產機器皆依存於軍事工廠生產的證據。

日本軍事性工業的比重還可以由官營工業在民營工業中所占比率看出。國家資本在全國企業資本中所占比率即在日本一般產業已經充分發展的今日，還是很高，平均為三〇·四%，其中，金屬工業占四九·七%，機器器具工業占二〇·六%，印刷工業占三一·一%，鐵路占七九·〇%(據森喜一著《日本金融資本政治的解剖》一六六頁所載昭和五年度預算參考著書及會社統計表)。官營軍事工業的資本總額，因為是秘密性，有不發表的部分，所以難知其確數，下表只指示其大概而已。

陸海軍直營工廠的資本規模

陸軍	陸軍造兵廠(千元)	一四二,二五九
	千住製鐵所(千元)	四,七二二
海軍	海軍工廠(千元)	二九,八〇五
	火藥工廠(千元)	七,七三五
	燃料廠(千元)	一一,五四三
合計		一九六,〇五四

(注)根據鈴木茂三郎《日本財閥論》四二七—四二八頁的數目編製的，海軍工廠的資本未發表，不得已姑以作業費充當。

從上表可知官營軍事性工業規模的大概，但此外尚有國家資本與財閥資本合辦的特殊公司：南滿鐵路公司，公稱資金八萬萬元，滿鐵資本系統的昭和製鋼、滿洲化學、奉天造兵所，及日本航空輸送（公稱資本金，一千萬元）、國際電話（一千萬元）、日本無線電話二千萬元、北樺太礦業（一千萬元）、北樺太石油（二千萬元）等公司及日本興業銀行系的川崎造船所，神戶造船所等等（據鈴木同書四二八—四二九頁）。

日本軍事性工業的龐大，從其官營產業的收入亦可推知一斑，若拿來和資本主義各國比較，其為政府的統制事業益加明顯。日本國有財產的總額是八五九，三〇〇萬元（據鈴木同書五十五頁昭和九年資料），而一九三一年各國官業及官有財產的收入在歲入總額中所占比率，日本是三九%，意大利一八%，英美德法六一—二%（據圖乾治著《日本軍需工業論》一四二—一四三頁），日本在各國中占第一位。日本官營產業的主要部分是由陸海軍軍事工廠、國有鐵路、國營通信事業，及八幡製鐵所構成的，完全是軍事機構。於此，既可見日本軍事機構的龐大，又可見政府後制之周密。同時，也可發見官僚的封建勢力存立的基礎。

2. 財閥軍事性工業的統制

日本軍事性工業不只限於官營工業，民營軍事性工業也占很大的比重。日本目前整個經濟系統是在幾個巨大財閥的支配之下，而財閥資本除了三兩個少數財閥（例如川崎、山口、根津等）此外，都以軍事性工業的經營為主體。國家權力對於財閥工業，尤其是軍事性工業，最初加以培植，其次加以援助。巨大財閥就是在這過程中形成的，民營軍事性工業也就是在這過程中被收羅於政府的統制網之中的。

前面述過，明治初年，日本政府運用由農民剝削得來的巨額地稅，使用由農奴轉變的半奴隸的工資勞動者創辦成功許多軍事工廠及其基礎的重工業，不久大多以極廉價錢

——幾近於無償轉賣給三井、三菱、古河、藤田、田中、川崎、淺野等人，創造了巨大的財閥。這是日本資本原始積蓄的又一特質。日本政府一方面以極廉價錢賤賣官營基本工業乃至軍事工業給民間，或予以莫大的獎勵金的援助（如最近山下、岡崎及岸本等財閥的海運業的船舶，都是日本政府以非常時的準備為名目賦與巨大的造船獎勵金造成的）創出巨大財閥軍事性工業資本；他方面又把他們收羅在軍事統制的系統之下，造成整個軍事機構的伸縮性。

日本政府不但創造軍事性工業的巨大財閥，並且時常加以援助。日本政府對於財閥軍事性工業的培植，大體上採取三種形態：①免稅及獎勵金的援助，②輸入品高率關稅的保護，③經營上警察及軍隊的監督。在這種優厚的培植之下，日本資本遂得以原始積蓄的形態膨脹起來，終至形成今日這樣不相適應的龐大財閥資本及其支配。

日本巨大財閥的軍事性工業，以三菱財閥及住友財閥所經營的為典型。三菱完全支配的軍事性工業，包括礦業、機器工業，及化學工業，公司總數為十九家，公稱資本為四二，五五〇萬元。此外尚有海運業，三家公司，公稱資本一一，九二五萬元（據鈴木茂三郎《日本財閥論》四三四頁）。住友財閥尤其把生產的整個基礎置於軍事性工業上，住友財閥第一種資本（即直接隸屬的資本）——一家公司，可以分為兩大部類，其一為金融業，其二為軍事性工業。金融業（住友銀行、住友信托公司、住友生命保險公司）的公稱資本合計，不過九，一五〇萬元，而軍事性工業（包據鐵鋼工業、煤礦工業、化學工業）的公稱資本總額，竟達一〇，五五〇萬元（據鈴木氏同書四四五頁）。住友財閥更以九·一八事變為契機而更加活躍起來。其次，三井財閥對於軍事性工業的支配，也不在三菱及住友之下，同樣地普遍支配著軍事性工業的各部門。尤其是大部分煤礦的支配（資本二〇，〇五〇萬元——上引《日本軍需工業論》）握於三井財閥之手，是三菱及住友所不及者。所不同者，只在於三井財閥對於軍事性工業的支配是以支系資本的

形態進行的罷了。此外，還有久原、古河、澀澤、森、大倉、大川、田中、淺野、藤田、安田、川西及中野，等等財閥，皆以軍事性工業為其經營的主體。日本財閥不但個別地支配著各部門軍事性工業，並且在相互之間結成卡特兒的獨占組織，以行其完全的支配。日本幾種主要的民營軍事性工業，可以說幾乎完全在幾個巨大財閥的支配網之中，這種情勢在九·一八事變後更加發展。例如鐵鋼工業，政府打算聯合以前的製鐵資本再網羅所有的大財閥加入，以成立一巨大組織，以與「滿洲昭和製鐵所」並立，形成日本軍事統制的骨幹。又如金銀銅的生產，只三菱、住友、古河、藤田及日本礦業公司五家即已占絕大比率：金占總生產七三·二%，銀占七九·一%，銅占九一·三%（飯田清三《日本主要產業論》一〇九頁）。機器工業總資本的六〇%及占全國造船力八〇%的八大造船公司，皆為財閥所支配。此外，新興的化學工業，及基本重工業的煤業上，財閥的支配力量尤其大。

注釋：

注一：「戶數割」是日本特有的地方稅，是以量所得額及財產賦課的一種人頭稅。

原載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九月《戰時日本》

日寇南進前的財政狀況

自最近日寇的外交手勢及軍事布置看，日寇軍事南進的野心更加暴露，但是再自日寇本身的力量加以檢討，則問題不如是簡單。柏林的司令台固然連三接四地催促日寇軍事南進，日本陸軍行動派及其支持下的政府，亦要藉軍事南進轉移內政的危機。但若德盟的攻勢未必有必勝的把握，日寇軍事南進後將更深陷其另一「健足」於如何地位，且看日寇目前的財政狀況，也可以明瞭大半。

一、戰時財政與公債

戰爭是國家的最大開銷，是人類社會的最大浪費。這正如病痛之於個人，往往將數年乃至十數年的積蓄，全部花費於醫藥上，有時甚至於要向戚友，告貸巨債。所以病痛在個人是非常時，同樣，戰爭在國家也稱為非常時。

非常時的財政是逸出軌道之外的，所以入不敷出的赤字，常以意想外的大數目出現。個人的財政原則，是「量入為出」，到人病痛這樣的非常時期，也就不能不改變原則為「量出為入」以隨應個人救急的必要，銷費過去的積蓄或借債。但是個人財政，無論怎樣變通，還要受「量入為出」的原則的嚴格限制，借債力還是有限。而國家財政平時的「量出為入」的基本原則，在戰爭時期更要發揮到極度。再者國家的積蓄與個人的積蓄不同，除國家經營事業十分發達的國家外，所謂國富的積蓄大部分皆集中於人民手裡，平時都是需要多少歲出，就預算好多少歲入，積蓄非常有限，所以入不敷出的差額，達到意想外的數目。在這個時候，國家就要以非常的手段，籌劃歲入的增加。其方法固非

常之多，如增加租稅、強徵人民財產、鼓勵人民獻金、增強法幣等等。但其中最主要的方法，要推發行公債。

發行公債是國家非常時候籌劃財政的最主要而且最有效的辦法，其他的方法皆有極嚴格的限度。例如增加租稅，一來因為原有租稅項目不能違背過去的慣例而無所限制的增加，二來因為新設的稅目不能過繁，所以租稅的增加在非常時也自有限。再如徵用人民財產，雖說和增加租稅，性質稍為不同，其對象只限於一部分人民與一部分物質，但惟其如此，所以數目不能太大，再加以私有財產制度的限制，強制徵用就無法儘量發揮，除非是在制度不同的國家或決心實施非常時國策的國家。勸誘或鼓勵人民獻金，雖然也是戰時籌劃財政的有力辦法，但是人民獻金只限於戰爭初期爆發時或戰爭勝利時比較有效，絕對沒有持久性，且因為沒有強制性，效用就不能太大，特別是人民覺出戰爭的不合理性時，獻金的作用就完全消失，如在日本強盜這次之對我侵略戰。又如增發法幣，以增加財政收入，也是各國所常用的方法。但法幣增加超過市面的需要時就必然引起通貨膨脹，若準備金過度減少時就會釀成惡性通貨膨脹，倒會影響國民經濟及人民生活，貽害及於作戰力量。況且戰時增發法幣，普通皆以公債為準備金，這又有待於公債的作用了。因此，無論那個國家，在戰爭時期總是發行多種巨額的公債；公債之中雖有內債與外債之分，但在戰時因國家對外信用的降低，故皆集中於增發內債，以加重本國人民的負擔。素患貧血症的日寇，也莫不採用公債政策，以為籌劃戰時財政的主要方法。

二、日寇侵華戰費

戰時費用之膨脹，主要的由於戰費的激增。日寇的侵華戰費雖不若大規模閃電戰及拚命抵抗的歐洲參戰國，特別是英德戰費之巨，但較比過去的甲午戰役、日俄戰爭，

乃至上次歐戰，卻又多得。據白崇禧將軍的估計，日寇這次的對華戰費，已達一六〇億日元（十一月十四日在中樞紀念周報告）。只據已發表資料，日寇此次戰費累增如下：第一次先從大藏省第二預備金項下支出一千萬日元。隨後又向第七十屆臨時議會提出九，六〇〇萬元的臨時軍費的預算。迨八·一三全面戰爭開始後，又向第七十一屆特別會議提出四億餘元的臨時軍費預算。但是戰爭愈益擴大，「現地解決」與「不擴大」的希望完全幻滅，遂又於九月間提出二十億餘元的預算，一九三七年（戰爭第一年）三次戰費共達二十五億餘元這是用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底截止的預算。是則六個月間（八月至翌年一月底，因八·一三以後才算入於大規模戰爭階段），每月平均共費四億餘元。以後每年的戰費大略以此數為標準。

日寇侵華戰爭的第二年度（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一月底），戰費預算超額又達四八五，〇〇〇萬元。日寇原定最低限度，在這一年度內逼迫中國屈服，所以孤注一擲，通過如此巨額戰費，但是戰爭並不如其幻想結束，而且戰場愈弄愈大。日寇政府此時已覺到戰爭之持久化，又為欺騙其國民及安定社會計，特在一九三九年度預算內（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一月底），雖把戰費預算減至四六五，〇〇〇萬元；一九四〇年度（一九四〇年二月至一九四一年一月底）的戰費預算，又減至四四六，〇〇〇萬元。但是這個數目是不夠開銷的；所以本年度戰費預算（即所謂軍事特別費），又增加至四八八，〇〇〇萬元（據二月十一日東京路透電）。實則戰費還不止此數，因為與戰爭有直接關係的費用皆較前增加，即預算新增加的主要項目如軍事充實費（四億多元）、傷亡兵之醫療撫血費（一億多元）、生產力擴充費（二一，七〇〇多萬），乃至海運振興費、民航事業振興費，等等，皆是準戰費，三年半的戰費尚不只一六〇多億元啊！

日寇自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來，不但戰費與年而俱增。即一般會計的歲出預算，更是飛躍的增加。茲列戰爭以來一般會計歲出累年比較表如下（單位千元）：

一九三七年	二，七〇九，一五七
一九三八年	三，二八八，〇二九
一九三九年	四，四九三，八三三
一九四〇年	六，〇九七，三三一
一九四一年	六，八六三，〇〇〇

據日文《國際經濟週報》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面數字加上所謂特別列軍事費，才是日寇戰費真實面的暴露。

三、日寇國富與國民所得

國家的支出，不消說都要靠國民負擔，在戰時財政龐大而當時的國民所得負擔不起時，就動用過去的積蓄與未來的債務，前者與國富有密切關係，後者就完全是公債的問題了。

日寇一向的國富與國民所得，皆不甚充裕，國富總額是一，一〇一億元（一九三〇年），而美國國富總額為八，八〇三億元（一九三二年），英國為一，七七六億元（一九三〇年），蘇聯為一，二二七億元（一九二四年），法國為一，二六六億元（一九二五年），日寇列第五位。若自每個國民的所有額言，則日寇又降為第七位，每人只有一，七一〇元，比之加拿大每人八，七七〇元，美國每人七，〇五二元，英國每人三，八七三元，實在相差太遠了。

至於國民所得總額一九三五年為一，四五三，二〇〇萬元，不及美國一八，七四六，

五〇〇萬元（同年度），蘇聯一六，一一五，〇〇〇萬元，乃至英國的六，七〇一，一〇〇萬元（一九三五年）多多，固不必說（皆據日本內閣統計局編《列國國勢要覽》）即就其本身近年來的國民所得考察，也不過如下表：（單位百萬元）

一九三四年	一〇，六三六
一九三五年	一四，五三二
一九三六年	一四，〇一六
一九三七年	一六，二九八
一九三八年	二一，二九二
一九三九年	二五，四三二

（注）據上引《國際經濟週報》。

九．一八侵占東北以來，日寇國民所得雖然年益增加，但是國家經常支出的增加速度高出國民所得一、二倍以上，加上戰費，日本國民自然負擔不起了。本年度的預算總額共達一，二八七，〇〇〇萬元（二月十一日路透電），若以一九三九年度の國民所得總額二，五四二，二〇〇萬元充用，所剩不過一百多億，但是國民又不能不吃飯不穿衣服如「仙人吃霞衣樹葉」（日人之言），日寇的財政怎樣能不虧空呢？若以一九三九年度の國民所得總額二，五四二，二〇〇萬元為標準，由七千多萬的日本人來分配，每人只能分得三六三元一角多。若用以充當生活費，每人每月平均也不過三十元，這不能不算是動物程度的生活了，如何能有力量去負擔巨額戰時財政呢？好在日本帝國主義有其壓榨的妙方與階級剝削的存在，戰時財政始能勉強維持下來。但是任何天才的財政家，皆無辦法變無為有，所以日本近年來的財政無不年年虧空，其虧空數目並與年俱增。這

就是日本的公債問題及由公債派生的許多問題的核心所在了。

四、激增中日本公債

日寇公債問題自九·一八以後就年益嚴重，同時也就上了日寇的政治日程。九·一八事變前的日本公債總額已達六十億元，其後因為財政每年虧空七、八億元之多，一般人皆覺得日本國民不能繼續負擔下去，所以很多人主張緊縮政策，加以調節，最著名的事實就是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公債以六十億元為最大限度的民政黨內閣的主張，及著名財政家高橋是清藏相的百億公債亡國論。但在軍事性的日本帝國主義，軍部常占優越的地位，並常製造「事件」以威嚇並強制政府執行他們的政策。所以民政黨公債政策的六十億元最大限度，為九·一八事變所衝破，其增加情形如下（百萬元）：

一九三一年	五，九五五
一九三二年	六，一八七
一九三三年	七，〇五四
一九三四年	八，一三九
一九三五年	九，〇九〇
一九三六年	九，八五四
一九三七年	一〇，三八九
一九三八年	一二，八一七

（注）據日本金鋼鐵社《經濟統計年鑑》。

九·一八事變突破了六十億元的最大限度。七·七事變又突破了亡國的百億公債線。其後更以大數目累年增發如下：一九三七年增發十五億元，一九三八年增發四十三億元，一九三九年增發五十三億元。一九四〇年又增發六十七億元。本年度因預算額激增至一，二八七，〇〇〇萬元，預計發行公債額，將達七八七，〇〇〇萬元（二月十一日東京合眾電）。這些的數字的累積，都是日寇侵華戰爭的成績。日本太平洋風雲又急，外傳三十二星期內香港就要發生激變，假定日寇另一隻腳再伸入太平洋去，海軍戰費當更較陸軍戰費為多，公債的急激增加，更無可避免。

日本戰費的激增逼得日本政府不得不拚命發行公債，但是戰時費用不獨限於國家預算案上的特別軍事費，所以可能增加公債的原因，還有直接間接與戰爭有關的項目，其中以生產擴充費為最顯著。為著支持戰爭而加緊生產，特別是軍火工業的生產，軍火工業生產雖有官營與民營，皆受政府的支持或獎勵與補助，於是生產擴充費大增。日寇此項支出，自侵華戰爭發動後卻有顯著的增加，一九三六年為一，六〇八，〇二四千元，一九三七年就急增至三，七四七，二〇〇千元，一九三八年為一，八三四，六八〇千元，一九三九年又增至四，〇五三，二八七千元，一九四〇及一九四一年雖尚無資料可稽，但僅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一九三九的三年間，即已達一百億元以上。日寇若果發動軍事南進，則此項生產力擴充費將更增加，因為海戰需要軍火生產更多。

軍火生產在日本，固然過半是歸陸海軍部官營，正惟其如此，所以生產擴充費的國家負擔，更要巨額增加，直接的戰費的增加，將益超越日本國民所得額，其結果將更倍蓰日本的公債發行額，陷日本未來國民於債奴的地位，或甚至逼亡日本帝國。高橋老藏相因為主張百億公債亡國論而被殺（二·二六事變時）。但今日的日本被這批軍閥們拖入泥濘深處，公債總額已增加將至三百億元（去年年底截止二八二億元），高橋有靈，不知將如何捶胸痛哭呦！

日寇在戰爭初期為鼓勵獻金與加征租稅、剝削人民至於無力再擔負的程度。因為此次戰爭為侵華的無意義不合理的戰爭，所以終至掀起厭戰與反戰。因此，人民的所謂獻金運動熱，已隨戰爭之進展而日益低落。人民在社會經濟上的負擔也日益增大，中下層人民的壓榨已達到飽和點，加稅與募債皆已感覺十二分困難了。籌款政策自不得不改變方式。日寇的募債與籌款，到前年即發展至實施全國總動員法第十一條的問題，即國家徵用特種資金及過分利潤為國家之用。最近且又決定大資本家的出錢辦法，最低限度要一百萬元起碼。我們固然要群策群力，但是戰時的花費極大，更需要大富家捐輸，始可有濟於事。

日寇目前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籌資金購買外國軍火。英國之得以支持戰爭於不墮，均拜美國供給軍火之賜，但這又是英國肯允美國封存在美存款，以為無限抵押，不能不說是更要原因。日寇前年也有動用三井三菱等大財閥在外資金的擬議。但是這在反動的日國內，恐怕很難實施，前年日寇財閥之反對總動員法第十一條之實施，最近反對戰爭之擴大，主張快結束「中國事變」，皆反映日寇財政的困難及其當前的財政危機了。

原載一九四一年三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六期

日本半封建的農業經濟

——解開日本帝國特質之謎的一把鑰匙

日本資本主義經濟機構的特質及其適宜的氣候，規定了日本農業在其整個國民經濟上的最重要地位。日本農業經濟的特別比重之形成，不外是由於社會的原因和自然的原因，但是社會的原因卻占指導的地位。日本列島一般氣候的溫暖，日光和雨量的豐富，固然供給了日本農業充分發展的自然條件，但在日本資本主義之產生及發展，大部依存於日本農村的剝削之點，更可以使我們理解日本農業經濟特別重要的社會原因。假使日本農業離開了目前的土地所有關係及農業經營狀態，更確切地說，假使日本農業經營充分資本主義化了，那末充當日本資本主義支柱的紡織工業，乃至其他的工業，即有立刻崩潰的危險。即說後進資本主義日本能夠急速發展乃至維持著現狀，皆得自目前農業經濟機構的賜與，並非過言。

日本雖因地勢的關係耕地面積比較狹小，但是農業人口卻占全國人口的大半，其比率在世界主要各國中占絕高的地位。據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日本國勢調查的結果，在有職業者總數二，九二二萬人之中，農業從業者的數目是一四，一五六，〇〇〇千人，約占四八四%，這種比率在各種職業人口中是絕高的。參閱下表（據一九三六年度金鋼石社〈經濟統計年鑑〉）：

日本職業人口的千分比率表

總數	一,〇〇〇
農業	四八四
水產業	一九
礦業	八
工業	一八一
商業	一五三
交通業	三八
公務自由業	七〇
家事使用人	二八
其他有業者	一九

然而實際的農業人口的比率，恐怕還要高些，因為農家的家族繁多，所以家族的從業者容易被忽略；其次兼作工資勞動者的農民及其家族，亦容易被算入別類職業人口之中。再從人口的動態來看，過去日本農業人口的比率尤其巨大。在明治初年占八一四%，以後因為工業的發展而向都市集中，但至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年），尚占五八一，即半數以上。至最近幾年因受農業大恐慌的影響而始大減。

日本農業人口比率之巨大，若與世界各國比較看，更有趣味。

國名	農業及水產業人口(千人)	比率
日本(一)	一四,七二四·六	五〇·三
美(五)	一一,一〇九·五	二六·七
英國(四)	一,五二三·五	七·八
德國(三)	九,七六二·四	三〇·五
法國(二)	八,二〇五·九	三八·四
意國(四)	一〇,二七五·〇	五五·七
比利時(五)	六一七·五	一九·九
荷蘭(五)	六四二·一	二三·六
瑞士(五)	四八二·八	二五·九
英領印度(四)	一〇五,六八九·〇	七二·二

(注) 本表根據一九三五年《經濟統計年鑑》編製的。日本之項據一九三〇年日本國勢調查,其餘各項均據德國統計年鑑。括弧內的數字,(一)表一九三〇年,(二)表一九二六年,(三)表一九二五年,(四)表一九二一年,(五)表一九二〇年。

其次,日本農業生產額的巨大,亦是指示農業重要性的重要事實之一。一九三三年度日本農業生產總額達二,八七二,七六四,〇〇〇元,農業恐慌爆發前的一九二九年,還多出五〇八,一六一,〇〇〇元。莫怪日本人盛稱:「農業是我國民經濟的根幹,其純富生產額依推算約占生產總數四分之一……」(本段數目及引語,皆據一九三六年度

〈日本農業年鑑〉一五七頁。

然而日本農業經濟最重要之點，還不在於上述表面的現象。日本資本主義之產生及發展大部分依存於農村的剝削，才是日本農業經濟對於日本資本主義所盡最大的任務，也就是在日本資本主義所占最大的重要性。第一，日本資本主義的產生及發展上所必需的原始資本的積蓄，絕大部分得自農村的剝削。特別是所謂明治維新後，都市對於農村的剝削，得到政府的法律保障——例如「地租改正」（即地稅改正）的結果——這種剝削尤其強化，日本始得在最短期間積蓄了現代工業發展上必要的巨大資本，大闊步地追趕先進資本主義，終於達到目前巨大資本的獨占階段。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年）「地租改正」後，日本農民的租稅負擔占全國人民負擔總額八〇%以上。又在「地租改正」過程中明治政府賦與封建諸侯的償金及秩祿公債，完全課在農民的兩肩之上。此外，農民隨商品經濟之侵入農村而在商品流通過程中賤賣貴買，受到商業資本的中間剝削，在農業經營上因為需要小資本而又受到高利貸資本的高度剝削。商業及高利貸資本由農民剝削所有的積蓄幾乎全部轉投於都市的產業上，助長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消說的，即如政府由農民徵收的租稅也都用於官營軍事工業的經營上及民間普通工業的培植上。這是日本資本主義產生最初的過程。

日本資本主義產生上所需要的另一要素的勞動力，也是大部分由農村供給的。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工業、礦業、商業及交通業的人口逐年急增而農村人口相對地激減，就是有力的證據。關於這方面因為沒有更詳盡可靠的資料，所以姑且摘用土方博士的調查。

日本本業職業別人口比率增減表

業別	明治五年	明治二十五年	大正六年	昭和二年
農業	八一四	六五二	五四一	四五二
工業	四八	一三六	一八三	二二二
商業	三五	八九	一一一	一三〇
礦業	〇	七	一五	一六
交通業	七	一七	三三	五〇

(注) 本表摘自《社會政策時報》一〇八號。原表除所列職業外尚有水產業、公務自由業，家事使用人，其他及無職業者的人口比率，因與本問題無關，故省去。

日本農村的勞力供給，特別助成資本積蓄的原動力，尤須舉述農民的兼業勞動者、季節的工業工資勞動者，及農民家族的女工。這些工資勞動者不是本身經營農業，就是家族兼營農業。他們之間有一個共通的原因和目的，就是為著補貼家計而出來兼當工業勞動者。日本的佃農、半自耕農，乃至小經營的自耕農，因為農業收入不足以開銷農業經營費及家計費，不得不利用農閑時出來都市充當工業勞動者。其中特別是農家的婦女，大部分逼於父兄的困窮而出來充當紡織工場的女工，他們都在父兄支付肥料錢的時期支取工資，或在入廠的當初即先由其父兄預領長期的工資。這種農民或其家族之充當工業勞動者，因為是出於補貼家計的目的，所以工資特別廉賤。紡織工場的女工幾乎充當抵押品預支異例的低賤工資。女工約占工人總數九〇%的紡織工業，就是在這種剝削基礎上發展成為日本的支柱工業。日本因有這種異常廉賤的勞動力供其各部門工業的剝削，所以能行其社會傾銷政策，各種商品能侵入世界各國市場。

一、日本土地所有制

(一) 現代土地制度的性質

關於近代土地所有關係的轉換，各國皆有各自不同的發展過程。換言之，在由封建制生產樣式向資本制生產樣式的轉換過程中，有徹底完成近代性的土地革命的，有在其中途妥協解消的，這是一個決定近代土地所有關係的性質及其發展方向的根本條件。在由封建制到資本制的生產樣式轉換過程中，徹底完成土地革命的有兩種典型：第一是農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取著均衡發展的英國典型。英國在這生產樣式的轉換過程中，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隨著布爾喬亞革命的完成而起適應的變化，不但把土地完全改變為商品，並且促進了大規模的資本家型的農業經營。第二就是大革命完成後的法國典型。法國在這大革命的過程中推翻了大地主制度，分割土地授與農民，農民因得進行其自由獨立的經營。這兩種典型的近代土地革命，雖其結果的形式不同，但其性質為則同為資本主義化，農業經營由農奴制及封建主義到自由主義，從土地所有權的桎梏到自由的農業企業經營。

反之，若在生產樣式的轉換過程中，土地改革未能徹底，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不能掃清，只隨應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起妥協的融合的變化，則土地所有關係停滯於半封建的情態下，農業的資本主義發展受到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妨礙，即令農業上發生多少工資勞動的關係，也依然帶著半農奴的特徵。舊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即其一例，日本也屬於此類。關於日本之項，野呂策太郎氏的幾段話說得很透徹：

「地租改正固然是『維新政府土地政策』的樞軸，但這並非就是封建地租的廢除的意義，事實上不過是繳給舊封建土地領有者的產物地租（現物實租），

轉化為繳給現今唯一最高獨占者的土地領有者的中央集權專制國家的貨幣地租（現金地租）罷了。這個變革不但在其租稅負擔的實額上幾乎沒有輕減，即其地租的前資本主義的性質亦毫未揚棄」（岩波書店一九三五年版《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二九七頁）。

「我國小農如此享得的土地所有的自由，實質上倒不過是為著封建的榨取條件之國民規模的擴大再生產的——因而為著資本原始積蓄的自由遂行的——土地處分的自由，即土地的買賣、分割及兼併、租賃及典質等等的自由罷了」（同書二九六頁）。

「地租改正的結果，在從前的榨取樣式上是毫無本質上的變革的。現金地租不過是現物地租的「單純的形態轉變」罷了。……」

「充當地租改正的前提又是結果的土地處分的自由，實際上不過是為著封建的榨取條件之國民規模的集中，因而是依國家權力強行資本的原始積蓄的手段罷了。在這種場合之下，嚴格地說來，即令有土地之私的或共同的占有者及使用權存在，但是任何種的土地私有，則未存在。」（《資本論》）明治維新土地改革的結果，雖然承認了土地之私人處分的自由，而從事於耕作的占有者，事實上不過是單純的佃農，尚未可謂為自由獨立的土地私有者。（以上同書三〇〇—三〇一頁）

若再進而考察日本慘苦的佃農，負著繳給土地所有者的佃租及繳給政府的地稅的雙重義務，則實是世界異例的奇重義務，約占農業收入的六八%，明治維新對於土地的改革如何無力，造成這樣倒退的結果，更可以想見了。因此從一般地說來，日本改革後的土地所有關係，依然繼續著維新以前的本質，國家變成中央集權的大地主，舊諸侯領主在實質上依然是土地的領有者，不過形式上有多少變化罷了。因此，半封建的土地所有

關係阻礙農業之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業經營不能大規模地集中化。

(二) 土地所有形態的發展

在日本近世的經濟發達史上，土地所有形態的發展有一個特色，就是依照封建的，經濟外的掠奪，及前資本主義的剝削而造成土地所有權集積的基礎，迨至明治維新後土地所有權愈益集積而農業經營卻愈益分散。明治時代的土地所有形態的發展，本質上只繼承以前的本質，所以剖述日本土地所有形態的發展，須溯及明治以前的時期。茲分三個時期：(1)明治以前日本土地集積的特色；(2)明治維新促成的土地集積；(3)資本主義成立後土地所有權的集積。來加以分析。

1. 明治以前日本土地所有權集積的特色

先行於明治時代的德川幕府時代是中央集權的封建時代，所以一方面有種種封建的拘束阻礙土地的私有化，因而束縛土地之自由的集積；另一方面諸侯的土地領有權觀念隨著實際的變化而漸稀薄。當時阻礙土地極端集積的原因約有四端：(1)武士階級勢力的強大及其阻止土地兼併的志向，(2)關係土地所有權的封建的禁制，如土地永世買賣及所有權細分的禁止等等，(3)關係土地使用權的禁制，例如禁止桑、茶及烟草等特種農作物栽種於本田，(4)土地所有者公租負擔的奇重，是最有力量的原因。因為公租的負擔過重，則土地所有者與耕作者之間不能有中間榨取的餘地，土地所有不能保障其經濟利益而失去引誘性。

然而另一方面當時的經濟變動卻又助長土地所有權的實際的集積。即就形式而言，當時農民階級之中有「地主」、「地親」、「小名」、「大名」的區別，又有所謂「老百姓」的特異名稱，用以區別單純的耕作者（即佃農）或土地所有者（即地主），或自

耕其地的自耕農的本質。事實上，土地所有關係已超越各種禁制而暗中通行著買賣、抵押典質等習慣。單從上述各種禁制之申明，亦可得到土地交易實已發生的反證。在永代買賣的禁止令的背後，人民既以典質的形式進行土地的交易，弱小農民的土地自然，漸為非耕作階級所收奪。土地兼併違反當時支配階級的意志而愈益進行，當時雖然尚有大地集積的阻力，但是土地小所有的基礎卻已存在，當時的土地集積大體上已從兩方面進展：豪族階級的土地集積及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土地集積。

德川時代明令禁止土地的兼併，而其反面則有各地方擁有勢力的豪族（即我國之所謂土豪），利用經濟外的方法侵奪農民的土地。這是土地兼併最初的形態，也是後來商業及高利貸資本侵入農村而兼併土地的基礎。土豪的來歷很遠，可以溯至戰國時代，經過織田及豐臣兩時代而至德川時代的過程中，地方豪族互相鬥爭的結果，勝者為「大名」或「小名」，敗者則充其臣下，而為土豪。土豪當時不但未受到壓迫，且任以鄉村的要職。於是利用這種社會地位及勢力侵占農民的土地，終至變成大地主。

土豪的資本及土地的集積，隨生產力的增進及地方商業的發展而愈益發展，土地的兼併再經由商業高利貸資本更加增長。在德川鎖國時代以前，海外通商的發達促進商業資本之急速的積蓄，在鎌倉及室町時代，商業的發達即已產生了貨幣經濟，因而又產生了高利貸資本的活躍。商業高利貸資本剝削所得的剩餘價值，因為當時土地投資較為穩固，故復又轉投於土地上，收買田地及山林，增進土地的兼併。到德川末期雖然鎖國三百多年之久，但是當時國內的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基礎業已穩固。當時的諸侯領主之依賴富豪，及其逢迎富豪保護他們的利益，使商業高利貸資本多得假借政治勢力壓迫農民。且因海外商業之衰退，商業資本全部集中到農村，特別是土地上。農民不堪其壓迫而終於□□□□□□□□運用經濟及政治的兩重力量以後得完成其土地的急速集積。當時膾炙人

口的政商勢力即含蘊此種機密□在德川鎖國時代增進土地兼併的另一原動力，就是耕地的開墾。當時因為鎖國而海外通商被禁絕的結果，商業資本的活動場所僅限於國內，再加以幕府的勸農政策及墾荒政策之施行，大部分資本轉移於耕地的開墾上，較大的土地所有逐漸形成。

2. 明治維新促成的土地集積

在德川幕府以前潛伏醞釀下來的土地所有關係的變革，至明治初年始得形式化，法律化。明治維新革命，關於土地所有制度的表面的改革，約有幾種主要事實：第一、撤廢封建諸侯的領有制而改為國民的私有制；第二、以前關於土地所有及使用的各種禁制完全取消，而土地買賣及農業經營得到法律上的自由；第三、以前的現物實租全國改成貨幣單位的地稅；第四、地稅的稅率無地方的差別，改成全國一致的制度。

不過，在這土地制度的改革過程中，明治政府採用了一種特殊的政策，其收回封建諸侯的領有地是以「有償」的辦法施行的。對於喪失土地領有權的封建諸侯、公卿，及武士階級，交與秩祿公債及現金，公債總額約達一九、〇〇〇萬元，現金達二千二百餘萬元。這種大負擔不消說是以租稅的形式轉嫁給一般民眾，特別是當時負擔稅收八〇%以上的農民。這是明治維新土地改革的第一特色，同時也就是決定其後土地所有制度的性質及其方向的基本原因。根據這有償的基本原因，而以後的土地所有關係上發生幾項特殊變化：

(1) 第一重要的特殊變化，就是國家（包括領有「御耕地」的皇室）變成絕大的大土地所有者。明治政府實行廢藩的當時，從來的藩有地所有權及其他的土地所有權之認為不明的全部收歸國有。同時復又收奪山間部落民的既得權。明治初年沒有統計可以引證，但是單看明治十四年的官有地共計為五，二八九，八二三町步之廣而民有地不過為一一，

七五二，〇九五町步，前者約當後者之半，已可知其梗概。官有地的集積，其後更加增進，到明治二十三年已達二一，四〇一，二四一町步，增加四倍，而民有地則只增至一二，五〇九，九八六町步，幾乎沒有變化（據山田氏著《日本資本主義的分析》一八四頁）。這是多麼巨大的集積，後來這種官有地復又無償地轉給民間有力者，亦是助成土地集積的原因之一。

(2) 巨大官有地無償轉給民間的土地所有權的變化。擁有上述廣大面積的國家，後來常隨其必要而無償地轉讓巨大面積給民間的有勢力者。此類事例大多發生於新墾地的北海道及庫頁島。日本大土地私有制之發生集中於北海道及庫頁島，可以說完全基於此因。日本農地五十町步以上的土地所有戶數四〇，〇五〇餘戶之中，北海道約占二萬戶。這是在說明日本土地國有的特質及其大土地私有形成的過程。

(3) 諸侯及上級武士保存巨大的土地私有權。明治政府當時之廢藩置縣，對於輔佐幕府的諸侯採取比較嚴格的辦法沒收其藩有地。但是對於勤王的諸侯則非常寬助，許多巨大的藩有地皆變成他們的私有地。現在華族所擁有的巨大不動產，大部是在這過程中形成的。他方面，諸侯又利用藩有財產依照極低價格收買農民的土地。這也是巨大土地集積的原因之一。

(4) 下級武士的土地收奪。明治變革的結果，武士階級突然離開俸祿，立刻陷入窮途。明治政府為救濟他們而採用的土地政策，對於土地所有權的變化，亦起很大的作用。其最重要的就是以「土族授產」為目的的開墾事業的獎勵政策。這種政策的用意在於確立下級武士的生活基礎。使不再為亂。例如在津輕藩、出雲母里藩等處，強迫一般農民賤價提供土地，以備土族歸農之用。下級武士概皆利用這個機會收奪土地，自成巨大的地主或自耕農。這種政策的施行，同時也成了有力量的武士及資本案乘機獲得巨大土地所

有權的機緣。

(5) 資本家及土豪劣紳非法地獲得土地所有權。當此明治變革的機會，部落的有勢力者利用部落民對於新社會制度的無智而將部落公有地占為自己的私有，債權者也徑將抵押地據為己有，確定其所有權，或於永佃關係的土地上設定新所有權，使永佃人喪失土地的共有權，等等，都是當時盛行過來的事例。而新的土地所有權的集積，就在這變革過程中形成了。

3. 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土地所有權的集積

明治維新後受到世界資本主義的影響而急速發展，迨至明治四十年前後算已完全確立了。日本土地的所有形態亦隨著資本主義的產生及發展而有相當的變化，土地所有權更有顯明的集中，現在以明治四十年為界線分成資本主義確立前及確立後兩期，而就其情形分析一下。

(1) 明治四十年以前的土地集積

明治維新後日本土地所有權集積的基礎，一半在於所有權的確立，具體的事實就是明治改革當時關於土地所有權的各種禁制之廢除。這是上面詳細分析過的。另一半的基礎在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向上期土地經濟占較有利的地位，即土地所有的經濟利益較大。因此，在分析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土地集積的事實以前，應先剖述這些土地的經濟利益。當時的土地經濟利益，約可舉出下列幾端：

① 土地所有的負擔之相對的減輕。明治維新後為著財政的目的，確立了現在的租稅制度，最主要的就是明治六年的「地租改正」。這次的改正有兩種特質，即現金稅制及全國劃一制。這兩種特質對於地主有利。全國劃一的地稅額是地價三%，地方稅額是一%，這些都是轉嫁於直接耕作者的佃農的。定額的現金地稅更於地主有利，因在米穀隨

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逐漸騰貴的場合之下，對於地主是相對的減輕的，因為地主徵收現物地租而繳納現金地稅。但是直接耕作者的佃農不但因為「土地饑饉」而佃租額有增無減，並且因為突然參加貨幣經濟，倒反受到商業資本更大的中間剝削。當時農民暴動的繁多即其實證。至於地稅改正後地稅負擔額之多少的減輕（明治五年較之天保七年減三十九萬石，七年減一四〇萬石），更加肥滿了地主。在這種情勢下，土地的引誘性極大，土地集積是必然的趨勢。

② 佃租額的絕對的增高。地稅改正當時的佃租雖互有增減，但其後則因資本主義的發展及農民過剩人口對於土地的逼切要求，而佃租日益增加。這種增加又囿於土地資本的特性而愈益進展。這自然又於土地所有者有利，也是刺激土地集積的要因之一。

③ 農產物價的急速騰貴。隨著資本主義的進展而都市對於農產的需要大增，而農產物價急速增高。僅就東京米價而言，明治七年一石為六・一六元，十三年至十七年平均增至八・四七元，至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又增至一一・〇九元，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更增至一四・六三元。地稅改正後三十五年的期間，農產物價約漲一倍半。另一方面土地的負擔卻沒有增加，故於土地所有者是有利的。這也是刺激土地投資的一因。

要而言之，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度之確立，土地的封建的負擔之相對的輕減及漸減，首先刺激資本家購買土地的欲望。又資本主義技術的進步增進了農業生產，其利益則以佃租高漲的形態肥滿地主的荷包。資本主義向上期農產物價的繼續的騰貴及其傾向，更是引誘資本家及地主投資於土地的雙重原因。因此，在這期間土地集積到少數人手中，是必然的動向。地價之急速騰貴，正可指示此時土地投資的激烈及土地集積的事實。

年次	每反步價格(元)		同上指數	
	田	旱田	田	旱田
明治六年	四七	一六	一〇〇	一〇〇
明治二十三年	六二	二六	一三四	一六三
明治三十二年	一三二	五八	二八一	三六三
明治四十一年	一九六	九〇	四一七	五六三

(注) 據東浦莊治《日本農業概論》九十六頁第十八表。

這裡留下一個可能的疑問：就是在這樣土地的經濟利益膨脹之下，小農民豈不是同樣可以購買土地嗎？土地就不一定是集積的情勢了。但這問題是很容易解答的。小農民不但從來的經濟力量不足以購買土地，並且在這經濟制度的變革過程中，經濟地位只有愈益動搖，逼迫小農民放棄土地。特別在農業恐慌期中，農民之放棄土地更加顯著。例如在明治十四至十六年的紙幣整理及緊縮政策的強行，引起十七、八年間的農業恐慌，由小農民手中奪去了不少的土地。當時雖無正面的統計資料，但尚可由側面的事實找得證據。明治十四年至二十二年十一月之間，繳納地稅五元至十元的府縣會議議員選舉權者，由九三〇，二六三人減至六四八，一六一人，減少了二八二，一〇二，約減三〇·三%。同時期十元以上的同種選舉權者，由八七九，三四七人減至八一四，〇二二人，減少六五，三二五人，約當七·四%。這是在說明這八年間繳納五元以上、十元以下的地稅的小土地所有者階級，約減了三分之一。十元以上的繳納者，雖其減率較輕，但仍不免於放棄土地。因此，明治十七年至二十年之間，十八縣的佃種地的比率增加了一三·

七%，以十七年至十九年之間全部耕地約八分之一，因抵押而喪失了所有權。土地的兼併是很明顯的，此種動向即在農業恐慌後依然繼續。明治二十年十八縣的調查，佃種地占全部耕地的比率是三八·九%。至明治四十二年全國總耕地中的佃種地，水田占五〇%。旱田占三八%，這是指示本時期土地集積的總結果。（絕對數根據上引東浦氏同書九九至一〇二頁）

(2) 明治四十年以後的土地集積

資本主義確立後日本土地所有權的集散，雖是曲線狀的發展，但是一般的情勢依然承繼以前的動向，向集積的方向進展的，這種情勢表現在①自耕地面積的比率減少而佃作地面積比率增加，及②耕地總面積增加而土地所有者戶數減少，等事實上。

這期間日本土地所有權的變化是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盛衰而呈曲線的情狀。明治四十一年至大正二年的期間完全承繼以前資本主義向上期的景氣，農產物價騰貴，所以農業尚有發展的餘地，耕地面積大增而地主的數目大減，佃種地的比率增加而土地大形兼併。大正二年至七年之間適值歐戰時期，日本工業的發展登峰造極，工業物價超過農產物價，產生米價指數低於他種物價的傾向。這對於農業一般是不利的，但是尚無土地所有權分散的基礎，所以土地還繼續集中的情勢。反之，農業的蕭條倒反容易造成土地集積的原因。其次，大正七年至十二年之間，日本資本主義尚繼承歐戰期的景氣，工業還在發展時期，所以土地的所有既未有顯明的集積，亦未有分散的情勢。但至大正十二年—昭和三年之間，日本資本主義碰到歐戰後景氣的倒降，農產物價低落，土地負擔增加，再加以承繼上期以來的佃租減輕運動（例如每町步佃租，明治十七年與大正十五年的變化如下：東海岸三縣由一·一二石減至一·〇四石，近畿六縣由一·四一石減至一·三七石，中國五縣由一·三〇石減至一·二七石，北陸四縣及關東七縣僅能維持其原狀，其他增加的地方僅東北六縣及九州五縣，促使地主放棄土地。這時期地價的急速

低落，使地主方面高唱自耕農創定及維持政策，甚至主張土地國有，都是具體的證明。迨至昭和四五年間，日本資本主義業已備嘗一般恐慌的滋味，農村恐慌特別深化，細小自耕農的沒落已經不是單靠政府「自耕農維持政策」所能阻止的了。於是土地所有權完全依據資本制的資本集中原則，急速集中。此時，小農的經濟困難逼使他們不能留戀於土地所有權，不管地主及商業高利貸資本家願意與否，土地是急向他們的手裡集中的。下表可以證明：

資本主義確立後日本土地集積的動向

時期	自耕地		佃耕地		總面積 (町)
	面積(町)	比率 (%)	面積(%)	比率 (%)	
明治四十一～大正元年	三,一三八,九四一	五五・〇	二,五六九,四五七	四五・〇	五,七〇八,三九八
大正二～六年	三,三三三,六一〇	五四・六	二,六九二,八二〇	四五・四	五,九二六,四三〇
大正七～十一年	三,三二八,四四五	五四・一	二,八一九,五〇二	四五・九	六,一三七,九四七
大正十二～昭和二年	三,二八九,二七六	五四・一	二,八九七,四四五	四五・九	六,〇七八,四〇六
昭和三～七年	三,一五七,二五一	五二・九	二,八二三,八五三	四七・一	五,九六七,五〇六
昭和八年	三,一八六,八〇四	五二・九	二,八四一,九五九	四七・一	六,〇二八,七六三
昭和九年	三,一七九,八三二	五二・九	二,八二六,〇五九	四七・一	六,〇〇五,八四一

(注) 本表之編制根據一九三六年度《日本農業年鑑》五十二—五十三頁。

日本自耕地之漸減及佃種地之漸增，是一直線的發展，直至昭和四、五年間這種情勢始略為停頓。而這種停頓並不是自耕農的增長，只是昭和五年以後，農業恐慌逼使中小地主淪為自耕農，佃農淪為工資勞動者的反證。這時期的土地集積有一特色，就是土地集向銀行資本及國家資本之手，是值得注意的。

(3) 最近土地兼併的動向

一九三〇年日本農業恐慌爆發以來，日本的土地兼併發生一個新動向，農業恐慌爆發以後，一般農家皆收入激減，金融梗塞，其窮苦達到極度。農家的負債，不要說還本，即連利息也都無法償還。結果，不動產抵押借款的債主終不免於抵押競賣的執行而喪失其土地的所有權。當時，不動產抵押品的土地之集中，約有兩種動向：其一就是融通各種農業經營資金給農家的各種銀行。其二是融通低利資金的政府。國家資本及銀行資本即欲競賣抵押品的土地，也礙於無人購買，而農家的土地所有權不得不集中到他們的手中。於是發生所謂銀行地主及國家地主的新形態。關於這方面尚無全國普遍的調查，但只從部分的及側面的新資料也可以證明一般的情勢。

長野縣農會曾就長野縣全縣作過最近土地所有權移動的調查，得到銀行地主產生的結論。茲據帝國農會報第二十五卷第三號所載「長野縣銀行土地所有權增大的傾向」，節譯於下：

長野縣下銀行地主發生的情形：恐慌以來地方銀行的農村放款資金大為凝固，其收回年益困難，擔保物的土地的價格低落激甚。加之，地方銀行的存款激減，地方銀行完全瀕於破產。昭和六年的金融恐慌中，四銀行竟至停業。存款方面，本店在縣內的普通銀行及特殊銀行皆大減少，而本店在縣外的銀行倒反增加；放款方面，本店在縣內的銀行減少，反之本店在縣外的特殊銀行大為

增加。由於縣外本店的普通銀行的放款特別減少的原因而地方普遍銀行窘於存款的減少及放款的固定化。反之，縣外本店銀行則因存款之增加及放款收回的進展，乃至特殊銀行的存款及放款的增加而農村資金愈益流出縣外，更加助長地方金融的梗塞及地方銀行的惡化。

由於這種地方銀行營業的不良，促進了銀行的合併，縣內本店銀行四十五家，在昭和七年合並整理成為十七家。因此，債權集中的結果，對於農家負債的支配力強化，促進了負債的整理。銀行對於農家負債的提取激烈，成了臨時縣會的問題。

銀行放款整理，運用其抵押權，在地租徵收不可能的場合競賣擔保物。現在農家處於不能支付利息的狀態下，其抵押品的土地自不得不被競賣。此時銀行即將土地付諸競賣，亦因極少購買土地的人，這些土地自然要歸到銀行手裡。

這樣登場的銀行地主固然不願死守其土地至於最後，但是這種土地即令利用小農的土地所有欲一時加以分割的處分，也因連年的蕭條，農家經濟不得好轉，而再因債務的不履行，土地重回銀行手裡。土地所有制漸次變成銀行土地所有權增大的情勢。

銀行土地所有權增大的實狀：根據縣農會的調查，昭和五年以降，逐年銀行的土地所有面積如下表：

長野縣銀行土地所有面積

	昭和五年	同六年	同七年	同八年	同九年
水田面積	一,四九二,一〇〇	一,六九九,七七	一,八三三,〇二三	二,四八四,四五	三,〇二九,一〇〇
指數	一〇〇	一一四	一二三	一六七	二〇三
旱田面積	一,八五九,五〇六	一,九三三,八八	二,一〇一,三三四	二,六七六,六二五	三,二〇二,〇二五
指數	一〇〇	一〇四	一一三	一四四	一七一
山林面積	三,八三三,一〇一	四,三九七,二六	四,九六八,八二〇	五,三三七,五五九	二五,九七〇,七〇二
指數	一〇〇	一一五	一二〇	一三八	四一八
原野面積	一,八一九,三〇四	一,八七〇,〇二六	一,七一九,二〇〇	一,八五一,三二〇	二,〇八五,八〇〇
指數	一〇〇	一〇三	九五	一〇二	一一五
宅地面積	七〇三,九〇五	六八七,四二六	八二〇,七〇一	九三三,三二一	一,一三三,一〇三
指數	一〇〇	九八	一一四	一三一	一六一
合計面積	九,六九五,八二六	一〇,五八七,三〇二	一一,四三三,〇二八	一二,三〇八,三三〇	一三,五四〇,七二〇
指數	一〇〇	一〇九	一一八	一三六	二六二

(注) 調查根據每年一月一日的土地地帳所載面積。

如上所述及數字所指示，農業恐慌以來長野縣的土地所有權逐漸集中到銀行手裡，並且不是地方銀行，而是縣外的巨大銀行。其中，特別是田地山林的集中尤為顯明。其結果，最初不願意死守其土地所有權至於最後的銀行，也終於不得不專設所謂「土地公司」，以專門處理所有地，於是銀行的土地所有權遂得其永續性，而銀行地主的地位固

定化。

其次，國家資本對於土地所有權的支配實況如何雖無詳細的統計，但只據政府低利資金之巨額的放出亦可知其大概的情勢。國家資本之雄大是日本經濟機構的特色，而其侵入農村亦與年而俱增，這是由於低利資金的放出。低利資金可以分為兩個體系，大藏省儲金部資金及簡易生命保險積立金。這是由國家的金融機構吸收民間的零細資金再轉放出去的一個路徑，由此建立國家的金融支配權。儲金低利資金又分為普通資金及特別資金。普通資金在農村方面貸與耕地整理組合、產業組合、森林組合、漁業組合，及畜產組合等；特別資金則以特殊的目的，例如救濟災害、米穀應急等目的而放出。

普通資金之貸出如於明治四十三年，現在截止的貸出總額達三七，〇〇〇萬元。這種資金特別是在近年激增的。明治四十三年至大正四年之間，每年的增加平均不過四、五百萬元，大正十四年以前激增一千萬元，昭和六年以前更增加三千萬元，七年以後也有一千三百萬元。

儲金部特別資金發端於大正十二年的賑災救濟資金，至昭和九年十月截止合計放出資金十億元。這種資金從昭和二年以降始增加。昭和元年不過二千二百萬元，昭和二年則為二一，〇〇〇萬元，殘額的六七，〇〇〇萬元是昭和五年至九年的五年間貸出的。

簡易生命保險積立金的融通額雖然不多，現在截止不過一一，六〇〇萬元，但有一種特色，即融通給自耕農的資金，占絕對多數，約為一一，〇〇〇萬元，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以上數目皆據一九三五年《日本農業年報》三八〇—三八四頁）

日本國家資本在農業恐慌期向農村急增的進出，與農民之破產而促進另一種的土地兼併，是極其自然的情勢，所以今年來國家地主的新發展，是不待數字之證明而可以相信的事實。

二、日本農業經營形態

(一) 日本土地制度對於農耕形態的規定

那一個國家的農業經營形態，皆為其社會經營的條件所規定。其中，土地制度特別是規定農業經營形態的第一原動力。日本自然也不能出此例外。日本是以過小農經營著名於世界的國家，大部分的農家皆耕種著不滿一町步的土地，並且這個細小經營形態是承繼封建末期下來的，經過資本主義經濟變動之後，其細小形態只有愈益普及化。這一點是日本農業經濟的主要特色之一。

大凡經過資本主義經濟變革的國家，其農業經營形態普遍皆向大規模經營的方向發展。資本主義始祖的英國及後進資本主義的美國，都是如此，固不消說，即如德俄也莫不如此。即以小農經營著名的法國，本質上也與日本有異。考茨基所主張的大農優越性，是有其普遍的適當性的。然而日本的農業經營形態，何以能夠獨異其趣呢？經過長期資本主義特別是獨占資本主義的浸淫而不能改變其細小農業經營規模，其原因何在？簡單一句話，主要原因在於細小農忍受饑餓凍餒的特性——考茨基所允許的唯一的「小農經營的優越性」。日本的土地制度正好逼迫著一般的耕作農民發揮這一點優越性。換言之，日本土地制度的特性已把農業經營的細小形態規定好了。

1. 日本佃種制度對於細小農耕規模的規定，關係土地制度對於農耕規模的規定，首先應該分析的就是上文一、日本土地所有制度所述日本佃租制度對於農業經營規模的影響。日本的佃租是異例的高率，這就是阻止農業經營大規模化及資本主義化的第一原因。一般佃農的負擔（直接繳給地主的佃租及間接繳給政府的公租），占農業總收入一半以上，甚至於六八%。自己的所得額不過三二%，再除去種籽及肥料等費用，所剩實在無

幾。(詳見本書序論) 這個六八%的絕高率的負擔額，並不是單純的地租成分，其中不但包括著利潤的全部，並且包括著工資的一部分。在佃農的收入當中，適當於工資的部分極為低微，其單位工資較之一般的工資廉賤得多。

佃農資與一般工資比較表

年度	充當工資 收入部分(元)	自家勞動 日數(日)	自家一日 工資(元)	普通工資 (元)
大正十一年	一一·八七	二一·三	〇·五六	一·六〇
同十二年	一一·四三	二〇·五	〇·七五	一·五六
同十三年	二九·九三	二〇·二	一·四七	一·六一
同十四年	三五·〇四	二〇·八	一·六八	一·五六
昭和元年	二七·八九	一九·五	一·三四	一·四四
同二年	二七·四八	一九·一	一·四三	一·五二
同三年	二三·〇四	二一·〇	一·〇九	一·四三
同四年	二三·五八	二三·七	〇·九五	一·二八
平均	二四·一六	二〇·八	一·一六	一·五〇

(注) 本表節錄上引東浦氏同書一二九頁。

以佃農的總收穫額減去全部經營費(包括佃租)剩下的部分，假定為自家勞動報酬部分。這部分換算為單位工資，則佃農自家的一日工資在大正十一、二年間僅及普通工資三分之一，即如最近的昭和四年度仍尚差很遠。固然其間亦有近於普通工資的年度，但是以大正十一年至昭和四年八年平均數，尚且相差很多。在昭和五年以後的農業恐慌

期間，其差值恐怕更要增大。

地主不但以佃租徵收地租，並且掠奪經營利潤的全部及工資的一部分。擁有土地的地主，與其自己耕作不如出租土地較為有利。租地經營既無利可圖，資本家及企業家也就不會投資於農業經營上。因此，日本近世史上，只沒有土地資本家的顯著的發展，而卻沒有農業資本的膨脹——除去北海道的行情略異者外。日本農業經營規模的細小，就是為這個異常高率佃租所規定的。

2. 自耕農經營對於細小農耕規模的規定，在日本的農業經營上，不但佃農的經營規模不能擴大，即自耕農的經營也無法擴大，自耕農的經營現狀亦是規定農業經營規模細小的動力。這乍一聽來好像是矛盾，其實處在日本資本主義特殊機構中的細小自耕農，沒有擴大再生產的能力，並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地方。日本一般的細小自耕農本來的實力即極其薄弱，再加以高率租稅、強度的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的剝削，不但不能進行擴大再生產，即連單純的再生產，也須在兼營副業，充當工業勞動者，及累積負債的情勢下始得勉強維持過來。

日本資本主義是在極度剝削農村的一貫的路線上發展下來的。第一應先指出的，「地租改正」後的地稅負擔額，在全部國稅收入當中占八〇%以上，其後的比率雖然隨著都市工業的發展而漸減低，但是農民負擔的絕對額仍未稍減。這種奇重的剝削，自耕農自然也不能倖免。其次，就是高利貸資本的剝削。日本的現代金融機關，雖然隨其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已相當發展，並且侵入農村。但是在農村方面能夠利用這種現代金融機關的，只限於擁有巨大土地抵押品的地主及富農。至於佃農及細小自耕農，則依然忍受著前資本主義的高率剝削，即連信用組合的放款，他們尚且無法享受。第三，細小農民所受的剝削，就是商業資本的中間剝削。農民因受季節需要的逼迫，不得不以低賤的價格出賣農產品而以較高的價格購買工業製品。肥料的獨占價格，即其主要的例子。這是近年來

產業組合運動始發的原因，但是產業組合運動仍無更大的效果。

處在超重重凌辱剝削之下的細小農民的農業收入，當然不足自家的費用，必須兼營副業及充當工資勞動者，始得維持生計，擴大再生產簡直是他們所未夢想的事情。且看農家的收支的情形：

昭和七年	自耕農家的總收支(元)
農業所得額	五四四・二二
兼業所得額	一一八・七三
家事收入額	三九・八四
共計	七二〇・七九
家計費	六三二・五七
剩餘	七二・二二
六年度剩餘	一〇・三四

(注) 本表的編製根據一九三六年《日本農業年鑑》。

上表所指示的，單以農業收入尚不足以計費的開支，加上兼業收入(包括工業工資)及家事收入，始稍能收支適合。單以農業收入不足開支虧缺一百元之多，即加上兼業收入及家事收入，開支後所剩的也不過七十一元二角二分。若六年度的剩餘更少，只有十元三角四分。尚須注意之點，這個調查是以較為富裕的農家為對象的。

3. 規定農耕規模細小的其他原因除開上述兩種關係土地制度的基本原因以外，阻止日本農業資本主義化的副因，尚有幾端值得顧為分析一下的：第一，農業以外的資本利潤較為優厚。不但阻止都市資本流入農村，倒反由農村吸收資金。第二，日本農耕上特

有的主要米作，隔離世界市場，受到價格競爭的影響較小。第三，一般的工資特別低廉，使用機器的生產費大於使用勞動力的生產費。第四，日本的地勢富於山岳，很少大平原，故不宜於大機器的耕作，這些原因在社會經濟機構變革後固然可以克服，但在農村經營仍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地階段上，依然不失為阻止農業經營規模擴大的重要原因。

要而言之，日本的農業經營規模為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特質，特別是土地制度的特點規定好的。日本農業經營之停滯於過小農的狀態，在現階段上是無可奈何的。

(二) 過小農耕的發展過程

日本半農奴的過小農經營的發展，正和現代主要的資本主義各國步著相反的方向。各國的農業經營規模，愈遠離封建的時代愈加擴大；而日本則適得其反，其整個的社會經濟愈益資本主義化，其農業經營規模愈益縮小。日本農耕的過小規模，不但承繼著德川末期，甚且比之德川當時更為縮小，是極有趣味的事情。

1. 德川時代的農耕規模，就一般的動向看來，日本農業經營規模是年益縮小的。即如明治初年的規模亦不及德川時代之大。德川幕府當時有幾種原因阻止著農業經營零細化：第一是土地買賣及分割的零細化的禁制。因有這種禁制，所以當時雖然很少大地主，而十町步及五町步的中小地主卻占多數，並且這些地主都由自己經營。第二，當時的負擔過重，所以土地所有者單靠「作德米」的佃租不足以維持，故須自己耕種較廣的土地。第三，德川時代的政策及當時的風尚，認不勞的地主為寄生蟲而加以排斥，故大部分地主皆不得不自己耕作。第四，當時的人口是相當過剩的，政府的政策又將過剩的人口束縛於土地上。習慣上，次男以下的子女不能分產，終於流為農村的勞動者，供給較大規模的農業耕作者使役，容易促成較大規模的耕作。第五，當時耕地面積相對地較為廣大。農村人口雖然相對地過剩，但卻絕對地減少，所以每人的耕地面積可以增大。當時的政

府又極力獎勵墾荒，較大規模的耕作，更有發展的可能。

因有上述幾種特殊的原因，所以德川封建制下的零細農耕面積較大於明治六年「地租改正」之後。據山田氏搜集的資料，德川時代的農耕規模約略如下：

寶曆三年（一七五三年）仙台藩內以「中民以下每一農民」的計算為基礎而推想的耕作面積，是田六反步，旱田四反步，合計一町步。又寬政三年至四年（一七九一—一七九二年）當作「一切耕作農民的耕作畝數」規定的耕作面積，約當於六反步至七、八反步。又安政二年（一八五五年）「良夫一人妻一人，農忙期日傭一人，全部三人」的耕作面積，是田一町，旱田五反，合計一町五反步（《日本資本主義的分析》一九四頁）。

然而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年）「地租改正」後，三府三十六縣每一農家的平均耕作面積，不過〇·八八町步，明治三十七年，北海道（最大區域）及沖繩縣（最小區域）的特殊地域除外，一般內地農家一戶的平均耕作面積，是〇·九三町步；大正八年是〇·九九町步；昭和四年是〇·九四町步（據上引同書的羅列）。

2. 明治維新後農耕規模的發展明治維新後日本農耕規模，大體上是繼承德川時代的。上面述過明治初年的農耕規模比之以前不但沒有增大倒反減少。至少，我們可以相信明治初年資本主義經濟未充分發展以前的農耕規模，是絕對不會增大的。因為根據一般的通例，農業的資本主義化，大體上是隨著一般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所以只就資本主義確立以後的發展情況加以考察，則可明瞭明治維新後全部時期農耕規模的動向（因為明治初年沒有具體的統計，所以不能用數字來證明）。

日本資本主義確立（明治四十年前後）以後的農業經營規模的發展動向，大體上是愈益零碎化的。固然亦有幾個特殊地方，因為特殊的情形而有擴大化的事實，例如北海道及東北區。但是這些地方的大規模農耕，是國有荒地無償授與民間的特殊原因促成的，

所以比較上採用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經營。反之，這些特殊地方的農耕大規模的反面，半段（段同於反十反一町步）以下的極小農耕卻也同時增加，沖繩縣方面更加停滯於極小農耕的狀態。這些事實都是全局推定上應加注意的事實。

耕地廣狹別農家戶數比率增減表

時期	五反未滿 (%)	五反以上一町未滿 (%)	一町以上二町未滿 (%)	二町以上三町未滿 (%)	三町以上五町未滿 (%)	五町以上 (%)
明治四十一年	三七·三	三二·六	一九·五	六·四	三·〇	一·二
明治四十一年以後五年平均	三七·三	三三·〇	一九·五	六·一	二·九	一·二
大正二年以後五年平均	三六·五	三三·四	二〇·一	六·一	二·七	一·二
大正七年以後五年平均	三五·六	三三·二	二〇·七	六·一	二·八	一·六
大正十二年以後五年平均	三五·〇	三三·八	二一·四	五·八	二·五	一·五
昭和三年以後五年平均	三四·六	三四·三	二一·九	五·七	二·四	一·一
昭和八年	三四·二	三四·二	二二·二	五·七	二·三	一·四
昭和九年	三四·二	三四·二	二二·二	五·七	二·三	一·四

(注) 本表根據一九三六年度《日本農業年鑑》，實數參閱同書。

根據上表可以瞭解幾種事實：(1) 五反步未滿的過小農是一直線地減少下來。但這事實並不是說明農耕規模之擴大化，而只是過小農之無法維持而沒落為工資勞動者的說明。(2) 五反以上一町步未滿的及一町步以上二町步未滿的小農，都是一直線地增加，這才是

小農年益增加的具體說明。(3)二町步以上三町步未滿及三町步以上五町步未滿的中農，卻是一直線地減少。這和(2)項事實聯結，更加證明農耕規模的縮小。(4)五町步以上的中農經營略有增加，這是加算北海道及東北區的特殊地域的結果。在本項五町步經營者當中，北海道占去八〇%。因此，資本主義確立後日本一般的農耕規模，確是一直線地愈益縮小化。這種傾向完全和土地所有權的集積，步著相反的方向，是饒有興趣的事情。

(三) 過小農經營的現狀

1. 農耕規模一般的現狀，日本農耕規模是世界有名的過小農制。關於此點，由田盛太郎曾在其《日本資本主義的分析》一九九頁上，作過各國的比較。

這裡為檢討日本農業的零細性而來試作農家每一戶平均耕地面積的內外比較。在日本農業上，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度，近畿區是〇·七三町步，東北區是一·四六町步，北海道是四·四五町步，內地總平均是一·〇六町步；朝鮮是一·五八町步。反之，英國是一二·三町步，包括附屬地二七·〇町步（農業勞者等場合的關係除外）（一八九五—一九二三年）；愛爾蘭是一·九町步，包括附屬地一四·〇町步（同上）（一九〇五—一九一八年）；法國是四·二町步，包括附屬地八·七町步（一八九二年—戰前）；德國是五·五町步，包括附屬地七·五町步（一九〇七年）；美國是三一·七町步，包括附屬地五八·〇町步（一九二五年），蘇聯是二·六町步；中國是一·二町步（Moytinsky, Die Weltin Zahlen. III 1926. S. 22, 100, 104. 帝國農會《中小農保護策》明治四十五年刊，第二卷，十八—十九頁，那須皓《農業》，現代產業叢書第一卷所輯，昭和三年刊，三十一—三十一頁）。

日本目前農耕規模的情狀，如下表所指示的，一九三四年度全國總耕地面積是六，〇〇五，八四一·四町步，農家總戶數是五，五七二，〇〇〇戶，每一戶農家的平均耕地

面積水田及旱田，合計是一町步多些。這是包括北海道等特殊地區平均所得的，否則更小。

耕地總面積(町)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農家戶數		六,〇二八,七六四・四	六,〇〇五,八四一・四
農家一戶的耕地平均面積(町)		五,六一九,二六六	五,五七二,〇〇〇
水田	〇・五七四	〇・五五六	
旱田	〇・四九九	〇・五〇五	
合計	一・〇七三	一・〇六一	

(注) 本表根據一九三六年度《日本農業年鑑》。

每戶平均的農耕面積是一・〇六一町步(約當我國十六畝)，這是多麼細小的規模，但是其規模之細小更有遠過於此數的事實。這一町步有餘的規模是一般的情形，若僅就佃農檢討看，其細小更堪驚駭。如下表所指示的。五十町步以上大地主的佃農每戶的耕地面積平均不過是〇・六六町步——還須特別注意，這是大地主的佃農之點！

階級別(町)	每一佃戶租地平均面積(町步)
五〇~一〇〇	〇・四六
一〇〇~二〇〇	〇・五七
二〇〇~三〇〇	〇・七八
三〇〇~五〇〇	一・〇二
五〇〇~七〇〇	一・〇九
七〇〇~一〇〇〇	三・七九(?)
一〇〇〇以上	一・九三
合計	〇・六六

(注) 轉錄東浦氏《日本農業概論》所載農林省的調查(?)——宋附注。

又，農耕規模區別戶數的比重，如表下所指示的，一町步未滿的農家占總戶數六八%以上，而三町步以上的農家不到四%，這是多麼加強日本農耕細小的事實。

農耕規模別農家戶數及其比重(一九三四年)

	戶數(戶)	(%)
五反未滿	一,九三二,七二一	三四·二
五反以上一町未滿	一,九〇六,八〇〇	三四·二
一町以上二町未滿	一,二四四,一四九	二二·二
二町以上三町未滿	三一七,七六四	五·七
三町以上五町未滿	一二一,三六五	二·三
五町以上	七七,四一三	一·四
總計	五,六一〇,九四三	一〇〇

(注) 本表根據上引《日本農業年鑑》斷載各府縣農會農事調查後的推定。

二、地方別的農耕規模，日本農耕規模在地方的分布上極其不平衡。例如北海道特別區域每戶農家的平均耕地面積，竟達四町步有半以上，東北區地約為一町步半，其餘的區域除關東區及北陸區尚能維持一町步的以外，所餘七區皆為一町步以下。

農區別農家每一戶的耕地面積

總數	一・〇六町
北海道	四・五四町
東北區	一・四二町
關東區	一・〇八町
北陸區	一・〇二町
東山區	〇・七六町
東海區	〇・八三町
近畿區	〇・七三町
中國區	〇・七四町
四國區	〇・六九町
九州區	〇・九三町
沖繩	〇・六三町

(注) 轉錄《日本農業概論》所載農事統計表(一九三一年度)。

從農區別看來可以得到四種典型：(1)巨大農業經營的北海道，(2)略大農耕地域的東北區，(3)細小農耕的近畿區，及(4)殖民地經營的朝鮮區。各區的農業經營的區別，不但在於其規模之大小，其各自的特質更是應加注意之點。

北海道的特質是經由明治十九年的《土地拂下規則》(轉賣土地給人民)及三十年後的《國有未開墾地處分法》創造成功的半農奴制的寄生的大農場組織。所以三町步以上的經營農家竟達十一萬以上，占總戶數二十萬的過半數。其次尚有五反町未滿的農家三三，三〇〇多戶，占一五%以上；其餘五反以上一町未滿，一町以上二町未滿，及二町以上三町未滿的農家，則皆占較小的成分，這是大規模經營及半工資勞動者的貧農摻雜

存在的證明，同時亦是該區域的特色。

一九三三年度北海道耕地面積別的農家戶數（戶）

五反未滿	一，九三三，七二一
五反以上一町未滿	一，九〇六，八〇〇
一町以上二町未滿	一，二四四，一四九
二町以上三町未滿	三二七，七六四
三町以上五町未滿	一二一，三六五
五町以上	七七，四一三
總計	五，六一〇，九四三

（注）本表根據《日本農業年報》一九三五年上半期二四一頁。

其次，東北區在日本本部算是農耕規模較大的地方。這個區域和北海道同樣，帶著半隸農制的性質，只是階級大小的構成略有不同罷了。北海道是以五反未滿的極小農及三町步以上的中大農占絕大多數；而東北區則以五反未滿的過小農，五反以上一町未滿，及一町以上二町未滿的小農，占八一·九六%的絕大多數。但在其二町以上的農家比重，大於近畿典型區多多及其零細化較為緩慢之點，是其特色。

一九三三年東北區耕地面積別的農家戶數及其比率

	(戶)	(%)	明治四十一年至昭和六年 的增減率(%)
總數	六三〇・八六三	一〇〇	
五反未滿	一六八・〇三三	二六・六三	(+) 二%
五反以上一町未滿	一七三・六一四	二七・五二	(+) 二七%
一町以上二町未滿	一七五・四七五	二七・八一	(+) 三六%
二町以上三町未滿	七九・五八四	一二・六一	(+) 一五%
三町以上五町未滿	二九・五七四	四・六九	(-) 二三%
五町以上	四・五九三	〇・七四	(-) 六二%

(注) 本表之編製根據《日本農業年報》一九三五年上半期二四四—二四五頁，其中有(!)的注號之項，根據山田氏《日本資本主義的分析》一九八頁。

再次，以高利貸寄生地主為其特質的近畿區，其農耕規模不但極度的零細，一町步未滿的農家占八二・三八%的絕大多數，且其零細化的速度也極急速。在日本資本主義最發展的中心區，而其農耕規模則愈益步著相反的方向，是本區的特色，也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特色。

一九三三年近畿區耕地面積別的農家戶收及其比率

	(戶)	(%)	明治四十一年至昭和六年 的增減率(！)
總數	五七七，八七三	一〇〇・〇〇	
五反未滿	二四〇，九〇三	四一・六九	(-) 一〇%
五反以上一町未滿	二三五，一五七	四〇・六九	(+) 一〇%
一町以上二町未滿	九五，〇四〇	一六・四五	(+) 四%
二町以上三町未滿	五，八五九	一・〇一	(-) 四%
三町以上五町未滿	七八七	〇・一四	(-) 三九%
五町以上	一二七	〇・〇二	(-) 八七%

(注) 本表之編製根據上引年報二四四—二四六頁，(！) 注號根據上引山田氏同書同頁。

最後的一個典型就是殖民地農業經營的朝鮮型，這區域的特質在於帶著民族界線的巨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營。在這裡，東洋拓殖會社「土地王國」，擁有土地七萬町步，管轄鮮人佃戶十五萬家（大正七年度）；官有土地十二萬町步，管轄佃農二十六萬戶（大正八年度），都是本區域的殖民地特質的證據。台灣殖民地的農業經營形態，（例如所謂砂糖王國的大農場），也可歸納到這一典型之中。但因不是日本內地的範圍，故不加詳細的剖述，俟後章頁為細述。

(四) 日本的佃種制度

由於日本土地所有制的特質及農業經營的細小，確立了細小的佃作制度，是個集中的表現。

1. 細小佃作制度的特性

日本的土地所有權向兼併集中的方向發展，地主所得的剩餘價值轉投於土地上，都市的資本也有一部分集注於農村的。但是這種投資的性質是土地資本的投放，而不是農業資本的投放。因此，日本佃種制度特別發達，並且發展成為過小農佃種的特性。這種特性表現於三種事實上：(一)大地主很少而中小地主較多，(二)每一個農的耕作面積過於細小，(三)佃作大多兼營於小自耕農。

階級別地主戶數及佃作地單位面積

地主階級別	三十町步以上 大地主	十~三十町步 中地主	十町步未滿 小地主
地主戶數(戶)	七六	一二六	二二九
佃農戶數(戶)	一五,一〇七	七,五〇〇	五,四六九
佃作地面積(町)	五,八六三	二,一四六	一,二二六
地主一戶的佃戶(戶)	一九八	五九	二三
一個戶耕作面積(町)	〇・三八八一	〇・二六六二	〇・二三三四

(注) 未表根據上引東浦同書一一八頁。

三十町步以下的中小地主占大多數，佃耕地的單位面積也隨其地主之細小而愈益細小，三十町步以下地主的佃戶每人耕地面積平均在〇・二二—〇・二六町步之間。即如五十町步以上的巨大地主的佃戶耕地面積平均也不過〇・六六町步而已（詳見東浦氏同書一一七頁表）。

自耕佃種別農家比率表

	自耕農		佃種農		半自耕農戶數	
	戶數	百分比	戶數	百分比	戶數	百分比
明治四十一年	一,七九九,六一七	三三・三	一,四九一,七三三	二七・五	二,一七,〇二三	三九・二
明治四十一年以後五年平均	一,八二四,九五七	三三・二	一,五〇二,七六〇	二七・五	二,一四九,二六四	三九・三
大正二年以後五年平均	一,七七七,四二六	三二・一	一,五三二,七九四	二七・六	二,二三五,八七二	四〇・三
大正七年以後五年平均	一,七四一,五二八	三二・四	一,五五八,一二七	二八・〇	二,二五三,三〇四	四〇・六
大正十二以後五年平均	一,七二八,四二八	三〇・一	一,五二〇,九五九	二八・五	二,二九五,二四二	四一・四
昭和三年以後五年平均	一,七六七,四八八	三二・三	一,四八八,二三三	二六・三	二,三六四,三七九	四二・四
昭和八年	一,七四五,八四七	三一・一	一,四九九,八五五	二六・七	二,三七五,八三三	四二・二
昭和九年	一,七三七,四二一	三一・〇	一,五〇六,三六二	二六・九	二,三六八,二七九	四二・一

（注）本表的編製根據一九三六年《日本農業年鑑》六十一—六十二頁。

從第二還可以看出日本全部農民的約略七〇%處於佃種關係之下。再從上節列表，

又可看到日本耕地約有一半以上是佃作地。在日本佃種制度中有一特色，即半自耕農比率特別大及其年益增加的趨勢。這些事實都在說明日本佃種制度的重要性及佃租異常高率的秘密。

2. 異常高率的佃租

佃租之異常高率也是日本土地制度的特色之一，這種異常高率的地租是日本土地經濟的封建遺制之一種證明。同時它的本質是承繼德川時代的遺物，更足證明其所具的封建氣質。從形式上說，德川時代的租稅有由地主繳納的，有由佃農直接負擔的；在後者的場合，就是以佃租形態代替從來的公租。但是無論哪一種場合，在佃農負擔公租及佃租（即所謂「作德米」）之點是沒有差別的。所以說，明治維新後的佃租完全繼承德川時代的遺制。再從佃租之高率說，明治的「地租改正」對於佃租之減輕毫無影響。當時的佃租大半未加改正，即有一部分改正的，也是以地價標準的米收穫額乘六〇%至八五%，以決定佃租額，可說都是以舊時佃租為標準的。

「地租改正」前後佃農負擔及所比率

	租米占收穫米比率(%)	佃農所得占收穫米比率(%)
鎌倉府租法(□年以後)	四四	五六
文祿田租法(一五九四年)	六七	三三
貞享田租法(一六八六年)	五〇	五〇
明治六年地租改正(一八七三年)	六八	三二
明治四十一年~大正元年平均	五三	四七
大正五年~九年平均	五一	四九

(注) 本節錄山田氏《日本資本主義的分析》一八六頁，詳解參閱本書序論。

佃農的負擔在當時是有增無減的，即至最近仍占甚高的比率。據東浦氏所引最近的調查，一季作田的佃租四十五縣平均為〇·九七二擔，占收穫米總額一，九〇八擔的五〇%；二季作田的佃租，三十七府縣平均為一·一九五擔，占收穫額二，一六九擔的五五%。這樣高率的佃租，無怪其與主要各國比較在數倍、數十倍以上。例如每反步佃租日本大正十年一季作田為三一·七四六元，二季作田為三九·五九七元；而英國戰前為二·五〇元，蘇格蘭一九二一—一九二〇年平均為二·〇〇元，愛爾蘭一八八一—一九二〇年平均為一·八〇元，德國一九一三年為一·九二元，法國戰前為一·二〇元—一·六〇元，美國戰前為一·〇〇—一·五〇元。

3. 佃租形態

日本的佃租形態之封建性，即如東浦氏亦從事實說明著：「在日本現行佃種制度上，現物制是壓倒的。舊時的賦役佃租乃至『從屬佃作制』的遺物，現在尚存在於各地方，而支付著勞力地租」（見《日本農業概論》一一九頁）。這樣，我們即不引用所謂左傾作者的舉例，單援用東浦的著作即已證明日本地租形態之如何停留於封建的地租形態上。

日本現代的地租形態，約可舉出勞力地租、現物地租、現金地租，及代金地租四種，而前二者為壓倒的，後二者僅限於特殊農作示其傾向而已。地租形態大體上依其耕地的性質、地方的習慣，及農作物而異。據東浦氏的推定，可分述如下列三種（《日本農業概論》一二〇—一二一頁）。

(1) 水田水田的佃租，幾乎全國皆以米租為通例。山梨及長野等縣，也有納稻子的，但其社會意義並不引人注意。只是近來由於各種情形而採用錢租的，漸有增加的傾向。

(2) 普通耕田耕田的佃租，普通以來，麥、大豆，現金的單一租或參雜數種者為多。但其中仍以米租為最多，麥租次之，大豆及現金又次之。這裡有一應加注意之點，即以

米為旱田的佃租。現物地租大體上是以納本耕地生產物為原則，而不產米的旱田佃租則用米者占最多數。其故安在？這是舊幕府時代從一切的土地徵取米產以為貢租，不使米留於農民手中的制度；換言之，是經由旱田的支配關係徵收水田作物的制度的遺留，這照實指示著農民生活之隔離米的狀況。

(3)園地園地的佃租，通行全國的以米和貨幣為最多，而麥及大豆等物次之。園地佃租多通用米的原因與耕田相同，而錢租特別多之點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點。園地的生產物（桑茶及果實）不適於用作現物佃租，又園地生產物大多是近代的商品生產物也是一因。這些皆是園地經營完全轉化為貨幣經濟的結果，園地佃租之急激轉變為現金地租的原因，也在於此。

關於上列三種耕地的現物地租，還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就是物租種類並不限於米、麥、大豆等主要農產，且有陸稻、小米、白薯、大麻、紙、桑、茶等，有時甚至混用兩種以上的作物。其次，就是一般的佃農尚處於地主繁忙時提供勞力幫助地主的慣例。

日本農村業已相當貨幣經濟化，被編織於貨幣經濟網之中，而地租卻尚停滯於封建的形態上，最大的原因是便利地租的剝削。這層上面已經詳細述過，無需重贅。不過，因此而明治維新的「這個過程，本質上不是由自耕農到工資奴隸的創出過程，而是到借款奴隸的創出過程，不是「近代性」的創出，而是佃作形態上「封建性」比重的增加」，「布爾喬亞革命的維新革上的封建性比重之增加」（《明治維新史研究》一五七頁）。

原載一九四一年一月至六月《戰時日本》

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至第五卷第二期

編者注：文中數字統計可能有誤，為尊重原文起見，未作更改。

日寇通貨膨脹的新發展

一

歐洲戰局的擴大與激烈化，勢將延及亞洲，戰神的魔手摸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只是時間的問題了。在這種情形下，好戰的日本帝國主義，不但深陷中國戰場的泥足，無法自拔，此後還要覺悟更大威脅及更困難局面的到來。日本目前最懸念的問題，仍是根本矛盾無法解消的蘇日關係與美日關係。蘇日矛盾絲毫不因為蘇日中立協定的實現而解消，蘇聯用繼續幫助中國及禁運軍火過境的事實，粉碎了日寇當局一時「得意忘形」的幻想，所以日本論客仍謂「蘇聯虎視於日本背後」。蘇聯國防建設的成功與積極推行，更使日寇畏懼擔心。近年來蘇聯加速度地增加國防費。中日戰爭開始的一九三七年只是一七五億盧布，但是去年一九四〇年則增至五七〇億盧布，本年度預算更增加至七〇八億盧布。美國現在的重點雖然在於援英擊德，對於日本則暫採緩和手段，但是美日在太平洋上爭霸的衝突，是與日而俱激進的，日本朝野現在莫不以美國太平洋軍事的增強為憂。他們對於美國本年度軍事費的增加即已十二分畏懼，所以說道：「近年來加速度增加軍事費的美國，今年度通過大國防預算六十七億美元，明年更決定膨脹至一〇八億美元。此外又據對於武器貸與法再增加七十億美元的特別預算，總計一七八億美元——約當日金七六〇億元。美國決定這樣空前的超大國防費，皆證明其用意不僅在對付歐局，而且是在準備太平洋戰爭。」（《東洋經濟新報》一九六九號）

在這種恐怖籠罩下，日本自不得不在貧困的國民經濟上加緊壓榨，並動員各部門經濟，企圖克服當前的經濟危機，準備應付未來更大的戰爭。但是這種辦法，不僅是剝肉

醫瘡，並且是飲鴆止渴，日本經濟界將走上更高度膨脹及統制的途程。

二

隨著世界各國軍備的擴大而日本的龐大歲出已達到全國生產力不能全部消化的程度。現在為著籌劃臨時軍事費而每月必須發行公債四十五億元，這筆款先由日本銀行或儲金部承受，以後逐漸轉給普通銀行及其他金融機關，乃至一般大眾去消化。但是結果，不能全部消化，所以逐漸增加日本銀行的（法定鈔票）發行額，而致通幣的流通量大大增加。去年三月中（十五日）的日本銀行券發行額只有三八二，一〇〇萬元，但在這一年中增加的數量竟達九二，八〇〇萬元。其最大的原因，就是一年間停滯未消化的公債，又增加一三八，八〇〇萬元（日本銀行普通以未消化出去的公債為準備金，增發銀行券）。若和以前的情形比較，其趨向將更明瞭。去年三月中（十六日）以前，約略一年間，日本銀行券發行額增加了八三，三〇〇萬元，停滯公債增加了八〇，五〇〇萬元；而前年三月中（十八日）以前，約略一年間，日本銀行券發行增加額，只有四九，〇〇〇萬元，停滯公債也只增加三三，九〇〇萬元。公債未消化部分愈來愈多，本年度內還有不少不能發行的公債，日本銀行也自隨其比例而增發銀行券。政府已放棄去年秋季以前的抑制膨脹政策；而走上通貨膨脹之途。

三

日本當米內內閣當時曾經採用過抑制膨脹的政策，即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以後，這種政策還繼續下來，一直到去年秋，都可以說是膨脹抑制的時期。

第一是國家預算的減少。自去年春七十五屆議會，減少預算即成為日本政界的問題，

政府也被迫答應極力緊縮。這個宿題在米內內閣沒有得到解決，直至去年九月第二次近衛內閣，才實現了節約，預定減少十一億元，其純節約額是六四，〇〇〇萬元。其緊縮的方式採用停付軍部的預支，停止政府部分的支付，半強制金融機關購買公債，對於流通資金的貸出則勵行報告主義等等。

日寇的膨脹抑制政策，不只實行於日本內地，同時也採用於偽滿。偽滿比日本還率先斷行財政的節約，即產業開發計劃，也都緊縮至某一程度，銀行的借款也採取緊縮方針，由日本到大陸的旅行者也受到極度限制，阻止旅行者之撒布資金，即連軍事關係的支出，也盡可能採取節約主義。

日本一方面採用日元系通幣的膨脹抑制政策，另一方面又強制實行其流通圈的擴大政策。在華北方面，去年八月強制天津英法租界當局締結通用偽聯合準備銀行券，加強了偽聯銀行的輸出匯票集中政策，而擴大偽聯銀券的流通範圍。在華中方面，自去年年初即禁止日票的流通而專用軍用票，即腹地的交易也完全以軍用票為標準，斷行了相當徹底的軍用票流布政策。這完全是打擊法幣，抑低法幣價格，提高日元的策略，終於引起了上海的金融問題。

然而日本的膨脹抑制政策，在通幣方面雖有多少效果，但在物價方面則幾乎沒有積極降低物價的能力。再自生產的角度看，除重點事業以外，一般產業界都是愈加增高困難的程度。日本一方面集中軍需部門的生產力，提高貨幣購買力；一方面卻加膨脹抑制於金融界，自然不會發生很大的效果，倒反愈使產業界增加困難。因此，日本當局又不得不緩和膨脹的抑制，而自去年秋後急轉直下，走向相反的方向。要而言之，去年春至秋間的膨脹抑制政策，只是日本高度國防體制推行中的一大波動而已。

四

日本自去年春至夏間，因為採取膨脹抑制政策的結果，無論是產業部門或是金融部門皆由停滯而入於蕭條，百業不舉，迫使日政府重新考慮新政策問題。再加上歐洲局勢的激烈化，德國強拉日寇加入德意軍事同盟，日本軍部乘機強制日政府實施所謂「高度的國防」，而日政府的膨脹抑制政策，遂一變而為金融緩和策，急速地再度走上膨脹的途程。

日本政府首先採取的應急辦法，是由儲金部放出短期貸款資金五千萬元，公司債抵押貸款資金九千七百萬元，購買證券業者現有公司債約三千萬元，總共約有二億元的新資金出現於流通市場。同時，政府方面也再對軍隊方面實行預付辦法及政府納入品的部分付款等辦法。其結果，政府對民間的支付超過額，遂逐月增加，由九月的九千六百萬元到十月的三五，六〇〇萬元，十一月增加到三五，六〇〇萬元，十二月份更激增至一一六，三〇〇萬元。在這三個月間的政府支付超過額共達一八八，五〇〇萬元，比去年一一七，〇〇〇萬元，增加一七，五〇〇萬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這種金融政策的目的，在於供給軍需工業及其基本工業，以充分資金而刺激增產，促進所謂高度國防。

日本政府又經由日本銀行實施其信用大膨脹政策，其途徑約有兩端：其一是對政府給予信用，增加公債的投資；其二是對民間給予信用，增加對民間銀行的放款。日本銀行行的公債（短期的政府證券除外）投資，在去年九月是倒賣出一千一百萬元，但自十月以後則反購進，十月份二八，七〇〇萬元，十一月份二三，二〇〇萬元，十二月七三，八〇〇萬元，三個月間累計總投資一二五，七〇〇萬元。在同期間，政府發行二十六億的巨額公債，而其半數為日本銀行所承買。上年同期，公債發行總額一六五，〇〇〇萬

元之中，日本銀行只承受四七，五〇〇萬元，可見去年特異之點了。

日本政府膨脹抑制政策緩和的效果，首先表現於民間銀行由日本銀行借款的減少，去年八至十二月期間和前年同期間，走著相反的方向。此外由日本銀行的一般往來存款的增加，也可看出日本金融緊縮情形的緩和。但是這種金融新趨向的發生，完全由於日本銀行擔受的公債增發，其結果又表現為銀行券（鈔票）的增發。自去年十月以後，日本銀行券的增發額即開始激增：八月只有三五三，三〇〇萬元，九月也不過是三六〇，五〇〇萬元，十月增至三七五，三〇〇萬元，十一月又增至三八七，四〇〇萬元，十二月更增至四七七，七〇〇萬元。（皆據日本銀行日報）

五

日本政府雖靠發行公債政策來籌劃國防建設資金，來阻止金融界及產業界的頹勢，但是公債的消化成績並不很好：公債發行額盡增加了，可是消化率卻反降低了。去年夏季的消化率尚有九三%，至冬季則降至五一·六%，逼得日本政府不得不減少公債發行額（由去年冬季的二十六億元減至今年春季的一五八，二〇〇萬元）；另一面又強逼各界承銷（財閥的承銷額以百萬元為最低度），才得到一〇〇%的成績。

另一方面，日本產業界並沒有因為日本政府的膨脹政策，及日本銀行的信用政策而有活躍的發展，這點可從產業公司的股票價格的低落看出。據東洋經濟新報社的調查，三十種產業公司股票平均價格的變動，是以去年四月的九十六元九十錢為最高點，其後一直跌落下來，到去年十月竟突破七十三元七十錢的紀錄。以後雖有多少反漲，但直至今年三月底，也不過恢復到八十元。並且這次的反漲，並非由於經濟的原因，而主要的由於政治的刺激。第一，是日本政府的經濟統制的緩和，其具體事實是近衛內閣的所

謂新經濟體制的實施，碰到一般財界的激烈反對而停頓或修正。第二，是昭和十六年度（即本年度）政府龐大預算的通過，這給予了一般經濟界，特別是軍事性工業界，以很大的刺激，形成戰爭景氣再高一層發展的前期狀態。第三，是德國在巴爾幹的勝利，給予夥伴日本的人民以不少的慰安與幻想。第四，日本國內現狀維持派（穩健派）勢力的抬頭，財界代表人物及有關係人物之入閣，所給予日本投資者的興奮等等。

日本去年秋以後再膨脹政策的反應，還可以從日本的輸出貿易的變化上，求得一部分解答。日本去年八月以後的對外貿易，若與上年同期比較，則為相當的衰退，其輸出貿易額的減少，八月份即達五，九八三萬元以上。甚至如十二月份竟達一一，八五七萬元，其減少率是：八月份一五·九%，九月份二七·六%，十月份一〇%，十一月份一四·九%，十二月份二五·六%。反之，輸入方面並沒有減少，更可說明日本經濟界的動向了。

日寇的物產及動力總剖述

一國的動物、植物，以至礦產，動力資源，對於那個國家的經濟狀態及興衰，是有極大的影響。我們固然不主張「地理決定論」，但是一切的自然條件在同樣生產關係下決定種種不同的經濟動向，卻是無可否認的。所以在同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各國中，檢討各自的動物、植物、礦產、動力資源，乃至其他的自然條件，也可以看出那個國家的工業、農業、漁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盛衰。

這裡擬就日寇本國的動植物界、礦產及動力資源，作基本的檢討，以便瞭解日寇產業界的特殊情形，及對外的依存關係。

一、植物的分布

日本植物界的主要特色，就是種類繁多及數量豐富。日本的植物種類達一千五百多種以上，其中由住民栽種的即有四百多種。在日本的森林中也有一六八種以上的樹木。這比其他的地方多出很多。美國也不過一五〇多種，歐洲僅有八十五種。主要的原因當然在於日本列島之延長互於寒帶、溫帶、亞熱帶及熱帶。日本動物界的特色，就是陸上動物的缺乏及水棲動物的豐富。日本不但一般的陸上動物缺乏，即如家畜及家禽也極貧困。反之，日本的水中動物卻極旺盛，占世界各國的最高位置，這是由於海岸線之富於曲折。一九三三年度日本的漁業產額為五，〇九五，〇〇〇公噸，同年英國的產額卻只有九九四，〇〇〇公噸，挪威的產額（一九三二年度）為一，〇〇四，〇〇〇多公噸，美國的產額（一九三二年度）只有八三四，九〇〇公噸，據金鋼石社《經濟統計年鑑》所載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每公噸為一千基羅格蘭，略

大於美噸，略小於英噸）。

日本植物的種類雖然多，數量雖然豐富，但於國民經濟具有普遍意義的，則為數不多。其主要的，只可舉出米稻、茶樹及甘蔗、若海草、桑樹及木材類等，則不過占次要的地位。再如棉、亞麻、小麥及豆類，雖產於日本各地，但是產量極其微小。這些主要食料及染料倒反仰給於外國。只棉花一項，每年由外國輸入總額即達一四，〇九九，〇〇〇俵（每俵一百日斤，據日本紡織聯合會一九三四年度的調查）。日本植物的地理分布，約有四種區域，即熱帶、亞熱帶、溫帶，及寒帶。其中以亞熱帶及溫帶的意義最大，約占全部領土三分之二以上的比重，並且包括日本最重要的地方。熱帶地方占北緯三十一度以南的日本領土、台灣、琉球、南洋委任統治地，及九州南部皆屬之。主要的植物有甘蔗、樟腦、竹、米、馬鈴薯、烟草及種種果樹和木材，其中特具重要經濟意義的當推樟腦（全部產於台灣，占世界總生產額的大部分）、竹、米及甘蔗。亞熱帶的領土包括北緯三十度至三十七度地方，本州的大部分、四國全部，及九州的中北部皆屬之。這部分的代表植物，有米、茶樹、桑樹及種種果樹。木材之中有日本松、常綠櫟、山茶、矮棕、杉、竹及日本楓樹。溫帶地方位於北緯二十八度至四十三度之間，包括本州北部，朝鮮全部及北海道的西南部。這部分是日本最重要的森林區，所產木材供給全國的需要——特別是日人家用的燃料如木炭。農業植物之中有大麥、燕麥及各種豆類。在南部區域，果樹的栽種極其普及，有梨、桃、梅、蘋果及櫻桃等。寒帶地方僅占日本領土的極小部分，只有北海道的北半部、南庫頁及千島列島，位於北緯四十三度至五十度之間。這部分的植物和同緯度的別個國家比較，貧弱得多，這是受到寒流及暴風的影響的。只有針葉樹的森林略具重大的經濟意義，至若栽種植物的燕麥、馬鈴薯、亞麻、麻及食用草，並無多大的重要性。

在日本的植物產品中具有相當的經濟意義而又值得特別提出的，尚有木材的生產。

日本的森林面積占日本領土的大部分，約當五四％。這種高比率僅見於斯幹第那維亞各國（芬蘭為七三％），在南部亞洲的熱帶地方，日本占第一位。森林及原野的面積（據日本農商務省的統計）達四三，五七五，〇〇〇公畝。不過，日本森林之具有工業意義的幾乎可以說僅限於熱帶地方的台灣，其面積約為二，二〇〇公畝。故較有價值的木材資源在森林全部面積的一半以下，其他部分的生產用作普通燃料。日本森林的地理分布，最密的為台灣，其次為北海道，再次為日本三島。日本森林的所有關係也富有趣味，約當三四％的面積為官有（即國有），一九％歸市村公有，七％為皇室及寺有；民有面積不及一半，約為四〇％。

二、動物方面

日本動物可以分為二大類別，即陸上動物與水棲動物。陸上動物極其貧乏，家畜及家禽尤其是缺少，是上面說過的。家畜之中僅有牛、馬、豚、羊等，並且產量不多，這是日本肉類消費量微小的原因。一九三二年牛的宰屠頭數為一五五萬頭，豚為二七四萬頭；一九三二年以前為數更少。此數若與美國的牛一，二八〇萬頭（一九三二年），豚七，一一五萬多頭（一九三一年），羊二，三〇〇多萬頭（一九三一年）比較，實在微乎其微（據 National official Statistics）。日本的羊毛更不得不全部仰給於外國，大部分是澳洲。

在日本昆蟲之中，只有蠶特具重要的經濟意義，值得特別一提。生絲的生產在大正末年達到九五，〇〇〇多萬元，最近還有四億元內外的生產（一九三四年度）及三八，〇〇〇多萬元的輸出（一九三五年）。

然而日本水產動物卻與陸上動物相反，特別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日本的水中動物可以分為海水動物與淡水動物。近年來海水動物的重要性之增大非常急速，已取淡水動

物的地位而代之了。淡水動物大多產於琵琶湖等湖沼，產額極其豐富，主要的有鯉魚、鱒魚等。養魚業近來頗為日本國民所重視，特別普及於瀨戶內海各海灣，其次為東京灣、伊勢海及北海道。魚類為日本國民的主要食物，聊可補償肉類的缺少，故於日本的民食問題特具重要性。

日本海水動物的特色在其多樣性，南自熱帶地方，北至極北，所有一切的代表動物大概皆有。日本的海水動物大體上可分為三種類：(1)魚類，(2)海棲動物，(3)軟體動物及蟹。魚類特別繁殖，所以日本漁業特別發達，不但用作食物，並且利用作肥料。

日本漁業在其國民經濟中占極高的地位，其產額在世界各國中占第一位，每年輸出額在六，三二九萬日元以上（據日文《外國貿易月報》所載）。

世界主要國家的漁業產額

國別	產量(千公噸)	年度
日本	五,〇九九·五	一九三三年
英國	九九〇·四	一九三三年
挪威	一,〇〇四·二	一九三二年
美國	八三四·九	一九三二年
德國	四〇九·〇	一九三三年
加拿大	三三九·〇	一九三三年
法國	二九八·六	一九三二年
愛爾蘭	一一二·四	一九三二年
荷蘭	一一二·四	一九三四年

(注) 據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

日本的漁業近年來日益發展，其作業範圍也年益擴大。日本的主要漁業區約有五個區域：(1)日本領土的沿海，(2)北海道近海，(3)中國近海，(4)朝鮮近海，(5)與蘇聯締結協定的極東漁區，及(6)北美海岸區域稱大洋區。日本漁業區近年來漸由瀨戶內海移向北方漁區的北海道及本州北部，更進而移向大洋。日本漁業的膨脹逐漸侵入蘇聯極東的領海及美國海岸的近海，年來糾葛不斷的日蘇漁業問題即可證明。其向南的發展也更加侵入我國的領海，所不同的只在於沒有引起糾紛罷了。

三、動力資源

日本的現代資源是一般的缺欠，這個原因促使日本資本主義又一開始即踏進帝國主義的階段。羊毛的全部及棉花的大部分仰給於外國，鐵礦的需要亦須依賴外國的供給。即如主要動力的煤及煤油的出產也都列於第二流國家之伍，遠不及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只有白煤(Whitcoal指電力)在動力資源的比重較大於其他的國家，尚得補償別種動力資源的缺陷。日本的發電量一九三三年是一八，一六〇百萬基羅瓦特，在主要資本主義各地中僅次於英美，美為八二，三七九百萬基羅瓦特，英為一八，八八六百萬基羅瓦特(據日本經濟統計年鑑)。日本電力產量約占世界全部產額的九·八%，列為世界第三位，這是日本動力生產的最大特色。但若就其水力的潛藏資源加以檢討，則又不過三千萬噸，僅占世界儲藏總額二·五%，降為第十位。日本的水力電氣業已充分發展，同時日本水力資源之開發也已達到全部儲藏量的六二% (據博博夫著《日本》第一篇第六章)。日本動力資源的前途，與此自煤資源的漸減及其生產費的增高相聯結，依然是重大的問題。

日本的基礎水力電區，是本州的中央部。那裡有占全國七一%的潛在水力資源，可

日本主要的水力資源

以利用的成分為七四%。全國幾處最大的發電所皆集中於此部分，而供給其電力於日本全國最主要的工業區，如東京、橫濱、名古屋、京都、大阪及神戶。日本電力的基礎生產區，大體上與電力的需要區域接近，這是日本動力資源上的另一特色，更加增大白煤在日本工業上的經濟功用。供給水力最主要的河川，在日本海岸方面有首占第一位的信濃川，其次有發源於猪苗代湖的阿賀川及黑部川；在太平洋海岸有木曾川、根利川、天龍川及富士川等。此外尚有幾處著名的湖水，如琵琶湖、諏訪湖及猪苗代湖等，皆為天然巨大儲水池，良好的發電所。日本水力資源之地理的分布，列如下表，其功用隨年來遠方輸送法之發展而愈益增大，更加促進日本工業之發展。

地名	利用量		利用可能量		實際利用量	
	最低	六個運轉時	最小	占可能的比率%		
東京橫濱	一,〇二七	一,七九三	三九六	三七·六		
名古屋	四三七	一,〇八一	一五〇	三四·四		
大阪神戶	一八九	三四三	一一二	五九·二		
中部地方	一,七二一	三,二〇三	四一八	二四·四		
西部地方	一六〇	三七〇	五二	三二·五		
北部地方	七九一	一,五二六	一三六	二九·九		
四國	一二九	三三三	三三	二八·八		
九州	三七六	八〇五	一七四	四六·三		
北海道	三二〇	六二五	八一	二六·五		
合計	五,一三〇	一〇,〇五八	一,六五二	三二·二		

(注)單位千基羅瓦特。資料根據《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 Japan》，東京世界動力會議上，前原及森技師的電氣部報告(報告書第十四號)。這表的統計似未加算台灣的部分，若再加上台灣日月潭的藏量及實際利用量，日本的水力資源當更增大。

日本動力資源中占重要地位的尚有黑煤。日本黑煤的埋藏量尚無定論，但據日本著名的地質學者井上禧之助教授一九一三年在第一二回國際地質學會上的報告，總量當為八七二，七〇〇萬公噸，其中業經開採部分為三一，五〇〇萬公噸，當時截止的推定埋藏量尚為八四一，二〇〇萬公噸(注一)。一九二九年渡邊萬次郎教授在東京世界動力會議上的報告，又追補北海道及庫頁島的資料，推定一九二八年的埋藏量為八二七，五〇〇萬公噸(注二)。又日本黑煤的採掘早即相當發展，一九二八年全國產量即已達三六，七九九千公噸。近年來雖因生產費之昂貴而略為減少，但尚為三二，四八四千公噸(一九三一年)。殖民地的產額且又年益增加，所以日本過去曾經長期充當過煤的輸出國，近年輸出量雖漸減少但尚足供本國之用。

日本目前黑煤的問題在於(1)生產費，即技術組織的問題，及(二)特種煤如焦炭的問題。這兩種問題正和滿洲的煤產及華北特別是山東的煤礦聯絡著密切的關係。日本黑煤資源之地理的分布，占最大比重的是北海道，其次為九州，再次為南庫頁，而本州的比重很低，僅高於台灣。這是日本經濟比重上的例外事實之一。

日本黑煤埋藏之地理分布

地方別	現在埋藏量(百萬公噸)	所占比率%
北海道	三,一〇〇	三七·五
九州	二,六三五	三二·八
南庫頁	一,五八四	一九·一
本州	六四五	六·六
台灣	三六九	四·五
朝鮮	四二	〇·五
總計	八,二七五	一〇〇

(注) 本表資料根據《東京世界動力會議議事錄》(一九二九年中)《Coal Resources of Japan. The Imperial Geological Survey of Japan》P317。推算時期為一九二八年截止。朝鮮的埋藏量僅包括無煙煤及半無煙的煤礦。

日本動力資源一般的特色，要而言之就是動力資源絕對量的微小及其種類的多樣性。日本動力資源的種類除了上述的電力和黑煤而外，尚有煤油、泥炭、天然瓦斯、可燃性片岩及木材。但是日本全體動力資源的總量，在各國中占很低的地位，僅略高於意大利而已。

日本及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動力資源

國家		資源			
		總動力	黑煤	水力	木材
日本	百萬公噸	一五,七七八	六,八二〇	五,一八八	三,四九三
	比率	一〇〇・〇	四三・二	三三・九	二二・一
法國	百萬公噸	一八,三二八	一四,八一八	二,三八〇	一,〇二〇
	比率	一〇〇・〇	八〇・九	一三・〇	五・六
德國	百萬公噸	二二五,一二〇	二二八,七九四	三,〇〇〇	一,二三一
	比率	一〇〇・〇	九七・二	一・四	〇・五
英國	百萬公噸	一七〇,二七〇	一六四,五六六	六二八	七二一
	比率	一〇〇・〇	九六・六	〇・四	〇・四
意大利	百萬公噸	三,一七九	一三八	二,四〇〇	六四〇
	比率	一〇〇・〇	四・三	七五・三	二〇・四

(注) 本表資料根據 Poppov 著《日本之技術的及經濟的基礎》第一篇第一章第三項。總動力之項包括煤、煤油、泥炭、木材及水電力，煤油及泥炭因其在日本所占比重過低，故未列出。德國之項，除去薩爾，不加算在內。

日本天然動力資源之缺乏，逼使日本儘量利用現有天然動力近於飽和點，同時又高度壓榨人類筋肉的勞動力。但是總的動力生產量依然低下，遠不及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

這不但是指動力生產的絕對量，並且可以適用於人口的比例上，是極有趣味的問題。日本的人類筋肉勞動力在各種動力中占很大的比重，即如德國尚且遠不及它。德國筋肉勞動力的比重為五·六%，而日本則為一九%。又其總動力生產量之薄弱如下表：

各國一日的動力生產量（單位時間及百萬馬力）

生產量	國家				
	美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日本
勞力	四〇	一五	二二	一四	二二
黑煤	一,〇〇一	二七〇	三三三	一二七	五二
煤油	四八一	二八	一〇	二二	七
水力	一一二	四	一三	一四	三〇
總量	一,六四三	三二七	三七七	一七七	一一〇
人口(百萬)	一二三·七七	四七·七二	六二·三四	四〇·七四	六二·九四
每人一日生產量	一三·三八	六·六五	六·〇四	四·三五	一·七五

（注）本表資料根據《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一九三三年No. 1）。美國的煤油項下包括天然瓦斯。

四、礦產方面

和上述動力同具重要性而為日本列島所缺欠的現代資源，就是礦物資源。日本的礦產雖然隨日本資本主義的工業化而年益增加，由一八七七年的三四〇萬元增至歐戰前一九一四年的一五，六一〇萬元，更增至戰後的六四，一三〇萬元。但其需要量的大部

分仍仰給於外國。歐戰後因為生產原費的高漲，而日本礦物的生產又呈漸減之勢。

年度生產實額（百萬元）

一九一九年	六四一·三	據博博夫《日本》
一九二一年	三三二·六	
一九三二年	二八二·二	據《經濟統計年鑑》
一九三四年	五二九·五	

一九三一年以後是所謂日本「躍進」的年度，日本軍事工業有急速的進步，但是礦物的總產額也不過如此。並且在這總額當中，朝鮮，台灣及南庫頁的產額約占去六分之一，日本本土的礦物資源之如何貧弱，可以想見。

在礦物中具最大經濟意義的鐵礦，在日本列島偏又十分缺乏。據斯德哥爾摩地質學會的老資料，日本鐵礦的儲藏量不過五千六百萬噸，只占世界全部儲藏量的〇·一九%，純鐵儲藏量二千八百萬噸，占世界的〇·二三%（這是因為日本鐵質較好，鐵成分較多）。即據日本地質學協會的資料，鐵礦的儲藏量，也不過是確定部分為四，五〇〇萬噸，潛在部分為八千萬噸。日本鐵礦區大部分集中於北部，即北海道的南部及本州的東北海岸地方——岩手縣，那裡有日本最老的鐵礦山、釜石。日本鐵礦只在其礦質之高及其位置與煤礦接近之點，可稱為優點。但其仍須依存於太平洋沿岸其他各地的鐵礦，卻依然無變。因此，日本近年來愈益急向中國大陸及南部亞洲諸國侵入，構成太平洋問題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在有色金屬的礦物資源中，日本銅產占突出的地位。銅礦幾乎遍於日本列島，而集中於本州的北部及中央部，特別是茨城縣、□木縣。那裡有最著名的銅山、足尾。

其次為秋田縣。四國的愛媛縣，九州의 東南部，台灣及北海道的小部分，亦有銅礦。據博博夫的著作，日本銅礦的埋藏量約為一五，〇〇〇萬噸。日本銅產在礦產中占很高的地位，一九三〇年的產量為七九，〇三三公噸，一九三三年尚為六九，〇〇〇公噸，足供其自用五分之四（一九三三年的消費量為八三九，〇〇〇公噸）。此外尚有鉛和亞鉛，貴金屬的礦產中也有金和銀，但是地位均不甚重要。一九二四年的產量，金為四六六盎司，銀為六，八〇四盎司。銅、金及銀的產量皆據《Year-Book of American Bureau of Metal Statistics》。

在日本礦物中具最大經濟意義的，須推非生礦礦物，例如粘土、硫黃、黃鐵礦、砒素及磷。粘土之豐富造成日本為世界陶磁器的最大生產者之一。據日本商工省的統計，日本陶磁器一九三三年的總產額為八五，二四六千元，一九三四年的輸出總額達四一，八七七千元。又因為日本富於火山性而置日本硫磺生產於重要地位。據一九二六年全世界地質學會的資料，日本硫磺的儲藏量非常之大，僅次於兩個地方，西班牙和荷屬東印度。

世界硫磺儲藏量（單位千噸）

地方別	實際量	推定量
西班牙	一七三	二二二
荷屬印度	—	一六七
日本	八三	一五七

日本硫磺的主要產地，是北海道（十二—十五千噸），岩手縣（二〇—二十五千噸），福島縣（六—八千噸），及群馬、栃木二縣（五—七千噸）。日本的硫磺生產有年益增加的趨勢，以一九二七年的四七，七七五公噸到一九三二年的八四，五一二公噸，

再增至一九三四年的二二八，四二三公噸（據《經濟統計年鑑》）。

日本黃鐵礦之豐富，亦與硫磺同樣，促使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生產者之一。此二者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因為它們是重化學上根本生產的硫酸的原料。日本黃鐵礦的生產也日益增加，以一九一三年的一一四，〇〇〇噸到一九二六年的四一七，〇〇〇噸，及增至一九二九年的六一九，〇〇〇噸（據上引博博夫《日本之技術的經濟的基礎》）。

日本砒素的採掘，近年亦呈急速的發展，其產區集中於北海道、九州及朝鮮。日本砒素的總生產量已達四千噸，幾占世界總額五％—六％。此外，磷亦有重要的意義，其產源亦為硫磺一樣起因於火山的活動，日本磷的出產，更有急速的發展。一九一三年僅為二五，〇〇〇噸，自一九二五—一九三〇年之間，已增至十七萬噸左右。磷的用處在於充當化學工業，特別是軍事性的化學工業的基本原料。

日本運輸機關的發達，更使上述非生礦礦物的經濟意義增大，使在現階段的日本經濟占重要地位的化學工業能夠完成其普遍的發達。非生礦礦物生產的增加，和現階段經濟的發展互相聯結著。在這日本經濟愈趨於軍事工業化的時代，這些礦物，特別硫磺和磷的消費者，第一就是軍事工業，其次為電氣化學、染色工業、陶瓷工業、製紙業及冶金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益擴大的今日，日本有色金屬及非生礦礦物的生產，將更引人注意。

注釋：

① 《第十二回國際地質學大會議事錄》第一卷井上教授的報告。

② 《Transaction of the Tokyo Sectional Meeting World Power Conference》Vol. PP. 307-317.

日寇戰時的死亡問題

中日戰爭發生以後，日本統治階級痛切日軍的精神道德頹喪墮落。特別是日本軍閥感到頭痛的，是國民體格的衰弱，死亡率的激增，肺結核病、花柳病、眼病及其他各種職業病的普遍流行，致影響徵兵不易，兵源缺乏。此種現象，連「天皇」也看不過眼，去年在他生日那一天，特賜五十萬元，作為「滅癆」基金。軍部和厚生省感謝浩浩「皇恩」之後，發狂似的提出了改善青年健康，增進國民體格，強化民族，和保護嬰兒，多生子等運動。日本軍閥這樣表示對青年的關心，並非出諸慈悲，主要的是為了保證兵源的補充。它以為這樣就可撲除各種社會流行病，增進軍隊的來源，殊不知此種病態，完全是由於日本資本主義制度而來的。日本資本主義是一個什麼制度呢？簡單一句話，是一個吃人制度。

早在一九三五年七月，日本共產黨領袖岡野氏在第三國際會議上，作了一個尖銳的政治報告，就以「日本現存的制度，是進行戰爭，製造饑荒，和蹂躪人權的制度」為題。在報告中，岡野指出日本大眾在日本國內所受的剝削，也正如在殖民地一樣：「工農在日本資本主義的掠奪下，在地主的奴役下，在警察的暴力下，變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人民隨便遭受暴虐的警察逮捕毒打，以至成為殘廢；饑餓與疾病，威脅每個人的命運。這樣的血腥統治，造成了日本國民精神的喪毀，體格的衰弱，死亡的增加，自殺的日多，疾病的流行，這是天然的結果，我們知道，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主要是建築在對外輸出的輕工業上。所謂價廉物美（？）的日貨，氾濫著全世界。這完全以榨取日本大眾為基礎，來造成日本資本主義的繁榮的。

九。一八以後，日本資本主義又變成了半軍事的編成，瘋狂的備戰，使得國民體格加速度的衰弱。在所謂「準戰時體制」之下，擴大軍備與擴充生產力愈益進行，勞動力的供給就愈感不足，因而強化勞動愈益加甚，而國民體格衰落的傾向就愈趨嚴重，日本人的死亡率也就特別增高。這裡試把日本國民的死亡率和各國比較一下吧。據《改造》所載，一九三三年，日本每千人的死亡率為一七·八%，法國為一五·八%，意大利一三·五%，英國一二·三%，德國一一·二%，荷蘭只有八·八%，由此可見日本的死亡率，比任何國家都高出許多。

但這個資料，還未夠說明日本統治制度的「文明」。請再看看日本人口問題專家上田貞次郎於《經濟學者》雜誌上所著《時局與人口問題》一文吧：

「日本人口死亡，以幼兒之死亡者最多，所謂多產多死傾向之嚴重，乃其第一特徵。多產多死，在文化低落的國家，其傾向最甚。日本國內也是一樣，像在文化水準被稱為低落的東北地方（包括北海道），幼兒——只要為滿五歲以下者——的死亡率，特別來得高。……現在日本全國平均未滿一歲之嬰孩，其死亡率占出生數一二%；再根據生命表，滿五歲以下死亡者，約占出生者四分之一（即二五%）。」

「其次，日本人口死亡的第二個特徵，是二十歲左右的年齡層死亡數特別多，其原因就是肺病。假如把日本和英國的死亡率比較一下，英國幼兒和二十歲左右的死亡率很低。自然，再以任何年齡層比較，日本人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結果，日本人平均壽命為四十二歲，而英國則為五十四歲，竟發生這麼大的差別。……」

「婦女的死亡率，在她的年齡之某期間，特別來得高，這又是日本人死亡

之一特徵。四十歲以上，婦女的死亡率比男子為低；但從十五、六歲至四十歲為止，則以婦女的死亡率為高。」

請看日本帝國主義者「文明的」統治吧！一歲至五歲的幼兒，其死亡率竟那麼高！此種現象，御用學者每每以欺瞞的遁詞，歸咎於自然現象，而一筆抹殺了資本主義機構的罪惡。上田貞次郎也把日本北海道地方死亡率的特別高，歸咎於文化水準的低落。但我們知道，日本封建殘餘勢力最雄厚的地方，正是北海道一帶。自九·一八以來直至現在，那個地方連年饑荒，農民們受不了饑餓與貧困的襲擊，迫得把成千成萬的女孩出賣給工廠主和妓院，有什麼辦法不使婦女的死亡率不高？又在日本資本主義的高度榨取之下，婦人因肉體勞動過度，多陷於早產及流產。據一九三六年調查，以「包身工」姿態受雇而從農村大批流出的低廉工資的女工，占了日本全體工人四三·七%，而紡織工業的女工更占了八〇·二%。自從戰爭發生以來，男子因多被徵當兵，女工數目（尤其重工業）更驟增起來。去年三月為止，重工業中，男工增加率僅為三七%，而女工增加率則高至五一%；現在重工業部門，已有一成是女工（輕工業為六二%）。女工數目所以增加，除因男工缺少外，貪圖女工工資低廉，柔順耐勞，易於榨取，尤為最主要原因。例如自去年三月至今年三月，重工業部門男工的定額工資增加三·四%，而女工則僅增二·九%。從生理上說，女工本不能擔任重工業的勞動，加以強化勞動結果，女工的死亡率只有激增，這便說明日本四十歲以下的婦女死亡率為什麼比男子高的根本原因。

其次，根據日本秀山界教授的調查，更可明瞭日本二十歲左右的死亡率，其中尤以十五、六歲女孩的死亡率為什麼特別高。他說：不到十六歲的童工，估工廠工人五二%以上，而在這些未成年的童工中，女童工又占九七%以上（即約五十萬人以上）。這些女童工的數目，幾乎等於日本全體女孩的半數了！因了生活條件的惡劣和過度勞動關係，這般不幸的女童工，現在患著悲慘的肺病、駝背，及其他職業病的，已為數不少。由於

這些事實——秀山界教授自問自答道——「不由得我不恐懼：『這些未來的母親所生出的孩子，能夠負得起保衛國家的責任麼？我們國家是在走進牛角的尖端了！』日本人的死亡率所以比各國為高，自然由於國民體格的衰毀。而體格衰弱的原因，則又由於國民的貧乏，生活條件的惡劣，和一切的職業病。疾病中最主要的，要算肺結核病了。例如去年四月廿九日，東京朝日新聞就有這樣的記載：『據厚生省調查，最近日本的肺結核病死亡者，一年達一四五，〇〇〇人；患肺結核病者，則有一五〇萬人，其中過半數是青年，而十五歲到二十九歲的死亡者，結核病占了一半。結核病的蔓延，是如何削弱了現下日本國民的體格，阻害國力的增進，可以想見了。』」

同時讀賣新聞亦以同樣的口吻說道：「日本國民的死亡原因中，以結核病占第一。一九一八年結核病死亡者，達一四〇，七四七人……破最高記錄。後來雖漸減少，但最近又增加起來，一九三六年增至一四五，一六〇人。如果結核病的患者是死亡者的十倍，那末，日本便有一四〇萬人以上是患著結核病，即每五十人中便有一個。」

但這個還是一九三六年的數字，近二年來，結核病者究有多少，報紙是秘而不宣的。可是去年四月三十日，東京朝日新聞又登出這個消息：「據最近報告，今年日本國內的結核病者，達去年的三倍了！」由此推論，那末，恐怕現在日本至少有幾百萬的結核病者了。

這樣日益增加的結核病者，當然是削弱壯丁的體格的。這一點，我們從日本的徵兵檢查中，也可明顯地看出來。據《改造》所載：一九二五年的應徵者，每千人中有二五〇人不合格者；一九三一及一九三二年，不合格者便增至三五〇人；一九三六年再增至四五〇人乃至五百人。一九三六年的應徵兵役中，有一半是患著肺病，眼病和花柳病。陸軍省弄到無辦法，只好再舉一次複驗，降低入伍標準，但是仍不能減少因病不能入伍者的數目（一九三六年軍部《新聞班》調查）。

以這樣的體質組成的日本軍隊，它的戰鬥力當然是很不可靠的，所以秀山界教授曾說：「從一九三一年起，我就研究關於保健問題，……我從研究中得到一個結論：日本軍隊在極快的將來，會發現有體格非常脆弱的隊伍。」弱體的隊伍，必然影響到政治道德的墮落，軍隊素質的低墜，與士氣的頹喪。這一點，連松井大將也不能不對於日軍搖頭嘆息。

松井「凱旋」歸來，〈現代〉雜誌的記者唐島基智三氏曾向他詢問：日俄戰爭時的軍隊與今日的軍隊之間有何差異？他說：「今日的軍隊與日俄戰爭當時的軍隊之間，可以說本無何等變化。」但他接著又說：「只是所謂個性的修養，社會的道德，與乎武士的嗜好諸點，我覺得像是頗有不同，即是我覺得今日的，要來得較劣。此種情形之所以發生，當然有著種種原因，……要之，這是所謂國民的精神與社會的道德於這四十年間自然地趨於墮落所造成的結果。……看啊！松井只是說「自然地」趨於墮落所造成的結果。但既是「墮落」，這墮落當然是由於日本資本主義機構所造成的「惡果」。

這次中日戰爭，「墮落的惡果」充分暴露了出來。「皇軍」原來，就是奸淫搶掠、軍紀蕩然、士氣頹喪的隊伍。以「反共」自任的皇軍，在這次蒙偽邊境衝突中，見了紅軍，也抱頭鼠竄。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當時，日軍那種「日本精神」，今天已不知往那兒去了。

日本軍閥十分清楚此種墮落現象，並且非常恐懼軍隊政治信念的動搖，所以拚命向青年宣傳：日本主義是至高無上、征服世界的主義。「忠誠的日本人」應提高愛國精神。但是，這種教育政策，顯然已失敗了。現在正有不少覺悟的日本青年，都瞭解日本主義的宣傳者真意何在，他們已和中國的弟兄們肩並著肩，在向著日本軍閥作殊死的鬥爭了。

日本人口問題與移民政策

一、日本移民政策的欺騙

「當做民族發展源泉的農業人口」！這是日本官方及其農業人口政策理論者的大標題；且將如何運用農業人口的移殖以遂行其對外侵略，已可想見一斑了。

日本侵略者常常以「地狹人稠」為口頭禪以演繹它的侵略理論，這當然是欺騙之辭，日本的人口密度並不比我國江浙的人口密度高。日本過去向我內地移民沒有顯著的成果，固無庸言；即其移殖於朝鮮及台灣的人數，也並不多。日本移民國外的動機是侵略性的移殖，與普通因人口稠密而移住者，自異其趣。過去移殖於朝鮮及台灣乃至我國東三省的日人，大多是帝國主義先鋒隊的軍人、警察，及專門以剝削為事的前資本主義型的工商業者。日本帝國主義的對外發展是與英美諸先進國家，顛倒其程序的；英美等國先移其商業與工業生產者（經濟的），而繼之以政權如商權之確立（政治的），最後始殿之以軍隊的保護（軍事的）；但是日本則先發動軍隊，最後輸送工商業者。日本的武裝移民，是世界移民史上最醜惡的事實。

然而日本這種最醜惡的移民政策，最近已擴大其應用範圍，除工商業者之外，還更大規模實施其農業人口的武裝移殖，這是日本侵略者更露骨的更尖銳的移民政策之運用。日本政府仍舊以日本地狹人稠為口實，但是事實卻由正面反證了日本侵略者的狡猾。日本侵略者一面在積極推進其〈滿洲百萬戶開拓移民計劃〉；另一面卻在實施其〈本國農村確立十個年計劃〉，並成立所謂〈皇國新農村確立運動案〉，其主要目標在於努力維

持日本農業人口四〇%的存在。換言之，日本本國的農業人口是在年年減少過程中，日本政府還須設法維持其比率不再減低到四〇%以下，而其侵略政策則又欲武裝輸送大批農業人口於國外；侵略者移民政策的荒誕與欺騙，已可於此洞悉其奸了。

二、日本農業人口問題的苦悶

日本在明治三十年代，還是農業國家，農業人口占總人口八〇%以上，明治三十年以後逐漸步著低降的步伐，但其激減則自發動對我全面侵略戰爭的時候開始。日本為著侵略戰爭而動員二百多萬的壯丁到前線，日本軍隊又是大部分構成於農業人口，其農業人口自然大為減少。據櫻井武雄的統計，日本農業人口在中日戰爭前（一九三六年）尚占總人口四三·一%，其後每年約減三萬多戶，每戶若以七人計算，每年減少農業人口當在二十一萬人以上。日本農業人口的比率至中日戰爭四年後的一九四〇年，競降至四〇%以下，三九·八八%。這與明治三十年間的八〇%比率比較，已是大半的激減。這種減少，並不是日本農業生產性提高的結果，日本農村現在動用婦女勞動力，補充男子勞動力，其農耕機器化的程度尚無顯著的進步。於是日本侵略者自己，也已大起恐慌，想設法維持其農業人口四〇%以上的比率，這個決議案已明定於所謂大東亞建設審議會的〈大東亞農業綱領〉之中。但若再就日本農村近來出現了許多所謂「職工農家」，名為農家而實非純粹的農業人口推敲，則日本侵略者的恐慌，當更深巨而急劇。日本農業經濟理論家，也以「皇國農村確立的指導精神」為題，喊出「日本農村再編制」的呼聲了。日本農業人口是在激減過程中，日本政府制定了〈人口政策確立要綱〉，其原則在於預想日本內地總人口至一九五〇年增到一億，而其農業人口必須維持四千萬的程度。然而今日日本內地所保持的農業戶數，只有五四八萬戶，每戶人口以六人計算（據櫻井），

則其農業人口總數只有三、二六八萬人，離四千萬人頗有距離。同時，日本政府，又在積極進行其所謂「適正規模農家」政策，欲使每戶農業人口減少而農業生產性增高，四千萬日本農業人口的維持，當更困難，所謂「膨脹日本」現階段的國外移民政策，陷於非常苦悶之中，也是當然的。

三、日本現階段的移民政策

日本侵略者在上述人口問題的苦悶中推進著對外侵略性的移民政策。

日本的占領區域，確已飛躍的擴大了。這些區域正需要著更多日本人口，去作侵略性的填補。日本軍隊已經開到我國東北四省，開到華北，開到華中，開到華南，還開到安南、緬甸、菲律賓、馬來亞，乃至荷屬東印度等等地方。日本侵略性的移民政策，隨其大陸政策與海洋政策的前進而分成兩種方面：其一是以朝鮮、「滿洲」，及我國內地為對象的大陸移民；其二是以台灣、南洋群島，及我華南沿海為對象的海洋移民。這兩種方面的移民政策，又可就其性質分成兩種典型，即舊殖民地典型與新占領區典型。前者實施於朝鮮及台灣，後者實施於我東北四省、關內各地，及南洋群島。而二者現在皆以農民移殖為特徵。

日本新占領區移民政策的最主要對象，為我東北四省。日本政府規定《滿洲開拓農村計劃》，預定自一九三七年向後二十年間移殖一百萬戶農家五百萬農業人口入我東北四省（日本稱曰滿洲）。此計劃分兩期實施：第一期五年計劃預定移殖十萬戶，其立法程序是先制定所謂《滿洲開拓政策基本要綱》，其後以此要綱為基礎而又制定《農地開拓制度》，《開拓與行政經濟機構》，及《青年義勇隊指導要領》。第二年復又制定《開拓團法》、《開拓協定組合法》，後又制定《開拓農場法》等等。

日本對我東北四省的農民移殖，至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其糧食問題之嚴重化，而更加加緊推進，蓋欲以我東北四省充當工業原料供給地，同時又充當糧食供給地。自一九四二年開拓其「滿洲」農民移民的第二期五年計劃。日本滿洲移民第一期五年計劃實施的結果，共移四萬餘戶，一〇二，〇〇〇多人，茲就其統計列表如下（一九四一年底）：

種類	戶數	人數
集團開拓民	一三，二〇五	七二，一〇四
開拓團義務隊	一〇，七八四	一〇，七八九
集合開拓團	三，二〇八	九，一五八
分散開拓團	二，〇九二	一〇，六九九
合計	四〇，〇九九	一〇二，七五〇

據日文《外交時報》昭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

日本為著強行其所謂「日滿一體」的農業政策，復由其「滿鐵總局」、「滿洲拓殖委員會」、「滿洲開拓義勇隊訓練總部」及「開拓」等關係機關，組織一個綜合機關——「實行委員會」，繼續研究移殖政策和辦法，以期第二期五年計劃達到移殖開拓民（包括義勇隊）二十二萬戶青年義勇隊十三萬戶的成果。

日本舊殖民地移民的典型，就是對我舊領土台灣的移殖，日本一向對於台灣的移民，還是消極的態度，所以統治台灣四十八年，移住台灣的日本人，包括統治上直接必要的軍隊、警察及工業生產支配者，也不過三十萬。但自中日大戰爆發不久，日本侵略者即

一面為著加強「對岸政策」（對我華南沿海的侵略政策）的必要，一面又為著確立戰時糧食政策的必要，而開始實施其名符其實的移民政策。日本為銜接台灣舊殖民地與我華南新占領區而強迫或獎勵台灣人中的青年及壯年農民，移住我國的被占領區，就中尤以海南島為顯著；然後讓出肥沃富庶的地方，給予日本內地的農民移住。年來台灣人的田地無代價被強迫移交日本農民的，不知已有多少；日本農民移向台灣的數目，遂有飛躍的增加。據一九四一年度〈台灣農業年報〉所載，戰爭以來台灣日本移民數，只台南、高雄兩州及台東、花蓮港兩廳這四個地方，即已超過四八，〇〇〇人，估量其全島總數當在十二萬人以上（至一九四二年止）。此外，對朝鮮舊殖民地的移殖，當亦一樣。日本一面趕出朝鮮及台灣的住民，逼迫他們來大陸及南洋群島當國際的流浪者；一面移殖日本內地的農民，以期安定日本本身的糧食問題。只台灣一地，每年即可掠奪七、八百萬擔，約占台灣米的年產量五分之四。

日本的農業人口，雖是年益減少，日本政府雖已焦急欲維持其農業人口的比率在總人口占四〇％以上，但是日本侵略者對於舊殖民地及新占領區，仍將積極推行其侵略性的移民政策。這是日本侵略者的一種矛盾與苦悶，同時這種少數民族國家大規模向外移植，也就是其本身瓦解、分崩、離析的一大前提。這是日本侵略者現階段農業人口問題的真相。

日本產業統制的三種制度

最近在日本產業統制政策上，最引人注意的事項，除了生產行政權的加強與一元化之外，就是統制會制度的成立。但是統管團制度的產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其先尚有「管團制度」及統制會社（公司）的先行制度存在，此三者現在雖成鼎足，但是彼此之間又有密切的關聯。因此三種制度已為一般日本人視為產業統制界的三台柱，故特就其發展過程及其關聯性和異同之點，略加剖述。

日本政府雖自「中國事變」爆發後即著手加強經濟的統制，但是統制會社、管團及統制會制度，卻是最近進入戰時經濟階段以後的產物。在此三種制度當中，首先成立的是統制會社。其成立的原因，在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外國物資來源斷絕，日本政府以統制物資分配為目的。在太平洋戰爭以前，日本物資的缺乏問題就已日益嚴重，漸自一般的重要物資，擴大至於糧食。日本為增加糧食而率先施行統制於肥料的分配上，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即先根據《臨時肥料配給統制法》，組織了「磷酸肥料配給會社」，是統制會社的嚮矢。繼之，一九三八年復又相繼出現飼料、硫酸、洋灰、鐵屑、舊銅、皮革類及橡皮鞋類的各種統制會社。至一九三九年更據《米穀配給統制法》而設立日本米穀會社。其次又出現汽油共販會社。一九四〇年更制定《特別會社法》，組織日本煤炭會社、日本肥料會社、日本輸出農產會社。商工省及農林省也依其各別的統制法令，組織各自的統制會社。至此時，日本統制會社制度算已具體化。

但是日本統制會社制度的急激發展，卻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一九四一年依《特別會社法》組織特殊會社。一九四二年更有根據《物資統制法令》成立了各種統制會社。無論在中央抑在地方，大有雨後春筍之概。尤可驚奇的，此種統制制度不獨出現於物資

方面，即在文化方面也都出現。統制會社是依〈特別會社法〉、或〈一般會社法〉組織的股份公司的形態，其根本性格為營利的財團法人。

其次，營團制度是根據一九四一年第七十六屆議會日本政府所提〈住宅營團法〉、〈帝都高速度交通營團法〉，及〈農地開發營團法〉，開始組織的。其後朝鮮及台灣方面，也都各依〈住宅營團令〉出現了住宅營團。至第七十八屆議會，又通過〈產業設備營團法案〉，第七十九屆議會，再通過〈重要物資管理營團法案〉、〈糧食管理法案〉，而重要物資管理營團，及中央地方各種糧食營團，隨之成立。後又根據〈國民醫療法案〉，成立「日本醫療營團」。本屆議會又提出〈交易營團法案〉，日本有價證券交易所，且有組織日本有價證券營團之議。

該種營團的性格，自其出資之點言，有全部由政府出資的與官民共同出資的兩種。所以出資者沒有股東總會之設，完全由官方指派的理事機關，採取獨裁主義，推行商務，是一種強有力的統制機關。這是營團與統制會社不同之要點。但其事業仍為經濟事業，故其發展形態，為吸收統合民間出資者的一種企業協同體。

再次，統制會是最近成立的一種制度。固然，該種制度早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制定的〈經濟新體制確立要綱〉之中即已萌芽，但因日本政界的意見分歧，致使遲遲未能實行。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始以〈重要產業團體令〉的公布，而於同年十月第一次的指定統制會產業部門。一九四二年四月再追加指定。八月又有第二次指定合計指定二十二種產業，即須成立統制會。

其後，日本政府為著加強統制會制度，而由商工省委設該省有關的權限。最近則由厚生省委設其所轄權限。現在此種統制會已不獨限於〈重要產業團體令〉所指定的範圍，其他的新統制組織，也成立不少。

統制會的性格，在其統制組織上，雖然允許產業團體獨立存在，但對於這些團體則強制其為會員而置於統制之下，所以會員總會，只不過是一種諮詢機關。此點正與營團性質相同。

統制會的會長由主管大臣任命，其所管轄的會社或組合的社長、理事長、副會長，以至理事，皆由會長委任，總會的最後決定，是由會長的責任執行的，完全是一種獨裁管理制。其事業活動，限於統制事業，但不進行生產及配給等經濟活動，此點與營團的性質不同。其為國家機關，並為條文所明白規定。

關於上述三種制度的性質，若作一綜合的比較，則營團與統制會比較相近，純然是以國家的目的組織的，其經營採獨裁主義。而統制會社則尚保持營利主義的構成，政府只是盡可能加以統制，使得適合於國家的目的。

統制會與營團，也有不同的性質，前者允許企業團體的獨立存在，而後者則否。至若統制會社，則又有允許的與不允許的兩種形態。同時，營團帶財團的性格較強，而統制會及統制會社，則為社團的性格。又營團及統制會社，是一種企業組織，而統制會則為統制組織。

從以上的剖述，吾人應該把握的一點，就是日本政府對於產業統制，愈想加強，而其實際則愈須放鬆。這無疑的，是由於日本產業組織的基本弱點，一時無法克服。日本的重要產業，一向採取嚴格的統制政策，在平時因大多局限於軍需工業，並因其軍需工業大部分歸國營，故其統制比較容易。其他產業部門，如支柱工業的纖維工業等，其統制效率就非常低微。故自戰爭爆發以來，日本急進派即主張擴大國營制度，或實施全面的國家管理。

但是實施國營制度，日本國家無此力量，即退而採取全面的國家管理，行政費負擔

及虧損的賠償，也非日本政府財力所得辦到，不得已而僅能於產業團體本身轉念頭。故於設立統制會社之後，為矯正其缺陷，也只能設立媒介性的管團，從事於生產者與消費者，乃至生產諸團體之間的介紹工作，期於其中獲得統制的效果。至管團制度不能舉全面的嚴格的效果以後，日本政府也再設一種統制會，並由內閣有關各省委設各自有關的權限。於此，日本產業政策，愈離國營或國家管理愈遠，這在充分暴露日本產業政策的現實與理想違背的實情。

日本關心產業問題的人士，邇來對於國營與民營爭論甚烈，利潤與增產的矛盾性，也已表露無遺。一般人對於日本政府較劇烈的國家管理，也都大表不滿，以其政府所設限制與阻力太多，如關卡、租稅、辦理手續等等。日本統制政策，終於導致統制會的地步。

原載一九四四年九月三日〈廣西日報〉

日本糧食增產政策的批判

一、糧食增產政策的兩種意見

日本侵略者因其糧食的需要增加，外米的供給困難，邇來增加農產的急躁，已聞名中外，而其農業政策的強化，愈益增加其重要性。

日本政府最近已實施其所謂「超重點的生產」，但此問題不只限於二、三種類的重工業，其根幹的農業問題，也在其中。因為離開農業，則其他工業政策的推進，也不可能。如糧食不夠用，則勞動效率不能向上；勞動力的不足問題不能根本克服，則工業生產的增強不可能。農業在補充勞動力之點，具有極大的作用。此點即自過去的經驗，也自不能置於度外。

自歷史考察，農業所完成的任務極大，其作用不自今日始，各國皆然，日本也莫不然。據日本人的解釋，在明治維新當時，日本之得以抗拒先進資本主義各國，而促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實拜農業部門之賜云。即如軍需工業及輸出產業的發展，也皆以農業部門為犧牲品，此種論說實有相當的根據。日本之所以登上資本主義的途程，大部分依賴農村的「資本原始積累」。即舉租稅負擔為例，明治初年，農村的租稅負擔占至總稅收八〇%以上，而都市的負擔竟在二〇%以下。固然，日本農業在今日在作用與明治初年有本質上的不同，但是日本經濟之依存於農業，在某一角度上，依舊無變，在戰時統制經濟上，此種依存性尤其濃厚。故其農業對策，自然帶上很重要的地位。

在今日日本糧食不夠用的意義上，日本農業對策，自以糧食增產及農業技術高度化，

為其主要內容。在外米的來源日益困難的今日，日本糧食增產的必要性，已為日本朝野所共認。即令日本政府指定超重點生產於運輸技術，但是問題的根本克服仍不可能，外米的來源仍然淤塞。所以究根結底，農業對策的重心，在日本一般仍認其在於糧食的增產。

又如日本年來急驟於考慮工業部門的勞動力補給泉源問題，認其在戰時經濟所占地位極高，則解決勞動力泉源的農村生產問題，也是當然的歸宿。農村生產問題的核心，在於如何提高農業生產性，以增加農村勞動力更多的過剩，以供給工業部門更多的勞動力，這又是改革農業組織及農業技術的問題。日本政府雖然強調其「精神昂揚」政策，但其實際內容則在於技術的改善與經營規模適正化——這當然只是就目前日本資本主義農業經濟組織而言的，所以日本議論糧食增加政策者，也只注意於此點。

日本方面關於糧食增產政策，有兩種見解，值得我們注意：其一是「現狀改進對策」，其二是「現狀加強政策」。前者主張農家適正化，經營機器化，用以提高勞動力的生產性，積極圖謀落後的農業高度化，而將其剩餘的勞動力，移用於工業部門。此時，生產性比收穫量，更占問題的中心。反之，後一種則主張：□□的情勢不許急激的改革，即令強行農業的改革，在各種反逆條件存在的今日，反能阻礙糧食的增加，所以農業的改革，應留作後來的課題。現在只能就目前的情狀，謀節約經營更加徹底；多產一粒米也都是目前當務之急。

二、日本政府的農業政策

日本的糧食問題，自去年外米來源發生問題而其國內需求增加以來，確已相當嚴重而上日本政治的日程。就去年米穀生產實狀考察，一九四二年度的生產目標，原為七一，六三九，〇〇〇石，但其實產額尚不足四二八萬日石，日本農林省雖誇為次於一九一九

年及一九二五年的豐收，但仍難免其聊以解嘲之譏。不得已，日本政府又於去年十一月底發表第二次預想實獲額六，七三六萬日石，其全年收穫額始比前年實收額，增收一二，二七二，〇〇〇日石。

但其糧食問題的嚴重，日本官方也都不能否認。其所舉原因為（一）外米輸入困難，殖民地米產移入困難；（二）因國內人口增加而其需要急速增加。外米因船運不足用及各當地軍米的需要增加而來源已漸杜塞。即從來日本所倚為穀倉的朝鮮及台灣兩處殖民地的糧食供給量，也已減少。朝鮮去年大鬧旱災，在播種期（插秧期）雨水不足，致去年的米產量，比平年減收七、八百萬日石的巨額，只實收一五，六八七，五七八萬日石。據日政府估計，本年度朝鮮米之移入，已不可能。又如台灣產米，據說第二期產不能比平年豐收，而日本內地從來榨取台灣產米，已超飽和點，台灣平年產米一千多萬日石，而輸往日本內地五分之三至四，此後即令再加強壓榨，恐也不能於無中生有。

再就其本國情形考察，日本本年度的舊米存量，比去年度減少，但其米的需要，卻反增加了。日本人口近年大有增加，食米的需要也大增，據估計，本年度米的需要增加七、八十萬日石。再以勞務者及青少年孕婦的臨時增加配給量，也需要一百數十萬日石，所以本年度日本米的需供關係尚不可樂觀（皆據日本農林省發表，內閣情報局〈週報〉三三〇號）。

日本政府於是對於增加米產問題，大起焦躁，苦心孤詣地考慮農業對策。農林省經於召集全國道府縣主務課長，舉行「糧食增產協議會」，協議具體方案，計劃本年度糧食的「飛躍」的增產，其時決定兩項原則：

1. 關於米穀增產上的重要改善事項，及其指導者及方法；
2. 提高兼業低位收穫農家的耕作田園的收穫量，及放棄耕作解消耕地。

其中第一項關於增產米穀的重要改善事項，特別規定於一九四三年度的完成，故其為農業對策，更有其意義與作用，若抽出其具體要點，則有如下：

①關於米穀增產上的重要改善事項：增加種植密度，稀薄播種，擴大秧地面積，確保除草次數，增施自給肥料，實施淡素質肥料的使用，稻熱病及浮塵子的驅除；

②關於指導方法：動員各種團體，活用有系統的指導組織，徹底發動名片、印刷物、講習講話，實地研究會，及座談會等。

據日文經濟雜誌《金鋼石旬刊》二月一日號

上面具體方案，皆限於技術方面的增產辦法，即其指導方法的活用全國的團體，及有系統的指導機關，也與一般沒有兩樣，只本次會議所決議《農業團體統合法案》，若付諸實施，則本來四分五裂的指導統制，將趨於一元化，日本朝野也正如此期待，但其前提條件，必須日本農業團體先統合成功始可。

三、土地改良與機械耕種

日本目前的農業對策，大部份限於技術的提高，所以此次會議，特別考慮到兼業低位收穫農家的對策，其理由就是：以獲得自用糧食為目的的農家的單位面積收穫量，一般低劣，不能協力於其農產物的供出，是決戰下糧食增產確保上的「大障礙」。此種農家在日本佃農耕作中，也是最脆弱的一環，一向構成日本農業經濟上的嚴重問題，固有施以根本對策的必要。但是日本政府的對策，並不能從根本上謀得解決，而只著眼於其收穫物的增加，其具體辦法如下（據《金鋼石》雜誌所掲載）：

1. 昂揚農民精神，以舉增產的實績；
2. 組織糧食生產實行共勵委員會，以參畫耕種設計，且由市町村農會以一人一戶辦法指導農家；

3. 種苗消毒、育苗、肥料分施等作業，由部落農業團體，共同或一齊實施；
4. 對於勞力不足的農家，施以勞力服務；

5. 若希望縮減耕作面積，則先與農地委員會取得聯絡，而實行再耕作或共同耕作；
6. 圖謀婦女勞動力的利用，及其技術向上。

又為防止此種農家因勞動力不足而棄耕田地增加，並考慮兩種事項：①為圖增加生產力，而急速完成暗渠排水及土地改良方法；②普及農具，特別是水田畜力中耕除草機、旱田畜力中耕機、畜力挖薯機，以補勞力之不足。

日本政府固置農業政策的重點於土地改良及普及機械耕種上，但是實際上的效果，不會甚大，因為農業經濟上的阻力甚多。只就所謂土地改良一項說罷，問題也極複雜。

日本的土地改良費，一向占很低的地位。例如每一日石的生產費，在自耕農的總額為四十元四十六夷，而其土地改良設備費，則只有七夷，占〇·二%，每一反步的生產費總額一百零七元六十一夷，而其土地改良費則只有十八夷，占〇·一六%。土地改良費，在佃農尤其低微。以如此低微費用，如何能夠改良土地呢？日本一般通行的地力剝削問題，在戰時仍無解決的希望。

因而，最近日本各方面提起土地制度的改善問題，但是他們所注意的，仍在於技術方面，即土地交換分合的提倡。在日本現存的經濟制度，實行集體耕農，既不可能，則此項土地交換分合政策，自也不能有過大的效果。

再如提倡使用機械耕種，以提高農業生產性，固也不失為增加生產的一種方法，對於農村勞動力的調整，也是一種解決策。但在日本現在的情況下，此種政策仍是此路不通。戰時日本正集中全力於所謂超重點主義的直接軍需品的生產，無暇顧及農耕機械，姑不具論；即自農民本身言，也只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鏡花。單就經濟情形比較優厚的自耕農說，以占生產費總額〇·一六％的土地改良費的農家，如何能夠付出巨額農業機械購買費，以從事機械耕種呢？

四、日本政府的本意

日本農業政策的根本目的在於糧食的增產，尤其是食米供獻量的增加，其所注意的對象，第一是增產，第二也是增產，第三仍是增產。日本農林省的糧食補給政策，尤有更露骨的指示：

第一、增產麥類、番薯、馬鈴薯等雜谷，以增加米供獻量；

第二、更徹底實施一般的消費規正辦法，此後盡可能實施綜合的配給；

第三、節約農家的消費，強化米穀的供獻。

第一項規定的具體內容，很容易明瞭，毋庸贅言。其第二項及第三項農家消費規正與節約，則有如下內容：「業務用米及加工用米，如釀醬用米、釀酒用米及製糖果用米，除十分必要者外，皆極力禁用」。對於一般日本國民的食品消費，去年閣議決議普及「糙米食用及搗精限制」，如七分搗、半搗或三分搗（根據內閣情報局《週報》三三〇號）。

總而言之，日本政府今日的糧食增產政策的根本目的，在於迫使農村增加米的供獻量，羊毛還要出在羊身上，日本「百姓」對於戰時的壓迫，將何以堪！

日本政府一九四三年度的米產預思量，是七，一五九萬日石，不足以應付需要，乃求之於雜穀的番薯、馬鈴薯，及麥類的增產。從單位生產量言，番薯占第一位，米占第二位，馬鈴薯占第三位，而麥類最劣。所以日本政府所希望番薯及馬鈴薯本年增產三四成，番薯一七六，三〇〇萬貫，馬鈴薯七八，一〇〇萬貫，並又特別注意麥類的增產。自本年一月二十一日發動一個「麥類增產完遂運動」，其生產計劃為耕種面積：大麥四二三，四六六町步，小麥九〇六，六六八町步，裸麥五四三，四六六町步，總計一，八七六，七一七町步，生產數量：大麥九，〇二六，四〇八日石，小麥一三，六〇一，三五四日石，裸麥八，三二六，二十日石，合計三九，一五三，九七二日石（據內閣情報局所發表）。

日本政府顯欲以雜穀代米產，而移食米於軍用，而其糧食增產政策的「窮途末路」，於此可以具見，毋庸多加剖述。

原載一九四三年九月五日《大公報》

日寇的「超重點」產業

自從美英在太平洋上對日發動反攻並得節節勝利以來，日本朝野即開始在聯合國總反攻之前，恐懼戰慄了。六月間，日本政府匆匆召開第八十二屆臨時議會，其主要議案集中於如何加強對美英決戰的各種施設，自非偶然。

原來，日寇早已規定今年為決戰年，而以上次議會為「決戰議會」，早在決戰即將來臨的覺悟下，通過許多關於應付決戰的法案。此屆臨時議會，不過是企圖再將上屆議會通過的各種法案，更加加強施行罷了。但是所謂決戰的意義，不只是軍隊對軍隊的戰鬥而已，尤其不是一次作戰即算完了的工作。日本當局亦已覺悟及此，故重申此次戰爭為「百年戰爭」，並呼籲國民發動全面的總力戰以應付一個跟著一個不斷而來的決戰。

在其與美英決戰的許多連環當中，日寇感覺最重要的一環，就是「生產戰」。美國產業近年來不斷的飛躍的發展，及其生產量的天文學數字的增加，已使產業生產性落後的日寇發抖而痛感將來戰爭的勝負，決於其與美英作生產比賽的結果。所以在決戰議會中通過的決戰議案大部分與如何加緊生產，尤其是軍需生產有關，其產業政策如此，即其政治上的決戰，也莫不如此。日寇產業政策的新決定，是指鐵鋼工業、輕金屬工業、煤炭工業、造船工業，及飛機製造工業五種，當所謂決戰階段的「超重點產業」，計劃自本年起集中生產於此五種產業部門，以期提高最重要戰時物資的生產性，增加生產數量，以便充分補充前線至於「無憾」，完成所謂「決戰的趨勢」。

但在日寇加緊決戰生產施行超重點主義產業政策上，最關重要的產業行政指示，我們應先予以剖述，因為這個行政的新措施，是日寇施行超重點產業政策的關鍵，這就是本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內閣情報局所發表的《戰時行政職權特例案要綱》的頒布，其

概要內容如下：「凡關於鋼鐵、煤炭、輕金屬、船舶及航空機等重要物資的生產擴充上，有特別必要時，內閣總理大臣對於關係各省大臣，得予以必要的指示；」。「在前項物資生產擴充上有特別必要時內閣總理大臣，將關於勞務、資材、動力及資金，接受各省大臣的職權，應自己執行，或指令各省大臣執行」；在上項場合之下，總理大臣還將「行使一切行政官職，或其官吏的職權。」日本首相東條的獨裁權，已由政治伸入經濟，乃至產業界了。

從來，日本的內閣組織由於其經濟組織及政治制度的多元性而採取各省獨立自由主義，各省各有獨自的權限，不相聯繫，故而至於互相對立，即總理大臣也都無權管轄全體閣僚，統一號令。一九三九年日皇雖已頒布敕令，規定內閣總理大臣，得以命令各省大臣，但在事實上並未發生效力。直至今年一月公布《戰時行政職權特例案要綱》；又於上屆議會（本年三月）通過《臨時措置辦法》，而總理大臣的產業獨裁權，始算確立，日人稱為「生產行政一元化」。

日寇即在東條的產業獨裁政策下，加緊推行其超重點的產業政策，首先推行的部門，是製鐵煉鋼工業、造船工業，及飛機製造工業，因為這三種工業，在今日的戰時體制當中，日寇認為是超重點中的重點。

關於製鐵煉鋼，日寇集中生產於五六家一流的重點公司，其最主要的公司，就是日本製鐵公司、日本鋼管公司兩家。日寇的超重點政策，不但一流重點公司的集中，並且實行重點地域的集中，例如在關東地帶，集中生產資材及勞動力於日本鋼管公司。日本的鋼鐵工業，從來是利用海外的礦石，以供其內地的生產，大部分集中於官營的日本製鐵公司。但該公司的成績並不甚佳，生產能率不能比民間中公司高。為提高其效率，特於去年十二月在八幡實施所謂「增產周」，最近又與鋼管公司提攜，日本製鐵公司採用鋼管公司的湯馬士制鋼法，而供釜石的礦石給鋼管公司，放棄從來的官管臭架子，謀與

民營公司合作。聞本年的新擴充，需要新資金，在五億元以上。

在戰時的製鐵煉鋼工業中，最為重要而困難的就是特殊鋼的制煉，日本將特殊鋼的製煉，集中於特殊製鋼公司。該公司自七·七以來即應日本政府的要求及戰時下的特殊需要，而連續實施擴充計劃，首先實施的是軍用工場的擴張。其次又建設新工場於川崎、橫濱，該公司以前因為生產資材及勞動力的資源枯竭，生產能率沒有充分發揮。至最近日本政府予以獎勵，定為超重點公司，正企圖充分供以資材及勞動力，強令該公司積極擴充。

製鐵煉鋼，若說是重軍需工業的基礎產業，則造船造機及槍炮製造工業，就是該國基礎工業的加工工業了。日本近年來造船的擴充甚強，因其需要迫切。自對我發動全面侵略以來遂感大量船運的需要，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其運輸船更感不夠用。所以日本近來以強制的辦法，通令造船公司增加生產，現在日本的造船已由普通機的製造，擴充到木船的製造了。最近又指定超重點主義的造船公司，加緊其生產，其最主要的，就是三菱重工業公司，川崎工業公司、及浦賀船塢公司，就中尤以三菱重工業公司為超重點中的重點。

三菱重工業公司的生產範圍，不獨限於造船，即飛機及機器，也為其生產對象。三菱的機械、規格、精度，皆為日本工業界的代表，普通公司不能製造的，該公司都可以製造。三菱重工業是以三菱財閥的雄厚資本為後盾，故其生產設備，隨戰爭之發展而日益擴充，日本政府也即利用此點，更加通令該公司大事擴充，一方面令該公司各造船工場擴充設備，一方面令承受江南船塢的委托經營，增設朝鮮重工業及台灣船塢。三菱重工業公司擁有製造大型船舶的特別技術，日本政府尤為器重。長崎以次各造船所已在銳意擴充中，最近又受昭南（日方資料只打××島，據筆者推測或即為昭南島，即星加坡）的經營委托，積極於復興工事。此外，川崎重工業公司及浦賀船塢公司，也都有積極的

擴充；前者與三菱重工業齊名，號稱日本造船界的雙盛，後者因其位置於東京灣並與特殊方面有關係，在其擴充上有特殊的便利。

日本的鋼鐵製造工業，集中於三菱重工業公司、川崎重工業公司、住友股份公司，及中島股份公司。三菱重工業公司，即因擴充飛機的製造工程，而於一九四二年十月，徵收加倍增資的第一期消納六千萬日元，其不足部分的資金，尚以公司債或借貸的方式彙通過來，其資金總額，已突破十五億元，各種事業皆在繼續擴充中。

川崎重工業公司的造機部門，也屬日本第一流的地位，其造機人材及技術，比較豐富，日本政府期望甚殷。日本政府對於川崎重工業公司的擴充，第一步先檢驗其資金部分，此次又加指定為超重點公司，而供以豐富勞力與資材。現在資金達二十億元，全部銷清，日政府還敕令以公司債、借貸及特別資金的辦法，擴增資金而擴大機船各工場的設備。

浦賀船塢公司，在造機工業之點，也是日本有數的公司。聞該公司以其造機部門，為造船的心臟部，以推行聯貫性的製造。且以其擁有汽機、汽罐、蒸氣揚航機等製造技術，而採用生產合理化辦法。日政府一再獎勵該公司擴充設備，如浦賀工場大擴充，青島船塢能力的增加，四日市工場的新建設等等。此外還對於該公司的子分公司的名古屋造船公司，要求連續的擴充。

要而言之，日寇自入本年決戰年以來，更加集中全力，以「必死」的狂態，從事於超重點主義工業的生產，其超重點中的重點產業，更謀其飛躍的發展。在日寇作戰參謀部的估計中，美英本年或明年秋以前，當不至於對日實行總圍攻政策，蘇聯向有與日本維持中立關係的可能，中國只能作局部的反攻，故總決戰尚有待，正可以利用這個時期，趕緊軍需生產，以備未來。日寇現階段的政略集中於此點，而貫徹於其本國及占領區。

改軍事戰為生產戰，是日寇作戰上的進步，惟其如此，聯合國家更應趕快設法破壞它的生產設備，勿坐大了日寇的戰爭工業生產。

原載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廣西日報〉

日本戰時中小工業的沒落

日本工業生產性的低下，保持著普遍的中小工業存在，日本社會的特色就以此中小工業製品的消費，中等階級為中堅，日本統治者曾將此特色誇示世界，其社會政策也以維持此中產階級為方針。大凡住過日本的人，總可覺出中產階級衣食住行的便利。

出自戰爭的需要，逼迫生產要素缺乏貧弱的日本，必須集中生產於戰時必需品，尤其是軍用品以來，日本中小工業就難免步入沒落的途程。而日本社會失卻調和，日本社會動蕩不寧的一部分原因，也即孕育於此。茲述其中小工業的沒落必然性及情形如下：

一、日本中小工業的內容

日本的中小工業一向在日本工業體系中占很高的比重（詳見拙著《日本工業的危機》——中山文化教育館版），直至中日戰前，還都普遍存在於國民經濟的各部門，大別之可分為三大種類：（一）以農林產物為原料的農村家內工業，如各種織物、陶瓷器、製材、木製品、日本酒、豆醬、醬油、竹製品、茶葉、柳條製品及藤製品等，以至稻草製品、麥桿等；（二）大都市貧民街的家內工業，如席類、橡皮製品、玳瑁製器、火柴、電泡等類；（三）農械及器具工業的承攬手工業，如各種機器零件工業。

日本此類中小工業，皆有其存在的社會經濟的原因。例如第一類的農村家內工業，因其原料受到現地的約制及農家副業與兼業的經濟關係，而致其生產技術不能脫離手工業的區域，其中尤以日本農家經濟機構的缺陷，為最大的原因。一方面因為農業高地租的壓迫，佃農乃至半自耕農的家族，必須兼營副業，以至充當廉價的勞工；另一方面又

為平時日本農村勞動力的過剩，而小資本的廠主，得以就地經營中小工業生產。是以日本中小工業在都市高級工業發達的今日，尚得以普遍存在於日本農村，形成一種畸形的發展。

再如第二類的都市家庭手工業，也幾乎以同樣經濟機構的原因，一方面社會經濟的壓迫，逼使日本都市生活者的家族，尤以需要為著，從事於生利□□；另一方面有些工業如製鞋、席類、□□等製品並不需要高級的技術。所以日本都市的貧民街住民的家族及農村的兼業勞動者，遂為小資產工廠主所利用，以經營此類中小工業的大工場及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阻礙，如電泡及火柴工業等，原可以大量生產，但事實上則為中小工業所代替了。

再如第三類的承攬工業，生產各種機器的零件，原可以由大工場從事於大量生產，但是在日本也以社會經濟的原因：第一，日本的機器市場不大；第二，大工廠主願意避免擴充設備費的增加；第三，在蕭條乃至恐慌時期，可以轉嫁其虧損於中小工業者。是以普遍地成立承攬工業者可以轉而極度剝削農村兼業者及都市的過剩工人，故其經營方式為□□的行會制度。

二、中小工業的地位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日本中小工業是以日本家族勞動力及農村過剩勞動力為前提，而以低廉工資及高度能率為條件，其生產範圍，普及於一般消費財的生產部門，以至侵入生產財的生產部門，而大量生產的大工業的發展受到相當高度的阻礙。但這是日本高率地租地稅壓迫下的農業經濟及高度剝削下的都市低廉勞工制度所產生必然的現象。而於其於日本國民經濟中所占地位的重要，也可以想見。

然則上述中小工業，在日本國民經濟的再生產過程中，又具有如何的作用呢？

第一及第二類的中小工業，屬於消費財的部門，日本絕大部分的日常生活用品，皆仰給於此類中小工業的生產。日本一般人民所使用的日常用品，如布匹、雜貨、粗物類、金屬類，乃至酒和玩具，都不能離開此類中小工業。日本一般國民對於此類中小工業製品的□□者，已具有一種□□性。

其次，日本中小工業生產，在日本輸出業中也占據重要的地位，在中日大戰前，此類工業製品，占日本工業品的輸出總額三分之一以上。日本即靠此輸出以購返金屬、金屬礦石、廢鐵、工業用鹽、汽油等日本所缺乏而急需的重工業及化學工業的原料，乃至重化學工業製品、高級機器類等。在日本國民經濟組織之中，消費財的生產部門與生產財生產部門，缺欠彼此的連系，更不能相互依存，所以在其再生產過程中，必須依賴外國貿易，始得進行無阻。換言之，日本工業生產，在某一方面必須輸入，但欲輸入繼續不斷，又須繼續不斷的輸出。再換言之，日本必須輸出中小工業製品，始可以得到外國的重化學工業製品。中小工業生產在日本國民經濟上的地位，尤其重要。

三、中小工業沒落的命運

日本中小工業生產，在其國民經濟中，雖具有上述重要的地位，但自中日戰爭爆發以來，其所以存在的一面原因，漸因外國市場的喪失而漸減少。尤其自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洲發生第二次大戰而暢銷於歐洲市場的玩具、罐頭等工業生產，失去大部分根據。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日本的生絲及絲織品，再喪失了美洲的最大市場，日本的中小工業，已走入沒落的決定階段。

自今年日本贖武政府決定「超重點主義」生產政策，決將所有的人力、物力，及生

產設備，集中於戰爭必需品，特別是軍需工業，如製鐵、煉鋼、造船、造機等，日本中小工業，沒有充分存在的理由。日本中小工業沒落的命運，已決定於日本現階段的工業政策上。

例如日本支柱工業的紡織工業（它完全採用了中小型的家庭工業或工場等工業的生產方式），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即已減少九〇％的生產。現在日本政府更欲以此種手工業為犧牲，對於紡織工業，僅保留紡機一百萬錠及織機三百架以上的大公司，其他中小工場全部命令停止生產。又如製絲工場原有數千，今只允許保留一五〇家工場，家庭的製絲業，悉被禁止，自是必然的歸宿。

日本政府的超重點主義的生產政策，對於中小工業是一種極大的打擊，且又是日本一般消費者，特別是中堅業主的一大厄運，這是日寇對外侵略戰爭所賜予的恩惠。

原載一九四三年九月二三日《廣西日報》

美國雄厚生產威脅下日本船運的苦難

一、美國造船的壓力

在西南太平洋方面逐島退卻，在中太平洋方面受到「越島進攻」，在北太平洋方面美國「空間要塞」日益加強，尤其在中國大陸上中美陸空軍協力反攻日益加緊的情勢下，日寇的「決戰」心情，日趨慌亂而手腳皆忙了。

一九四三年，日寇將之稱為「決戰年」，春間召開的議會，也稱為「決戰議會」，但是事實上在軍事方面並沒有決戰，也不能夠決戰。因為日寇一切的準備，皆不充分，且在決戰準備的諸多條件的苦難中掙扎。日寇決戰的姿態，延至一九四三年秋出關時，漸漸覺出苦頭。一九四二年間作成的決戰準備議案，已不大適用了。其基本原因，就在於船隻的缺乏與海運問題的困難。

日寇的船運，不但目前處於劣勢，同時且為美國雄厚生產所威脅。據日方所披露，去年四月中美國造船所所交出的新造商船，即已達一五七艘，一六〇萬噸，破了美國造船的新紀錄，一日平均造船五艘（據三五二號日本內閣情報局〈周報〉）。又據美國戰時海運局長藍愛漢所發表，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二年底四年間，美國陸海軍所徵用的船隻，共達三五六艘，五百萬噸。而一九四三年，美國的造船目標，定為一千八百艘，二千萬噸以上。日寇終於喊出「戰局的現實，常與輸送船結著深切的關係，即在睡夢中也不應忘記」（同上）。

日寇大本營海軍報道部秋間所發出的悲鳴，尤值得我們吟味：

「戰鬥的火花，確實在第一線散漫著。但若飛機以次的兵器、彈藥、食糧及人員等後方的補充力，不能跟上前線的要求，則第一線非遭遇非常的苦戰不可。美國正在蜿蜒五千海哩的廣大海上，為克服萬難而狂奔於第一線戰力的補充增勢，形成其根幹的，不消說，就是船舶。近代戰的兵站補給線的確立與否，就是勝敗的決定要素，其原因也即在此」（同上《周報》）。

日寇已在美國船舶的飛速的生產之前，開始戰慄了，且又為著趕緊製造船舶而手忙腳亂，其各部門戰時生產也受了致命的打擊。日寇大本營海軍報道部的結論，稱曰：「酬報在黃熱瘴癘的第一線奮戰的將兵的方法，只有「統後」戰力的增強。敵方現為統後戰力增強而拚命，此次戰爭，即為美日統後戰力的決戰」，而日寇一切的「統後戰力」又須決定於海運，故此海運問題予以概要的剖述。

二、制海的重要性

近代海上交通的發展，把整個世界聯成一個節節相聯的網，而整個世界之如此打成一片，又在海運交通上增加了重要性。

「制海即可以制世界」，這是世界舞台活動者的一個信條，但是「制海」的武器，就是船隻。船隻的製造數量和質地，愈發達進步，就愈能制海，因而又制世界。島國民族的這種信念，通常是非常堅決的。日本素具對外侵略的野心，近來更想獨霸整個亞洲（包括棋布於大洋洲的無數島嶼），其所具這種信念，尤為堅強。

日寇的船運事業，原已相當發達，但自發動侵華戰事及太平洋戰爭以來，運輸增加數十倍，船隻及海員的需要，也驟增數十倍。太平洋戰爭演至現階段，同盟國家對日作戰，已由防禦改採進攻戰略，日寇為著保持其廣大的占領區而須加強西南太平洋的防守，

從日本本土經由日本、中國海，以至西南太平洋，綿延數千海里，所需船隻甚多，日寇對此已感覺頭痛。

日寇要繼續作戰，必須保持西南太平洋的新占領區。日寇是以資源貧血症聞名世界的，而西南太平洋那裡，正可以給日寇輸血。關於此點，筆者曾經發表過詳細的數目字，現在只據美國著名軍事評論家尼可爾遜陸軍少校簡單的估計，日本在這個地方已經「占有世界橡膠九〇%、錫七〇%、米產九〇%、亞麻幾乎全部、鋼鐵及廢鋼數百萬噸，至汽油方面，只荷印的出產即夠轉動日本艦隊、航空隊及運輸輪船」。日本喪失西南太平洋即喪失幾乎全部的戰爭資源，也即喪失幾乎全部的戰爭能力。所以日寇必定拚命企圖保持南太平洋的新占領區，而船運的重要性更為增大。

日寇稱今年為「決戰年」，已為決戰的執行召開過三次議會，現在又要召開第四次議會，其手忙腳亂的醜態，已可想見。再考察十月二十六日東條在八十三屆臨時議會的致詞，更可窺見其應付太平洋戰爭的焦慮內情。從大體上說，日寇今日與其說是「決戰」，不如說是「加強備戰」之為愈。日寇目前最大的嚴重問題有三：其一是防空問題，其二是糧食問題，其三是輸運問題。而此三者的關聯點，集中於航運。要加強防空必須增產飛機及汽油，而絕大部分汽油在西南太平洋，須賴航運始得達目的。日本本土素缺糧食，而絕大部分的米產，在泰國、越南、緬甸及台灣，日本要搬回這些米產，目前捨船運以外，尚無他法。

日寇固也企圖完成其「大東亞縱目鐵道」的建築，以補救其船運的缺欠。這個計劃的實現而即連日本人也承認是一個「未來的夢」（八月號〈揚子江〉），日寇目前仍不能求救於船運的加強。

三、船舶需要激增

船運的基本條件，就是船隻的增加。日寇在同盟國家總反攻之前，已經覺悟到問題的嚴重，他們承認：「以誇耀龐大資源的美英為敵的大東亞戰爭，是資源的戰爭，生產力的戰爭」。「海上輸送力，絕對必需船隻，若只擁有大東亞共榮圈內物資豐富，還只等於月球世界的物資，對於戰力的增強，沒有絲毫的幫助。船隻，也只有船隻，才是增強戰力的關鍵，才是大東亞戰爭必勝的武器」（日本內閣情報局〈周報〉本年七月二十八號）。

另一方面，太平洋上船隻的需要，驟然增加；一方面英美荷的船隻全部撤退，他方面戰爭的需要增加，這些補充的責任，加在日本黷武主義者肩上。

據日本自己的統計，一九三六年爪哇、馬來、菲律賓、泰國，乃至安南的入港船隻，約八〇%為美英荷蘭的商船，其噸數約在數千萬噸以上，現在這些船隻全部需要日本船隻來補充。

增大太平洋上日本船隻的需要，還有一點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戰線及補給路的延長。現在，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戰線，北自阿留申群島，南至孟加拉灣的安達鼓島，西至印度洋，廣袤數千海里，並且這個廣大的海原是距日本本土很遠，故其補給船舶更需要大量的補充。

然則至此廣大的海面上，究竟需要多少的船舶？現在假定日本在我東北、關內及西南太平洋各地域的同量補給物資，是以日駛二五〇海裡的船舶輸送的，則一年間的航海回數及所需要船隻的比數如下：

地 區	一艘一年航海回數	日本↘東北間為1
日↘東北，華北，華中	約三十五回	一·〇
日本↘華南間	約二十一回	一·五
日本↘爪哇間	約十三回	二·七
日本↘緬甸間	約九回	三·八

補給路愈由我東北伸向我國關內，更延長至西南太平洋，則其所需船隻，愈益增加。具體言之，現在所需要的船隻，若與九·一八事變當時比較，即約略增至四倍。這是以單純伸延為假定的，但是實際上，日本到東北及華北、華中、華南，仍須繼續輸送，故若就全部運輸計算，現在所需要的船隻，應在九·一八事變的九倍以上。若再自泰國、越南乃至北太平洋方面的廣大外圍考慮，則所需要的船隻，將更增加多了。

四、日本船隻的減少

日寇目前所需要的船隻比例數量，較之九·一八事變當時，增加十幾倍，確為日寇軍事當局頭痛的根源；但他方面，運輸船隻的減少，更為增加這種頭痛的劇度。

有據稱二大的原因，減少了日寇的普遍運輸船隻；其一是由於軍隊的強制徵用，其二是作戰上的重大損失。

先說因為軍隊的徵用，而一般的輸送船舶減少罷。

日寇徵用一般船舶，主要的有兩種種類，都是送到戰爭的第一線服務軍務的。第一種徵用船稱為「特設海軍艦船」，第二種稱為「兵站輸送船」。因為軍隊的這種徵用而日寇普通的物資運輸船減少甚多，其確切數目日方雖未發表，但就一般言，美英兩國因

此種徵用而普通運輸船約減五〇%；日寇因為戰線格外延長，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兩種事實更使日寇的軍用船數增加而一般船隻減少。第一種事實，是日本糧食及軍需資源皆須仰給於侵占區，如米之於安南、緬甸及泰國等地（約占全世界米產九〇%），橡膠、亞麻、錫、鐵、汽油之於南洋各地。第二種事實是日本軍隊的用品，由於習慣與生產關係，上自飛機、大炮、子彈，下至軍服、罐頭、醬菜，幾乎皆由日本本國輸送供給。此兩種事實，造成日本作戰的南轅北轍的矛盾與困難，其軍用船隻更為格外的增加，而一般運輸船比例地減少了。

日本運輸船減少而需要增加的第二種原因，就是在於戰爭的巨大損失。此點可由兩方面說明，其一是普通運輸船的損失，其二是軍用運輸船的損失，尤以後者為巨大。太平洋戰爭的初期，由於日寇的突擊而英美淪陷了南洋各領地，英美為防止這種情勢的擴大而採用潛艇戰及飛機的轟炸。現在日寇的海軍陣容恰好形成一條細長的線狀，且其南北兩端又處於彼此互相節制的關係之下，英美正好利用潛艇及飛機，以切斷日本南北的聯絡，所以美英上述戰略的發動，對於日寇運輸船的打擊非常嚴重。

英美在太平洋上的戰略，始終著重於運輸破壞戰，在戰爭初期，用此種戰略阻止日軍前進，最近更用以切斷日軍的聯絡，打擊日本的總戰力。近來英美比較著重於攻擊日本的中間路線，從夏威夷經威克島、中途島、關島、日本南洋委任統治地、菲律賓群島以至台灣，主要原因即在於此切斷戰略。

五、日航運最近的厄運

（略）——編者注：因原稿模糊不清。

原載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一—二十一日《廣西日報》